

目前中國政局的解剖



3 0534 5599 8

1

五中會議以來，中國的局勢，已經又由一個反動的，官動的狀況，進而入於一個觀望的，相持的，不動的狀況了！在這個觀望的，相持的，不動的狀況之中，他們所用以籠罩社會，為統治者鞏固已經獲得的地盤說法，是一個虛偽的口號：「北伐成功」，「訓政開始」；他們所用以妥協政局，為封建軍閥把鑷的說法，是一個欺騙的口號：「分治合作」，「相安一時」。從政治方面講起來，什麼天花亂墜的「建設」，「五院」，「人選」，「易職」，「迎靈」等等的莫名其妙名詞，是隨着安福系，政學系，研究系，以及什麼元老元少，財閥學閥，買辦，地棍，娼妓，反革命的魁首。躡躑登庸，一齊出現於打完北京以後之所謂「國府」的政治舞台；雖然我們不願意他就是像曹吳時代之賣官鬻爵，然而他們的事實，實已遠過於軍閥時代之分贓打搶！從黨的面面講起來，是已經由一過「再度清黨」的主張，圓滑到了進一步的「直接指派代表」，「特種登記」等等名目，以求達到自種到頂，都能夠腐朽一氣，貓鼠一撥；不惟大膽的要犯

新時代的醞釀與中國革命的新趨向

(一)

黨硬到一兩個人荷包裏面去，而並且還把黨硬斬送到十三年以前，甚至於民二以前之一個腐朽的垃圾桶裏面去。從革命的方面講起來，在這個次殖民地的中國社會裏面，他革命的第一個對象，誰不知道是帝國主義？他第一個緊要的工作，誰又不知道是打倒帝國主義？然而近時以來，不惟帝國主義者所持以生存的平等條約，是已經由「修改」之名，作進一步的承認之實，並且就是羣衆用鐵和血所已經達到取消了的，收回了的如漢口九江租界，也已經是無理由，無條件的放棄；不惟英帝國主義者在兩廣，在長江一帶的勢力，是由保守的進而至於發展擴大，並且就是日帝國主義者他們之在山東，在滿蒙的勢力，也已經是由一個動搖的時期，進而入於穩定發展，飛揚跋扈的時期了，這是第一。革命的第二個對象，誰不知道是封建軍閥？他第二個緊要的工作，誰又不知道是打倒封建軍閥？然而我們只要簡簡單單的去看看，看看現在那些聲威嚇嚇，來做總理惟一的忠實信從，來做黨裏惟一的忠實同志，是以前的那些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民衆之受壓迫，與論之被摧

許德珩



A233991

變，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不自由，什麼暴徒，亂黨，土匪，農匪，學匪，甚而至於「做黨務工作的人，也就是惡化，（用南京中央某人述語，見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海各報）等等名詞，一天天的喊得響亮，喊得熱鬧，喊得新奇，也就是一個必然的趨勢，無所用其驚異的了！因為統治者是這些極少的人，他們要維持他們所搶奪得來的地盤，欺騙得來的地位，要繼續他們所已經工作的投降妥協的勾當，他們之向民衆壓迫進攻，又更是事勢之所必然，無所其驚異的了。

這是近時反動的局面之一箇荷殘殘喘的形勢，和在這一箇荷殘殘喘的形勢裏面之一些叫人憤懣，叫人痛心莫過的事實。本來，從這箇反動的局面之本身說起來呢，他這一箇均勢的假聯合戰線，在某種情形之下要戰爭，在某種情形之下又想調和，本來是一箇極矛盾，極衝突的表現，朝日冰山，他崩潰即在目前。並且從歷史上許許多多的革命歷程看起來，每當一次革命失敗以後，而反動的勢力，亦即推波助浪以起，來消滅革命，中斷革命；不過反動的勢力，雖然是因革命的失敗而推波助浪的起來消滅革命，中斷革命，然而他却不知不覺的是在那裏醞釀革命，鼓勵革命，助長革命，他總是不足以消滅革命的；他不惟不足以

消滅革命，而並且還是在那裏醞釀一箇新的局面，新的時代出來。你看，法國第一次革命到了一八一四年以後，不惟宣告了死刑的「布汝奔王族」Bourbons，是重新復活起來，人民所切齒痛恨的貴族僧侶，和在革命時代所已經放逐而不敢一入國門的反革命派，是盤據要津，重新活動起來，並且就是在政治上，法律上所已經廢除而可以不必取用的一些舊的制度，也都恢復轉來，這總可以說是反動到極點了哪，然而這箇反動的局面，却醞釀了一八三〇年的革命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再就俄國來說罷。一九〇五年十月革命以後，反動的勢力，也就是夠凶了，然而他却培植了未來的一箇新的革命，醞釀了未來的一箇新的時代。再就我們中國來說。辛亥革命以後而產生「民二」，「民六」之反動的局面，他不惟沒有終止中國的革命，而却醞釀了一箇「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他緊急的應時而出，爲中國革命的途徑上，展開一箇新的局面出來。「民九」「民十」以降，段張曹吳賡續的統治中國，政治上的反動，高壓，也就可以說是凶極了，而「五卅」，「三一八」的事件，也就是很急切的，很凶勇的，針對這箇極反動，最高壓的政局，從這箇極反動，最殘酷的政局裏面，破圍衝陣，衝了出來，以與當時國內外約惡勢力宣戰；更由這箇極反動的政局

，把當時一些分散的革命力量，逼得團結起來，來幹三年以後到十六年以前的革命。由這些歷史上的事實看起來，一箇社會裏面，假若他的客觀條件是需要革命的時候，即反動的勢力，因革命的退潮而暫時聯合起來，也是不足以消滅革命的；他不惟不足以消滅革命，而並且不知不覺的還是在那裏促進革命，助長革命，因此，我們對準着現時政局的本身來說，無論統治者是怎麼樣的去與帝國主義者勾結妥協，無論新軍閥，舊軍閥他們是怎麼樣的去調和拉攏，也再無論資產階級是怎麼樣的獻計幫忙，以求達到「相安一時」的政局之實現，來打擊革命，而我們還不能不堅決的承認，這種反動的局面，也逃不脫過去歷史上的一些公例，他是在那裏醞釀新的時代，促成新的局面之實現；中國大多數被壓迫的民衆所要求的一個新的革命，還是在這個最反動的局面裏，破圍衝陣的出來，而不會消滅的；爲什麼呢？因爲就現在中國的客觀環境看起來，他於銀行，交通，貿易，礦山，鐵道，關稅，工廠，租界，租借地等等，每年所進貢於帝國主義之十二萬萬元巨費，不惟沒有絲毫的減除，而並且因爲近年來之戰爭不息，於銀行，交通，貿易，工廠，租界，租借地等等，所報効於帝國主義者的，只有一天天的加多，又兼以軍閥的打搶

，貪官污吏之剝削，豪紳痞棍之再來，苛捐雜稅之有加無已，社會已日趨於擾亂，民衆的經濟狀況，已日陷於窘困乾枯，「安」既是不可能，「定」如何有？而如吳稚暉先生所謂之「相安一時」的說法，在他不過只想鼓勵鼓勵已成的軍閥，已存在的貪官污吏，東山再起的豪紳痞棍，叫他們安心去剝奪搶掠，不要再爭奪鬧亂子，然而自一般貧苦的民衆們看起來，狗搶肉骨頭，當然免不了有些張牙舞爪，這是用不着去替狗幫忙，而這些猶猶然張牙舞爪之聲，都是在那裏等候着廚房裏伙伙先生用官錘火棍到來，全家要飯吃的人。是用不着害怕，也更是不着因爲怕狗咬人，就去替狗幫忙的。

(二)

反動的殘餘勢力之不足以消滅革命，他只有不知不覺的在那裏促進革命，助長革命，醞釀一箇新的時代出來，那末，我們現在應該要怎麼樣的歡迎這個將要來的時代？應該要怎麼樣去預備這個將要來的新的革命？並且應該怎麼樣去穩定這個將要來的新的革命，莫使社會上再經過了一次革命以後，又要走到一個反動的途徑上去，以至於打擊革命，摧殘革命，中斷革命呢？

簡單的來解答這幾個問題，第一就是要澈底的來肅清

反動的勢力。第二就是要充分的來預備革命的力量；這兩個問題沒有相當的解決，無論天天去喊打倒什麼，推翻什麼，都是一個空談，一個口號，於革命的本身，是沒有絲毫的好處，而只有無窮的害處。

其實，目前之所謂反動的勢力，其結晶就是在於封建階級，豪紳資產階級，而所以表現這箇封建階級的毒餒，就是一些地域觀念，英雄思想，閹閹思想，和一些綽名教的思想。由這箇地域觀念，英雄思想。閹閹思想逼着帝國主義者的幫助和利用，才有這十幾年來前仆後繼，生生不已的一些封建軍閥；更由這箇綽名教思想之流毒，所以才有革命失敗以後之一些復古的反動思想之「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似的到來。歸結一句話，目前反動的勢力之結晶，是帝國主義者所利用的封建階級與豪紳資產階級，所以要肅清反動勢力，當然是對付這箇封建階級與豪紳資產階級，而能夠對付封建階級與豪紳資產階級，只有一箇民衆的勢力，只有一箇廣大的，普遍的反抗封建勢力的民主勢力，我們現在是要盡量來的促成民主勢力向封建勢力鬥爭；以達到消滅封建的勢力，這是第一。

自然，反動的勢力是很薄弱，很矛盾衝突，不足畏懼的；然而革命的力量是怎麼樣呢？我們也可以簡單的回答

，若果在過去革命的力量不是薄弱的，那嗎反動的勢力，當然也就不會這樣凶的形成。革命革到此時，無論從那一方面去觀察，我們所得到的，只有一個「瘡痍滿目」，「四壁蕭然」；從反動的方面去觀察，我們所感覺得到的只有一箇「恐怖」，從革命的方面去觀察我們所見得到的，只有一箇「空虛」。這樣的一箇「恐怖」，一箇「空虛」，其結果是不是要弄到革命一次，反動一次，反動一次，革命一次，循環往覆，靡所底止。這樣的幹下去，革命本身的意思，究竟何在？而人民之需要革命，究竟又爲什麼？所以我們第二步的要求，也可說是我們根本的要求，就是如何填補這箇「空虛」？簡言之，就是如何充實革命的力量？

然而近時以來，社會上所發生的，確是有這雨箇極矛盾的現象：一箇是一方面在那裏盡量的來幫助這種「恐怖」，而另一方面就是在那裏盡量的來製造這種「空虛」！幫助這種恐怖的人，我們現在用不着去管他，我們此時是討論如何填補這箇空虛？如何充實革命的力量？我們現在就來問：看造成這箇空虛的原因，究竟是在那裏？

簡單的第一箇回答，就是革命的力量之分歧，因爲革命的力量之分歧，在全部的革命勢力中，各有各的一黨，在一箇黨中各有各的一派，在一派中又各有各的一系，新

以從鬥爭的事實上講起來，他當可以使反動的勢力得點便宜，不可以使同勢力的異黨，同黨中的異派，同派中的異系討了好處；他當可以使反動的勢力一天天的高漲，不可以使同勢力的異黨，同黨中的異派，同派中的異系抬起頭來！這究竟是爲了什麼？

簡單的第二箇回答，就是革命的理論之不統一，革命的組織之不統一。——這其中雖然還有箇人領袖的問題，感情問題，鄉土問題等等，然而最重要的，或者是大多數革命民衆所最重要的，恐怕就是革命的理論問題——因爲理論的不統一，所以鬧得一黨中而有什麼派，什麼系，弄成功一個整個的糾紛，整個的場合。

(三)

緊對着上面所列舉的一些問題看起來，在這個正當醒釀新的時代之苦悶的社會中，我們既由這個社會裏一些客觀條件之要求，而肯定他是要革命的；又經過由過去革命歷程中所遺留下來的一些混戰混鬥，反動，盲動的事實，使我們得了許多教訓，覺得中國革命的趨向，是要重新轉換過來，重新轉換過來的趨向是怎麼樣呢？

(一)是要集中革命的力量。由上面所舉的一些事實看起來，反動的勢力，雖然他們彼此是極端的衝突，極端

的矛盾，而還能夠苟延殘喘，並且還能夠日益高漲，在那裏打擊革命，摧殘革命的原故，就是因爲革命的力量之分歧之不統一；帝國主義者之所以能夠由退讓的，進而爲保守的，爲侵掠的，飛揚跋扈的，也就是因爲革命的力量之分歧不統一；貪官污吏，昏庸老朽，反革命的政客，買辦豪紳，娼妓等等，他們之能夠大搖大擺的出現在南京所謂「國府」之政治舞台，也是因爲革命的力量之分歧而不統一。所以從中國整個的革命的出路講起來，現在是要集中一切革命的方量，無論過去是那一黨也好，是那一派也好，只要重新認清楚中國革命的人，各人都忘記過去的歷史，重新團結起來，重新來幹中國的革命。

(二)是要認清楚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是箇半殖民地封建社會，雖然在不少的通都大邑之中，已經有了近代的工業，成了近代工業社會的雛形，然而整個的內部，還是停滯在一箇極幼稚的農業社會之中而沒有變動。一箇社會上的經濟，是整個的操縱在帝國主義者和其走狗——賣辦以及依附帝國主義者存在之資產階級的手裏。所以在這箇社會裏的革命，是國民革命，而不是社會革命，是要由國民革命走到社會主義之路的革命，簡言之，就是要以廣大的工農小市民（城市小資產階級）聯合之國民革命走到

社會主義之路，不是要以過少數的無產階級單獨的來領導，直接的就從社會革命做起的革命。

(三)是要認清楚領導中國革命的黨是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黨而不是其他的黨。誠然，現在南京的國民黨，却已經老早就不能夠代表民衆，老早就是一個反革命的黨，而不是箇革命的黨了，然而孫先生的國民黨却是革命的，他所以昭示於我們的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三箇原則——三民主義以及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政綱，却始終是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適當方法，是革命的。我們是要繼續孫先生的革命精神用革命的方法來改組這個已經腐化

復興中國革命運動

(一)

「北伐」已經勝利了，全國已經「統一」了，「五院」已經成立了，「國民黨」已經取得政權了，「國民政府」已經得到「列強」承認了，「青天白日旗」已經掛滿全國了（東三省也早已「預定」什麼時候「易旗」了），總理座「靈柩」亦快要搬到「首都」了。凡此一切，都是說明中國革命已經「成功」了；從此「軍政時期」告終，「訓政時期」開始，全國上下，一

了的國民黨。

(四)推動這個反動的局面。現在反動的局面，已經是由一個衝突的矛盾的狀況，入於一個觀望，妥協，相持不動的狀況，在上面我們已經大略的講過了。然而無論他內部是怎樣的衝突矛盾，是怎樣的妥協不動，而他們對於民衆是取一個高壓的摧殘的手段，總是相同。革命的民衆們，你們忍得住再有這樣長時間的壓迫，長時間的摧殘，長時間的屠殺嗎？起來！共同的起來，推動這個反動的局面，再幹中國的革命！

一九二八，十二，二十八，上海

施存統

致努力做「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工夫，不出「二十年」的期間，中國一定可以「富強」，與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並駕齊驅」，「雄視」於全世界而真能與京。這是一種「看法」。採用這種看法的人，就是現在的「革命成功者」。他們就他們自己底立場來說，這是絕對的「真理」。反對這種「真理」的人，就是「反革命」，他們可以用「革命紀律」來制裁。

然而事情還有別一面的看法。從別一面看來，中國革命不但沒有成功，而且的確已經失敗了。這可以舉出許許多多的事實：例如反抗帝國主義變成投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變成承認不平等條約（說「修改」還是好聽的話），打倒軍閥變成收羅並製造軍閥，打倒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變成保護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喚起民衆」變成壓迫民衆，「扶助農工」變成摧殘農工，「平均地權」變成壟斷地權，「節制資本」變成擁護資本，「以黨治國」變成以槍治黨，「民主集權」變成個人獨裁，「國民會議」變成「善後會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底不自由甚於以前，苛捐雜稅底剝削也甚於以前，多數民衆底痛苦更甚於以前，至於革命同志和革命團體所受的摧殘與壓迫，其殘酷野蠻的程度，尤爲古今中外一切歷史所未曾見。這樣的事實，可以說數不勝數，舉不勝舉。一切眼睛沒有瞎的人，都可以看得明明白白。一切「良心」沒有死的人，都可以想得清清楚楚。照這樣看來，中國底革命，無疑地是已經失敗了。要使中國革命成功，必須「從新來過」。這又是一種看法。採用這種看法的人，就是現在的「革命失敗者」。他們在中國革命中努力，奮鬥，犧牲的結果，現在是「一無所得」，所得的只是「鎖鍊」與「飢餓」。他們站在他們自己底立場上，沒有「屈

服」或「妥協」的可能，只有繼續奮鬥，繼續「革命」。只有繼續革命，才是他們唯一的出路。這是他們底「真理」。他們一定以「行動」和「生命」來擁護自己這個真理，與一切反革命派鬪爭到底。

這是兩種不同的立場，代表兩種不同的人。前一種是少數人底立場，後一種是多數人底立場。所謂少數人底立場，就是封建資產階級底立場；多數人底立場，就是工農小市民（即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立場，亦即勞動民衆底立場。這兩種人底階級利害不同，所以他們對於現狀的觀察也不一樣。前一種人希望今後不要再鬧什麼「革命」，後一種人希望現在的「假革命」局面早點完結，從新恢復真正的革命運動。這是現在客觀的情形。

我們呢，究竟站在哪一邊？這是一個先決的問題。我們不滿意於現在的「假革命」以至於反對現在的「假革命」，究竟是爲什麼？是不是因爲「假革命」的隊伍中沒有我們的一份？如果是的，當然應該站在少數人的一邊，站在封建資產階級的一邊，準備「明天」別人來革我們底命。倘若不然，那就應當堅決地站在多數人的一邊，站在工農小市民的一邊，爲多數人底利益奮鬥到底。這中間沒有徘徊四顧的餘地。在革命的劇烈鬪爭中，「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

沒有袖手旁觀保守中立的可能。我們如果以為『我們底革命』已經成功了，便應當老老實實地站在少數人方面去，為擁護少數人的『革命成功』而努力；不然的話，便應當堅決地站在多數人方面來，為獲得多數人的『革命成功』而奮鬥。現在中國革命顯然已到了一個新的時期，事實要求我們確定我們底『革命立場』。

(二)

我們先從客觀上考察，目前的反動局面（從多數人底立場看來，從社會進化的觀點看來，都是『反動』的），能不能夠『穩定』下去？換句話說，吳老頭兒所說的『相安一時』，到底這個『一時』是有幾久？要答復這個問題，首先須明白目前反動局面形成底過程及其真正性質。

本來，中國革命運動，自從『五卅』反帝國主義鬥爭發動以來，直到前年國民黨出師北伐攻下武漢打倒吳佩孚收回漢口英租界為止，其發展之速，影響之大，為前此歷史所未曾有，當時實已開始走上成功的道路。不幸民族資產階級首先動搖，脫離革命戰線，投降反動的陣營，使垂亡的封建階級驟然獲得一枝強有力的友軍，重復振作精神，鼓舞勇氣，領導一切反動的勢力向革命的勢力反攻。同時革命的勢力，又因為革命理論底不統一（尤其對於中國革

命底性質沒有一致的正確的認識），黨的組織底不統一，以至革命領導權底不統一，策略與行動底不統一，必然地伴隨着種種內部的矛盾，釀成戰線底分裂來（詳細請看拙作『中國革命底理論問題』）反動的勢力猛烈地反攻，革命的勢力不能團結，以致造成現在的反動局面。

中國社會現在還是一個半封建的社會，封建階級底經濟基礎雖然早已在崩潰衰落的過程中，但是封建勢力却還是最強大的社會勢力。目前反動局面底形成，自然有資產階級底幫忙，然而主要的角色，處於領導地位的，還是封建階級。舊軍閥底不能消滅，新軍閥底不斷產生，都是證明領導革命的，依舊是封建階級。只有封建階級，才能這樣堅決地，澈底地，殘酷地，野蠻地領導反革命到底。資產階級，懼怕革命運動底深入，自然是同情並援助封建階級。這兩個階級，現在在『防止革命』的共同利害上，結成反革命的聯盟，一致向革命勢力進攻。

然而這個反革命的聯盟，事實上又受帝國主義底領導，因為中國革命底成功，根本要威脅帝國主義底存在，挖掘帝國主義底墳墓，所以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英日帝國主義，必然要出死力來反對中國革命，用盡一切方法來消滅中國革命。中國封建資產階級，既不願意革命運

動底深入（因為深入就要挖掘他們底墳墓），自己獨力又不能鎮壓中國革命（因為經濟上沒有辦法），自然只有低首下心，跪拜於帝國主義底脚下，向他求救。鎮壓革命運動，屠殺革命民族，就是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見面禮。帝國主義是世界反革命運動底領導者，他以很巧妙的方法使中國封建資產階級不能不受他底領導。現在這個目的是已經完全達到了。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資產階級已經結成鞏固的反革命聯盟了。目前的反動局面，就是這樣一個性質。

這種反動局面之所以能夠形成，固然一方面是因為有帝國主義底指揮，同時又因為有資產階級底幫忙，然而主要的關鍵還在於封建階級底存在。目前反動局面底主體，實在是封建階級。直接支配我們的還是封建階級。一切物質的精神的支配力（經濟，政治，軍事，教育以及舊思想舊倫理舊風俗舊習慣等），大部份都握在他們手裏。所以目前革命底主要對象是封建階級，目前革命底主要性質是民主革命。我們要打開中國革命底出路，目前必須努力打倒封建階級，繼續民主革命。只有這樣，才能打開現在的反動局面。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這個以封建階級為中心的反動

局面，有沒有『穩定』的可能？從資產階級底要求來說，『穩定』是絕對需要的。因為時局『穩定』，交通就可以恢復，工商業也可以有相當的發展，財產也可以有一定的保障，這於資產階級是有益處的。但是可惜，資產階級雖有這樣很好的願望，却沒有這樣的力量可以使它實現，遇到軍閥打仗時，還只得拿出錢來（自然是附有條件的）。中國之所以不能建設資產階級的政權和資本主義的國家，也就因為中國資產階級太沒有力量了（自然還有別的原因）。目前的反動局面，是以封建階級為中心的，資產階級實在作不得主。再從封建階級底關係來說，長期『穩定』在客觀上是不可能的。雖然有一些軍閥，因為自己已經占有比較肥沃的土地，很想暫時把內部整理一個程度，多括些民脂民膏，多培養些實力，然後再圖向外發展。但是同時又有些軍閥，所占的地方肥頭太小，連自給都很勉強，勢非向外發展不可。這種軍閥間底衝突，在現在斷不能消滅。過去十餘年的歷史，已經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了。再加以官僚政客底得勢與失勢種種關係，更加促進軍閥與軍閥間底衝突，最後必然爆發為公開的戰爭。所以從軍閥官僚等封建勢力底內部關係來觀察，斷不能有長期的『穩定』。（這個問題，請來有機會當再作詳細的研究）吳老頭兒所謂『相安一時』

，真正說得不錯，軍閥與軍閥之間，事實上只能「相安一時」。而且這個「一時」，決不是有五年十年之久，至多不過「一年半載」少則兩三個月。就是在這個「相安」之中，也包含着無限的「暗鬥」，並且在準備更大的「明鬥」。在「暗鬥」的時期中，在準備「明鬥」的時期中，就是所謂「相安一時」。目前反動局面底「穩定」，就是這樣的意義，（在革命勢力與反動勢力底對比上，現在大體上也可以說是「穩定」的，但是我們這里暫時不討論這個問題。）目前這種「穩定」底原因，在於各派軍閥底暫時均勢。然而這種均勢，隨時有破裂之虞；一則因為內部充滿了矛盾，二則因為資本主義底發展（尤其是商業及交通底發達），足以破壞這種均勢。這種軍閥底均勢一破壞，反動局面就起了動搖，革命勢力就有發展的可能。如果有堅強的革命勢力，那麼推翻這種反動的局面，把軍閥戰爭變為革命戰爭，決不是很難的事。

這樣看來，軍閥統治底基礎，封建階級統治底基礎，並不鞏固；一則因為他們內部充滿了矛盾和衝突，隨時有爆發為公開戰爭的可能；二則因為他們所藉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剝削農民的小農經濟，已經開始崩潰，不足以滿足他們底欲求。舊的經濟制度早已發生根本的動搖，早已

不能滿足中國民衆底要求（其最顯著的事實是游民無產階級及過剩人口底可驚的增加，對外貿易入超之逐年增大）；代表舊經濟制度的封建階級約統治，早應該宣告死刑。只要我們能夠把一切革命勢力團結起來，能夠把最大多數被壓迫民衆底力量組織起來，決不難消滅這種反動的穩定，進而建設革命的穩定。而且事實上亦只有革命的勢力戰勝反動的勢力，才能使目前的「相安一時」變為「相安永久」。

(四)

然則我們現在應當怎麼辦呢？我們已經知道目前的反動局面是不能長久維持下去的，「回頭路」是絕對走不通的，那麼我們只有前進，繼續革命。站在多數人底立場上說，站在工農小市民底立場上說，目前只有一條出路——即繼續革命。可是過去的革命已經被少數假革命反革命者拍賣完了，我們現在應該從新來過——努力復興中國革命運動。我們現在應當承繼總理民二組織中華革命黨繼續革命的精神。排除一切腐化反動分子，團結一切真正革命的同志，從新來幹中國革命——「復興中國革命運動」。

「復興中國革命運動」，是現在大多數被壓迫民衆普遍的需要。要解除大多數被壓迫民衆底痛苦，要實現革命的需要。

三民主義，要達到『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目的，要實行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革命的政綱和革命的決議案，要遵守總理遺囑速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要恢復十三年改組的『革命的國民黨』，都只有『復興中國革命運動』是唯一的出路，其他妥協改良哀求泣告都是些死路。如果現在的反動局面是條生路，那麼總理四十年的革命歷史——反對滿清，反對袁世凱，反對段祺瑞，反對吳佩孚以及反抗帝國主義等等舉動，都可以說是全無意義了！如果因為現在的新軍閥們頂着國民黨招牌便不應該反對，那麼陳炯明，陸榮廷，唐繼堯，楊希閔劉震寰等舊軍閥也都頂過國民黨招牌都應該奉如神明了！民衆決不問名義好聽不好聽，而只看行動是不是合於他們底要求。如果行動不合於民衆底要求：就是名義比『國民黨』再好聽些，他們還是要反對的！現在反動派底行動是誰都看得清楚的，民衆絕不甘心這種反動的壓迫，當然只有復興革命運動，以消滅這種反動的局面！

然而要復興中國革命運動，必須把一切革命勢力團結起來。現在反革命派——帝國主義，封建階級及資產階級，已經有了一致的團結，已經結成鞏固的反革命聯盟；而我們革命派呢，却還是四分五裂，一盤散砂，無法團結。

不要說工農小市民底革命聯盟，現在無從結成；就是國民黨左派——國民黨內真正革命的同志，也還最互相猜疑。不能以誠相結。在國民黨外，共產黨固然依舊在『自行其是』，第三黨第四黨的呼聲也不斷地傳入耳鼓；在國民黨內，各種革命的小組織（投機的小組織不在我們此刻所論的範圍內），還是成見很深，多半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別人（這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好的），離統一的時期還似乎很遠。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想團結一切革命勢力，的確是一件困難的事。但是我却相信，客觀環境底需要，將來會逼得大家非團結在一塊不可。因為我認定中國革命只有一個——即三民主義的革命，從民主革命到社會革命，並以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與世界革命相聯結；因之完成中國革命的革命黨也只能有一個——即代表工農小市民的統一的革命的國民黨，始終領導中國革命民衆完成三民主義的革命。（詳細請看拙作『中國革命底理論問題』及『中國革命與三民主義』等小冊子）只要我們理論上在革命的三民主義之下統一起來，行動上在革命的國民黨之下統一起來，決不難團結國內一切革命的勢力——工農小市民等一切革命的勢力。

現在一切革命的分子，不論過去屬於何黨何派，在這

反動勢力底一致進攻之下，都應該拋棄過去的一切成見與偏見，更應該拋棄一切個人的是非恩怨。大家一致地站在革命的立場與民衆的立場，替中國革命與中國民衆求一條出路。我們大家都知道，革命是爲民衆的，要使革命成功，必須獲得廣大民衆底擁護與參加，決非少數人所能包辦得了的。我們是爲革命才來組織黨，爲民衆才來組織黨的，決不僅是爲我們個人。革命黨是革命底工具和民衆底工具。離開革命的立場和民衆的立場去求黨的立場，是非常錯誤的。現在中國革命和中國民衆所需要的革命黨，顯然是代表工農小市民的統一的革命的國民黨，既不是腐化的國民黨，亦不是少數無產階級的共產黨，更不是『空中樓閣』的第三黨或第四黨。我們現在只有堅定地站在革命的

我們爲什麼革命

現在是再度革命的醞釀時期，不論對於革命的理論，或是對於革命的行動，都有清算與整理的必要。『沒有革命理論，沒有革命行動』。我現在想先對於革命理論，略說一些話。

我第一要說的是爲什麼我們革命。在這個題目之下，

立場和民衆的立場，才能求得黨的立場。我希望一切真正革命的同志，不要忘記革命底目的，不要忘記革命底對象，大家一律捐棄小嫌小隙，團結在一個革命的黨裏——即團結在代表工農小市民的統一的革命的國民黨裏。

目前多數被壓迫民衆，都需要復興革命運動。要復興革命運動，必須團結一切革命勢力。要團結一切革命勢力，必須恢復革命的國民黨。

革命的民衆和革命的同志們！在這反動勢力底高壓之下，我們實在只有一條出路——承繼總理底革命精神，恢復革命的國民黨，復興中國革命運動，以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

一九二八，十二，廿八。

張崧年

我要說兩層意思：第一說我們革命的緣故，其次說革命的對象。

我相信這兩層都是該說說的。一個人不拘作什麼事，說什麼話，最好是先自己弄明白所以要那麼作那麼說的緣故；就是對於人，也應該如此。你如要批評別人的行爲，

判斷別人的言論，你最好先弄明白他所以有那樣行為或那樣言論的緣故。我以為人如能保持住這種態度這種辦法，一切問題必定都容易解決的多。那麼，我們革命，我們為什麼而革命呢？我以為不拘誰，如要革命得徹底，不因循，不苟且，不投機，不妥協，都必不可不先對於這個問題，有個澈底的自覺的解決。至于關於革命的對象，我覺得現在有一種很流行的錯誤見解；為求革命前途，少生枝節，免除無謂的紛糾起見，對於那種錯誤見解，也實有急速加以矯正，并將真正的革命對象，斬截地明白指出之必要。

我們為什麼革命呢？要曉得這個，不可不先明白所謂革命是什麼。革命是社會結構由積漸而致的驟然變革。在這個界說上，第一要注意：革命是關於社會結構的事，社會結構不變更，無論社會政治上，怎樣的混亂，也算不得革命，至少在今日，革命的意義是應該如此的。在這個界說上，第二要注意：一個社會之所以革命，并非一朝一夕之故，乃是積漸而致的；只是以革命本身而論，則革命却是一種突然驟然的變革，有人比之于冰山的翻筋斗，可以算得一個確喻。冰山之所以翻筋斗。當然不是一天兩天的緣故，但在翻的那一頃刻，則不能不算是一種突然的變化。

。人類社會中的革命，便也如此。

本來，社會結構的所以形成，一方有社會生產力，一方有與之相應而成的社會制度，社會制度乃是一種有惰性的東西，是傾愈變化的。等到生產力逐漸增長，原來與之相應的社會制度，不但越來越與之不相應了，而且越來越變成窒礙，于是雙方的矛盾抵牾，逐漸增加。等到這種矛盾抵牾，增加到某種數目，也就是社會生產力，增長到某種數目，于是舊來的社會制度遂必然地而不得不破裂；同時在那逐漸增長的生產力下，養成的一種新社會力量，便自然而然地將一種在舊社會制度中孕育了的新社會制度揭發出來，而一種新社會結構于是遂得逐漸地形成。即這便是今日所謂革命。今日所謂革命，是不能外乎這個的。在這種意義之下，顯然，所謂革命乃是一種必然的社會現象，放開來說，也就是一種必然的，人不怎麼能如之何的，自然現象，只是這種自然現象，特別與人關係密切罷了，以集合人與人的關係而成的所謂社會也者為主體罷了。

那麼，革命既然是一種必然而無可如何的社會現象或自然現象，人在其中似乎也不過隨波逐流，出于不得不然而已；又能有什麼意義？又能有什麼所為？但是這却不然。人之革命，固然在一意義下，也可說是行乎所不得不

然；可是爲什麼有人革命，有的人却不革命，甚而至于反革命？這其中必然有種種緣故。進求這種緣故，當然最顯而易見的，乃是人之所以革命乃是環境使之，乃由生活情況湊合而成。但是湊合成的又是什麼呢？我以爲這除了不得不然的成分以外，即除了不自覺的分以外，必然還有個對於社會變化的自覺。這就是說，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不但必具開闊的胸襟，熱烈的心腸冷靜的頭腦，堅決的意志，必然還更有一種比別人靈銳的感覺；他之所以革命，必然是在社會變化上，覺察到了什麼，必然是從社會變化上，感覺到了一種反革命或不革命的人所不能感覺或沒有感覺的刺激，因此才有革命的反應，因此才有革命的行動。我相信，客觀地看來，我們的所以革命，實在于此。

現在當看一個革命者在社會變化上究竟感覺到了什麼。如前所說，社會之所以發生革命，乃由社會生產力的增長。可是社會生產力爲什麼增長呢？社會生產力的增長，主要的原因，不外生產技術生產器具的改善。而生產技術生產器具的改善，主要原因又不外乎科學的進步。所以如此說來，促進科學，最是使社會革命的妥當的方法；而社會一度革命也就是社會一度顯著的進化，只是因爲人類的愚蠢，因爲人類的惰性，因爲人類的對於自己的事情，特

別不能客觀，也就是因爲人類還未能把由數學與實驗相結合而成的『科學法』，普遍應用，歷來的革命，不免犧牲得過大一點罷了。

社會一度革命，就是社會一度顯著地進化。我相信，一個革命者在社會變動上，第一所感覺到的，就是這個。因爲感覺到了這個，因爲要促進社會的進化，這便是一個革命者所以要革命的第一個緣故。社會本是必然地自己要變動的，本是必然地自己要進化的。但人固是社會關係的構成者，在社會變動上，自有其應盡的本分。本分是什麼？便是使得社會進化可以順利地進行。一個革命者便是能夠履行這種本分者，履行這種本分，也就是革命者的歷史使命。在唯物史觀上，所謂歷史，本就是社會變遷的意思。所謂革命者的歷史使命，本就是革命者在社會變遷上的使命。照這種說法，所以可以說一個革命者就是社會新結構的一個助產女士。社會革命本是社會矛盾的解和，社會革命者（即今日一切真正革命者）也便可說就是這種解和的人。

中國有句老話，就是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種話聽着，自然不免似乎腐。中國還有一句俗話，說『替天行道』。這種話聽着，自也不免于土。但是不管其土不土，腐不腐，現在的真正的革命者，其實也還是如此

的，但令曉得所謂「天」，不過是「自然」的意思。所以革命者之所以革命不過是爲的與社會變化相應，而使其進行得順利。中國還有兩句古語，說「順天者昌。逆天者亡」。革命者只是要順乎自然，而不肯叛逆自然；只是要昌，而不甘于亡。

馬克思也說過：「哲學家們只不過種種地解說了世界；要緊的乃是去變更之」。可是照馬克思的「辯證法」(對勸)，世界本自是時時都在變更着的，爲什麼又要人變更之；所以要人變更之者，也不過是要人行爲得與世界的自然且必然的變更相應而不相背而已。而且所謂世界，人本是其一部分。說世界變更，人之變更，自在其中。因此，要人變更世界，蓋也不過要人對於己也在其中的世界變更，有個自覺，而更勇猛積極進行之。同樣，前所說一個革命者對於社會變化的覺察，也便可說，就是覺察到在社會變化之中，自己也有其分，爲與這種變化相應，爲盡這種變化的本分，所以才不得不助着社會革命，以達社會進化的目的。

可是，社會爲什麼又要進化呢？社會進化的目的又何在？社會變遷，究竟要變遷到那裏去？換言之社會革命的究極目的，又是什麼？說到這一層，便勢不能不講到人生

觀或人生理想的問題，有的人或不免以爲這個更玄虛了。然而其實不然，人生觀其實是最切于人生的事。一個革命者，如要革命得澈底，必須對於人生有種至極深刻的認識。當然，這種認識之得來，必是本着自己的銳感，而從生活本身中得來，絕不能憑空瞎想的。一個人而無對於人生的認識，而無對於人生的理想，必是一個「無主宰」之人，「無主宰」之人，如何能革得命來，當然更不能作革命的領導者。這樣的人，其實可說就沒有認真地在人生生活中活過，就沒有嘗到過人生的滋味，他又怎能如人生何？這樣子說來，一種人生觀對於一個革命者，尤其站在革命前鋒的人，確是必要的。問題乃在所需要的是那樣一種人生觀。對於這個問題，我不能不在此簡略地也說幾句話，以表明我們所以革命的又一個緣故。詳論則當俟另篇。

當然，一個革命者的人生觀，必是革命的；還可以說必是客觀的，因爲不容觀便得不到實際的緣故；更還可以說，必是美學的，因爲美是圓滿的人生中最後的標準的緣故。這樣的人生觀，如何可以得到？當然，必須根本人生的實際，如前所說，必須認真地在生活中生活，必須切實地體驗那種生活。如此才可以見到人究竟爲什麼而生。人爲什麼而生？人爲什麼而活着？人只是爲生而生，人不過

爲活着而活着。所以生之一字，乃人生最偉大最重要之一字，凡是一種切實的人生觀，必不能不根據這樁簡單而概括的事實。根據這樁事實，而定一種切實客觀的人生觀，那便只在使人人都得遂其生，使人人都得善其生，簡單言之，便在『生之擴大』。卽這便是人生理想，卽這便是人生節制，革命的最後的目的，是不能外乎這個的。我們的所以革命，這便又是一個極要緊極根本的緣故。反是而言革命，必然只是自救而救人的話。我們爲什麼要喊叫解放一切被壓迫者？我們爲什麼要反抗任何侵略與剝削？我們爲什麼覺着現狀不可一朝居？根本上實在因爲什麼壓迫侵略剝削現狀，都太與那種理想歸宿相違反了。都太與『生之擴大』的人生觀，相去的遙遠了。在現狀之下，大多數人是不能遂其生的，更說不上什麼善其生。這是應該的麼？實在沒有一點道理。照今日世界的生產力，全世界人類，本已都可過得很好的生活。然而現狀竟不許，我們感覺到這個，我們相應社會的變化，我們如何不思把現狀改革而去之？我們如何不謀把造成現狀的一切制度習慣，悉掃而空之？我們既爲此而革命，我們要促成的社會制度，自不難見。當然一定不是什麼流行的資本主義，更不是由資本主義長成的帝國主義；自也不是，要維持『殘餘的封建

制度』，以及什麼從以前的制度遺留下來的思想習慣勢力；而乃是一種所謂大同主義或『共產主義』。

這說得太空了麼？這說得太烏託邦了麼？我以為這是不能這樣子抹殺之的。所惡乎烏託邦者，惡其不切實際。所惡乎空想者，惡其不能實行。但是一種比較寬遠的眼光，一個革命者却絕對不能沒有。一眼只望到遠處的人，固然可以跌在坑裏。（相傳希臘等一個哲學家圍利史的故事）。一個完全沒有理想歸宿的人，也必會弄得茫茫欲何之，寸步不能移。須知政治并不是一切，眼前的政治尤不是一切。只顧到眼前的人，必不能解決眼前，因其除了眼前，更不曉得出路。一個革命黨，要緊的是既有遠大的目的，又有當下的辦法；反過來說，就是既有遠大高尚的理想，又要有當下可行的方略。卽以國民黨左派而論。國民黨左派如果要整頓國民黨，如果要恢復國民黨的信用，如果要與天下人以共見，如果要貫徹革命的主張，那便應一方明明白白地揭布出自己最後的理想，自己的斬截的態度，一方更應詳細地對於一切經濟建設，政治改革，文化政策，土地問題，國際關係，種種等等，都訂出審察周到切實可行的方案；不當政時，作豫備工夫，一旦當政，便悉舉而實行之，像俗語所說的，一登台便拿出幾手來給人看；如

果能夠這樣子，中國的復興，革命的成功，實在不是難事。本來，遠之於近，遠遠的理想與目前的計劃，貌似相反，其實相成，缺一不可，相離也不。可所謂『沒有革命理論，沒有革命行動』，也就是這個意思。我所以說我們所以革命既為與社會變動相應而促社會進化，又為一種廣遠的主張『生之擴大』的人生觀，區區之意，也不外乎此。

照上所說的兩層，好像人之所以革命，都不是為的自己，都不是為的箇人，這其實也不盡然，如果一個人，同的不外子女玉帛，豐食廣居，革命當然不能為這樣的箇人的這樣目的。這樣的人最好不必革命，他其實也絕不會革命。但革命却并非因此就不為箇人。本來，就一意義說，我所謂為一種人生觀而革命，就是為的那種人生觀所要代表的一個一個而彼此有關係的箇人，而絕不是為的一句話洞的見解。但現在所說的為箇人，還不止是這個意思。照一般所曉得的，革命顯然是為大眾。一個社會裏，如果非大多數人自覺地或不自覺地都需要革命，革命絕不能成功。少數人的革命是沒有的事。假如你是革命的，你當然也是革命的大眾中的一分子，有的人開口從民間來，閉口到民間去，我真不知其自居于何地。如此，革命是為大眾的，你是大眾中的一分子，當然的結論：革命也為你自已。

那麼，為你自已什麼呢？為滿足你自己的欲望。為滿足你自己的什麼欲望？特別是生之欲望。人不受壓迫，生活不窮困，大概是不會革命的。恐怕人的所以革命，第一步大概都如此。

或者以為革命不免要犧牲，既為自己，豈還能犧牲？我以為此疑不然。革命雖也為自己，并非單為自己，單為自己的人，你不用想其革命。而且革命之為到自己，入由一個革命者不能自居于大眾之外，因為大眾乃為到自己，既非專為自己，顯然，要犧牲時，是還可以犧牲的。這并不是唯心的說話，只不過表露事實。革命最忌矯情與客氣。矯情客氣的人也是絕不能革命的。革命者明明都為自己，明擺着的事實，你如何不承認之；所以如說唯心，不在我而在你。

總上所說，可說都是說的我們為什麼革命的正面。以下當進而說說負面，便是革命對象的問題。

我們革命，我們究竟要革那個的命？關於這個問題，我于開篇，曾說有一種很流行的錯誤見解，不能不加以矯正。中國這次已經失敗的革命，開初的口號，本來有兩個，一個是打倒軍閥，一個是打倒帝國主義。這本來就不全對；近來簡直竟有中國人，連這個也都不許提了，當然更

不對的利害。但我所謂流行的錯誤見解，却還不是指的這種人的見解而言，因為這種人本來不是革命的，在革命理論上，用不着與這種人去計較。我所指的錯誤見解，乃是把革命對象說的好像革命在對人。這實在是一個極大的錯誤。第一，因其忽略了根本；第二因其違反了革命的本意。因此附庸。都不免使得革命多生枝節，多所糾紛。例如打倒軍閥一個口號，就不免犯了這種錯誤。只說打倒軍閥，而不更注意于產生軍閥的制度，結果舊的軍閥，表面上似乎是打倒了，而却隱生了一大羣的新軍閥，究竟于實何裨！

那麼，真正的革命對象，到底是什麼？我以為但令人切實地明白了如前所說的革命的意義，這個并不難曉得。我可以極鄭重斬截地說，革命乃是對於制度，絕不是對於人。中國的革命是要打倒帝國主義與『殘餘的封建制度』。所以要打倒帝國主義，就是因為帝國主義是一種制度。你如真要打倒軍閥資本家於地主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你也只有從根本上打倒產生這種種什麼軍閥資本家等等的制度。如果只知對人，而制度不管，結果必致表面上舊的像是打倒了，而新的又復產生，而且說不定你自己也就變成你自己所要打倒的人。一個人無論他怎樣，我始終堅決地相信

『箇人無罪』。一個人之所以有罪惡的行爲，都是社會制度與習慣使之，箇人實在不能負那種責任。箇人習慣的養成當然不外由于社會制度與教育；而教育自也是一種社會的制度。所以一切罪惡，究其實，都不能不加在社會制度的身上。要使世界無罪惡，只有革社會制度的命，由好的制度，好的教育，以養成好的習慣，這樣子乃能使人無復罪惡的行爲。若像現在對待所謂罪人的方法，只不過由于人的懶惰與不科學，事實上只有延長罪惡，一點好效果也不會收得到。

一種革命，雖不能由一切人來幹，但是一個社會裏的革命確是爲的所有一切與那個社會有關的人人。你于此一定要問，難道現在的革命也爲帝國主義者軍閥大地主資本家麼？爲的，爲的，不管你怎樣駭怪，我也要這樣說。爲的什麼？爲的使它不再作帝國主義者軍閥大地主資本家，爲的使定不再作侵略壓迫剝削的事，以至于使全世界上從此再不復有侵略壓迫剝削以及一切殘忍酷暴的事。當然，在革命之際，對於反抗革命者，對於擁護舊制度者，不能不加以制裁。但是所制裁者，乃是裁制其反抗革命而擁護舊惡的制度，并非先天地特別有惡于其人。現在壓迫者，但令其不復冥頑不靈，但令其能不死聽其現在豪強以爲利

的制度，本可與被壓迫者同等看待。只是人這種蠢東西，不見得這樣能變遷了！不過，人之有不良行為，由于有不良習慣，有不良習慣，由于有不良制度；這究竟是一樁不可不特別注意的事實。

現在世界上，最高尚最可欽佩的人，本只有勞動者；至于什麼侵略者，剝削者，鉤心鬥角實空實空以侵蝕別人勞動的收穫者，實在均是最堪憐憫的人，不管他們自己覺着怎麼得意，怎麼趾高氣揚。勞動者現在不過因社會制度而受苦；而這種人却是因社會制度而爲惡。所以我覺得革命對於這些，是同樣當想方法的。我相信，一個革命者而能透澈地見到這個，而能胸襟這樣地開闊，而能把注意特

政治轉換期的預測和我們鬥爭的方針

馬 潛

什麼是「政治的轉換」(Political Change)？就是由舊的政治，轉換到新的政治；自然在現時所謂黨國要人，高唱統一建設的時期，正在「躊躇滿志」，滿以為「萬壽無疆」的當兒，這句話總算大逆不道；再退一步說，政治的命運，是一個事實所決定的問題，我不是「張半仙」，怎能胡亂來推斷。不過我要知道，政治是一個社會結構所表現的形態

別集中對社會制度上，必會自覺着心安而理得，必會益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必會艱難困苦，悉所不計，勇往直前而無所于悔，必會免掉了一切不好的情緒，必會進行得妥帖而順利，也必會益作得熱烈真摯，圓滿周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總結我的話：我們的所以革命，第一，是爲箇人而革命；但第二，絕不止于是爲箇人而革命，更是爲革命而革命；但第三，也不僅僅是爲革命而革命，更還是爲人生的最高理想，即是「生之擴大」，而革命。而我們的革命對象，絕對在制度，而不在人。

；她的性質，組織，形式……等等，都是被支配在社會所堆積及其相互作用的力的上面的。所以某一種政治形態，是某一社會階段的反映；等到某一社會階段，加了新的成分，動搖了過去的根本；那末，新的適應的政治形態，便會物發成長爆烈出來的。只要我們能夠抓着社會客觀的事實，而加以科學的分析；即便不是「張半仙」，也自然可以

知道個大概。

但是「政治的轉換」，在某種關係上，是一種突變；然而絕不能說掉了因果律的支配；並且只有因的質和量的如何？才能決定果的突變或緩變，以至不變，所以我們要推斷政治的命運，首先要研究她的背景——過去和現在——無論如何，以現在政治的現象——實質上和形式上——衡之過去數十年，不，即最近兩三年革命的歷史，不能不覺得奇怪。因為現在政治上所表現的，與過去——尤其是現在革命民衆所要求的，分明兩樣，儼若地球南北兩極之相懸隔。如果就單純的因果律來看，有革命的歷史——並且有幾十年的，自然要產生革命的政治；為什麼反轉來在政治上所表現的，不但不革命，且反革命到十二萬分的利害，這不是很堪詫異的嗎？然而所謂「因」的本身，絕不是這樣簡單；因為它的來源，發動於各個所佔立的物質條件——換一句話說社會關係不同的各個份子，其作用，其效力，仍要經過整個社會關係來決定的。例如一個無產階級的工人，是要求社會革命，一個資產階級的資本家，是要求民主革命；同時兩個的要求，又相對立的衝突，結果只有互鬥，使兩個的革命，都不能成功，而政治的形態，乃得到一個出乎兩者預料以外的變化——或促成舊的政治

的穩定。

現所謂「因」的構成，亦不可靠幾件單純的事實，更不可創以很短的時間；因為單純的事實和短促的時間，如力量——即效用——僅能達到局部；那末，整個社會關係所表現的政治形態，仍不會動搖的。因此，決定政治形態的「因」，是要由社會關係所決定社會關係的力來決定的。我們回想過去兩三年的歷史，雖然民衆的革命熱情，達到相當程度；可以「鬥爭」策略的紊亂，與領導革命的集團的脆弱，在主觀上絕不能一足打倒封建勢力和踢開帝國主義，乃是必然的事。自然一個革命鬥爭的統一與鬥爭策略的正確，以及革命集團的健全，是要在整個社會關係所決定的鮮明階段，才能達到的。但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基礎的物質條件，既幼稚而且複雜；即使除去西藏蒙古新疆等邊僻的地方，專就中部說，交通便利的區域，已發現了資本主義的都市，而許多地方，却停頓在手工業及原始農業的形態。代表工商業生產以及受資本榨取者，在生活意識上原反映出了什麼「德謨克拉西」，和「梭賽里思姆」，而代表農業生產的——尤其是土地所有者，却還在夢想「真明天子」。並且以帝國主義壓迫的原故，資本主義的民主革命不能成熟；因此，具備近代無產階級條件的工人，要

求社會革命，亦以物質條件的缺乏，駭不上那個天堂。

以此原因，當然在主觀上不能形成一個中心的革命階級；更以此原因，而不能形成一個健全而具有轉移政治的黨。尤其是事實上國民黨和共產黨各別的存在，各圖發達，各有立場；既無統一的意識，又無融合的政策；乃始由政策之爭，繼之以民衆之爭，結果乃演成了黨爭，黨爭的結果，共產黨政策急轉直下，自然要發生其本身的變化；國民黨却以歷史的關係，沒有代表一個較嚴格的階級，經過這個革命戰線破壞的過程，更表現分裂的現象。乃得使代表封建勢力，及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大加抬頭。

此外，在過去兩三年——尤其是廣東和兩湖的革命運動，本已經過與一切封建勢力如土豪劣紳的激烈鬥爭，全國的大資產階級，亦間接受了鬥爭的影響，這便造成新的反動政治的有力動因。同時，以國際資本主義的暫時穩定，亦作了有力的外援。因為破碎的封建勢力，和脆弱的大資產階級，雖然作成了反動政治的主體，如果沒有國際帝國主義的援助，亦是沒法維持的。所以現代政治的內容，便是國際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及大資產階級的溶合物；縱使以其本身利害，有若干衝突，然就對革命勢力說，可謂三位一體。

據事實來說，很明白的，國民黨已被封建式的軍人政客官僚，以及一班新智識份子，和商業的紳士們包辦了。名義上已經是統一，却張學良至今還霸佔在東三省，連旗也沒有換。其餘的地盤，亦劃分爲某記某記，一切行政，財政，司法，交通，軍政等等，互相不但沒有聯屬，而且是對峙的，國家大法既沒有產生，國民會議，也沒有影子；可是什麼五院却像煞有介事的成立了。分明是割據的小朝廷的政治分會，偏偏要說根據於總理的均權。天天談建設，却連幾條可憐的鐵路的車頭運轉，互相霸佔着，各路的收入，亦歸私有，使交通至今不能恢復，南京的首都，花了三十萬修的一條馬路，現在不到幾天，連以前的樣子也不如。南京的地皮，更有些闊人，私自掏荷包，壟斷到自己手裏。販賣煙土，成了大股的公開的祕密；不知道還要設禁烟大員做什麼？至今苛稅雜捐，已添了許多花樣，加了許多重量，只就公債一項說，不知道增加着若干萬。在外交上更是可憐，時時刻刻總聽到說中國統一，自然進步；而現在事實怎樣？經過幾月大擂大鼓以後，所謂成立新約的十二國，如美，德，挪，比，意，英，荷，瑞，丹，葡，法，西等；就性質上只有兩種約稿，一爲解決關稅問題，一爲解決法權問題。歸結不過：（一）以最惠國待遇

與內閣待遇之精神，解除從來關稅之束縛；（二）於關稅事項外訂明條件附之領事裁判權的撤廢；於從來不平等的關係，他無所改正，且無新平等的條文；即在關稅自主和撤廢領事裁判權亦無確期。所以其性質上與歷來的北京關稅會議，及華盛頓會議，了無分別，是之謂條約，嗚呼恥矣！

其對於民衆，標榜所謂黨治，一切自由都剝奪盡了；如果問黨在那裏，是否革命？那就不管，殺戮青年和農工，比封建時代的戰爭，優勝將軍獻敵若干萬級，還要來得勇猛。土豪劣紳的政治組織和武裝，一天一天的嚴密而齊整，舊禮教，舊制度，極量在那裏恢復和維持。這些現象，還是就一般說的。其他特殊地域——如兩湖及兩廣——勾結帝國主義和壓迫民衆的特殊德政，更是不勝指數了。但是反動政治勢力的背景，雖在於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及帝國主義的社會基礎；可是其中心力量，却依然封建的軍事勢力在維持，如果封建的軍事勢力破裂，那末，反動政治勢力的弱點，便馬上暴露出來。我們知道，封建的軍事勢力的社會基礎，已經動搖，決沒有再統一中國的可能，這是在過去許多軍閥的教訓，已經很明白了。即使他們表面還在那裏彼此敷衍，然而暗地裏却縱橫捭闔，準備

火拚。這是因爲彼此都感覺自身勢力的缺點，非拉到一個幫手，不敢動手罷了，他們口裏未嘗不說裁兵，實際上却都在補充實力，即是很明白的例證。如果就形式上說，現在的反動政治勢力，比較舊軍閥時代，似乎高明，知道利用黨和民衆；然而她的本質，却比舊軍閥時代還要殘酷和毒辣。這一方面是經過革命運動激烈鬥爭的反映；一方面是其基礎更加動搖的最後掙扎。因此，現在的反動政治勢力，本身即是新矛盾的表現；同時是又俱備製造新矛盾的爆發物。

站在與現在反動政治勢力矛盾極端的革命民衆，如僅管在束手待斃，永不動彈，過去的一切革命歷史，根本就是完全無人。否則，在許多新的反動，壓迫，掙取的經驗和教訓中，種植新的更加熱烈的革命情緒，擴大鬥爭的實力，以引導革命向更深刻更偉大的路上去，是很自然的，且根據這個原則，使中國革命，最近將來，有一個統一的，更偉大的實現和成功，亦不是意外。況最近許多革命的小組織之成立，一方面由舊的脫化，一方面由新的浮出，均是代表一些不滿意當前環境的民衆和青年。正在準備新的鬥爭；同時普通青年的煩悶無出路，亦何嘗不從這種意識爲出發呢？

更具體的說，最近將來所不可避免的反動政治勢力的軍事衝突，以無統一的力量故，決不能消滅自己的對方；結果，必定只有混亂和對立。且以反動政治勢力面積的廣大，其混亂的範圍亦必定廣大。在這個大規模的混戰和對立當中，革命民衆所固有的痛苦。及新軍閥戰爭所犧牲的，和反動政治勢力之破裂等原因，自必有一個突然的進展，毫無疑義。進一步就國際局看，各國的反動局面，已經高漲，新矛盾的條件，十分具備；所謂英美兩國爲主體所各領導的各個資本帝國主義，爲市場衝突所引起的第二次大戰，體系已經鮮明，而世界革命的形勢，自必有個新的進步。所以「新的政治的轉換」，不但最近要在中國實現，即在國際上，亦可同樣去觀察，絲毫不用懷疑和悲觀！

然而「政治的轉換」，雖由社會關係來決定；可是人爲的努力，絕不可漠視。站在革命戰線上的人們，不但要有革命的意識且要有革命的勇敢和努力，方能使舊的反動政治，更快的破壞，新的政治，更快的建立；所以一樂天知命」的，機會主義者，是最堪唾棄的。自然所謂勇敢努力，決不是盲目的；而是時時刻刻計較；怎樣使鬥爭有效？和能夠達到目的？這便是革命的鬥爭方針，不能不決定的最大原因（因爲革命不是個人的，乃是羣衆的，如不擇手

段的變幹，決無很大的成效）。不過現在我們要說出門爭方針的詳細辦法，在此短文中既不可能；且有時間和空間的情實不同，更無從說起。

但是在鬥爭的原則上，第一個不要忘記的，便是要獲得大多數人的同情。尤其是當此積極壓迫之下，沒有大多數人做後援，是不能鼓舞起革命民衆參加鬥爭的勇氣。所以革命的口號，宜取普遍，羣衆的組織，不宜太嚴格；一切的一切，均要以民權鬥爭的方式和性質，方能漸漸擴大鬥爭的戰線，我相信爲大多數的利益去鬥爭，是能夠得到大多數人的同情；而且大多數人的鬥爭中，自然可以表現自己的革命力量，領導中國整個革命，入於正軌，踏上新階段的階段；這於中國革命的特質——由民權革命到民生革命絲毫沒有違背。並且只有這樣，爲整個革命民衆，提出總要求而鬥爭，發揚及充實民權力量，才能鑿送反動政治勢力的命運，團結革命勢力，以利於中國革命勢力的進展。

其次，革命的成敗。是要集中一切革命勢力爲前提；尤其是當國民革命戰線破裂的今日，革命失去領導的中心，我們不得不揭出一切民衆的要求，以促進革命勢力的大團結。並且以革命勢力的破碎，在此團結困難的當中，我們要盡可能的力量，促成或援助各種各類的革命運動，不

拘其性質之如何，不要存一毫歧視。經過這個複雜化的鬥爭後，才能有新的團結和統一戰綫的可能。

依上述鬥爭性質的決定，可以得下列簡單的方式：

一，鬥爭的目標——打破反動政治勢力（包括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及特殊的大資產階級）。

二，鬥爭的同盟軍——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包括工農及小市民等）。

三，鬥爭的組織——使一切被壓迫民衆，有整個的或個別的行動的團體，完全民主集權化。

四，鬥爭的策略——揭出反動政治的原因及惡毒，提出大多數人的要求，使鬥爭的影響，在宣傳上和行動上一天一天的擴大。

五，鬥爭的口號——切近普遍民衆的實際利益。

在現在許多人的錯誤觀念，不愿即時去勇敢鬥爭；而是盼望反動政治勢力的即早火併，以便有機可乘。其實反動政治勢力的火併，我不否認有充分的可能性；只是靜着去等待或者盼望，終是十足的機會主義。我們只有努力鬥爭，才能使反動政治勢力崩壞得更快；並且以革命鬥爭去崩壞反動政治勢力，才能希望有以革命民衆勢力為主體的「新政治」的出現。不然過去十餘年間軍閥循環的戰爭，爲

什麼還打不出一個革命的統治勢力出來？

最後還有個切要的問題，便是領導革命民衆的集團——黨，不能不促其早日形成和健全；因爲革命民衆沒有革命的集團，便等於軍隊沒有總司令部；並且在革命運動過程中，一定會湧現一個領導革命的集團。但是革命集團。是有兩個必需的條件——是能領導大多數革命民衆；一是有適合大多數革命民衆要求的主義及政綱。然而現在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缺乏這兩個條件，新的東西，根本不容易產生；並且以國民黨的腐化，僅是少數的軍人政客與官僚等，而不是多數黨員，更不是主義和政綱；所以只要我們能夠願及國民黨的過去革命歷史，以及認識國民黨的真正精神，拿出徹底改組國民黨的勇氣；那末，新的適應中國革命需要的黨，便可實現了。

要之，從客觀的事實，已經看出整個反動政治，產到極點，新的「政治轉換」條件已經具備，每一個革命同志和民衆，都不應放棄鬥爭的責任；且只有鬥爭，才能使「政治轉換」得更快，而與我們更有利益。同時在鬥爭的不斷過程中，選擇我們的鬥爭的方針，及在鬥爭的開始，準備我們鬥爭的方針。所以我們認清時代的責任以後，第一個任務，便是鬥爭！鬥爭！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廿九日

革命的裁判者

程希孟

革命本是一件最偉大最光榮而最艱難的事業，在現今的中國却不幸成了一個時髦的口號。幾乎無論誰都說自己是革命的，罵對方的人爲反革命。甚至反動的勢力也厚着脸皮冒革命的招牌。我們所認爲反革命的軍閥張學良如今也成爲「忠實同志」兼「國府委員」了。然而這專只從自命領導革命的人們方面講，才有這種矛盾和虛偽。在民衆方面看，革命和反革命好比白天與午夜有極明顯的區別，真假是非絲毫不容混淆或假借的。以領導革命自任而握得政權的人們是否真在做革命的工作尤其欺瞞不了民衆。

民衆——尤其是被壓迫的勞苦民衆如農，工，小市民，卽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基礎，這是誰都知道的。但是這個意義不單是說革命要有民衆的擁護纔能成功；並且是指革命的目的要能代表被壓迫民衆的利益，革命的進展要能夠滿足被壓迫民衆的希望。不具備這種條件的政治或社會運動，儘管可以具革命的形式而算不得真革命，所以湯武式的革命，只是以暴易暴。歷史上還有許多的運動以勞苦民衆的利益爲號召而以少數領袖的私利爲歸宿的。因

爲在革命的初步民衆往往容易被利用，一等到政權到了手所謂革命的領導者常常不貫徹先所號召的主張，專以鞏固私人長久的政治地位爲目的。法國的大革命犧牲了多少的勞苦民衆，都爲得「領導者」的爭權奪利，所以由中產階級的勝利中造出一個拿破崙。從三民主義的立場看，沒有一個政治或社會運動可以離開或犧牲民衆而配稱做革命的；更沒有那一個中途拋棄了勞苦民衆的革命不是革命的末路。

勞苦而被壓迫的民衆不獨是革命的基礎，並且是革命的裁判者。民衆的痛苦還未解救，革命的主張還未貫徹而革命本身被領導者所斷送時，便成了一個反動的局。可是反動的勢力決不肯承認自己是反動。被壓迫的民衆呢？他們看見所熱烈期望的革命效果還沒有實現，便用領導者的言來責他的行。他們便知道所謂「革命成功」全不是那麼一會事。所以做革命基礎的勞苦民衆卽是革命的裁判者。

「革命領袖」或者要反問：勞苦民衆知道自己一切的需

要或利益嗎？他們所希望實行的辦法一定都對嗎？對於第一層：我的回答是即使有一些需要或利益不為勞苦而被壓迫民衆所深切知道的，但是他們所確切感覺到的需要必定是真實而正當的利益。這些要求，革命領導者，非使民衆滿足不可。一個佃農感覺受了替地主作牛馬的苦痛而要求田地，一個工人吃盡了廠主的虐待而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資，一班民衆被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軍閥買辦及帝國主義者的壓迫而要求解放，一個革命難道可以不理麼？至於貧農對於教育的需要，「苦力」對於政權的需要，多數市民對於羣衆運動的需要，不能說他們不知道，只可以說他們不能深切的了解，革命者的責任和功用正在使民衆深切的了解他們的利益而加以主持。關於第二層疑問，我以為被壓迫的民衆對於解放的辦法，太抵希望採取切近而具體的步驟，對於遠大而根本的計畫甚至於不了解或不贊成的。這也正是解放運動中民衆須要革命的主義和革命的領導之處。例如我國農民對於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自然希望「耕者有其田」但不知道土地國有是耕者有其田最後的保障。工人希望罷工後增加工資，或要求政府改定勞工法，至於用國家資本來代替私人資本的辦法未必便想得到。平民希望用武力打倒軍閥而不知道增加國民黨的革命力量以黨治軍為消

滅軍閥的根本辦法。這些困難都不成為革命進展上的障礙，只要於革命者忠於革命繼續前進，以期三民主義的社會完全實現。

如果我們承認本黨已經獲得政權，負有貫徹革命的主張之責，那我們更加不能以「困難」來開脫反動勢力的罪惡。一個在位的黨不能像在野的時候一樣，僅以宣傳為能事，要實踐從前的宣傳，解放民衆，證明革命的真實。現在說是「革命成功」了！黨部遍佈海內外；三民主義的積極宣傳也有了二年。打倒帝國主義，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解放民衆等政策更是天天叫着。現在民衆——尤其是勞苦民衆——正拿出空頭的文票要求兌現了！

但是，究竟能不能兌現呢？不錯，五色旗換為青天白日滿地紅，南京代替了「北京」。但這於被壓迫民衆有何好處？凡是忠於革命，愛護本黨的同志，只要不擺出「領導者」的架子，平必向民間考察一下，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出民衆的地位依然如故。憔悴而悲慘神情，疲瘦而酸楚的肢體，衣服被取得等於沒有，飢餓得心身快要分家，過非人類生活的老幼男女們，在「革命成功」之後，減少了一個沒有？就是白崇禧先生最近在他條陳籌邊的文章裏也承認北伐之後兵匪愈多，民生愈苦。中國除了貪污土劣買辦軍

團和一切壓迫階級以外真是個廣大的貧民窟。在這種情形下，民衆要求解放，迫不及待，而「革命領袖」不能貫徹主義與以利益，無怪乎民衆要失望了！我不像一班「忠實同志」否認耳目所親歷的事實，不敢直認民衆失望和懷疑，我更不像一班「革命領袖」對於有理由失望的民衆輕輕加一個反革命的罪狀，使他們無從告訴，不敢要求。要曉得對本黨工作表示失望的民衆都是曾經擁護本黨主義和政綱的，唯有那對本黨破壞本黨的如腐化份子，國家主義派，無政府黨共產黨生怕國民黨不反動，他們根本不希望我們領導革命使牠成功，自然沒有什麼失望！我們要因民衆的失望而努力打倒反動敵底進行革命，根本滿足勞苦民衆的要求！

究竟革命的目的是不是應該為利益？這自然要看為誰的利益，從被壓迫的勞苦民衆方面講，革命是應該為利益的。從一切反動，壓迫者方面講，革命就是叫他們吐出被掠來的利益。參加革命的人雖然常受犧牲，犧牲終非革命目的，只算革命過程中難免的事件。領導革命的人應該有犧牲的精神也只有對勞苦民衆犧牲，沒有為反動勢力犧牲的道理。至於勞苦民衆，苟延殘喘於水平綫下的生活中，除了一條命之外，實在再無別的東西可以犧牲。革命是他

們唯一的出路；利益是他們正當的需要，一切反動勢力自身既然成了革命的對像，均在打倒之列，若說也為他們利益，豈非笑話？所謂全民利益：在革命未成功前，與「革命」是矛盾的名詞。

其實，在平等原則下，求利益並非壞目的。為被壓迫的人們謀利益正是為全社會利益平均所必經的階段。虛偽的革命者以為一談利益，人類便要私慾橫流，相爭相殺，永無止境；面不知以平等主義來提倡唯物，自然有利無弊。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 (Liberalism) 為基礎的資本制度專為少數人謀私利，壓迫多數人，結果，人慾橫流，毒惡無比。可是以集合主義平等主義為基礎的民生主義為大多數被壓迫民衆謀利益，所以才成為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好原則。中了資本主義的毒的美國，不是現在牠的唯物趨勢，只現在分配不均，在資本制度下分配也決不能平均。一切人類高尚生活都要有合理的舒適為起點；一切文化的發展都得相當的物質條件做基礎。在一個生產落後的中國，勞苦民衆過那非人類的生活，再不為他們的利益設想，還談什麼革命？

在水深火熱中受重重壓迫的勞苦民衆不但須要利益而且須要根本積極的直接的利益。唯有根本積極而直接利益

可以救他們的危亡，作實際的解放。況且他們是社會的生產者，有他們的人格，應該享受充分的根本積極而直接報酬。這種平常的道理，在革命時代，應該完全實現的。

「革命領袖」或者要說：提倡直接利益足以引起紛爭，煽動鬥爭，甚至重演共產黨在兩湖的暴動慘劇」。回答：（一）直接利益並不一定須要直接行動纔能得着。但是民衆利益要有直接行動的可能性做後盾然後可以確實保障。所以自治和民權的最高目的即在養成民衆合理的直接行動，使政權的使用完全民主化。（二）直接行動不一定是暴動。只要他是合理而有益於民衆的根本利益的，應該爲革命者所採用以防止腐化，打倒反動。罷工游行等等民衆運動在資本主義下的國家裏也是允許的，難道在三民主義下的民衆反不許麼？暴動本身固然不能夠給民衆以利益，如果以反動來代替暴動，也是一樣「害民」。我們須用政治的方法解決許多革命中的重大問題，但我們所採用的政治方法須是革命的。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中國革命所擁上台的人們，在現今情形下，有給民衆以根本直接而積極的利益之可能嗎？在原則上講，當權的革命黨或政府應該有這樣的可能性，

除非他們不革命了。如果說革命時期不能以直接而積極的利益給民衆，那無異承認革命論的根本破產。

普通有一種流行的見解，以爲無論如何澈底革命的黨或人們一到上了即漸漸退後，腐化，而反動。如果這是真理，並不能證明革命已經成功，只證明他們不革命或反革命，與革命的政府決沒有不能解放民衆，予以真實利益的。利益是被壓迫民衆不斷的需要，壓迫一天不去，即革命一天未成功，革命的必要也一天存在而加深。只要再進一步，革命仍然是出路。但是在歷史上，不革命的政府有時爲得逃避革命，也會零星的給民衆一點利益。那沒「革命的」政府，如不給民衆謀利益，連不革命的政府也不如了！

有人要說：「不革命的政府有時既會給民衆以利益，那我們只須行社會改良政策好了，爲什麼要革命？」不錯，革命的政府如果只能像遵行社會改良政策一樣，不澈底解決民衆利益問題，那的確用不着革命。但是，我們要知道，社會改良政策是資產階級在統治的地位，用以和緩革命空氣的手段，牠的目的不在爲勞苦民衆謀利益，牠的辦法是片段的枝節的；牠的效果是微弱，僵枯而遲緩的，革命的三民主義其目的在解放勞苦民衆建立合理社會，其方法是根本的整個的，其效果是偉大普遍而迅速的。社會改

良政策敵人將要敗仗時的讓步的條件，他一天勞力比民眾強了，立刻即會翻臉反攻來奪回那一點讓步的利益。英國工黨自誇是進化的，而非革命的；可是去年保工黨在下議院仗着多數票通過新工會條例，將英國勞工運動近百年來所艱難締造的根基幾乎一掃而空。「殷鑒不遠」中國革命者要特別注意！革命的三民主義下民眾利益好比革命田園裏產生的革命花和菓，只要你天天培植革命的種子（主義）維

從黨的沒落說到黨的改組

潘懷素

這一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個月間，到處聽得兩種聲調：一種是歡喜者的聲調，那不外是說北伐告成了，全國統一了，百姓們從此可以安居樂業了……歌舞昇平的頌辭；他一種是悲哀者的聲調，這却信信要說國民革命失敗了，國民黨的革命精神快要消滅了，黨員一天比一天腐化了……追悼送葬的讖語。歡喜的聲調，彷彿是鈞天之樂，自然不為凡人為我者所能了解，而悲哀的聲調却不時振動了我的心絃。只要大家都承認革命的三民主義之最高目的當真在於建設民主主義的國家——由經濟落後的國家達到社會主義的國家，就是說：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是一種緩

持革命田園（立場），這田園中的人們在他們生命的限定以內總可以享受平等自由的幸福。但是革命的基礎是勞苦民眾；只有他們能判別出革命的真相，斷定革命的成敗。在中國革命變化到現在的情形時，我敬為忠於革命的同志貢獻一個必須實現的口號：「為被壓迫的勞苦民眾求根本的積極的直接利益」。

和的社會革命（當另作文討論），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話，那末這種共鳴就使我對於悲哀者之所以悲哀及悲哀者將來應走的大道，不得不加以審察與推想。我在一年前，總算是和國民黨有相當的關係，但是現在我願以國民黨統治之下的一個小百姓資格，在此把我所審察所推想中的幾點重要的提出來，請大家討論討論。

我們都明白，悲哀者之所以悲哀，因為他們親眼看見這次革命事實上又失敗了，而革命所以會失敗，是因為負責領導革命的國民黨本身無能力，漸漸趨向沒落的緣故。那末使國民黨至於沒落的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於是

分析這些原因，就有好幾種說法。現在姑且舉出四種在下面：

(一) 因為共產黨中途違反國民革命，篡奪革命領導權，其方法是用盡挑撥離間的手段，破壞國民黨的組織，曲解三民主義的精神，國民黨受了共產黨這次大打擊之後，才萎靡不振而至沒落；

(二) 因為三民主義的理論不統一，所以才有左中右三派之分因為黨的內部有裂痕，所以投機分子政客官僚才會混進來，結果黨的精神被他們腐化了；

(三) 因為本黨領袖互爭黨的最高領袖地位，致引起黨的分裂，其結果和(二)相同；

(四) 因為黨的組織不嚴密，黨員不負責，黨員對於主義沒有切實的認識。

其實此處所舉的四種說法，都有相當的理由，到了現在，對於共產黨問題，已經清了好幾次的黨，消滅了不少的共產黨員和共產黨的朋友，那末可以說有了充分的成績而共產黨的活動依然如故；對於理論問題則有連環式的，孔敬正統的，吳稚暉的，李宗仁的，新生命的，以及其他所謂左派的種種解釋，依各派的主觀看來，總算是求得客觀了，而理論不能統一依然如故，對於領袖爭黨的最高地

位問題，現在領袖之間好像已經有了諒解一樣，我們看看特委會前後，甲去乙來，五院組織的時候，甲推乙讓，表面上總可以說得他們是為了黨國，犧牲了個人的利祿，但是據各種的風說，他們在暗中，依然是甲倒乙，乙倒甲；至於對第四項問題，各級黨部改組了兩三次，黨員對主義的認識及黨員的能力，也真面目地測驗了好幾回，選擇又選擇，如今黨部都先後成立了，黨員都一一登記了，那末應該是很好的咯！然而黨部無作用，黨員不能負責，依然如故。要之國民黨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一定會沒落下去的。所以在四事舉黨國一的今日，悲哀者——不滿意的黨員正在聲嘶力竭地喊着黨的危機和黨的沒落，必定還有其他重大的原因存在。

依我的見解，這重大的原因，總括地說不外是黨員本身的問題。這問題有了答案，同時也可以拿他去解決上面所述的問題。

(一) 黨員沒有革命的人生觀

(二) 黨員求報酬心太奢

(三) 黨員取得黨籍太容易

(四) 黨員太側重於領袖在黨的行動中的作用

(五) 黨員對於主義不能在客觀上去認識

(六)黨員對於本黨政綱無實施上的準備

我現在就把這六點之所以有重要的意義說一說。

(一)革命的人生觀是怎樣辦法呢？我們知道人本來是利己的動物，但是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中，決不是孤單單的、同時還要理解社會一般狀況未曾改善以前，我們是得不到優美的生活。假如有優美的生活之可求，那必定是不正當的自私自利的結果。所以我們要改善個人的生活，必須要在社會一般狀況的向上中打算。參加革命的人，必如此才能夠以革命的成功為自己的成功，革命的失敗，為自己的失敗。必如此他才能夠了解為革命而奮鬥的真正意義，他才有熱烈的革命情緒。

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本黨多數黨員的入黨動機是怎樣的。據我想：他們本來就沒有參加革命的必要，在他們自然更無革命的人生觀之可言。那末他們入黨的動機，並不是為黨來播革命的種子，也不是來促進革命的成功，完全是在革命過程中的趁火打劫。現在他們裏頭，大成功的則腰纏千百萬，左抱嬌娘，右擁美妾；小成功的，也必食祿千鍾，香鼻溫轡。什麼國民黨是為人民謀利益的，什麼國民黨是要實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在他們心目中，這些話老早成為熱病者的謔語。於是一般小百姓以這些大小成

功者為國民黨黨員的好模範。而好的黨員在黨內對此亦不敢多說幾句話。這樣看起來，多數黨員沒有革命的人生觀是不失為政黨沒落的一個原因。

(二)一個黨員必須有革命的人生觀既如上述。但是完全靠自己的良心去維持這種人生觀是不夠的，因為人天性上是利己的動物，必須還有紀律的方法就是黨對於黨員的生活上，應該有一種制裁才行。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黨員向社會所要求的物質報酬上，應有一律的制限。這事有以下幾種好處：(1)可以團結真正的革命份子，(2)可以防止投機分子的加入，(3)黨員間不會因物質報酬而生階級的觀念，(4)工作能力薄弱者不會去爭黨中重要的地位，(5)不會以黨為獵官的機關。如此才可以知道黨員對於黨的眞動機。

現在的黨，簡直是獵官者的龍門，謀利者的交易所。這已經是事實，不必等我多說了。於是投機者魚貫而來，好黨員之意志薄弱者，也未免隨波逐流，見利思遷，因此黨員對黨的義務心一天消失一天，而權利日盛一日，結果爭權奪利以他們為最努力，黨派之分亦因之而起。進一步必至自相魚肉，昨日為親，今日為仇。我們各就自己的經驗，回顧前三三年來本黨的事實大約總可以尋得出一點

証據吧。所以黨員求報酬心太奢，也是使黨沒落的一個原因。

(三)入黨者除照黨章內所規定辦法外，在黨員取得黨籍以前必須由黨授與相當的黨的訓練，以察其意志，以測其能力，經過一定的時期，才使正式入黨。這種分期取得黨籍辦法，可以使黨員不但有認識力，工作力，而且會與黨發生密接的關係，會養成爲黨工作的習慣。

過去入黨的手續，是最簡單不過的了，於是什麼人都鑽了進來；因爲沒有先期訓練的辦法，所以黨員入黨後，既沒有工作的能力，又沒有工作的習慣，於是黨員和黨不能發生密切的關係，結果黨員對黨不必負責，或者是無適問的機會。總之是黨的損失。所以這也是使黨沒落的一個原因。

(四)革命黨的領袖，在行動上是各年中的指揮官，可是這兩種職務上的性質是絕對不一樣的。指揮官是以自己的意志爲意志，而黨的領袖是以全部或大多數黨員的意志——即黨的意志——爲準繩而決其行動，又領袖必須有表現黨的意志的能力，然後在組織上成爲上級黨部的執行者。就實際而言，領袖應該是黨的行動上最適用的工具。

不過現在的黨員對於領袖，似乎不是這樣吧。他們以

領袖的意志爲自己的意志，由他們組成的黨爲領袖的工具，他們忘却自己在黨裏的地位，他們又看不明白領袖在黨的行動上的作用。這是爲什麼呢？因爲他們自己對於黨太不負責太無能力的緣故。黨員的行動既以領袖之意志爲轉移，那末結果只有看見領袖的行動而不會有黨的行動。至此黨的作用可以說是已經消滅淨盡了。現在的黨是不是這樣的情形，請大家自己看看吧。

(五)一種主義決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完全人造的，而是某一環境的歷史上的產物，所以環境變遷，當然予主義以相當反射作用。同時認識或批評一種主義者也必須要明白產生該主義的歷史和環境。這就是客觀的認識法或批評法。那末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自然不能在例外，也就是中國所處環境之歷史上的產物。所以現在黨員對於三民主義的認識和批評不能和四十年前對於三民主義的認識和批評是一樣的。因爲其間經過一個長時間，在這時期之內，空間的環境也不同了。如果現在有人對於三民主義的認識和批評，說和以前的是一樣的，那末三民主義在他的見解中一定是天經地義亙古不易的，即絕對不會受環境變遷的影響。這種結果在批評上或認識上必定會發生一個時代的錯誤。我覺得現在有不少的先知先覺老少同志學者大人犯

國民黨左派與中國革命前途

蕭淑宇

了這種時代錯誤。好像把清廟的禮帽戴在一個穿中山裝的人的頭上，究竟不成東西。所以對於主義認識之不相同，結果決沒有好的影響及到黨的。再明顯地說來，就是黨的分化。那末這種分化作用也不外是黨的沒落的一個原因。

(六)黨員對於黨的政綱各無一點實施上的準備，這便是他對於黨不願或不能負責的明白證據。一個黨握了政權之後黨員不能運用政權同時對一切政綱毫無辦法，事實上非請他人來辦不行，那末結果等於把以許多汗血換來的政權很恭敬地又交給他人。這兩年來的情形不是如此由大家自己去判斷，不過我覺得黨員對黨綱無實施上的準備也是一個使黨沒落的原因。

現在這六種可以使黨沒落的原因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是更深切地叫我們感覺到了。我們不問黨的情形則已，不承認黨的沒落則已，如果要問要承認，同時在理論上實際上又以國民黨仍舊還有負今後中國革命之可能，那末非把這六個原因的正面講個清楚不可。這幾個月來黨的改組聲浪很大，很普遍大家真要求黨的改組嗎？倘若是真的，我請

以這六點為大家運動改組的先決問題。分析言之便是下列的十一條件：

- (一) 決定革命者的人生觀。
- (二) 提高革命的情緒。
- (三) 革命者的犧牲精神要從自己向社會要求報酬的事實上做起。
- (四) 黨員對黨必須有切實負責的能力。
- (五) 黨員在黨內，不論對任何問題對各等級黨部負責人員都應該有審議批評的自由。
- (六) 領袖是黨的行動上最適用的工具。
- (七) 拋棄黨的行動上不適用的工具。
- (八) 打破領袖有無上權威的觀念。
- (九) 把三民主義在現在環境中重新認識一下。
- (十) 把黨的政綱在黨的基礎組織中重新嚴密地討論一下。
- (十一) 要革命的重新團結起來。

(一)

「這一次革命又算失敗了，同志們，準備重新再革命吧！」當初流行這句悲壯沉痛的話語時，有許多人竟說是太過激或意氣用事，到現在，這句話已經深入人心，而且是牢不可破了；這與其說是革命同志們奮鬥或宣傳的結果，毋寧謂為經過了統治階級自身事實的證明。本來革命不是少數人腦中的幻想，亦不是如幻術般的可以欺騙了事，而完全在於客觀環境的要求；所以不管戴季陶先生的演說有時怎樣沉痛，怎麼動聽，終不能使革命同志們胸中的餘火稍息。戴先生曾以革命過程中的破壞和建設比之折房子，築馬路，比喻雖然是有相當的理由，然而他却不知道那班不忠實的工程師和工頭們，房子沒折完，就只顧偷磚賣瓦，結果，房子折爛了，磚瓦木料偷賣完了，公款吞食盡了，不但修不成馬路，連地基都變成了糞坑和垃圾堆，到這步田地，還罵監工者——民衆——不懂得工程學，不當多說話麼？要知民衆在此時不是怨憤工程師不應將房子折破，乃是責備他們不忠實，無技能，折了房子，修不成馬路！現在中國的政局不都剛好成了這個狀態麼？戴先生們好似未之見未之聞，不但不起來糾正，反而常要出來辯護，所以不管他如何會說，終於將事實彌蓋不住，而且因

爲他常有此等反乎實際的辯護言論，連他本人在民衆方面的信用也失去了。從此我們更深一層的認識到，革命完全爲事實和環境所造成！（按戴季陶先生曾在南京中央黨部紀念週上有以革命比折房子修馬路之演說）

從歷史上觀察，各國革命運動都有其重大之背景，而且不外乎民族問題，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換言之，民族，民權，民生問題耳。在客觀的事實上，我們認定現在中國革命的需要仍不外於三民主義，因爲事實已經證明了今日的南京黨部不但不能領導完成中國的國民革命，而且處處走出了三民主義的正軌；所以現在的中國政權雖已從北洋軍閥轉移於一部分背叛革命的國民黨人之手，然而中國革命的環境依然無稍變易，明白一點說，就是：多數民衆所需要解決的民族問題，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經濟問題還是沒有希望！

現在南京政府是不是具備革命的條件呢？這不但是一般人民的批評，連他自己也還在懷疑，南京政府的「整飭官方」令不是說：「軍興以來，綱紀凌亂，大法未申，上焉者以官職爲酬庸，下焉者以奔競爲能事，墮廢民社，舉止乖方，甚至政以賄成，人心違怨。事既發覺，祇以黜職薄懲，使其飽颺法外，一遇機會，復尸職位，以至治本益

環，民困日深……」麼？這篇文章，雖未足以形容其萬一，然從此可見一般，所以平情而論，革命後的政治和革命前的政治，我不懂得進步在那裏？誰亦說不出他們的區別所在！而且自從西山會議派篡奪黨權以後，人民所感受思想，言論，行動上的不自由，比之北洋軍閥時代尤甚十倍；所以人們常說，兩年前在反革命的北京政府統治之下，民衆所能得到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居住，罷工等自由權，現在得不到了，按諸實際何非如此。新與的統治階級只企圖鞏固其已得的政權，不管國民黨政綱中如何載列着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自由權，不察民衆的痛苦，一惟以強橫手段，束縛其思想與行動之自由；以故在言論，出版方面，現在的當權者每藉防止宣傳共產主義爲名，查禁一切不爲政府歌頌的有關於政治，社會，文化等宣傳之書報和刊物。在集會遊行，罷工方面說，不論其關於政治，經濟或民族運動的，一律以防共產黨搗亂爲名而加以武力制止，所以在段執政時代有「三一八」慘案，而在南京特別委員會時代則有「一二二」慘案。「五四」運動時北京學生代表因毆辱曹汝霖等被拘捕，而今南京學生代表則以及對喪權外交，搗毀王正廷住宅遭囚禁。以此類彼，無怪乎張學良於被任爲國民政府委員後方肆意任哈

爾濱大殺愛國羣衆！更就民衆生活方面而言：行年以來，物價騰貴，災患無擇，共產黨與土匪既到處相結肆虐，土豪劣紳又圖乘機報復。政府對於工人現無法以改善其生活待遇，對於農民則不但土地問題不得解決，連本黨前年減租之決議尙不予以實行。對於商民則苛捐重稅，任各地小軍閥及貪官污吏之百般剝削。政府既不能爲民衆與利除害。無怪乎民衆對於政府不加信任與擁護。奉軍退出北京以後，北伐粗告成功，人民殷殷垂望於統一政府成立以後，政治漸入正軌，豈知政府改組以後，除排去了前政府中之左傾分子，及引用了一班西山會議派及「一二二」慘案禍首以外，也無成績之可言。且主席和院長雖高揚南京東三省猶懸掛五色旗幟，禁止國民黨活動之張學良，也被舉爲國民政府委員；前北京政府中之一般反革命之腐舊官僚，猶存議員又相率南下活動，現在南京政府各部院中，居二三等位置者，大半此輩人居多，因此成功了所謂「軍事北伐，政治南伐」之謬語。本來以現在黨政腐傾之責歸之於蔣介石先生一身，未免太過，但是蔣先生爲當今之國府主席，中央常務委員兼組織部，政治，軍事二委員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已集黨權，政權，軍權於一身，自不能不負相當的責任。再說到所謂根據新制（未經中央至會

正式通過)成立的五院：行政院中除了添設了幾個新部，及因不敢免王伯羣交通部長之職，由交通部中劃分出來一個鐵道部；任用了一個身居買辦階級的穩稱初爲工商次長，以開財閥專政之端；任由王正廷簽訂辱國，喪權之條約以外，他無遊人的建設或破壞之舉動。考試監察二院本是用以位置一班不上不下的新舊人物不當然談不上什麼。司法院的作用我們看不出與司法部有何分別，擴大了之後，不過好讓王院長多引用幾個法國白相朋友。談到立法院，那就愈出奇，四十九位立法委員當中除去大部分的西山份子，「一二三」等案禍首以外，最是大多數得出的人物，是最奇妙的人物是一位已經去世了的王委員，退一步想，任主席夫人，和李總司令的書記官或者尙屬胡漢民先生的苦心，用死人的理由，我們實在不能明白。以這樣一個殘缺不全的政府，而欲強革命同志領導羣衆去擁護牠，這不是夢想麼？

自從南京黨部和政府離開了民衆，失去了民衆的信仰，成功着背道而馳的趨勢以後，革命中斷的危機愈見顯明，在這個革命危機當中，雖然有一般忠實的革命同志尙在刻苦奮鬥着，打算爲中國國民黨和中國革命前途開一條新的出路，然而各種反動勢力也正在乘機蠢動，欲所有爲，

這些反動黨派的勢力就是：

一，共產黨 共產黨自從南昌，廣州兩次大暴動，及在各地勾結土匪游氏，實行其殺人，放火，劫財的政策以後，民衆本已深惡痛恨之矣。乃因國民黨黨權的篡奪，政治軍事的腐化，遂得復到處蠢動，使一般不滿意於現實的青年受其煽惑，據被發共產黨學生所借述，尙有在最近加入共產黨者，此等青年雖多致由於見解錯誤，然而其動機尙因對於當局的過分失望而起，所以假使國民黨長此被一般假革命分子竊據着，將更予共產黨以可乘的機會。

二，無政府主義派 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派實際成功着反革命派了。因爲他們不但反對強權，主張自由，反而勾結軍閥，崇拜武力，極端壓制民主思想，試看吳稚暉李石曾輩之勾結桂系軍閥，主張不取消政治分會，不取消總司令總指揮制。極端由軍人主持中央及地方行政，反對黨的有紀律，有嚴密的組織，主張取消省以下之各級黨部，企圖把持全國各地教育權，消滅現有青年運動的組織，站在他們自己的立場上，雖然認定非如此破壞國民黨的統一和健全，不足以發展其本身的力量，然而因爲其不擇手段的原故實際上已反於革命矣。最近他們的活動甚力，除在教育界上佔有勢力以實行每年花費公款五十餘萬元之勞動

大學爲其造就人才之大本營。并圖利用國民黨的經費，開始其勞動運動；所以目前他們的破壞中國國民革命，實不讓於共產黨和其他一切反動派。

國家主義派 此派人現在已由公開而入於秘密的活動了。自從北伐軍佔領北京以後，他們的機關報醒獅週報已遷去日本刊行，他們利用國民黨內部的發裂，使他們的分子用着灰色的態度，攪進到行政機關及教育界去活動，據各地消息，他們現在還在到處蠢動，此輩人的活動雖不足爲革命前途的大患，然而搗亂則有餘。

四北洋系 所謂北洋系完全爲北京政府之舊軍人，政客所結集的總稱，其中包含着安福系研究系，交通系，外交系，財政系，他們現在除利用南京政府的腐傾局面，奔走活動於各方，保存了相當的勢力，據外報記載，他們最近尙有在北方組織政黨的醞釀。總之在此革命危機當中，一切反革命勢力都有乘時興起的可能；不過此系勢力實際形成以後，最爲中國革命前途之大患，因爲他們除了可以代表一切封建勢力，豪紳地主階級，洋買辦階級等反革命勢力，并且可以利用國民黨的落伍軍人，及與政府當局聯合，以壓迫革命勢力，所以在此革命勢力消沉當中，此種反動派之活動，尤堪注意。

本來上面這四個反動的黨派障礙於中國革命前途，爲敵於我們國民黨者已非一日，不過牠們勢力的消長正與革命勢力的消長爲反比例，此次因爲國民黨內部革命勢力消失，所以牠蠢動的機會更多，然而從此更證明三民主義與國民黨在於中國國民革命的需要。客觀一點的說，假定國民黨內部的反動勢力不能從速消滅，以至三民主義不能實行，則惟有延長中國的禍亂，使民衆多受痛苦。萬不能希望共產黨或無政府黨，國家主義派，以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來實行，以完成中國之國民革命。不過，現在南京的黨部和政府在其本身早因失去了革命的國民黨的精神，已不能得多數國民黨同志的擁護，成功了少數人的工具，我們對於牠，不但不能具有何種的希望，而且惟有希望牠和去年的短命特別委員會一般，早些消滅下去！歷史告訴我們，去年特別委員會的名目雖然消滅，但其勢力并未消滅，以後我們只有以毫不妥洽的精神，掃除今日的一切障礙。這種責任不是幾個少數人或那一個小組組織所能擔負得起來，我們只有希望全體忠實的革命同志——國民黨左派，起來擔負着這個責任！

什麼叫做國民黨左派呢？左派的定義，依汪精衛先生的解釋，是：「本黨黨內之有派，在改組以前，已是事實

只是脫不了個人關係和地方關係，及改組以後，方才有左右派的名詞發生……這兩派當時都沒有什麼組織，不過從其言論，態度，行動而自然分化……及至十四年夏間楊刻掃以後，右派分子感覺到廣州革命根據地不能立足，遂開始秘密組織……至於左派，不但當時并没什麼秘密組織，直至今日也是沒有，既然沒有組織，則所謂左派，依然不過從其言論，態度，行動而予以形容罷了。」不過汪生的解釋，是抽象的。而不是具體的，究竟從言論，態度，行動上如何表現着方為左派同志呢？我以為：在思想和言論的表現上，（一）要能接受總理的全部遺教，從物質，歷史，科學方面去解釋三民主義，反對唯心的解釋及其他一切修正，和曲解的理論。（二）要能認清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不單謀中國民族之解放，而尤在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担負着世界革命的一大部分工作；所以要遵守總理的遺囑，對內「喚起民眾」，對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三）要能認識中國之國民革命，實含有階級性，國民黨的階級基礎應建築在農工小市民身上，非如吳稚暉先生等之主張全民革命，軍閥官僚也有參加革命之可能。在態度上：（一）應仿總理的偉大精神，對於一切革命同志均出以雍容博大，「親愛精誠」的態度，而不當如胡漢民

先生之度量狹小，專門排斥異己。（二）同志間的結合，重理智而不偏於感情。在行動上應有百折不撓，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一）不與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謀妥洽。（二）時時站在民眾前面，以身作則的去領導奮鬥。（三）不腐化，不惡化。必如此，方能算稱一個國民黨左派同志。有人說，國民黨既然是一個革命的政黨，自然國民黨的每個黨員都應合於上面的幾個條件，何以單說左派同志，才應如此呢？本來在理論上只有革命與不革命之分，沒有左右之分，對於叛黨的不革命，反革命分子，我們應該不承認他們是國民黨同志，何必還要尊稱他們為右派呢？不過在事實上現在國民黨的黨權，從中央以至於地方，大部分被反革命的右派分子掌握着，他們又有武力以壓制一切，黨的招牌既然頂着在他們頭上，而他們口中還天天談革命，談三民主義。所以為使民眾易於辨別而不至於混淆起見，只好尊稱之為右派。

在這個整個的反動政局之下，而且以各當着帝國主義者乘機進攻，新舊軍閥大反革命，封建勢力抬頭，共產黨暴動時節，我們應該如何希望國民黨的一切革命同志——左派同志團結起來，共同担負着這個艱難的使命呢？歷史告訴我們，一個担負時代使革命政黨，必需具備着以下的

幾備條件，(一)要有明確的政綱。(二)要有嚴密的組織。(三)要能領導得起來廣大的羣衆。(四)要有悠長奮鬥的歷史。(五)要有能得羣衆信仰的偉大領袖。反觀現在的國民黨左派如何呢？雖然有領袖，有羣衆，有歷史，然而尚無顯明的綱領和嚴密的組織；因此我們(一)希望一切國民黨左派的同志團結起來，使過去自由趨向的同志，結成一個嚴密的而有紀律組織，以整齊而有步伐的統一行動，共同向反革命勢力去進攻。(二)希望將來有組織的左派

暴動與恐怖

不幸，中國的革命到了今日，已經達到一個極嚴重的時期了。一方面所表現的是無秩序的赤色暴動，一方所表現的是有計劃的白色恐怖。列宿的黨的戰術，想以「赤色恐怖制止白色恐怖，」想把「那班會使世界戰慄的人們戰慄于革命之前；」於是弄得全國農村的經濟破產，中小資產階級的命運固然日趨沒落，就是他們所欲拯救的無產階級，仍然哀號于飢寒之中。處境之苦，較革命未發動之前尤爲悲慘。這種現象，乃是列宿戰術之必然的結果；因爲中國的無產階級，就其階級狀況來講，很少近代無產階級的

能依照總理一切遺教及中國革命需要，制定明確之政綱使中國革命的理想完整而統一。(二)希望汪精衛先生和其他一切黨內的革命領袖。親身出來領導奮鬥。同志們！一切爲三民主義奮鬥的革命同志們！起來共同起來參加國民黨左派的救黨運動——改組運動——，中國革命的成功和失敗的關鍵就在於我們這次運動的身上！！

一九二八，十二月，廿五於上海

黃惠平

意義；就其數量來講，亦祇有二百萬多人，僅佔全國人口中千分之五；再就其階級的意思來講，完全是站在小資產的立場，舒適而小康的中農生活，是他們惟一的理想。而流氓無產階級，更祇有消費的意識，沒有生產的綱領。若認其爲社會革命的推動機，社會革命的主力軍，超越社會進化的歷程，漠視民主革命這個階段的重要性，結果不但使社會革命滯產，民主革命夭折，而且會使變相的拿破崙飛躍于中國的政治舞台，加緊對於民衆的壓迫，加重對於民衆的剝削。中國革命今日的流產，革命的國民黨員固然

要負相當的責任。豪紳階級的反動，小資產階級的搖動，與新興軍閥的反攻，誠然是使中國革命流產的客觀原因。我們姑且拋開黨的領導權這一點不說，單就歷史的客觀意義來下觀察，我敢大膽的說：中國共產黨必須担負大部分的責任。我堅決認定中國的社會是一個半封建的社會，民主革命是中國革命必然經過的階段。亦惟有真正民生共和國的實現，民主革命的澈底勝利，農工才能得着解放，反動勢力的連環性，才可以擊破其一端，而毀碎其全體。若認不清楚中國革命的歷史意義與其客觀條件，一意孤行，秉承第三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戰術，妄想以「小暴動匯成總暴動」，以為僅憑人類的意志可以推動革命的進行。殊不知一個成功的革命運動，除了構成革命集團的份子底意志與民衆的需要以外，還須有別的條件存在。譬如人類皆願長生不死，但是這個意志終是無法防止人類的自然死亡。所以一個成功的革命運動，必須與當時當地的社會客觀條件互相適合；一個真實的革命者，應當時常注意到社會上的實際關係。若不顧客觀環境，採用超時代的策略，中國的革命終將失敗于官僚金融財政與農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一——聯合陣綫之下，所以我說中國革命的出路，惟有鞏固農工小市民的聯合陣綫，厲行普遍的，廣訊的

民主運動，才能建設真正革命的民主政治，走上非資本主義的道路。亦惟有代表農工小市民的國民黨取得政權之後才能保障民主革命的勝利，完成總理孫先生的遺志，與中國革命的歷史使命。

其次，我們再來討論有計劃的恐怖。暴動與恐怖是革命過程中與反動政治之下的兩個顯著現象。他們彼此之間相互的關係，有如影之隨形。我們不願効所謂時賢的口吻，說些悲天憫人的話，以唯理主義的眼光批評統治當局的恐怖手段。我們現在祇願討論統治當局施行有計劃的恐怖手段的動機及其效果。原來革命就是被壓迫階級對壓迫階級的反抗運動，在原有制度下的特殊階級，總想維持他們的利益，和發展他們的慾望。所以一看見革命勢力正在醞釀，便馬上發生反動，不惜採用種種殘酷的手段，對於革命派肆加壓迫，藉以鞏固其已得的政權，與其特殊的地位。政治領袖的狂念，也可發生同樣的現象；他們一旦感覺本身勢力基礎搖動的時候，就千方百計謀作最後的掙扎，希冀苟延其政治的生命。有時竟殘殺同黨中的異派；羅伯士比之殺但唐，斯達林之放逐杜落斯基，就是革命史上兩件極鮮明的例證。恐怖手段的無限行使已經是革命行將失敗的預兆。更不幸的，就是這種手段施之于同黨同志。

在法國大革命中羅伯士比爾派曾以過激派的罪名，加之於同黨中的黑伯特斯派 (Traktion der Hebertisten)，將其捕交特別法庭判處死刑。既在今日的蘇維埃俄羅斯，幹部派的斯達林輩，亦以反「列寧主義」的罪名，放逐反對派的領袖杜羅斯基。但是效果怎樣？革命的法國在羅伯士比爾統治之下，人人朝夕自危；當時的民衆不但不願爲代表其利益的政黨而奮鬥反以推翻羅伯士比爾爲解除其痛苦的出路。於是演成了以後拿破崙的武力統治，與拿破崙失敗以後財政貴族的統治，造成政治上的反動局面，至于蘇俄的將來怎樣，我們現在雖然不敢遽下判斷，但是蘇俄共產黨幹部的官僚主義，正在發榮滋長，機械的集權主義使「黨與民衆的分離」已經整個地實現了。蘇俄共產黨對於俄羅斯的統治，今日已非基於民衆同性心的溫和領導權，乃

從重整革命勢力的運動中談到土地問題

張北海

近百年來中國農業經濟的社會基礎與封建的閉關主義，禁不住國際帝國主義的衝擊與剝奪，而引起中國不可思議的糾紛。中國在百年以前，在小農經濟時代，一般農民還能力耕自食。自從帝國主義的大公司大工廠把中國原有

爲官僚命令的強制統治。牠壓迫了一切批評，與抹殺了一切不滿意。到了某種時期，我敢大胆地說蘇俄共產黨幹部的政權遲早必有被民衆傾覆之一日。這個歷史的教訓，會在現在的中國發生若何的影響，我們現在姑且不談。但是某系軍閥「甯可寬殺三千，不可放走半個」的恐怖政策，與目前握著黨權政權的諸位先生底陰謀想以恐怖的手段壓迫目前民主運動的鬥爭，動不動就把「準共產黨」、「共產黨的朋友」這一類的頭銜箝制黨員的發言權，封閉革命的言論機關，逮捕革命的同志，究竟會發生若何的效果，歷史的變遷會明白告訴我們，我們不要爲一時的兇狀所迷惑。歷史懂得所有各種的變遷，至于「時物質的勢力，或英雄的狂念，這在政治上都不是嚴格的東西阿！

的小商店手工業整個的破壞以後，就正如「革命中國」的同人所說「新舊勢力的紛爭，震撼了整個的中國。使她陷於經濟的恐慌，造成中國人民生活的不安。農業經濟受不住工業經濟的攻擊而搖動，農民不能不捨了田畝變成兵匪。

本國工業敵不過外國工業的壓迫而萎頹，工人不能不成爲流氓，而跟着經濟的不安，當然就是政治不安。軍閥與軍閥的爭鬥，封建勢力與革命勢力的爭鬥，民族力量與帝國主義的爭鬥，復古傾向與維新要求的爭鬥，以及紅槍會與土匪與軍隊的爭鬥，大刀會與小刀會的爭鬥，整個的中國是一個爭鬥的中國。」這種紛亂的病源完全建築在社會的真實基礎的農村經濟上。

現在的農村經濟是被逼到極點了，中國革命能否成，就看農民的痛苦能否解放。本黨對於農運，雖有明顯的聲明，認爲「吾黨爲鞏固國民革命之基礎，惟有首先解放農民，無論政治的或經濟的運動，均應以農民運動爲前提。黨的政策，首須著眼於農民本身的利益；政府之行動，亦須根據於農民利益而謀其解放。因農民苟得解放，即國民革命大部分之完成，而爲吾黨三民主義實現之根據。」所以農民問題是本黨的中心問題。也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問題的中心又在於土地問題。本黨在革命高潮的前年，雖曾組織土地委員會，但是除了通過幾個議案之外，似無成績之可言。當時湖南的農村經濟完全破壞，有所謂東佃糾紛，爭佃糾紛，貧農富農糾紛，限制耕田糾紛，有業農民與失業農民糾紛，阻禁穀米糾紛，爭土地界址糾紛

，購買平糶糾紛，進而至於分谷，分佃，量地，插標佔田，等各色各樣的糾紛。這種情形，一方面固由於共產黨幼稚的表現，一方面也由於我們國民黨沒有預定的計劃。現在過去革命的高潮已退，國民黨革命的同志正在從事於重整革命勢力的運動中。在這個時候，對於土地問題，有充分的準備與解決的必要。希望革命的同志們起來討論，在理論與事實的共同關係中，於最近的將來，找出可以實行的方案。

這種方案我認爲須得適合於下文的三個目標，也就是解決土地問題的三點意義：（一）發展農村經濟——歷年來，中國的農民受盡貪污土劣的剝削侵凌，軍閥盜匪的苛抽擄掠，加以天災人禍，無時無刻不是使農民處於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境地。於是土地日見集中，集中的結果，耕種的人沒有土地，土地多的人不肯耕種，并且憑藉他的土地以高度的田租來榨取農民的汗血，我們從乘山中國田租的高度（見前進一卷九號）一文，就可以看出他用「購買年」的方法推算出廣東的田租比較歐戰後的英國還高過四倍多。他那篇文章的結論并且說，「據白克氏在蘇皖兩處的調查，則十年來田價的增加不及穀價快，穀價的增加又不及田租快。田價雖在那裏高漲，而田租更在那裏高漲。田價

漲的速率不及田租，則納租者一味吃虧，收租者占盡便宜。於是富者更富，窮者更窮。中國田租的高度遂成社會治亂的標準。」因為農民既要負擔高度的田租，就沒有資本去購買更好的或改良原有的生產工具，結果生產率自然減退，而形成農村經濟破產的局面。國民政府對於農民運動第二次宣言裏會說，「近年以來，農業戶數及耕地面積，日益減少，荒地面積，日益加多。據最近調查，全國農業戶數較前年（十二年）減少達三千餘萬戶，耕地減少，達四萬萬餘畝，荒地則增加無數萬畝。」假使這種統計是確實的，則實在令人驚心動魄了！所以要想挽救這種危機，以發展農村經濟，祇有從解決土地問題着手。（二）剷除封建勢力——從嚴格的封建制度論看來，雖然中國現在可以說是沒有封建制度。但我們回頭一看社會上的實際情形，就感覺得封建的殘餘勢力，非常的顯明。肥遯的民主革命與土地問題一文說得最清楚：「試問巡閱使總司令督軍兼省長，軍長兼省政府主席，聯帥與政治分會，分割領地，把持財政，抓取徵收機關，各自鑄幣與濫發紙幣，苛捐雜稅名目繁多到三十餘種，正稅預征到民國三十幾年，拉夫用繩索綁，殺人如屠狗屠猪，日日備戰，天天防賊，名曰一致北伐，實則內部無日不有倒戈與繳械事件發生，明

火執權，互相火併，也天天都有爆發的可能，倒戈也好繳械也好，明火執權，互相火併也好，中央不敢過問，總之強者為王，我不知這些較之封建諸侯何如？」

這種封建軍閥的統治，演成連年的內戰，使中國社會沒有進步的希望。所以他又說，「而他們惟一的目的，赤裸裸說：就是爭地盤，正如封建諸侯想擴充領地一樣，爭地盤的意義我看就是爭一塊土地來盤據，在歐美工商業國家，國家的大宗收入，已由土地的租稅，改歸商品的關稅，中國是產業落後的農業國，大宗的財源，仍是附着於土地，所以爭土地完全是封建社會經濟支配的反映，這是中國演成長期混亂局面的社會根據。」可見這種封建勢力有牠的經濟基礎，有擁護牠的不耕種的大地主，這種封建勢力才能夠殘存到今日，有了不耕種的大地主，才產生無量數的貪污土劣，土地國有沒有實現，土地私有制度沒有推翻，則封建勢力的經濟基礎依然存在，一切的思想道德風俗習慣教育政治都從這種經濟關係反射出來。其結果，軍閥的統治陳陳相因，農村經濟自然是永劫不復了。所以要剷除封建勢力，也祇有從解決土地問題着手。（三）打倒帝國主義——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是工業國家的產物，所以帝國主義向經濟落後的農業國家掠奪，是必然的趨勢。

中國是農業國家，帝國主義早就認爲最好的商場，并且又是原料的策源地。故近百年來，中國農民受帝國主義的摧殘最甚。一般貪污土劣，直接向農民進攻，爲帝國主義走狗般的工具，爲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代理人，以吸收貧苦的農民的膏血。所以廖仲愷先生說過『吾人其不欲解決吾人之痛苦，謀國家人民之豐富則已，否則必須與帝國主義

專 載

中國國民革命的前路

陳公博

戰；吾人其不欲打退資本帝國主義則已，否則必先與國內軍閥戰；吾人其不欲打倒國內軍閥則已，否則必先喚起全國國民共圖國民革命；吾人其不欲國民革命成功則已，否則必先去幹農民運動，故今日農民運動，其根本問題爲國際問題。』所以要打倒帝國主義，也祇有從解決土地問題看手。

我在十七年五月，曾草『今後的國民黨』一文，第一把國內外的形勢加以簡略的分析，第二對於國民黨的今後提出幾項的要求，在顯明的整個革命失敗的局勢裏面，我也知道并非破碎的黨所能挽救，我也知道并非漫無組織的個人所能支持，所以我屢次斷定政局必更腐傾，至於今日無論那一件事實都足證明我的判斷沒有錯誤。我草那篇文章的當時並沒有對於現局存幾微希望之心，不過在垂死的革命當中，指出幾點癥結，給關心中國國民革命的人們一條總走的道路。

對於十七年整個局面的觀察，大概可以分作兩種人，一種是失望而還帶有希望的，一種是失望而至於絕望的，我的客觀是後一種，而主觀呢是屬於前一種。我并不是個人內在性的矛盾，實在是時時刻刻想把黨的立場切合革命的立場，在這兩個立場衝突的當中，遂呈露惜感和意志的一時分立。而現在呢，絕望的更加絕望，而希望的也斷然入了絕望，所以我敢斷言在十八年的革命已表現了一個新階段，我們非把客觀的事實和革命的條件再估量一下不可

在一個相信物觀的人，無論那一件事實發生，必在事實的背景去研求，同時必把發生的原因去分析；以同樣的理由，所以對於無論那一個革命的成功，必有成功的原因，那一個革命的失敗，也有其失敗的背景。凡是一個革命黨，牠的任務，必在一個革命成功或失敗的一個結束階段以後，對於已往必須加以檢閱和分析，對於將來必須加以判斷和指揮，然而這種工作已不能望之於黨的機關，只好再拿個人的經驗，對於民國十八年革命的前路，重新作一番的探討。

現在誰也明白的承認革命已經失敗，就是擁有政權的人們離開他個人權位的觀念，也明白承認革命已經失敗。我們並不須要枝節的表面的痛罵政治的腐敗和個人的貪污，因為革命的失敗或成功，最容易判別的：第一政治不是有了建設，其建設是否與人民有關；第二經濟不是有了建設，其建設是否與人民有利。這個答案是肯定的，革命便可以說大體成功，這個答案如果是否定的，革命便可以說是根本失敗。

這兩個標準如果沒有錯誤，我們便可以照着這樣追求，我們先說政治罷，建設不建設，我們暫且不談，革命後的政治最低限度要表現和未革命以前的政治「不同點」。在

一年以來，我們固有找不出什麼建設，連那政治的「不同」也無從去找。我所謂不同，例如革命以前的政權是在貴族或軍閥的，革命以後的政權應該在大多數的人民，縱使因為革命的過程不得要握於革命的機關，其一切制度必得為人民利益的反射，換一句說話，即是政府的制度縱不是與人民相關，亦須治權與政權有幾微的連帶性。我所謂不同，決不是個人政權的移轉，北京政府換了南京政府，責任內閣換了五院，幾省的大帥換了集團軍司令，省長換了主席。現在只管議章程，定法制，人民固漠不相關，也不能過問，與軍閥時代沒有兩樣，與辛亥以前也沒有兩樣，若要勉強找出不同，只有對於人民各種自由再加上一層束縛和嚴格的限制罷了。

其次談到經濟問題，簡直沒有問題可言，但是我們並不是玄想者，要一日築成羅馬城，我們會三番四次用「設身處地」之心，發「刻已諒人」之論，也會被人批評過為安治者，也會被人酷罵過為政府派，可是一年以來，不只有經濟的建設，連統一財政的基本原則也還縹緲海外的神山。只見今天把內政再畫為衛生，明天再把交通再畫而為鐵道，語其結果，衛生和鐵道總找不出什麼計畫，反而連到內政和交通的本部也若存若亡。在我本人的意見，要

使政府成爲科學化，分工愈密，成效愈多，設使政府再化分爲二三十部，我也贊同。然而設職不以任事而以爵庸，更且不是爵庸而以爲敷衍之具，那真是官僚化政治，離經濟的建設很遠很遠。不錯，我也曾再三的考慮，目前要談經濟的建設，第一當頭的是資本問題，要談到資本，當頭的首要解決裁兵，但我想在這種分擔局面，若具有資本，是否能夠用於建設，是否不用於擴充軍備以鞏固割據的陣綫？

不過，我們是承認客觀的，我常說革命的失敗，必有其外因和內因，最顯明的外因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穩定和第三國際的破壞，進一步要防碍中國革命，內因由於封建勢力的復起和新興資產階級的反動，進一步要中斷中國的革命。合此手段不同而目的相同的兩大原因，中國革命途陷於崩潰的危境，至於今日黨的破碎，人的腐爛，完全有意識和無意識的受了這兩大勢力的支配，做了這兩大勢力的工具罷了。好了，現在我對於現狀的零碎批評太多，我深願對於這兩個外因和內因詳細分析以後，再判斷今後的前路。

(一) 國際形勢 資本主義的穩定

第三國際的破壞

要談到國際形勢，第一要明白中國在國際上所處的地位，第二要明白實際上足以支配中國的各國。對於前一個問題很容易加以一个簡單的答覆，因爲誰也知道中國是一個半殖民的國家，我暫置不平等條約不談，先舉兩個最近的例子，一個是十六年英國聯合各國向華出兵，一個是十七年日本以武力佔領膠濟，對於這種違反國際法的行動，中國在事前固然沒有抗議的餘力，即在濟案事後，國際聯盟連中國的請求裁判也以默然的擱置了事。爲什麼這樣，因爲中國在國際上簡直還談不到位置的緣故。對於後一個問題，我們應該加以詳細的解剖，在歐戰以前其實力足以支配中國的有英德法日美俄，在歐戰以後其實力足以支配中國的只有英美日和第三國際。（見我所著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第二章）我們討論英美日三國，可以牠們在中國的經濟關係決定其態度，我們討論第三國際，可以牠對東方的政策決定其態度，現在我先個別的談談，然後再作一個綜合論。

一英國 自歐戰以後，英國對華政策，可以分作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由歐戰停止以後至到民國十二年，因爲國內和歐洲的金融還沒穩固，所以對華也就取半放棄態度

，這個時期可以喚做搖動政策時期。第二個時期歐洲已漸穩固，對於太平洋問題，重復注意，華盛頓會議的英美合作，以至於所謂九國協商，可是一方抑制日本的獨霸，而一方還是對於中國屠殺，這個時期可以喚做壓制革命時期。第三時期由廣州的省港罷工以至放棄漢口的租界，一方聯合向華出兵以示威，一方單獨交涉故示其讓步，操縱揮闔，鞏固其東方的霸權，這個時期可以喚做軟化革命時期。至於今日保守黨的軟化中國革命政策，大告成功，但我們要知英國可以易鎮壓手段而為軟化手段，不能不先研究英國的內狀。我們先談重工業罷，英國鐵的出產在戰前佔世界全額百分之一十三三三，最近只佔百分之三一三；鋼的出產戰前佔世界全額百分之一一零一六，最近只佔百分之三八六；煤的出產戰前每年是二萬九千二百萬零四萬三千噸，最近只是一萬二千八百萬零三萬五千噸；至於紡績業戰前有五千五百六十五萬二千紡績錠，最近反增加至五千七百二十八萬六千紡績錠。然而英國的內部煤鐵的生產雖較戰前為減，換言之即是未及戰前生產額的平衡，但是英國印度戰前鐵的出產不過三十七萬七千噸，最近反增至一百五十六萬九千噸，即紡績錠戰前不過六百萬錠，最近已增至八百五十一萬錠。所以英國對於東方的政策，最要

緊是保持生產大本營的印度，其次是保持中國侵略東方交通孔道的埃及，她所以在上海屠殺，廣州屠殺，因為要鎮壓中國革命，然後才遂她把持印度和埃及的企圖；迨至屠殺不獨不能消滅中國革命，反而助長中國革命，於是放棄漢口租界，宣言準備修改條約，也因為要軟化中國革命，然後才可消滅印度和埃及的反抗。不但如此，聰明的保守黨，除了軟化中國革命以外，對於日本之出兵膠濟，不着一詞，企圖中國人民的目標，往之法於英者移於對日，其次更利用殖民地的零碎交涉，對於香港之助長割據軍閥，聲之不聞。前此我也說過鮑爾特溫保守派的內閣，不單是英國資本主義穩定的要求，也是歐洲整個資本主義的要求，英國重向東方來的政策，實決於資本主義穩定的前夜。目前英國對華軟化政策，算告大功，而其政策的決定，實遠在十六年末，保守派外長張伯倫在十七年一月曾在伯明罕演說，再三申明：「我們決不能讓我們受武力的行動，放棄條約上的權利……我重復聲明，我們對於中國並沒有進攻的思想，我們也沒有取得土地野心，我們也不想擴大英國的領土，等到中國給我們握有權力的證明，我們準備修改條約的交涉，并且逐漸退回條約規定我們在中國享有的特權。」這一段演說是保守黨在中國實施屠殺政策失

敗以後的話，根據英國最近行動，第一依然要維持其既得權，第二設法助長中國的割據，第三實施軟化革命的方略，果然今日中國便跟着英國的政策癱瘓了革命了。

二美國 我曾說美國對華除了七千萬金元輸入貨品以外無其他的關係，我也曾說美國的帝國主義已由成熟而至發展時期，我這話怎樣解釋呢？簡單的答案是：美國的鉅額債務是在歐洲而非亞洲，美國的殖民掠取是在南美而非在中國，所以美國的帝國主義只管發展，對於中國還取冷靜的旁觀，中國革命嗎，美國可以同情。中國復辟嗎，美國還可以不干涉，不過有一條件，中國絕不能實行民生主義，否則危及資本主義的生命泉源，其次還有一個條件，即是中國革命必不能管及美國在華的資本，所以美國的態度，雖近於英之軟化手段，然而有深淺的不同，說到這裏我們可以看看美國的經濟狀況和在華的經濟關係了。

美國在歐戰以後，經濟的發展實佔世界的第一位置。鐵的出產戰前不過佔世界全額百分之三十九九二，最近竟佔百分之五十零五二；鋼的出產戰前不過佔世界全額百分之四十一五三，最近已佔百分之五十二零四；煤的出產在戰前不過五萬三千零四十四萬噸，最近已產六萬一千三百九十萬噸；紡績錠戰前是三千一百五十萬錠，最近已至三

千七百五十萬錠；而煤油之產量更占世界全額百分之七四。資本既這樣發展，正合亞當斯密的原則：於是便要找殖民地了，於是便要建築軍艦了。可是對於中國的關係怎樣呢？照一九二六年的統計，美國對外輸出的貨品，總額值六億零一千二百萬金元，而對中國輸出的貨品，僅值二千萬金元，若以成分率計之，值為八十四分之一。美國對華經濟關係既如此其薄，與其說是經濟關係密切，毋甯說宗教的關係還深，所以美國雖然只管壓迫南美，只管強硬確定尼瓜拉瓜九十九年的保護期，而其對華態度，依然是門戶開放政策的利益均等，依然是一九二七年一月海洛宣言所說的：『美國自始至終即希望中國的統一獨立和繁榮。關稅和治外法權前之規定於條約的，我們希望愈早解除愈好。』美國的希望，只是海洛宣言最終所說：『無論如何，美國政府希望中國人民和領袖們承認在華美國人民的權利，在紛擾缺乏實在責任之時，能給美僑以生命財產的保障。』簡括言之，美國對於中國革命的態度，不論如何，以能受美國的影響為度，並且成為資產階級的革命為度。

三日本 日本障礙中國的國民革命，我已在『中國革命和田中的背景』說得已頗詳盡，這裏用不着贅說。簡單一句話，目前中國革命的最大障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目

前我們對於帝國主義的對象也是日本帝國主義。中國革命的成功，在日本眼裏，不但搖動日本的殖民地台灣和高麗，并且搖動日本的團體和生存。日本爲着生命的穩固，最低限度要守住高麗和台灣，爲要屏障高麗和台灣的安全，必得守住東三省和中國海岸綫。基於這一點，所謂大陸政策就這樣完成，而壓抑中國革命，又是這政策必然的結果。所以我常這樣觀察，在歐戰以前日本在中國的防禦綫是山海關，在歐戰以後她的防禦已展至黃河東流域。最近外國對華的總輸入價值爲九萬四千九百萬海關兩，而日本就佔三萬兩。所以日本非拼命防碍中國革命不可。就是以武力佔領膠濟和干涉東三省亦在所不卹。

關於日本問題，要詳細的可以成一本專書，要簡略的可以歸納爲幾句話。我這要指明的，大陸政策是日本的傳統政策，我們決不要誤會民政會的內閣要比政友會的內閣爲溫和，一九二七年一月若槻內閣曾在議會發表對華宣言，總括有四點：「一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全，謹慎避免內政的干涉。二增進兩國間的親善和經濟的密切。三同情的和希望的接待中國人民的正當願望，并努力以實現此種願望。四對於中國現狀，維持忍耐態度，政府并隨時以一切合理的方法保護日本人民合法和主要權利和利益」。

什麼才是中國人民的正當願望？什麼才是「合理的方法」？什麼是「日本人民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都是沒有確定的正義，廣泛點解釋，出兵也是合理的方法，至於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用不着說是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法」了。至到田中就職以後，更公開進一步的揭明，十七年四月間田中在報紙發表主張說：「以共產黨在中國活動的事實，日本因爲維持東亞和平，感受這種活動結果最直接而最深，日本很難安於靜默……使有特別問題發生，日本考慮至相當的時機和應行的處置，將準備和列強一致行動。」田中這種公開表示，當然一面爲對英聯合出兵的應聲，一面預備單獨向着華北出動，所以自十六年以至十七年兩度出兵山東，五月以實力佔領膠濟，現在力阻東三省易轍都是一貫的政策，這是日本對華的態度，和我們應有的認識。

第三國際 我這裏爲什麼不說俄國而說第三國際呢？因爲俄國和第三國際在政治上應看作兩件東西，而共產黨的行動也是接受第三國際的命令而不是接受蘇俄政府的命令，我們既以政治的眼光來分析，不管牠是不是兩位一體，在立論上應得有這些區別。我們平情而論，第三國際在中國的初期革命，牠的貢獻和努力都不少，而在後期革命障礙和破壞也較別國爲兇而且多。可是我們批評第三國際

際，卻不能像英美日以經濟關係決定其態度，而當以牠的東方政策決定其態度。第三國際的東方政策是什麼：簡括言之，就是要把中國造成一個波爾扎維克的國家，換一句話即是要中國歸屬於共產黨專政。第三國際根本的謬誤，只知有共產黨，而蔑視革命的條件和立場。在俄國可以不必實行共產主義，可以妥洽富農，但共產黨不可不專政。在中國可以對日本妥洽，可以取盲動的暴動，但共產黨不可不奪政權。他在中國的計畫，第一步是在國民黨勢力掩護之下發展共產黨的組織，第二步計畫是以共產黨的組織破壞國民黨的生存。假使共產黨不能奪取政權，即燬壞一切亦所不惜，根據這個條件，所以第三國際對於十六年南

編完以後

這箇週刊現在算是出版了。他是在這箇極沉悶的政局之下而出版的。他眼睜睜的見着時下能代表輿論，於革命的理论，方案，能有一箇比較正確的討論；於以往的錯誤，將來的出路，能有一箇比較明白的認識；更於目前的政局，能有一箇狼勇敢，極誠實的批評之一些刊物，都一箇箇的封閉下去，凋零下去，認爲是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之一箇最不幸的損失，所以他不畏懼一切，不顧忌一切，來大

昌暴動，廣州暴動，以至湖南江西的各縣的暴動，只有批評殺人放火的不澈底，更且捏造事實說中國已至十月革命的時機，所以就革命的立場而言，第三國際不但背叛了中國的國民革命，而且破壞了反帝的戰綫，簡直破壞了世界革命。不過我還要指出的，現在第三國際已整個的向中國進攻，不論斯丹林的政府派或託洛斯基的反對派都沒有兩樣，斯丹派固然主張暴動以破壞中國的革命，然託洛斯基自始至終都罵斯丹林不能早在中國建設波爾扎維克政治，使中國共產黨受失敗的犧牲，這是第三國際對於中國國民革命的態度，我們非澈底了解不可。

(未完)

者編

胆的出版。

他是以極誠摯極客觀的態度，來討論一些重大的問題，並且是以極光明極負責任的態度與精神來解決一些極重大的問題；欲挽回中墮的革命。祇有我們滿腔的熱血！革命的民衆們，我們現在在這兒前進着，正望你們的援助呢！

爲民權主義的鬭爭

施存統

(一)
我會經說過好多次，中國革命是一個長期的鬥爭過程，整個中國革命底性質是三民主義的革命：從『民權革命』（即民權主義的革命）到『社會革命』（即民生主義的革命），並以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與世界革命相聯結。目前中國革命底性質還是民權革命，所以我們目前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一切革命的勢力來完成民權革命。

什麼叫做民權革命？民權革命底歷史的任務是什麼？在歷史上說，民權革命就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其歷史的任務，在消極方面是推翻封建階級和掃除封建遺制。在積極方面是建設『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和發展資本主義。這種革命，從社會進化的觀點看來，無論何國都是要通過的；只有通過一種革命，社會才能向前發展。英國如此，法國如此，日本如此，德國如此，俄國也是如此。自然，這種革命底形式與其經過期間，各國不能完全相同，甚至於還有自己『特殊的社會意義』，然而其歷史的根本任務，各國都是一樣，都在於掃除封建遺制以促進社會底發展。

中國過去的革命運動，有沒有完成這種歷史的任務？如果辛亥革命已經完成了民權革命的任務，那麼辛亥以後的革命運動，就不是民權革命的運動，而是社會革命的運動了。如果這次的革命已經完成了民權革命的任務，那麼今後的革命，無疑地是社會革命，我們還要談民權革命，就未免是時代錯誤了。但是事實究竟怎樣呢？誰也不敢肯定地說：中國民權革命已經完成了。實在呢，這次革命底結果，實質上是與辛亥革命一樣的，在某種意義上說，還比辛亥革命不如。這，可以舉出許多事實：例如統治權依舊握於封建階級手裏，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底不自由比以前更甚，民衆對於政治依舊沒有一點發言權，復古的思想依舊盛行等。現在無論從什麼地方都看不出有一點民權主義的影子。辛亥革命以後，大家還曉得有一個『民國』招牌，還曉得什麼『主權在民』，還有國會省議會等假民主機關裝門面，還要假意由民衆選舉以表示尊重『民意』，還有一個『約法』作以人民說話底根據。現在呢，索性揭開面皮發幹，連這一套假把戲都不要了。少數軍閥官僚，借着『黨國』

（『民國』非他們所知的招牌，利用自己清一色的走卒嘍囉，組織或把持各種黨部，以槍桿子威逼多數人做他們個人底工具，實行昏天黑地的反動工作。以前空口答應民衆的種種利益，不但一律取消，而且悉反其道而行之。所謂『黨國大事』完全由少數軍閥官僚根據個人利益來決定，不知有民衆，也不知有黨員。賣官鬻爵，收受賄賂，分贓割據，爭奪地位，成爲公開的祕密。上行下效，成績實有可觀。一切的一切，都是暴露着無恥與反動。曹錕要做大總統，還要化一筆大錢賄買議員；現在要做什麼，竟可以硬幹了！以前還要顧忌一點『民意』，現在却只要『民血』了！在封建社會是『朕即國家』，在現在的『黨國』是『我就是黨，黨就是民』了！我們實在看不出兩者底區別在哪里。只要我們是有眼睛的，我們一定不會誤認現在民權革命已經完成了。

中國底民權革命，既然沒有完成，那麼我們此時底主要任務，當然在於完成民權革命。不通過民權革命的階段，決不能走向社會革命的道路。如果我們不是空想的革命家，便不應有直接進行社會革命的企圖。目前中國歷史的要求還只是民權革命，沒有到社會革命。我們不應該而且不能夠超過歷史而前進。（關於中國民權革命底性質及其

前途，請參看拙作『中國革命與三民主義』第一篇。）

（二）

這里有一種反對的意見（或者是誤會），以爲主權民權革命就是代表資產階級，就要被資產階級所利用。誠然不錯，民權革命可以代表資產階級，可以被資產階級所利用，但『不一定』如此。就過去的歷史來說，民權革命底勝利就是資產階級底勝利，資本主義底勝利。但是自從無產階級與社會主義在世界獲得一部份勝利以來——即自從世界革命開始以來，民權革命底勝利，就『不一定』是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底勝利。中國底民權革命，正處於世界革命的時代，必然地伴着反帝國主義而進行，所以其勝利有社會主義的前途。而且中國民權革命底動力，現在並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工農小市民，所以其勝利不會是資產階級底勝利。這是中國民權革命底特性。這種特性是由中國社會底『歷史條件』所規定的。

於是就有人說，中國民權革命底前途既然是社會主義，不是資產階級底勝利，那麼何不直接痛快地主張社會革命以社會革命相號召呢？這種疑問是可以發生的，這種疑問底發生是由於不懂革命發展底法則。決定目前中國革命底性質的，不是革命底理想，而是革命底任務——即在目

前中國革命中所要完成的歷史的任務。目前中國革命底任務，是依目前中國社會發展底程度來規定的。目前中國社會底發展，正在開始脫出封建社會轉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期中，封建的社會關係還很有力地阻礙着資本主義底發展。此時「歷史的要求」，無疑地是推翻封建遺制以促進資本主義底發展。滿足這種要求的就是民權革命。所以民權革命底任務，與社會革命底任務，性質完全不同。儘管中國民權革命底前途是社會主義，而「此時」革命底性質決不是社會革命。

有人以為目前中國革命必須擁護農工利益，必須以農工為主力軍，必須解決土地問題（如消滅地主，耕地歸農），便斷定目前中國革命就是社會革命，其實這種見解也是不正確的。目前中國革命運動中，含有社會主義的要素，確是一件事實，然而這要素，在現在並沒有占主要的地位。擁護農工利益，以農工為革命主力軍，以至於消滅地主耕地歸農，都是中國民權革命中應有的事，在經濟上並沒有超過民權革命的範圍，而且在目前也不能超過民權革命的範圍。我們應當知道：在中國要完成民權革命，必須以擁護農工利益，組織農工勢力及解決土地問題為絕對的條件。有了這些條件，才能推翻封建階級與封建遺制，才

能撤廢一切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東西，才能推動社會前進一步。

但是問題又發生了：中國民權革命與社會革命，究竟處於怎樣的關係？是不是先由我們來一個民權革命，再由共產黨來一個社會革命！這是許多人所憂慮的問題。我以為不會有這樣的事情，我們不必作這樣的憂慮。從客觀上觀察，中國民權革命實為社會革命底第一步，民權革命底成功可以說就是社會革命底開始。我們要保障中國民權革命底勝利，一定要進行社會革命，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不然，一定要回頭跑，重新恢復反動的局面。中國民權革命發展到最高度，必然會轉變成社會革命，其主要的關鍵在於革命的民主政權。如果能夠建立一個以農工為主體的鞏固的革命的民主政權（這可以說是民權革命底勝利或完成），就可以開始而且必須開始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社會革命），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我們在民權革命中應有的基本認識。

(二)

現在是民權革命的時代。此時歷史所要求我們的是實行民權革命與完成民權革命。目前革命與反革命底客觀標準，在於是否贊成或參加民權革命，即是否為民權主義而

爭鬥。我們現在反對中國資產階級，並不是因為他們不要社會主義和反對社會革命，而是因為他們不要民權主義和背叛民權革命。民權主義和民權革命，是中國此時大多數下層民衆共同的需要，也是中國資產階級（指民族資產階級）底歷史的需要，然而中國資產階級對於下層民衆革命勢力底偉大，不敢再要民權主義，而且公然背叛民權革命，投降封建階級了。現在中國需要民權主義與民權革命的，只有多數下層民衆——工農小市民。我們要完成民權革命，只有團結這些下層民衆。

中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是封建階級，資產階級還只能有很小的發言權。在歷史的需要上說，中國資產階級應當起來「領導」一切下層民衆反抗封建階級，完成民權革命，以發展「自己的」資本主義。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所處的歷史地位，不許他們完成這樣的任務。就過去的歷史來說，發展越落後的國家，資產階級革命性越弱，越容易與封建階級妥協，不能澈底地完成民權革命。德國與日本，就是最顯著的例子。（德國一九一八年的民權革命，是無產階級底力量完成的。）至於新與中國資產階級，因為自己底力量過於薄弱，而且受着帝國主義與世界革命兩重威脅，差不多一開始參加民權革命就有反動的傾向，最近且

公然背叛民權革命了。中國資產階級，此後爭取自己利益的方法，一定不會採取民權革命的方式；他們以後不會再是民權主義的成份，已經構成反民權主義的成份了。我們現在站在民權革命的立場上，不但應當反對反動的封建階級，而且應當反對反民權主義的資產階級。我們要完成這種任務，必須團結並集中一切民權主義的革命勢力。我們此時的革命職綫，應當以這個任務和這個意義來統一。而且只有在這個基礎上面，才能把目前這種四分五裂的革命職綫，重新統一起來。

一切革命的同志，都應當深切地覺悟：我們是在中國革命，不是在外國革命；我們是在現在革命，不是在將來革命。我們中國底革命與世界革命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底革命應當適應世界革命底趨勢，並應當與世界一切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保持一定的聯絡，這些都是沒有錯誤的；但是最應當注意最應當努力的，還是我們中國自己。我們現在的革命與將來有深切的關係，我們應當認識革命發展底趨勢，並應當認識從現在到將來所要經過的一切路程及應具備的一切條件，這些亦是沒有錯誤的。但是我們最應當注意最應當努力的，還是這個現在。中國革命者，最應當注意的是「現在的中國」。真正認識了「現在的中國」，才

5

誰進步走，才能與世界發生關係，才能走到將來。「現在的中國」是需要民權革命，我們便應當集中一切革命力量來完成民權革命。我們與其在「外國」做一個社會革命者，不如在「中國」做一個民權革命者。我們與其憧憬「將來」做一個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不如腳踏「現在」做一個澈底的民權主義者。「現在的中國」實際上所最需要的還是民權革命與民權主義，這是由民權革命到社會主義之終的革命不是社會革命與社會主義。一切革命的同志，現在都應當為民權主義與民權革命而爭鬥。

然則目前民權主義的爭鬥應當爭取的是些什麼？我以為現在除了消極方面反對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及帝國主義（即反對反動的統治）以外，至少還應當努力爭取下列各項：（一）力爭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底完全自由，（二）恢復一切革命的民衆團體（如工會，農民協會，學生會等），（三）速開革命的國民會議，（四）恢復革命的國民黨，（五）

東三省易幟和編遣會議

舊年的末尾，新年的開頭，在報紙上第一個引人注目的消息，便是東三省易幟，和編遣會議。本來東三省易幟

釋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六）廢除一切苛捐雜稅，（七）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八）實行革命的鄉村自治，（九）實現「耕者有其田」的辦法，（十）製定革命的勞動保護法。我們從這些爭鬥一步一步發展下去，便可以達到革命的統一，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權（這是民權革命與民權主義底最高要求）。只有這種民權主義的爭鬥勝利了，對外才能打倒帝國主義，完成民族革命，實現民族主義，達到民族間底平等；對內才能打倒一切「不利於農工之特殊階級」，開始進行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的建設，達到經濟上的平等。革命的三民主義底實現，其根本的關鍵完全在於民權主義底勝利。所以一切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者，現在應當集中力量從事民權主義的鬥爭。無論黨內黨外，現在都應當以擴大民權主義的鬥爭為最重要的工作。

一九二九，一，六，

馬 濬

，已經過當局數月的宣傳，到今日才能實現，不能不說是「煞費經營的事體」。至若裁兵，更是民衆所望眼巴巴的，

可以說自黎元洪放了一個大炮以後，一直到現在，能夠得到一般革命？大人們，「化干戈為玉帛」，果真「偃武修文」起來，不但戴道統先生，要多做幾篇「善頌善禱」的新聞墨，不才如我，亦當馨香禱祝。

然而事實決不是這樣單簡，現在我們第一步來分析東三省易幟問題。本來革命（現在一般民衆所需要的），決不是倒退幾千百年的政朝換帝，只要服從什麼新君的「正朔」，就可歌舞昇平，宣告統一。而是事實上合於被壓迫民衆物質要求的變革（政治的和經濟的以及社會的）；具體言之，即是從半殖民地的中國民衆，得到「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之三民主義國家的實現。但是現在事實怎樣？自命為革命的，「國府」，對外的關係，至多不過口頭持改約的空名，而實際上重新再承認帝國主義一切過去和將來的利益，使中國民族的「賣身契約」，再經他們打一次手印。政治的黑暗，比過去的軍閥時代，還要不如；最普遍的是假借黨治和革命的美名，來作摧殘民衆，壓迫民衆的勾當。經濟狀況，更爲惡劣；鄉村以土劣的抬頭，農民生活，益形困苦，城市以資產階級之得勢，工人生活，更是不堪。而一切大小新軍閥，官僚，更從而敲榨吸髓，吮吸民衆的膏血。

所以新政治形態的本質，純粹是舊政治（軍閥政治）的延長；尤其是經過一度革命運動——以及繼續在增進革命勢力當中，趨於最反動的一個表現而已！我們在這一個人反動的政局中，一切希望他們和祈求他們不但無益，而且無恥。因爲在他們的使命，已被支配在其一切關係，決沒有令我們可以一毫或一忽可以滿足的餘地。例如統一，是何等好聽的名詞；張學良的易幟，不是可以完成統一嗎？但是反動的軍閥的統一，於我們有什麼好處？況張學良的易幟，不過應付時局的一種策略，其於東三省的一切設施，仍然如故。東三省的政府名單，是張學良自己指定的，並要求設立政治分會，這還不是儼然一個小朝廷，與過去的東三省，有什麼兩樣？而據張學良十二月廿九日的通電，謂係仰承其先大元帥（張勳子）的遺志，改易旗幟，儼然把他的令尊，當作孫總理的老同志，這是如何滑稽的把戲。偏偏「國府」主席的復電，謂其效忠黨國；我不知道昨日被指禍國的軍閥，今日忽稱爲革命政府？的功首，其用心之何似；這個問題，只有他們自己明白，彼此朗照不宣了。

許多人或者以爲東三省易幟以後，日本對滿蒙的利益，有若何動搖，以至於其對中國的政策，亦有若干的失敗，如英國孟克斯特指導報的評論，謂：「東三省易幟，未

必即南京政府權力，將於若干年內，超過所謂宗主國權力之上之謂；但張學良此舉，確已表示毅然不依賴日本矣；（云云）（路透社卅一日電）。但是我們姑不問，今日的東三省，仍是昨日的東三省，張學良便是繼承張作霖，效忠於日本的奴隸；即使其奈奧的順服所謂南京政府，而今日的南京政府。與昨日的北京政府，又有什麼差別。所以聰明的日本政府，很爽快的承認：「東三省之易幟，不過形式上之變化耳，若無特別之變化發生，政府於滿蒙交涉，仍可沿襲向東方針。」（東方社六日東京電）。

退一萬步說，新軍閥政治勢力的統一，果能「相安一時」，未嘗不減少一些民衆戰爭的痛苦；不過，現在的統一，是否真正的統一？相安是否真正的相安？在理論上，代表殘餘封建勢力的新軍閥，決無統一的可能，在實際上，現在政治分會，請新設的，以及請緩撤的，均是極力在維持各個軍事割據的利益。而張學良的易幟，不過從固有南京政府幾巨頭以外，添加一個巨頭而已，其利害衝突，只有更加激烈，絕對不會減少的。況南京政府，等於一個帝國主義分贖的國際聯盟，其作用不在於努力新軍閥的和平，更不在於完成中國的統一，而是各個新軍閥在對峙的當中，各個企圖，藉這個工具，來擴充和攫取未來的利益

而已。所以現在的統一與相安，事實上即是不能統一和相安的敘幕；唯其不能統一和相安，乃產生現時形式上的統一和相安來。我們只看最近幾個巨頭，無不準備火併，大家勾心鬥角，縱橫捭闔。貴州戰禍，已經是某某和某某軍事勢力暗鬥之一幕，四川風雲，亦背後有兩隻魔手，在暗地操縱。表面上，是談笑從容，盃酒言歡，實際裏比三國的羣英會還要來得複雜，恐怕北伐南征東勦西討的好戲，不久就要開演。

我們看清了這個政局的內容，就可以知道編遣會議，不過等於什麼建設，改約，和平，統一等掛羊頭賣狗肉把戲之一種。固然編遣會議的宣言，以所謂四不（即不偏，不欺節，不假借，不中輟）相標榜；而某某更一再聲言，現在裁兵與帝國主義空口裁兵的性質不同。然而過去裁兵的成績（舊軍閥時代姑不論），已經領教過了。現在第一步須認明所有現時的政治勢力，是代表封建勢力的土豪劣紳及資產階級的大商人大銀行家的豪紳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其唯一的台柱，便是各個軍事勢力。軍事勢力的形成，既不是為革命，復不是為民衆，而是被握在幾個豪紳封建關係的巨頭。所以實際的革命軍，大體言的，不過做反動政治的武器，分析言之，只是為個人維持私利的工具。是

軍事勢力的本身，性質既是如此；同時局面在嚴重割據與對立當中，既無中心的力量來做真命天子宋太祖，可以歪酒釋兵權；又沒有像日本萬世一系的天皇，令西南諸王奉返藩籍結果是誰也不愿意編，也誰也不願意遣。過去的裁兵由軍改爲師，已經是師的實力，比軍還要充足；現在既要編又要遣，安知不比不編不遣，不要名額繁多，內容充實。

我們知道，編遣問題，比裁兵問題，還要繁雜，因裁兵只在於裁，而編遣則不僅在於裁，且在於編；然而所謂編者，首要在於軍事系統，歸於統一，軍事權力，能夠集中，萬不能如前此之各有總令，各有集團軍，不相統屬，各自爲政，以形成割據之勢，其次編制等問題，自可迎刃而決，於是乃能談到遣的問題。但軍事系統及權力是否能統一，須先看政治權力是否統一以爲斷。因爲軍事不過支持政治權力的重要工具，軍事不統一，即政治權力不能統一的表現。現在統治勢力的基礎，既在於封建勢力及大資本家的豪紳資產階級，其本身對於民衆，既需要高壓，方能企圖暫時的相安；而其自身，以基礎之薄弱，亦無能力維持統一局面；況其軍事及政治勢力的後面，各有帝國主義的奧援，是根本上已缺乏統一的條件，只看最近紛紛

請求緩撤政治分會，即其明證；是政治既不能統一，而能軍事的統一，真是欺人之談。

況政治的統一，是與其他行政司法財政外交交通等問題相關聯的。現在各個政治分會系統之下，各自號令，所有行政司法，已不要聯屬，外交交通，更是各行其是，輪船車輛，皆可隨意扣留，據爲己有，各路及電信收入，從不解交中央。至若財政，更是紊亂，上焉者只是各自開闢財源，以圖自給自足，自然不問勞民傷財；下焉者更是伸着大手，向所謂中央政府要錢。而所謂中央政府的財政，以號令不出都門之故，政既不行，財於何有？自然只有飲鴆止渴，東拼西湊，一切剝肉補瘡，聽向人言的辦法，都無暇計及了。

或者要反問，各個割據的勢力，如果在所謂利益均霑，妥協調和原則之下，只要得到機會均等的目標之下，未嘗沒有統一的可能性。不過我們要知道，過去的中國，完全是一個「封建國家」，以受帝國主義侵略以後，固有經濟，破碎零落，復有各個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做基礎，形成各個政治勢力的單位，原則上已失掉統一的可能性（革命勢力之統一係另一問題）。並且在這個階段中，資產階級，不能強大，沒有統一中國市場的力量，更不能以其做中

心，形成一個「民族國家」。而現在代表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勢力，大半部份還以封建勢力做背景，其不能統一中國，毫無疑義。固然彼等，未嘗以割據的現象為滿足，嘗在希望得到進一步的統一；但是這種統一的要求，是出於兼併的慾望；換言之，即是各自企圖以自己做中心，來消滅其他一切對方（尤其是敵大的軍事勢力，嘗作是想），造成秦始皇再生，或者莫索里尼第二。不過代表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勢力，在客觀環境上，不是過去的秦始皇時代，更不是現在的意大利，是已缺乏第一個條件。其次現在的各個軍事勢力，幾乎其本身都是勢均力敵，不相上下；藉使有較小的軍事勢力，亦正在各自拚命拉攏幫手，至少要維持其與較大軍事勢力均等的局面，以相抵抗，於是軍事勢力為兼併不免於火併，火併的結果，以不能統一，乃造成新的對立割據的局面，乃再圖火併之，火併的結果，仍是如此，千餘年來，戰亂相尋，如同走馬燈的局面，都是玩的這一套把戲。

是在統治勢力的客觀條件下，既無統一的可能，軍事系統及軍事權力的統一，自是笑話，所謂編的問題，更何

一九二九年與我們

從談起。如果不編甲不編乙，在甲固所不甘。如果編甲同時編乙，各依向來系統，減少至相同的限度，既勢所不能，亦等於不編。如果甲乙皆不編，而編丙丁，或不編甲乙丙丁而編戊己（如前此之裁減及歸併雜色軍隊），其圖反抗一也。所以現在求解決一軍事勢力編的問題，已不可得，更說到這的問題（我們不問這後如何安插），真是要到老虎頭上去擦癢了。

要之，既在仍是新軍閥對立的局面，統一既不可能，裁兵自不會實現，而所謂東三省易幟，與綏遠會議，不過是舊軍閥的統一裁兵的注腳事實上既在各個新軍閥，既在擔拳擦掌，準備撕殺，而謂僅換一換旗幟，開一開會議，便能以干戈始以玉帛終，告統一於天下，克奏和平，實行裁兵，恐怕只是騙騙小孩子而已！雖然真正的統一與裁兵，是我們民衆所需要的；並且只有統一與裁兵以後，中國才能真正開始建設。不過真正革命民權政治不建立（打倒一切新軍閥及封建勢力與大資產階級以後），真正的統一不能得到，所謂裁兵，徒事空談；因此，熱望和平統一與大裁兵建設的民衆們，趕快自己起來罷！

劉侃元

(1)

一九二八年過去了，在我們革命生活太匆匆的狀態當中，一轉眼間她竟成了歷史幕後的離人，向我們接了最後的別吻。而暮靡一掃，我們又已和一九二九的新人緊倚着肩，密握着手。海上的怪好風光伴着她來，連日明麗的朝陽，蒼蔚的碧空，活像象徵我們新婚的新生命，慶祝我們新婚的新生活似的，在我們的眼簾上眩耀着，心弦上跳躍着。好，天地有情，我們就開始這個歷史的同棲，努力創造這新生活的內容，且沉醉在這三百六十天的蜜月當中，着實享樂一下人生的意義罷！

人生的意義！革命者的人生的意義！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百折不撓，之死靡它，的歷史的使命的先驅者——革命的人生的意義！澈底于歷史的認識一步也不墜落，努力于歷史的創造一步也不卑怯，遵循歷史的指示一步也不幼稚，戰，戰，戰，——戰鬥的革命人生活的意義！——好，站在這蜜月首途的車頭，伏在這新愛人肉香四溢的胸頭，我們顧對着這慶祝與送行的太陽和碧空，堅決誠虔地自誓着：「去享樂一下！」

(1)

但是這樂究竟怎樣享法？當怎樣實踐？她還是一個處

女，我們不可發揮獸性，一味蹂躪她。她還沒有家庭生活的經驗，我們已是再婚人，我們應負一切指導的責任。我們是生長于有隔離性的空間的，同時又是生長于有連續性的時間的；我們是新的生活的追求者，同時也是舊的生活的追憶者。我們在這轉眼之前，和舊的愛人同棲時，所謂享樂的內容究竟充實否？有缺憾否？這是應該反省的。我們從此以後和新愛人同棲，那些點當改良，那些點當注意，這又是值得研究的。我們素來不怕新的愛人得不到，不怕「生的勝利」穩不着。但我們很怕自己反省與注意之不足，結果雖然一番新氣象，事實仍是兩件舊東西。故在這兒我們必得對過去加以反省，檢閱，批判，從而對將來有所把握，計劃，行動，而後這朵鮮花不會被我們糟踏，上所說的人生的意義我們也才真能享到。

但概括地說，我們在過去一年的生活中并沒什麼錯誤。我們在革命陣綫崩壞，全國瀰漫着反動空氣的時空當中，我們就會提出過「理論鬥爭」與「直接行動」兩個原則，以作一九二八年間一切革命生活的實踐標準。這個在一九二九年的今日反省起來，還是充分具有歷史的客觀性，絲毫也沒有提錯。同時在那年的實踐生活當中，直接行動一原則雖依種種主客觀條件之不備尙未能充分實際化，擴大化

給反動派以致死的打擊，但理論鬥爭一原則，則在一切可能範圍內我們已戰死了充分的支配權，成了優勝者。現在任何階級內具有革命常識的分子，都能判斷我們一年來的主張，批評，為正確。至少我們「暴露現實」的努力，也已把反動派各色各樣的醜態怪狀揭發到了十足加一，使他們除依靠「無恥」以咬住政權，「暴虐」以維持生命外，無以自存。這個實在是大收穫。老的少的，烏龜兔子，概一舉而殲死之投之于枉死城中，使民衆得洞明其本相，不再為所迷騙，所姦污，實在是我們一九二八一年中的大成功，對中國革命前途的小貢獻。

我們記得新軍閥在我們的筆誅之下戰慄過，尤其桂系。吳老頭兒在我們筆誅之下沉默過，成了「老而不死」。道統先生也曉得自己只好做盜統了，天天除盜盜國盜黨，自己已也盜官盜位外，不復敢再道其神經衰弱的哲學。連環先生上台時正值我們休息。假使我們那時不休息，也把他提上解剖台，鑿以銳利的解剖刀時，連環先生恐怕也早已四體不復連環，成了凌遲的黨國要人。其他鼠輩小輩更不足道。——在這反省之下，故在全體的革命生活的意義上說，我們確實沒有辜負一九二八年。我們和她結婚一年，實在沒有絲毫糟踏彼此的青春，充分享樂過。尤其是在這一

年當中，我們之對於革命的三民主義的本質的揮揚，及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的證討，更使全國觀瞻者為之震醒，偏激者為之覺迷。在漫漫長夜四顧蒼茫的視野當中，我們確曾拓開了一條蕩蕩平平的王道；這王道在一九二九年的革命生活上還不失為一個巨大光芒的燈塔，不待說，半殖民地地位如一天不變更，永遠恐怕也不失為一個登峯的理論。

暴露現實與筆誅是我們過去一年間的消極方面，根本理論的揮揚與建設是我們的積極方面。兩方面合起來是我們當年理論鬥爭的全意識，而各種具體而微的行動工作還不在內。固然行動工作中，錯誤與不徹底的地方很多，理論建設方面也還諸多未備。但那是一九二八年的性質使然，沒有法子強勉的事。

在這兒我們得說說一九二八年。誰也明白一九二八年是一個最富于矛盾性的年代。一方面舊軍閥根本崩壞，（如一張死一張逃）他方面新軍閥積極抬頭；（如桂系的積極發展）一方面帝國主義積極進攻（如濟案），他方面帝國主義相當讓步（如美英）；一方面分裂混鬥間不容髮，他方面相安苟合甚露塵上。——凡此兩極的現象的對立，皆所以實證當年為極矛盾之年，中國社會在極動搖中。固然反

動的傾向早已普遍地整個地形成，反動派在矛盾動搖的必死掙扎當中，也猶念念不忘壓迫民衆，不忘拍賣主義，投降帝國主義者。——在這意義上又可認爲矛盾之中有統一，動搖之中有安定。但同時在這種客觀情形之下，我們革命者自己主觀地想定出一個一貫的先見的行動策略出來，以謀行動之不陷於錯誤，則是極難的事。誰也只能主觀地決定去創造歷史，誰也沒法子主觀地去決算歷史。我們只能于堅守自己立場的條件之下設法去實踐各種的革命生活，（革命生活是極實際的），我們可不能在這條條件之下望着政治去流水東西。實言之，我們在歷史的矛盾時代當中只能矛盾地實踐着；只要我們固有的立場能保住，這矛盾生活且是唯一的革命生活；沒有矛盾的地方是決不會有革命生活的，我們要記得！唯其如此，故我們決不以成敗論工作，論過去，在這一年中，我們大大小小縱有許多錯誤，我們還是自己信自己。

同時理論建設方面尙多未備也是沒法。在這革命敗殘之餘，全空閒時間翻佈着魑魅魍魎水泄不通的當中，我們打開一條血路肅清這些鬼字傍的東西已大費力，漫說建設。播種總得先除草，況東南各省覆巢之區久無完卵，我們赤棵棵地跳出來，都着乾坤混天綾唱一劇挪札鬧海，於

革命的三民主義的真正認識上，生了幾多大的意義！起了多麼大的作用！我們現在打死了龍王太子的吳老頭及其他龜兵蟹將之後再來幹今年的理論建設罷，一九二八年是我們鬧海的時期，一九二九年我們再來建設一個我們坐鎮的水晶龍宮。

(三)

不過雖然如此，我們對於一九二八年自己行動與理論方面的錯誤和不足，並不是就放棄反省與檢閱的工夫。必有這麼一番反省與檢閱的工夫，我們才能規定今年工作的計劃與內容，我們相信。

在行動方面，我們承認今年當堅決地決定必以革命的手段達到我們改組的要求！自連環先生上台，什麼五院成立，訓政開始以後，尤其是什麼第三次全國代表選舉法頒布以後，我們只相信唯革命的手段才能達到真正改組的目的，其他都是廢話。我們現在抱着這方針務進下去！反動派龐高一尺，我們當深入民衆道高一丈！誰也不能相信革命的三民主義就此完結，革命的國民黨就此衰死！讓他們對民衆更加些鐵鎖，讓他們對時代更多開些倒車罷！最後更讓他們恢復一個封建主義的復古，或退一百二十步且讓他們完成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罷！如果歷史有這樣一個

奇蹟，我們何不也樂得學說一句風涼話：「三年不『崩壞』，你們殺我的頭！」？——總之一切西洋鏡把戲，在我們唯物照妖鏡證法之下，早已只值得「不顧而唾」算定了牠。閻王註定三更死，不得延長到五更」之後，我們安妥貼地守着尸史的意旨，一往邁進，準備着最後的手段——革命的手段罷！不錯唯有這個手段才是真手段。

其次，我們在行動方面還必徹底求到組織化。破碎的心理，必先須健全的理論建設才能統一，破碎的行動尤必須鐵樣的組織方能有力量。在這兒我們要求各方面放棄其歷史，感情，與成見，一致合作。在這兒我們要求各個革命分子深入民衆。我們要一洗素來做黨員的陋習，我們應把革命當職業看，且應把革命工作科學化。在一九二八年的當時我們還談不到這個組織化的問題，但一九二九年的時代性已客觀地明白規定了這個要求。黨到今日既已完全成了昏庸腐朽土劣貪污及新軍閥的俱樂部，被壓迫的勞苦大衆與革命黨員，必然地會自動地進行促進且實現這個要求。

至于理論鬥爭方面我們也要體察這年頭的時代要求，進一步。

第一，我們今年的理論鬥爭當建設化。我們應該對世

界與中國的各种政治經濟社會情形作更精深的研究，一切具體的問題，我們都應該站在我們的立場上定出精詳的計劃來。反復說一句：我們不怕革命的勝利得不到，只怕勝利之後不會做生產者。眼前雖還是勝利的前夜，但饒鐘一響，汽笛一鳴，我們都是要做工的，工場的機器又不是外行所能轉得動，織得布的，——我們得預備。尤其過去我們經過許多錯誤，時代又不斷地推移，社會內在的機能皆日有變化，我們按着自己的認識與立場，應對各種問題皆有圓切的綱領。我們應不斷地詳細地觀察中國的社會實情，站在進化的見地上定出多種辦法來。

第二，我們今年的理論鬥爭又應內面化。我們對於現實暴露的工作繼續中，還應當從世界情形中國社會情形上去深刻地把握。對反動派的筆誅已不是我們「今年」的能事，反動派理論基礎的薄弱，去年一年中我們已領略無遺。今年我們的使命，應于中國舊封建社會的殘存社會形態內，新資本主義發展的實際力量內，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穩定實情內，去把握反動派得以苟存乃至得以穩定之所以然。且必對於其階級力量的成分，經濟背景飄落的實情，以及各種相互作用的關係，作具體的專門的探討。同時于其中得到最科學的根據，去認識各地的特殊性及全國的普遍性

，以診斷他們此後必然的傾向及最後的歸宿。這是理論鬥爭之內面化之一。

第三，內面化還有一方面，就是今年理論鬥爭時不應端以反動派為對象，一切自認為革命的黨派與個人也應都是我們的對象，甚至於我們的同志當中，如有理論上所見不一所關甚大時也應認為商榷的對象。自認為革命的黨派的為中國共產黨，假使我們能得到牠的刊物，發現了牠似是而非的假革命理論——如機械的列寧主義，幼稚的斯巴達團主義及黨的立場高于革命立場的態度，我們應無條件地集矢于其身，使其無再能混淆視聽欺騙羣衆之可能，這是很重要的。同時像對國際問題的認識，中國社會的分析以及其他，如果我們同志中亦有似是而非的錯誤發現時，我們也當應公開地為真理爭持，不可講客氣。真理只有商榷才得澈底，理論鬥爭更亦有鬥爭才能有權威，生意義。

(四)

總之，根據過去一年間理論與行動兩方面的實授工作經過，今年的行動可以原則上決定之曰「反投機」，方法上

我們怎樣開步走

決定之曰「組織化」，「集中化」；理論方面亦可以進一步決定之曰「建設化」，「內面化」。

這個都是一九二九年中國客觀情勢之所要求，我們要想根本地變到一九三〇年，今年的工作就必澈底這樣才行。今年中國的情形或者矛盾更甚于一九二八年，或者減少于一九二八年，或者混沌下去完全相等。然都不是容易判斷的，只有待將來的歷史來記載。在歷史未具體記載以前，我們只能主觀地決定我們的態度與策略，毋伴毋隨，自強不息。因為我們在客觀的分析上早已認知了他們反動派遲早必壽終正寢，時間進到一九二九年在我們是幸福展望的權樂，他們則只有時日曷喪的悲苦，歷史雖像還沒決定他們在這年頭究死究存，但聖西門「未來是我們的！」的金言，則唯物史觀已為我們保證着。同時「不要忘記！想成就一偉大的事業，不可不奮鬥，——為對全人類保證人們的自由發展起見！」，也就正是一九二九年我們的人生的意義。因作「一九二九年與我們」。

一九二九，一，八，

黃惠平

自從革命論停止出版以來，這幾個月當中，革命的勢力，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沈寂了許多。一班富有革命熱情的同志，似乎有磨拳擦掌迫不及待的形勢；要求我們向整個的反動勢力，不顧一切的成敗利鈍馬上作積極的反攻。我們對於這些同志奮鬥的勇氣，犧牲的精神，祇有十二分的欽佩；但是我們在仔細檢閱我們自己的力量，與分析目前的實際環境以後，我們應當客觀地認識革命的勢力，還在「開步走」的時代。一個真正領導民衆的革命黨，所需要的不是虛浮的誇張，更不是英雄式的光榮，徒供後人的景仰，歷史家的贊嘆，我們所要的，是革命的勝利。我們要作歷史的支配者，在革命的鬥爭過程中，採用適宜的革命戰術；有時猛烈前進，有時審慎地後退；有時對反動的勢力作正面的攻擊，有時須迴旋地作側面的抄襲；有時還須偃旗息鼓充實本身的力量，準備第二度的反攻，務期從根本上摧毀反動的勢力獲得最後的勝利而後止。我們不要做歷史的被支配者。機械地相信反動勢力已被歷史的進化律判決了死刑，革命的勢力固無須乎集中與充分的準備，即可摧毀反動的勢力；時時想着縮減工程，不肯作長期的鬥爭澈底的努力。所以我時常說：急進的政治投機，不論在革命的集團方面，或者在革命者的個人方面祇有受歷史命

運的支配，不能創造歷史，祇有使革命流產，造成政治上的罪惡，不能促進革命的成功，完成解放民衆的大業。根據上面這個觀點，我以為我們目前最大的任務，是要檢閱與集中自己的力量，分析目前的實際環境與一般民衆心理，決定「我們怎樣開步走」。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革命實際問題，希望革命的同志以深刻的注意。我個人對於這個問題有下面的幾種意見，現在逐條地寫出來供全體同志公開的討論。

(一)打破小組織主義，集中一切革命的力量。小組織的產生。是黨的幹部官僚化之必然的結果。我們現在不願作惡意的批評，說曾經參加過小組織的或者正在醞釀小組織的同志都是想造成私人系統，製成個人勢力，爲滿足個人支配慾占有慾的工具。據我個人體驗的範圍來說，除了反動的小組織以外，確有許多小組織，是因爲中央幹部的破裂，黨的革命性之消失，一般黨員皆不滿意于現狀，感覺革命的無出路，爲着滿足他們底革命的要求而產生的一種東西。但就目前的現狀來觀察，依過去革命鬥爭的進展。國內的大地主土豪劣紳買辦階級，新舊官僚，已與國外的帝國主義，形成廣大的反革命同盟。他們現正企圖喚使黨內的反動派，排除黨內的革命份子，壓抑黨內外的民主

勢力。更由革命勢力的零落這一點來觀察，我們目前所看見的，祇是革命同志的逃亡革命民衆的殺戮。在這種封建勢力向革命勢力反攻的進展時期當中，我們開步走的方法，除了打破一切小組織主義，集中革命的力量，與統一革命行動，從事于堅決的鬥爭以外，還有其他開步走的可能麼？所以我們希望一切革命的同志，衝破一切小組織的障礙，在民主集權這個原則之下，集中起來，向國內的封建勢力及其代表派別，與國外的帝國主義作一次偉大的鬥爭。

(二)肅清一切機會主義者，鞏固革命的營壘。歷史

上任何一次廣大的革命運動，多少總免不了攪雜一些機會主義者的成分。我們不是玄學家，決不會夢想到構成一個革命集團的份子，都是意志堅決耐勞善戰的革命鬥爭者。我們不是唯心者，更不會相信世界上有天生的革命家。猶其在今日的中國，因為經濟生活的極端不安，智識份子個人經濟地位的搖動；於是中央派的改良主義，與急進的政治投機主義在個人的生活內容與理論方面可以並行不悖。根據這幾年以來中國革命的經驗，我可以大膽一點說：過去我們的失敗，革命的營壘內的机会主義者的成分太多，是要負相當責任的。中國的革命，現在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而且是這革命新階段開步走的時候，我以為對於一切

機會主義的傾向與份子，應該以嚴格的方法，防範其混入革命的營壘。不然，機會主義的革命（？）或因時勢的推移，可以成功；以革命自稱的機會主義者個人，亦可大成其功，官運亨通像今日某某青年要人，自誇革命成功，專心建設。但是真正的革命，就沒有法子開步走了。不過這個問題，是有兩重性質的：在我們開步走的時候，值得慎重考慮的，不可籠統固圖，陷于無意識的錯誤。一種是意識明顯的機會主義者，一種是意識模糊的機會主義者。對付前種，我們在開步走的時期，應當毫不客氣的嚴防其混入革命的營壘。至于後一種的機會生主義者，實由于種種幻影的引誘，他們在幻影追求之中，總希望現在的當權者的個人或派別，一旦翻然覺悟，為本黨保持一綫的生機。對付這種機會主義者，也可稱為半機會主義者我們應當從理論方面，事實方面澈頭澈尾揭破這種幻影的虛偽，指示他們一條為革命的三民主義而奮鬥的光明大路，然後再加以堅強的領導，使之從事于勇猛的民主爭鬥。如果認不清這點區別，那才是犯了左派的幼稚病呵！

(三)重行審查革命的策略 一個革命集團的策略，其性質的重要等於一種戰鬥部隊的作戰計劃，每因地理形勢之變更，可以變化無窮。中國的革命，現在已走入了一個

新的階段，我們軍就國內情形來觀察；我們可以發現許多新的事實，與兩三年前以前表面的形式雖大同小異，而實際的內容，則絕非一致。例如舊式軍閥張宗昌褚玉璞這一類的人物，祇知搜括民財，窮奢極慾，不肯稍分愛護，豈徒一班新式士大夫階級，為其走狗，以致國人皆曰可殺。而眼光稍為遠點的帝國主義者，亦痛恨其無用，不知駕馭北方民衆。但是今日的新軍閥，論到他們割據的野心，破壞革命的工作，雖然與張宗昌輩殊途全歸，但是他們的眼光比較遠大，他們的手段比較高明，他們不但要奪取或利用黨的組織，做壓抑民衆運動的工具；而且聰明狡猾的帝國主義者，為防止民主勢力的抬頭，亦不得為他們撐腰維持他們的統治權。更就國際的情形觀察：世界資本主義暫時穩定，俄國外交政策對日美的讓步，與西歐革命勢力的抑

從革命的立場談裁兵

假定所謂「編遣」是出於誠意而且會實行的，中國軍閥的問題便解決了麼？我們先須研究軍隊性質問題，次軍隊的統率問題，最後才是數量問題。

軍閥之所以為軍閥，決不只是因兵多，不過兵多只是使

沈，殖民地獨立運動的失敗，都是目前客觀的事實；較之總理在民國十三年改組本黨的情形，中間發生了許多新的變遷。我們為適應這些新的環境與新的變遷，所以有重行審查革命策略的必要；猶其是在開步走的今日，更有重行審查革命策略的必要。因為開步走的時候的每一種錯誤行動，都可為革命的前途，預伏下很大的禍根。關於這種革命的戰術問題，在革命的同黨當中，有兩種不同的見解：一種見解，以為我們過去的失敗由於策略方面過於妥協的原故，一種見解，以為過去的錯誤由於策略方面樹敵太多的原故。但是這兩種見解，有一點是共通的：就是過去的策路，毫無疑義的發生過許多的錯誤。為補救昨天的錯誤，杜防明天的失敗，指示今天怎樣開步走的方法，我們希望全黨同志，對於這個問題，作一番深刻的研究。（完）

程希孟

軍閥罪惡盡地暴露於民衆之前的一個大原因，如果武力仍屬於封建勢力的，即使裁遣了一些，也不能變改其軍閥性的。因為一團的軍閥武力，和一師的軍閥武力，量的方面雖有多寡的不同，質的方面却是一樣的。編呢？充其量

可以分開軍閥武力，不能消滅軍閥武力。在事實上軍閥到了利益分配不均的時候，其分愈小，亂機愈多，況且軍閥割據，決不能均，因為地盤有限，而慾望無窮，現在四川的兵事即是好例。如果細細的分析任何軍閥的武力，即可見其系中有派，派中有別，都是以利害關係為前提，以利害之深淺，衝突時機之遲早，以分其派別同異之遠近，定其結合之久暫，對敵之從違。軍閥的勢力也就是如此延綿而混亂的存在，擴充，即使有一部分革命的武力也無可奈何！

關於軍隊性質可分兩點看(1)軍隊份子(2)軍隊運用。本來募兵來做常備軍就非良法，即以革命來號召雇兵也只能吸收游民，——變相的利用失業人民。這樣要軍隊能存心為善，是不容易的；加以失業者多無相當教育，流弊更多。最重要的弊病：是凡入伍的大半不是出於自己願意，不過因受經濟壓迫，無路謀生，自然容易流於一種對人對物冷酷殘暴的趨向。平常人總覺得無事時欺凌枉法，戰時殘刻害民，是中國兵的惡根性。其實這並非兵士本身的罪惡，他們在生活鬥爭中失敗下來受盡了一切冤苦，所以一有機會就反射到行動上來。「兵即是匪」是現在一種最普遍最可痛心的現象，但我們不應當拿這四個字來作痛恨兵

士或退伍兵士的根據，要知道這完全是環境迫成的。要免除這種現象，須根本改革社會經濟組織。兵士還有一種弊病，即歷年來大小軍閥陳陳相因的傳統思想，變本加厲的暴行，發財慾，割據慾，種種風氣，養成鼓勵兵士將入伍當作投機事業，將軍事行動當作升官發財的階段。這種軍閥下環境所造成的軍隊當然只能增長增高軍閥的量和質使成無止境的惡劣循環。一個軍隊中下層明知被利用，但只想利用更下層的，如此層層互相利用下去，所以擾亂割裂，是終無止境的。

兵士未入伍前多因無路可生，加以被軍閥的引誘把入伍當作升官發財的機會，「何樂而不為」呢？所以份子問題非兵士個人本身問題，是制度問題，民生問題。不過軍閥不假借名義招兵，失業人民最多也不過流而為匪。不至於成為國家承認的人民血汗所供給的，而徒供軍閥私鬥的犧牲品。

要除此弊，自應採用徵兵制為根本原則。一時雖似辦不到，可分期施行以代替雇兵，這是一點。

即使兵招來了，如果為得民衆利益或國防而運用也不致成害民之兵，這更該由軍閥負責，非兵之過。運用問題，不僅在編制或分駐而已，要使根本屬於黨和民衆。封建

勢力下的中國軍隊，非改到完全打破少數私有，私用，私統軍隊的制度不可。這種制度不根本打破，那末以革命始的軍隊，也未嘗不以軍閥終。

如果真能將全國兵類裁至三十萬或五十萬可以節省國家無數明的暗的軍費，減少人民重重直接間接的剝削，那是多麼好的事！不過在軍閥局面中空談裁兵，根本上決不能打倒軍閥。試看做什麼司令的張學良不還是那個軍閥張學良？軍只空換個好看的招牌便能改變他的軍隊的成分，目的和運用嗎？哈哈！據奉天代表王樹常報告東三省現在已將所有的十七師十旅中裁去了十七師了！這是欺人，還是自欺？無怪乎他是奉了他「先大元帥」還「易職」的！我們姑不去討論這些醜而假的把戲，專從積極方面，貢獻一點消滅軍閥實行編遣的重要辦法。

(一)常備軍應一律改爲國防軍 本來軍隊常站在壓迫和反動一方面，這是資本主義國家內必然的現象；可是在封建勢力下的中國，舊式的武力不僅成爲壓迫與反動的最後威權，並且做了大小軍閥間暗鬥和混戰的工具，無止境的殘害民衆，破壞國家，却確是歐洲中古時代的現象，在現代的中國仍然改頭換面繼續的存在。革命的中國應切實將裁編後的常備軍改爲國防軍，以求抵抗外侮的武力，負

担其正當的使命，而不至變成民衆的仇敵。一切軍事計劃組織，訓練，分配，餉械，等問題悉以國防上的需要和便利爲中心標準。內地除要塞外，概由精練而黨化的警察維持治安。這種原則就是白崇禧先生也有類似的建議，可是徒然唱高調，是不誠意而且無效的。軍閥在暫時「均勢」局面下，沒有不知道以空言來博民衆的同情，但是一面高談裁兵或改軍隊爲國防軍，而大家互相牽制，總希望先裁了別人所統的兵，或者把游移份子編入自己部隊裏來，就算了事。歷史告訴我們，軍閥的把戲正是如此，而軍閥所以不能根本打倒，又正爲得這個把戲。所以我們要的是切實改編軍隊爲國防軍，不是空論。

(二)舊有軍隊分期歸農改工代以徵兵 總理的兵工政策本是極偉大的剷除軍閥可能性的上策，應該施行。同時，如果在土地問題農民問題根本解決中。也可吸收許多退伍兵士，又顯而易見。徵兵制是根本消滅軍閥的一個方法，又是訓練國民打倒帝國主義的一個準備，應該妥籌辦法，分期實行。

(三)軍隊統率權完全歸革命的中央 沒有軍閥的現代國家都是由中央統率全國軍力，中國所以演成割據的循環，在軍制上講，自然因爲軍隊統率權不能集中。不過集中

軍權最少有兩個條件。第一要將黨或國家代替統軍的私人軍閥的軍隊是封建式的私有的武力，要先剷除那搶人民血汗供私人運用的兵這種惡習，才能夠集中軍權。否則即使能集中，仍然走不出軍閥一條路以外，只可以造成封建的專制。所以第二個條件便是主管全國軍閥的中央必定要是革命的國民黨的中央，因為只有革命的中央能夠代表民衆利益，打倒軍閥。

(四)國防軍的編制在軍閥未根本剷除時應以師爲最大單位直接由革命的中央統率。這一點在高唱編遣聲中，說得很有理由，應該實行。不過，各師長還要按期互換統率，以求打破私有軍隊的心理，減少私用武力的可能。

(五)各師要選革命的中央命令互換駐防地點。換言之，軍隊非中央命令，不得擅自托故移動。在對外作戰時，自當別論。

(六)軍事首領不得兼任民政官吏，尤其不許操縱黨權。「軍民分治」這種辦法雖然已被人叫得磨霍了，但確乎非見諸事，不能促進軍閥的消滅。至於黨權如落在軍人手里，不但不能「以黨治軍」，並且非至於「以軍治黨」不止。操縱黨權的實際定義雖不容易下，然而原則上應先確定「以黨治軍」，事實上又何嘗不能分判什麼是干涉什麼是操縱

。武裝同志在黨內應與其他黨員享平等權利這是應該的，但如果恃其武力，破壞黨紀，那嗎黨且不存，治於何有。例如以前五中會議中多數的意見明明主張取消政治分會，而結果，因為少數恃着槍桿子來反對，無形將原案否決。自然這些愛護黨的話只應該對真正武裝同志講的，對專憑槍桿子的人們講，與虎謀皮徒然引他們冷笑，甚於要誣蔑愛護黨的同志爲「反革命」，「華共產黨」。

(七)軍隊餉需悉由中央直接籌給絕對不能許軍人以就地籌餉爲名截留款項，增加捐稅破壞財政。這個道理且讓「南京」來說。

「我們以後自然不能再學軍閥的惡習，擅自委任徵收稅務人員……對於現在服務之各徵收人員，向由軍隊委派者，財政部應考核其成績，量予調任他處，不使單人再蹈從前擅委私人把持財政自取滅亡的惡習。從前軍閥把持財權，中央固然失却統一的能力，地方也何嘗能夠過問？甚至軍閥本身之不能統馭祇便宜了一般官僚政蠶或小軍閥，敲剝人民脂膏，侵蝕國家血脈而已。我們現在決心整理軍事，必須有絕對不干涉財政的覺悟……否則財政毫無辦法，統一全國虛僞所有整理軍事的議案盡託空談……」

這一段話我想誰都承認是事實，並且是事實的很委實

的描寫。可是既然是事實，那末除非有了另一種事實，不能將現在的事改變的。我們還記得——不知道槍桿子還記得否？——去年有了一次全國財政會議，據說是爲謀財政的整理和統一。原來到今年還是那麼一會事！不過，本黨革命的同志決不忍見誰「開特別快倒車」走軍閥的末路，我們且等事實來證明到底是不是，財政毫無辦法，統一全屬虛偽，所有整理軍事的議案將盡托空談吧。

其實封建勢力的代表——軍閥——決不肯自己退讓的，非「使武力與人民結合使武力爲人民的武力」不能根本解

所望于今日的青年

我自不能賣老，但在年歲上我確已非復青年了。我雖不以此自哀，但我對於猶在青年的人，尤其革命的青年，不能不有極大的重視。誰也可以曉得，一國的希望就在兒童，一國的命運在青年。中國歷來的死氣沉沉，忽視兒童與青年最是一個顯然的表徵。對於兒童與青年，特別注意，也就可見蘇維埃俄羅斯確有與國的氣象。我因重視青年，我因對於青年，有熱烈的期望，青年的思想，青年的見解，我是非常喜歡知道。同時，我在人生中，已有三十多年

決「編造」問題。沒有人民的武力固然打不倒軍閥，尤其打不倒帝國主義。如何才能建設人民的武力呢？這雖非本文範圍內可以討論得到圓滿答復，可是有兩個先決條件，忠於革命的同志應該用全力使其實現的。(1)軍隊要民衆化，黨化，而且革命化。(2)治軍的本黨要不斷地領導民衆實現革命的政綱，打倒一切反動勢力，建設三民主義的中國。在這種情形下着手編造軍隊，政治訓練之深入軍隊，黨代表制之真實的恢復，都很容易辦到圓滿地步，軍閥問題自然可以根本解決，革命的武力也就可也建設。

張崧年

了，對於生活，不能不說已有若干的經歷；對於人生滋味，自覺已可算得嘗到了一些。因此，常常覺着有些話，願意對於青年們說說。特別要說的，尤其在：今日在中國，一個青年要作得將來不媿赤裸裸地的一個人，應該怎麼樣。這自然是有些條件的，天地間，事無鉅細，本來從無便宜可討，而現是要豫備作一個稱得起的人。現在就從我的經驗上，就我一時所能想到的，告訴青年大家一些該有的習慣與該作的事。我現在是只說正面的，當然也不能完全

，但如大家能夠作到這些，那中國也必一定有望了。

一，要堅決。一個人如果總是東倒西歪，游游移移，拿不定主意，必然要空渡一生，不會有一點成績。不拘作什麼事，若要有成，第一個條件總是堅決。『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這純粹是從經驗中得來，一點也不錯的話。但如何才能有恆，必始於堅決。你如要參加革命，堅決尤其緊要。因為革命絕不是一天一夜可以倖成的事。革命途中是必然要有種種人的物的阻礙的。你如不能持久有恆堅苦不拔，而乃稍遇挫折便自退，那必不能作成一個革命者。普通都說小有產階級不能革命，還不是因其飄搖游移的緣故。這實在最是人人應該克治的一種毛病。反過來說，便是，堅決，乃是青年們尤其革命的青年們第一必須養成的心習。

二，要敢作敢為。『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這句說的實在妙極。確實是，你如總是怕，這也不敢說，那也不敢作，世界是不會有你的。你不要怕幼稚，你不要怕錯誤，你不要怕得罪人，你更不必怕得罪風習制度。你應見到的就說，想到的就作。這樣子自不免於錯誤，但是好的東西也就由此發生。你必須敢說，才會說出新道理。你必須敢作，才會成就新事業。大家都應知道，科學法乃是世界

上最好的東西。但是科學法的來源第一步，則在『試錯了，錯了再試。』固然，敢作敢為，并不是蠻幹或盲動。只是中國歷來的教育風習對於青年，太拘束了，總想着使青年們循規蹈矩，越趨越囿。這種情形，是萬萬不適用於今日的。所以，敢作敢為實在也是今日青年尤其革命的青年，必須具的一種心習。

三，要認識時代。青年們必然常常要自問，『吾此生作什麼好呢？』這吾可以極簡單地告訴你，你如作的合于時代就是好的，不合于時代就是不好的。所以你要決定作什麼，你應先認識現在是什麼時代。顯而易見，今日乃是革命的時代，而且是社會革命時代，因為在現代的中國，非社會先革命，必無別的革命可能。今日青年的擇業，總要不違背這個時代性質才是。當然，吾并不需要你箇箇都趨在政治一途上去。革命本是廣大的事業，需要種種方面的人材。今日的革命是要建設一個新社會的。新社會中，自也有種種的方面。但令你生在革命的時代，不違反這個革命的潮流，大目標既能認識，種種不同的事業之中，自可隨你取舍。

四要對於中國負責任。中國現在還是怎樣地糟法，不待我說。中國近年是怎樣地受外來帝國主義者的侵害欺壓

鞭辱，不待我說。中國最近一年多來殺人殺的有多麼地殘忍慘酷，也不待我說。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等等凌亂不上軌道，更不待我說。凡此種種，大家但肯想想，都是可以感覺得到的。更毋正面而言：中國現在有沒有科學？沒有的。有沒有哲學？也只能說是沒有的。有沒有文學美術，嚴格言之，似乎也只能說也沒有。中國很大，歷史雖久，但是現在却已成了一片荒土，處處都是空虛。這是誰的責任呢？這當然是箇箇中國人的責任。過去的便不論，如何創造未來的新中國，如何不使現在的局而延長下去。箇箇有志氣的青年，尤該把這種責任擔在自己肩上，至死拋不棄。

五，要作大眾中的一人。我現在所與語的當然是讀書識字的青年，也便是所謂知識階級的青年。不曉大家說，大眾是歷來有一種不很好的習慣的，便是每每覺着自己與衆不同。這種習慣，實在不是要在人類中作事的人應有的習慣。大家如願獨善其身則已。如認為不能獨善其身，且也不能獨善其身，而立志在人類中作點事業，那便非把這種自異的習慣克去不可，那便非把自己化爲大眾中的一人不可。所謂大眾自然是指勞動的大眾。這是今日人口的大部分，這是今日生活的基礎，這是未來時代的柱石。你

必須與之同其甘苦，你必須能夠感覺其所感覺。你如要革命的話，你如不能如此，你的革命必永遠是假的。

六，要有熱烈的情感。理性可以指導人，熱情可以鼓動人。人無熱情，必致什麼都不會有。不用說藝術，就連科學也不能有，西洋的科學史已經明明白白詔告我們。青年本是可以有熱情的，那你就應任它去發洩，盡量地去流露，不妨事，特別在今日的中國。中國人匯來是太矯情了，太虛偽了，太拘泥了，太違背自然了，太多所顧忌了。這樣子不會造出一個有活氣的民族來，必不會有個新時代的產生。要造成一個有濃氣的民族，要產生一個嶄新的時代，必非改變這種矯飾的局面不可。青年們，你們應使你們所有的行爲，都是熱情的表示，不論是說話，不論是寫文章，不論是求學，不論是作事。人的真正的革命，尤其要是熱情的表露。

七，要刻苦地求學。天地間事沒有赤手空拳可以作得成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學問至少也可算是一種利器。我們即不爲學問而求學問，我們也應爲事功爲生活而求學問。你今日多在學問上作一番工夫，你異日在事業上便可多有一番收穫，一點不會辜負你。就以革命而言，革命也要有理論，革命也要有方案。革命的理論，革

命的方案，從何而來？這不是來自切合事實的學問。大家都曉得中國國民黨理論不統一，是一個致命傷。但爲什麼不統一？還不是因歸理論的人對於理論就不清楚。所以今日要統一理論，實非先對於各國歷來的各種革命理論及相關的各種學問，與中國歷來的事實狀況及今日的國際局面，再加一番的細密客觀的研究不可。求學本不就是讀書，

從國際政治說明中國革命

許德珩

在不久以前，我曾經有篇「世界政治現勢與中國革命」的文章，想從國際政治形勢來說明中國革命，那曉得篇未完而那箇刊物却已經停版。國際政治形勢與中國革命，我總認爲是息息相關；固然，我們不能不承認中國革命的對象是中國社會，脫離了中國社會，就無所謂中國革命；然而中國總是世界的一部份，他總不能脫離世界而獨立生存；在二十世紀的現今，他也免不了要和其他的國家一樣，於政治運動，社會運動，革命運動等等，是要受國際的影響，並且有時還直接間接是受國際政治勢力的支配的，所以要瞭解在中國社會裏所發生的問題，這第一是要借國際的形勢來解答的。在這箇革命失了重心，黨失了領導，社

黨黨必須于讀書之外，更對於事實作客觀的考察。「夫學殖也，不學將落！」這最是一句我無時或忘的話。我願意今日青年成大器，那便必須他自己肯拿學問來培植。

河魚腹疾之中，我所想說的只能如此而止。我想今日的青年們一定都可以作到這些，那就中國確是有望了。

會失了準衡，民衆失了歸趨的今日，已有的政綱政策，既已是因一些特殊的關係，置之於恐懼懷疑的地位而不用，一時應付的，又只是根據於一兩箇人感情的或者是利害的臆造而不是根據於事實，更難談到是根據於國際的與社會的事實；所以儘管資本主義在國際上現在是已經由發展的時期，經過到了最後的傾倒時期，而一些先生們，還是在那裏做夢，夢想倒退四五十年或者倒退一百多年去「取法法一美」，做效「明治維新」！儘管自己的經濟命脈是一點一滴的都緊握在帝國主義者的手裏，然而一些只知道「道統」的先生們還要閉着眼睛，在那裏空喊着「富國強兵」。今日發覺了共產黨搗亂，他馬上就恨不得聯英聯日來制俄。明

日與日本的借款發生了糾葛，他馬上又恨不得要去聯英聯美來制日；這些五花八門，絕無僅有的事實，年餘以來，真可以說是應有盡有。究竟現在的中國革命是不是一「明治維新」？又是不是能夠取法法美？或者是配得了取法法美？究竟國際的形式，是不是允許你去聯英？又是不是能夠允許你去聯日？這是第二要借國際的形勢來解答的。中國現在的局勢，是一箇極衝突，極矛盾的局勢，一方面他自己造出許多事來，使社會的不安，而一方面又在那裏發狂造作，從政治上籠罩着一箇「相安」。這箇極矛盾，極衝突的現象，雖然一部份是由於中國社會環境所生出來的，然而其實還是逃不脫國際政治的勢力，這是第三要借國際政治的形勢來解答的。

但是所謂國際政治的勢力是什麼？簡單的一箇回答，就是資本主義的問題。歐戰後這十年來，帝國主義者所以孜孜不息，共同進行的一箇工作，只是如何穩定資本主義的問題。在他們這種共同去穩定資本主義的行爲當中，所必要的一箇工作，當然就是要打壓勞動民衆，防止蘇俄，和鎮壓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獨立運動。中國既是箇半殖民地，他的革命當然也是逃不了他們穩定資本主義的計畫中的一箇鎮壓打壓。不過在他們盡力的去穩定資本主義的行

爲當中，所發生一箇極矛盾的事實，就是如何穩定資本主義的問題。所以我們首先來講國際現勢，把資本主義的國家在這十年以來如何穩定資本的事實，如何穩定資本主義的手段與由穩定資本主義所發生出來的一些如何不能穩定資本的結果大概的說明出來，接着再來說明中國的革命。

(甲) 如何穩定資本主義

歐戰以後，帝國主義者之所以惶惶，不能安枕的，就是他們的經濟破產問題。欲恢復他們那種已經破產的經濟，當然是有賴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的經濟權之加緊一步的握得。所以從歐戰終結以至於今，帝國主義者他們之對付殖民地，就是下了決心要去硬幹的。勿論英之於印度，埃及，法之於細里亞，摩洛哥，義大利之於南非洲是軍事連年，甘於在那些困苦顛連之勞動民衆的身上，增加軍費負擔，並且有時還要犧牲身體而不自覺，就是常常以「非戰」和平」號召於世界的美利堅，他們之對於尼加拉圭 Nicaragua，對於拉丁美洲各小國，又何嘗不是威之以兵，臨之以戰，使他們不得不走入於屈伏之一途。因此，鎮壓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獨立運動不至於成功，就是帝國主義者所以穩定資本主義的方法之第

一種。蘇俄十月革命，他向世界上所搖曳的大旗是推測資本主義，他所用以為推翻資本主義的步驟，一是援助東方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一是吹鼓西方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這兩種運動我們現在不管他是出於主張的或是出於手段的，然而就事實的要求看起來，這兩種運動都是可以使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聞風興起，嚮往景崇的。若果這兩種運動是成了功，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就要根本坍塌；因為如此所以協合起來共同制俄，就是穩定資本主義的方法之第二種。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勢力若果養成了，資本主義的國家也就是要自己傾覆，在上面是已經講過了。然而在這共同制俄與鎮壓殖民地的時期當中，對付國內的勞動階級，自然不能不取一箇暫時調和的策略，以作緩衝的地步；等到防俄的職線成功了，鎮壓殖民地的工作做完了；再來由妥協的，調和的工作，進而為征服的攻擊的工作，因此，對付國內勞動民眾的手段，是隨着國際上的情形而變更；這是帝國主義者所以穩定資本主義的方法之第三種。而在這三者之間，共同制俄，尤為當時最緊要的一件事，所以我們現在先來講一講列強在歐戰後共同制俄的一些方案與行動。

（一）共同制俄的方案與行動

當大戰剛剛終止，沙場的碧血猶存，白骨壘壘的時候，歐洲資本主義者的代表如英如法，乘蘇俄革命的根基未固，就派兵四出，援助白黨，冀一舉而撲滅此燎原之焰。所以從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這兩年，在波羅的海及黑海方面，英法聯合援助白黨攻俄之師，絡繹不絕於道。這是最初他們想用武力去征服蘇俄的一種討伐政策，與一九一七年冬間。美國對俄的經濟封鎖政策，是遙遙相應，同樣的酷辣、同樣的用心。只可惜援助白黨攻俄之師，節節敗退，俄國內部雖然是沒有即於安定，而却漸漸有走上軌道的可能，反之如各國內部的經濟的狀況，日趨於動搖；人民生活益陷於枯竭而不可救藥的地步；我們只要把歐洲的經濟調查表來看，在當時生產的減少，失業者的加多，是資本主義國家中一箇共同的現象。若再搜刮人民的膏血去勞師遠征，並且是搜刮人民的膏血去征討在當時以社會主義為號召的蘇俄；這不雄是要為人民所反對，恐怕長久下去，社會革命的紅旗，還要見之於征討蘇俄的國家自身。這樣看來，用武力去征討蘇俄的政策是幹不通，不能不放棄這種武力的征討政策，而另取一箇第二步的辦法；所謂第二步的辦法，就是他們對付蘇俄的經濟封鎖政策。計議既定，於一九一九年末，英相路易喬治與法國內閣總理普恩

加資會議於倫敦，他們商量的結果，決計放棄武力的征討政策，實行用經濟的封鎖政策來困俄。這是他們的第二步辦法。只是戰後的歐洲各國，在於經濟的恢復；俄國的工業不發達，對於西歐各國，他還算是一箇有廣大的消費力量的國家，可以銷納西歐各國剩餘的貨品，現在爲得困俄，來把這箇廣大的市場自己封鎖起來，當然不是一箇狠好的辦法；而同時在俄國國內，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他們的經濟狀況更是一天一天的穩定；而且有俄國的原料可以供給德國，有德國的機器可以供給俄國，有了列強對蘇俄的經濟封鎖政策，實足以促德俄之聯合，使他們的交誼日趨於親密，於法英各資本主義國家自身，並無絲毫好處。又兼當時法國派兵佔領德國的魯爾 *La Ruhr*，使德國國家的經濟，整個於趨於破產；從感情上，從事實上，是逼迫德國不得不東向而走到與蘇俄聯合的一條路上去。德國一與蘇俄聯合，是俄國對外政策之獲售，這樣一來，勿論英法，就是歐洲各資本主義的國家，也就要從此根本動搖；情勢之險惡，到了如此！所以當時歐洲資本主義者的首領如英國，看見了這種情況，就隨風轉舵，一變其以前之對俄的經濟封鎖政策，而提議對俄恢復邦交，於一九二四年一月而承認蘇維埃的勞農政府，以實行其「妥協蘇俄」的

政策；這是第一。然而德法的不和，是使德國東向聯俄，脫離西歐各國的障壁之一箇最大的事實；要使德國棄俄西向，要使俄國孤立，要使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狀況能夠穩定，第二步就要來調和德法的感情；拉出美國來，實行美國現任副總統道斯 *Dawson* 的賠款計畫，用美國的資本來救濟德國，兼以救濟這箇窮困的歐洲經濟狀況，並使賠款的問題，得以和平解決，把東向的德意志，從聯俄的隊伍中掙了出來，從此西向而與他們結合，成一箇廣大聯合的防俄戰線。所以在當時如英國的勞働內閣之成立，如法國左派聯合內閣之成立，以及黑里歐 *Herrin* 班樂衛 *Parlève* 之登台，如德國的混和內閣之一再的形成；雖然一方面是因爲當時的資本家要暫時緩和國內的勞働民衆之一種緩衝的策略，然而其實還是爲得要暫時妥協俄國，拉攏德國折散俄德聯合，鞏固防俄戰線的問題之一種手段；一直等到洛加羅 *Locarno* 會議成功了，道斯的賠款計畫實行了，美國的資本流動到了歐洲，德國畢竟加入了資本主義者所操縱指使的國際聯盟，更做了國際聯盟中的常務委員，有了担保他是與資本主義者的步驟趨於一致以後，他們才只放心，這是第二。但是德國雖然暫時的離棄了蘇俄，然而北方的屏防還是空虛，德俄聯合的危險還是很多；

所以他們一方面雖然是妥協蘇俄，更進而承認蘇俄，而同時還不能不繼續的召致在「波羅的海」的沿岸四國如波蘭 Pologne 芬蘭 Finlande 愛他尼 Estonie 勒他宜亞 Lettonie，從經濟上來接濟他們，使他們聯合起來，作防俄前線上的犍犬，法國更促成捷克司拉夫，南司拉夫，羅馬尼亞三國成爲小協約國，一方面雖然是爲防止匈牙利，抵禦德意志。而在其他方面未始不是想使小協約國與波蘭聯合起來，成一箇防俄的戰線，這是第三。

有了這些軟的的方策與行動，共同制俄的目的可以說是達到了，資本主義者可以說是躊躇滿志了。共同制俄的目的既是達到，他們所以穩定資本主義的第二種工作，就是鎮壓民地 and 半殖民地的獨立運動。

(一) 鎮壓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獨立運動

在前面曾經把歐戰後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的獨立運動，與帝國主義者之所以不得不鎮壓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的獨立運動的原因，大概的講了一些。只是帝國主義者他們之對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的獨立運動雖然都是要出於不得已的一箇鎮壓，然而他們鎮壓的方法究竟是怎麼樣，這是要隨着他們在國際上的情勢和他們國內經濟界勞動界的情勢而變更。約略的講起來，在共同對俄的問題沒有解決以前，在他們沒有

把東向的德國拖到他們自己的營壘裏去以前，在賠款的問題沒有解決，德法的感情愈趨於惡化，勞動民衆愈趨於貧苦的情況以前，他們之對付殖民地，還是一箇外柔內剛，隨風使舵的策略，不敢依着他們的本性，毫無顧忌的去硬幹。因此之故，所以英帝國主義者在事實上儘管是要加緊一步的去握得印度的政治權，經濟權，而在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年中，對於印度的自治案，還不能不虛與委蛇的去敷衍他宰他。雖然是要加緊一步的去壓制埃及，然而在一九二二年中，對於埃及的獨立，也不得不忍痛須臾，掩耳盜鈴的去承認他，容許他。只等到他們在國際上的情形改變了，他們國內的經濟狀況，改變了，他們就要翻轉過臉來，集其全力以制馭他的。你看，在一九二四年以後，歐洲資本主義者的代表國家，如英，如法，如比利時，他們的政治，不是漸漸的有一箇左傾的清明狀況嗎？然而在敘里亞的屠殺在靡洛哥斯的進兵，不是在左傾的政治未曾實現之一九二四年以前，而是在左傾的政治已經實現之一九二四年以後；對印度的武力壓迫，對埃及的威嚇用兵，也不是在左傾的政治未曾實現之一九二四年以前，而是在這箇左傾的政治已經實現，洛加羅會議已經成功了的一九二四年以後；並且我們知道，廣州的商團事件，是英帝國主

我直接看破他所御用的買辦階級來打擊中國革命之第一步的工作。而這種工作，也不是在他們對國內國外的經濟政治問題未有解決，左傾的政治未曾實現以前，而正是在他們對對外的政治問題，勞動問題，經濟問題已經有了解決，與動一時的勞務內閣已經實現了的當時。更其次如五卅事件，沙基事件，萬縣事件等等，那更是帝國主義者向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宣告開始鎮壓的炮聲，至等到新加坡築港的計畫，與搜查俄國使館，對蘇俄的絕交等等，則直等於成功後之一種閉幕式的紀念典禮，讀者早已料其必然的降臨，無所用其驚異的了。

(三) 對付國內勞動民衆的方法與行動。

防俄，鎮壓殖民地的的工作已經是如斯；穩定資本主義之第三種手段，就是來對付在他們國內的勞動民衆。我們在前面曾經講過，帝國主義者在他們共同防俄的聯合戰線沒有成功以前，在賠款的問題沒有解決，歐洲的經營界還是混亂，沒有達到能夠恢復以前，他們之對於國內的勞動民衆，還是一箇妥協的態度，而不敢有所作為。你看在一九二五年以前如英國之一九二一年的煤礦工人大罷工，一九二三年的鐵路工人罷工，一九二五年七月，鐵路工人，運輪工人，煤礦工人的同盟大罷工，資本主義者還是一箇

妥協的態度，是退讓的，而不是攻取的；等到了一九二六年，對內對外的準備都算是成功了，所以於這年的四月，竟然開始來停閉煤礦 Lockout，激起五月三日四百多萬人空前的總罷工，他更不惜犧牲一切，對於這箇重大的罷工加以嚴酷的打擊，以至於勞動者方面的失敗，資本家更趁着這箇失敗，來減少工資，增加工作時間；保守黨於一九二七年四月，更提出勞動團體之政治鬥爭的勞動組合法，限制工人集會結社的自由，這年五月，更宣佈對俄絕交，實行對於國內的勞動民衆，取一箇壓迫打擊的手段。

法國的情形本來也是早就應該如此的。不過因為在英國開始向勞動民衆進攻的時候，法國的經營，還是在恐慌的地位。因為左派登台以後的「爛發紙幣政策」Inflation，弄得弗郎大跌，物價飛騰，一九二三年德國的混亂現象，幾乎又要重見之於法國。社會既呈不安的景象，資本主義亦自岌岌可危，又兼對外用兵，軍費的增加，已經是使人民憤怒，在此時期，當然談不到要來做這箇向勞動民衆壓迫的工作了。等到資本家的忠實代理者普恩加賓親自出了台，把紙幣的問題暫時解決，把這箇混亂的經濟狀況暫時處理下去，他也就是要來向勞動民衆開始進攻。所以自一九二七年一月以來，他們對於國內的勞動界，也是取一箇

攻勢；一九二八年四月間的大選舉運動，反動的勢力竟是全部的勝利；在大選舉的前後，對於勞働民衆的運動，竟是一箇高壓的手段，更用「勞働合理化」的方法，來實行減少工資，增加工作時間。直至最近在利恩^{Liern}的紡紗工人因爲忍無可忍，才有每小時增加五十生丁（五十生丁約合中國四分洋錢。）工價的要求，竟遭資本家的否決，因此一萬五千工人相率罷工，罷工後政府竟是如臨大敵的派兵壓迫；現在在勞働者的一方面如宜汝^{Ilse}的礦工，波爾多^{Bordaux}的水手工人，以及法國北方的紡紗工人，都起來援助，作總罷工的預備；資本主義者的政府現在每天也正預備調兵遣將，正式的來鎮壓；其情形即使沒有一九二六年五月英國總罷工那樣厲害，我想局勢已成，或者不至於十分的寂寞吧。不過在這箇穩定資本主義之對外的手段已經告成之今日，他們之對付勞働民衆的方法，恐怕還要凶辣些就是。

至於德國，他是負了一・三六〇億馬克的賠款者。雖然從道斯計畫實行以後，輸入了美國的巨大的資本，賠款可以暫時應付，國內的經營現象，以及工商業的現象，是暫時的趨於恢復；然而在這箇市場競爭到了最激烈化的今日，德國自己的殖民地喪失精盡；兼之受了條約上種種的

限制，自然更談不到插足於市場的競爭。資本家在此時，要能夠維持這箇已殫的局面，他惟一的出路，當然只有向國內的勞働界想辦法。所以近時「勞働合理化」的口號，在德國也同在美國一樣，喊得很是起勁；生產的極端集中，八小時工作制度的推翻，勞資的減少，對於勞働界取一箇攻勢，竟是不不得然的趨向。然而據最近的統計，德國失業的人數還是比以前加多。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失業的總數不過是五十七萬三千人。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增加到了一百一十八萬八千人；而在一九二六年的十二月，更到了一百七十四萬九千人；資本主義的前途如此，我們真可以想見其將來了。

義大利和日本差不多。黑衣大王所明目張胆擁護的是資本主義，所打的大旗是國家主義；與田中義一所供俸的是天皇，三菱三井，武士道一樣；所以在義大利近來有解散一切勞働團體，組織什麼職業聯合會，實行禁止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取消了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權，更剝奪了勞働者的罷工權；而在日本於所謂普通選舉以後，忽然來一箇空前的大檢舉，把勞働民衆的力量，欲一舉而廓清之；更又提出什麼思想善導案，光怪陸離，真可以算得是資本帝國主義者最後掙扎的醜態，東西遙遙相應，無獨有

價了。

目前資本主義者所用在他們國內的方法，大概可以分為兩種；一是法西斯蒂的硬方法，直接的禁止工人罷工，減少工人的工價，增加工作的時間；一是德謨克拉西的軟手段，以「合理化」Rationalisation的口號，來實行集中生產，用新式器具，增加工作時間，減低工價；義大利，日本，是實行前一種方法的代表者，英，美，德，法是實行後一種方法的代表者；他們所用的方法雖有不同，然而他們之想穩定資本主義的目的，則是一致的。

防俄，鎮壓殖民地的獨立運動，打擊國內勞働民衆的革命運動，為帝國主義者所以穩定資本主義之三條必由的道路，他們真可以說是臥薪嘗胆，十年如一日的去進行，現在一條條的都是被他們走到了；從殖民地和平殖民地的現勢講起來，不惟各箇的民族獨立運動，是暫時一箇個的被他們打擊下去，而並且在殖民地和半殖民的社會中，為帝國主義者所象養的走狗，現在都一箇箇的起來，自己挺身出來打擊革命，拍賣革命，這不能不佩服他們的手段之

凶辣；從防俄的形勢講起來，他們能夠弄得各國都與俄國不通往來，並且就是被壓迫的各民族，也弄得與俄國不通往來，這也不能不佩服他們的方法之巧妙。再從他們國內政治上經濟上的形勢講起來，各國曾經紊亂的經營，現在一箇箇的都已經恢復安定；德國馬克的價值，早已經恢復到了戰前的地步是不必說。法國，義大利，比利時的貨幣，在一九二六年以前，浸浸然有步一九二三年德國的後塵者，現在也已經安若泰山，其他如英如美，更不必論。政治上他們的資本主義者都已經一箇箇的挺身出來掌握政權，壓制勞働民衆，而在他們國內工商業的生產，還是一天天的增加。穩定資本主義的風浪，已經是吹動了全世界，全世界的人類，喜的固然是眉飛色舞，愁的就不免要胆戰心寒。自然，國際資本主義若果有安若泰山的可能，我們這箇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民，只有羅拜在帝國主義者的面前，無話可說了，然而我們現在且根據事實來看一看，看資本主義究竟有安定的可能否？

(未完)

專 載

中國國民革命的前路（一續）

陳公博

（二）國內形勢

封建勢力的復興

資產階級的反動

目前中國封建勢力，可以拿鄉村的資產階級作代表，資本主義勢力，可以拿都市的新興資產階級作代表。前一個勢力表現於政治上的是軍閥和士大夫，後一個勢力表現於政治上的是金融的集團——如舊日的京津中國銀團和今日的上海中國銀團，以及牠們的經紀人。照理論說，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是兩件絕不相容的東西，然而在中國半殖民地的地位，前一種勢力雖然崩潰，但其附着物的土地和宗族制始終沒有動搖，所以不但沒有消滅，而且每值一個革命力量表現軟弱的時候屢次作反攻的形勢。後一種勢力雖然已完成其雛形，但在都市敢不過外國資本的壓迫，在他方面因着內亂匪患資本始終伸不入農村，所以只在都市得一個畸形閉縮的發展，對於政治也只能影響而不能

掌握，每當革命力量表現軟弱的時候，不是退縮，就是反攻。在今日的中國，這兩種絕不相同的東西恰恰成爲一種向革命進攻的混合物。我們先把這兩種形勢略略分析，再下一個影響於革命的結論。

我常說商業資本的發展，如果沒有工業的輔翼，只能破壞封建制度，而不能破壞封建勢力。（見我著中國歷史上的革命）歷史上各國的國民革命很明顯的是民主勢力和封建勢力鬥爭，中國國民革命的本質很明顯的除了一個民主革命以外還加上一個民生革命。自秦以來封建制度雖已打破，而封建附着物的土地和家族制還是儼然獨存，以故表面上今日的中國雖已脫離了分封的形式，而實質上終脫離不了分據的實質。清末的督撫，民國的督軍，目前的集團，無論那處都表現很濃厚的割據色，但是我們萬不要以爲偶然的事實，這實是歷史傳統來的封建勢力呵。今日談到封建和革命的鬥突，最明顯擺在我們面前兩件事，一

個是地方主義，一個是宗族制度，有了地方主義，國家遂無法統一，有了宗族制度，國家更與人民隔離。可是這兩件事怎樣來的？自然由於農村之未商業化，和工業化，因農村之未商業和工業化，封建勢力遂固着於土地，因而族長和地主的勢力矗立不可動搖。前清末年雖然天天嚷着自沿這條路只管預布多如牛毛，而人民之不能參與政權依然如故。前兩年北伐軍興，天天嚷着革命，口號只管喊着打倒劣紳土豪，而人民之不能參與政權也依然如故。不但如此，插象的白蠟徒惹起農村的無聊糾紛，實際的恐慌反形成豪紳的有力反抗。從前半知識的地主，還發官傲和士大夫替他們張目，到了實際的利害，他們已感覺本身的危險，起來向革命進攻了。（尤以今日兩湖為最明顯）到了今日，封建勢力已從恐慌中整傷隊伍一致推倒革命權威，什麼農民運動固已影滅聲消，就是『二五減租』也只好成了討厭名詞和走不通的絕路。目前還有一件確切證明，一般所謂黨國要人不是高叫尊孔崇孟嗎？這種呼喊就是封建勢力復興的表徵。我們要知道孔孟學術完全根據於封建土地小農作背景，（我待本文完成時候還要著一本『孔丘的背景』）我并不是反對中國固有道德，或反對人家提倡道德，但是我們試問這種仁義道德是不是這班提倡者所力行和要求。

本身不是需要這種東西，人家卻硬要幹這種玩意，這絕不是他們故意作這類『二重人格主義』的矛盾，只是降服於復興的封建勢力，不得不閃避革命，於是拚命高揚代表封建勢力的『道德空招牌』，希冀維持一時的政權，這是客觀事實，我們必須明白的。

其次談到中國的資產階級，我常批評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沒有力量，假使早有力量，早已領導革命底於成功，可是新興資產階級雖無力量可言，而資本主義在中國卻已有了雛影。第一資本主義的初期表現就是資本集中，資本集中內擴的表現是銀行組合，外擴的表現是市政問題。我們試看中國近日組織銀行的如雨後春筍，當然亂生，即使一般舊有的錢莊也漸漸採了銀行形式，至於市政問題更像今日最切要的問題，東也設市，西也設市，很像非有市政，不足言新，但何以前三十年沒有市政，到了今日才言市政，也因為資本主義漸漸形成，所以附屬於資本主義的問題，掀然而起。我們再拿兩件淺譬事實證明罷，第一試把中國近年的內戰分析，拿了上海，實際便拿了江浙閩皖，拿了漢口，實際便拿了兩湖和四川，拿了廣州，實際便拿了兩廣，拿了天津，實際便拿了河北北平和山東，這都不是偶然，實因於經濟的集中，把經濟的中心佔領，其附着

上海四馬路

牌門8745

復 尙 志 旦 書 書 屋 店

新 書 出 版

三版 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

著者 陳公博
實價 三角

再版 國民革命危機和我們的錯誤

著者 陳公博
實價 三角

再版 目前中國革命問題

著者 王樂平
實價 一角

再版 中國國民黨組織及訓練

著者 孟明
實價 二角五分

三版 吳稚暉陳公博辯論集

著者 施存統
實價 三角

中國革命與三民主義

陳公博最近論文集

編者 孟明
實價 五角

革命評論全集

陳公博

先生

編主

精裝

一元陸角
一元貳角

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

著者考次基
譯者黃惠平

1革命與恐怖 2巴黎 3大革命 4第一巴黎公社 a巴黎無產階級與其鬥爭手段 b恐怖政治的失敗 5恐怖政治的遺傳性 6第二巴黎公社 a公社的起源 b工人評議會與中央委員會 c公社中的雅各賓派 d公社中的國際主義派 e公社底社會主義 f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 g公社中的恐怖思想 7習俗的溫和 a野蠻與人道 b兩個趨勢 c暴行為恐怖統治 d十九世紀中習俗的溫和 e戰爭的影響 8共產黨的工作 a統公與組織 b無產階級的成熟 c狄克推多 (Diktator) d腐化 e鮑爾基維爾的變化 f恐怖 g蘇維埃共和國的將來 h世界革命的將來

鎔爐月刊 一期

徐霞村先生主編

自殺日記(小說).....	丁玲
皮篋得妻.....	徐霞村
六個尋找作家的登場人(皮篋得妻).....	徐霞村
熱情之骨(小說).....	啞啞鳴
無產階級藝術底批評.....	杜衡
詩四首.....	蕙子
拜倫與嬌迎絲朵的戀愛.....	趙景深
父親和他的故事(小說).....	胡也頻
洛迦特全博物館(穆杭).....	戴望舒
闖名故事(小說).....	沈從文
爐邊的話.....	編者

▲每月一冊每冊二角五分預定國內及日本全年
兩年兩元五角半年一元三角國外全年三元二
角半年一元二角郵費在內

還鄉集

著者 海涅
譯者 杜衡
實價 三角

困難的譯詩工作，是少有人嘗試而得到成功的，因此竟有人當這是不可能的了。但是目前已經有了些例子可以證明這觀念底錯誤：杜衡君翻譯的「還鄉集」就是這種例子中的一個。他底譯本：不但在意義上，就是在音韻上，都曾經過長期的推敲，和四五次修改，無處不盡可能地獲得了原作底神似，同時又脫盡了翻譯的痕跡。至於原作者法國詩人海涅，是無須介紹的了；本書是他底傳世作「歌底書」裏的重要的一集。詩人自己說：「這是葬着我戀髮底殘灰的骨甕。」從這句話裏，我們們可以看出本書，內容。

號聲

著者 王統照
實價 五角

消磨

著者 胡也頻
實價 五角

紅笑

譯者 徐培仁
實價 五角

火榴

著者 曹雪松
實價 四角

本長篇小說取材于振盪世界的名片黨人魂，書中有火血的爭鬥纏綿愛情；有船夫的歌聲公主的嬌啼；管節之悲壯曲折描寫之哀婉動人，實為革命文學別開生面。為中國文藝不可多得之力作。看過黨人魂的再看此書當交親切而有味；來看這張影片的來，看此書彷彿在銀幕上看了一遍黨人魂一樣。

民間故事研究

著者 趙景深
實價 四角

這是趙景深先生最近一兩年來的民間故事論文。看過童話概要和童話論集的讀者當知趙先生對於這方面是曾經專研過許多年的，並且以前上海大學和上海藝術大學還爲了趙先生特設童話講座。民俗學在我國漸漸的抬頭了。我們且從這本結集裏得些新的學識罷。

本集凡論文十篇，論印歐以及中國的故事型式表，西洋學者對中國民間故事觀察，並詳論呆女婿故事，朱洪武故事，擲成故事，終城事等等內容豐富都四萬言。

目前中國政局的解剖

許德珩

(一)

目前中國的政局，客觀方面雖然是盡量表現着一箇混亂不安，然而主觀方面，他們所用以為號召的，却是一個「昇平」，「相安」；這顯然是箇極矛盾，極衝突的事實。由這個極矛盾，極衝突的事實，湧現一個極矛盾，極衝突的局面。

這箇極矛盾，極衝突的局面，成之於統治階級的本身。因為統治階級一時均勢的力量之相持，雖然他們內部竟是有着鬼胎，各有各的要求，各有各的希望，並且是各有各的圖謀，然而在這箇保持均勢面不敢先動的均勢之下，誰都願意借着一箇「相安一時」的機會，來拉攏妥協，以鞏固他們自己已成的地位，培養他們自己已成的實力，好擴大他們將來的勢力範圍。這是在這箇封建的均衡勢力當中，統治階級所呼吸一箇「相安一時」的局面之內幕。直接擁護這箇局面，歡迎這箇局面的人，當然就是一些政客，蒙昧腐爛，久已熏陶於封建勢力，慣染了舊禮教，舊道德的士大夫，老朽。政客們看這箇均勢的「相安」局面，要施行

他們縱橫捭闔的手段，以襲壓他們的升官慾，發財慾；蒙昧腐爛得着這箇均勢的「相安」局面，好再來壓制民衆，剝削民衆；久已熏陶於封建勢力，慣染了舊禮教，舊道德的士大夫，老朽，覺着這箇均勢的「相安」局面，好盡量的來維持舊禮教，舊道德，舊文化，以襲壓他們的復古慾，反動慾。還有新興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他們既是想能夠繼續他們那種剝奪勞苦民衆的工作，當然對於這箇均勢的相安局面，也是一個有力的歡迎者，擁戴者。

這是目前中國政局的內幕，他是由於統治者「力的均衡」情況而成的，他所提出的口號是「相安一時」，他所代表的是軍閥，政閥，豪紳，士大夫，老朽，資產階級的利益與要求。因為要實現他們的利益與要求，所以有目前對內對外的一些行動，我們現在且簡單的來說一個大概。

(一)

(a) 對外 要能夠維持這個相安的局面，當然不能不相當的解決對外的問題。因為對外的問題如取消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等等，是我們中國革命的第一個對象，是大

多數民衆所迫切的一個要求，也是歷年以來多數人民所耳聞熟習了的一個口號；要維持這個相安的局面，當然不能不於大多數人民所迫切要求之對外問題，如取消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等等；有個相當的解決；這從一方面講是如此。但是從另一方面講起來，要維持這個相安的局面，換句話說，就是要能夠充實個人的力量，擴大個人的地盤，滿足箇人的統治慾，權利慾，支配慾，當然就不好開罪於帝國主義者；不惟不好開罪於帝國主義者，並且還要進一步的去妥協帝國主義者，或者有時竟要勾結帝國主義者。因為從名義上，從物質上，要想鞏固他們的政權就不能不仰給於帝國主義者的幫助。在這兩個衝突的情形之下，所以才有近時的一箇妥協的修約辦法。其實，近時所謂修改不平等條約，他對外，只可以算得是向帝國主義者獻功投降，更不只是什麼妥協；他對內，只可以說是欺騙了民衆，背叛了黨，更談不到滿足什麼民衆的要求，履行黨的什麼主張。因為我們從黨的主義，歷一二次代表大會宣言，政綱，決議案以及孫中山先生的講演裏面還翻，他所承認的，所決定的，只是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不是修改不平等條約。更就事實方面講，近時所謂修改了的中美，中英，中法，中比等等條約，他其中如「承認最惠國的

待遇，」規定「本國所享受之待遇，不得次於任何其他國所享受之待遇」之條文，不惟於從前的條約，沒有談到修改，更沒有談到改，簡直把從前帝國主義者兵臨城下時所喊出來的「利益均霑」「機會均等」等等口號，都完全接受具體承認，這是進一步的來承認不平等條約，不是什麼修改不平等條約了。而近時承認西原借款之說，甚囂塵上，這更是直接向帝國主義者投降，離我們批評的題目太遠了。

(b) 對內 他們鞏固政權的方法。既是在乎要得到帝國主義的援助，但是要能夠得到帝國主義者直接的援助，就非備具有援助的條件不可，而這個援助的條件，就是在乎能夠對內，而表示能夠對內的方法有幾種：

(一) 壓制民衆運動 民衆的力量，自然是爲反動的統治者豪紳，士大夫，資產階級所懼怕，而尤其爲帝國主義者所懼怕的；所以民衆運動，也就是爲反動的統治者與帝國主義者所最不歡喜的。他們要能夠鞏固政權，並能夠得到帝國主義者的幫助，第一，就只有壓制民衆運動。所以近時以來，不惟沒有民衆運動，並且不敢談民衆運動，就是這個原因。

(二) 消滅革命的黨 革命的黨也是反動的統治者豪紳，士大夫，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者所最嫉惡，最痛恨的。

遠的如陳廉伯與英帝國主義者之勾結，共同的來向當時廣州的革命力量進攻；近的如時下一班爲封建軍閥把鐵的先生們之所造的「華共產黨」，「不離字的共產黨」等等名詞，以陷害黨中革命的同志；軟的如吳稚暉們之主張「全民革命」之主張「把黨交給武裝同志」，把個黨部硬搬到三省邊防司令部裏面去；硬的如南京市黨部這次的悶點，把個黨又放到了一兩個人的荷包裏面去。這些一切的一切，反動的統治者之對於帝國主義者，都是要算不朽的勞績，蓋世的功勳的。

(三) 拉攏反動的勢力 要能夠使反動的局而一時撐持得起來，革命的力量打擊得下去就只有拉攏反動的勢力。所以一年以來，不惟在過去革命途徑中作革命的障礙，要消滅革命，打擊革命的人，一箇箇的都是最忠實的同志，就是挺身做革命的敵人，做革命的對象者，也都是最忠實的同志，反動的勢力，已經成了一箇廣大的聯盟，成了革命的領導者，轉而要吧反革命的罪名，誣陷別人呵。

上面所舉的一些對內的工作，現在都已經一箇箇的完成；談起民衆來，黑黝黝的局面當中，民衆已經沉默得可怕了！「黨」早已經變成了箇人的工具！四面所感覺得到的，現在只有反動的勢力之高漲的形成！統治者這樣的工作

，不能算他不是十二分的努力！然而最後能夠向帝國主義者表示力量的，還是要他們能夠「安定」能夠「統一」，而表示「安定」「統一」的一箇閉幕劇，就是這次的編遣會議。

(四) 編遣會議 自然，從中國客觀的情形看起來，兵的問題，可以說是各種問題中之最急待解決而又最難解決的一箇問題；他真是中國社會裏的一箇致命傷，因爲在目前環境之下，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他只是內亂有餘，而禦侮不足。據軍事委員會的報告，直屬的軍隊有兩百萬人，而奉魯及各地雜色軍隊尚不在內。據財政會議的報告，全國的軍費，竟佔了全國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二。在這種情形之下，若果真是能夠把這個內亂有餘而禦侮不足的軍隊，不惟能夠遣，而並且能夠編，使他能成爲有用的軍隊，那真是吾儕小民，焚香百拜以祝禱的。然而現在所謂之編遣會議，究竟如何呢？

我們知道從編遣會議開會以來，他可以使我們注意的，有幾件大事。

第一是劃分編遣區，其原文如左：

「昨開編遣會議，將全國現有各師，除中央直轄者外，定爲六個編遣區。第一區爲蘇，浙，皖，贛，閩五省，原係一集團各師旅，及未編入該集團之現駐該五省各部隊

屬之。第二區爲豫，陝，甘，魯，四省，原係二集團各師，及未編入該集團之現駐該四省各部隊屬之。第三區爲晉，燕，熱，察，綏五省，原係三集團各師旅，及未編入該集團之現駐該五省各部隊屬之。第四區爲鄂，湘，桂，粵四省，原係四集團及第八路總指揮部各師旅，及未編入該集團及現駐該五省各師旅屬之。第五區爲東三省，原係奉吉黑各長官所屬各師旅屬之。第六區爲川，康，滇，黔四省，現駐該四省之師旅屬之……

第二是分全國爲六箇編遣區，由各部隊共同派員負責組織點驗組，分往各部隊，實行點驗。

第三是指定衛戍區域。

第四是發行十八年所謂孫吳公債四千萬。

由第一條劃分編遣區看起來，所謂六個編遣區域，除了以前孫傳芳的五省，改作了現在之第一集團；兩廣兩湖，把兩廣的革命勢力消滅了，合併當日兩湖的軍閥區，改成了現在的第四集團以外，其他的四區，差不多都是革命以前整箇的舊勢力，舊形勢之存在，他除了把五色國旗換作了一箇青天白日旗以外，恐怕是絲毫沒有更改，這箇區域之劃分，完全是依照革命以前，軍閥佔據的形勢，以及現在之集團軍，政治分會等等形勢而分的，不能與宣言中

所謂「決不限於國際裁軍之不徹底，在於各方面利害之本位……」合全盤以統籌，爲整箇的整理，倘有以集團或地域爲單位，而倡爲均衡裁遣之說者，則在制程上，將延長封建之惡習，爲革命主義所勿容，而實際上足以誘啓軍閥之割據，亦爲國家利益所勿許……」相背馳，簡直是要進一步的把以前法律上沒有根據的割據局面，以及早要取消的「政分會」，「集團軍」，而使他永久存在，由事實的存在，進而得法律上的保障而存在。

依此種形勢看起來，編遣區是已經依照舊有的勢力，而分配好了，則我所指出的第二個注意「由各部隊共同派員負責組織點驗組，分往各部隊，實行點驗」中所謂之各部隊，無論是指本集團以內的部隊，或是本集團以外的各部隊，都一樣的是欺騙人的具文，實際上是等於不編不遣，連宣言中所謂「國際裁兵之不徹底」都談不上了。

那嗎，第三個所應當注意的「衛戍區的指定」這究竟是不是「中央」能夠征服地方，能夠把衛戍區域都設在新疆，蒙古，西藏，青島等等其他緊要的地方去，或者是羣雄的勢力畢竟要逼倒「中央」把現在文的政治分會區域，再武裝化一下，加上一個衛戍區域條文的保障呢？這是要看他們的把戲，變到了終局，我們總能知道究竟的。

第四個我們應當注意的，就是這四千萬元的公債了。我們知道過去的什麼廢督，什麼裁兵，什麼善後會議，都不過是把原有的名詞，再來改正一下，好向外來借款，對內來舉債，這次的續遺會議，是不是等於「羣英會」？是不是等於廢督裁兵？是不是等於善後會議？又是不是能夠如宣言中所說的「不假借」，「不偏私」，「不欺飾」，「不中輟」？這有事實來告訴我們，無所用其推測好了。

(三)

這是目前所謂「相安」的時局之內幕。由他對內對外的一些事實看起來，無論他什麼美好的名詞，他的目的，總是在乎對外表示統一，來得到救援，好增加實力，撕殺火併的，無論是桂系也好，是奉系也好，是什麼其他的系也

怎樣改組國民黨

(一)

我們知道，要中國革命成功，必須造成健全的革命黨；要復興中國革命運動，必須恢復革命的國民黨。革命問題，在主觀方面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便是黨的問題。要實行革命而離開黨的問題，實際上等於迴避革命。

好，他們「對外投降」，「對內壓迫」的志願總是相同的。在這箇均勢的局面底下，他們雖然是形似妥協相安，然而矛盾是一天天的加多，衝突即在目前。革命的民衆們！你們忍得住反動勢力這樣長時期的互鬥？忍得住封建軍閥這樣循環的去衝突互爭？忍得住叫革命的力量這樣長期間的消沉下去，叫反革命的勢力和帝國主義者的勢力一天天的高漲起來，來中斷中國革命嗎？我們團結起來！在革命的三民主義旗幟之下團結起來，反對分贖式的會議，反對投降式的對外修約！重新團結起來，打破這箇割據的，封建的局面，消滅這箇對外投降，對內壓迫的政策，完成中國革命！

一九二九，一，十五，上海。

施存統

我們又承認，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完成中國革命的黨，客觀上應當是真正承繼總理革命精神的革命的國民黨。中國近幾十年的革命運動，誰都不能不承認，是孫中山先生及其組織的革命集團所領導的。過去孫中山先生及其組織的革命集團之所以能夠領導中國革命，是因為他能適應「

此時此地」的客觀環境，即因為他適合中國當前的客觀需要。孫先生所指示我們的中國革命底出路，我們至今還覺得沒有什麼錯誤，而且過去孫先生所組織的黨始終是革命的，所以我們承認，中國革命，客觀上應當由真正承繼孫先生底革命精神的革命的國民黨來領導。但是主觀上呢，現在並沒有這種革命的國民黨；我們所能看見的，只有日趨腐化反動的國民黨。

我們姑且根據現存的事實，來看一看現在的國民黨。我們翻遍全世界底政黨史（不必說革命黨史，）都不能發見有一個政黨，其奇形怪狀，有如現在的國民黨。現今國民黨底奇形怪狀，真可以說是耳聞，有目共觀，有心同感，有身同受，我們要描寫起來，實在不勝其描寫。現在我們只能簡略地說一說。第一，現在的國民黨，一清再清，以至於三清四清，差不多把以前的革命忠實黨員清乾淨了，從新加入了一大批「反革命的忠實同志」，什麼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買辦洋奴，走狗學者，研究系，交通系，政學系，安福系，外交系，北洋系，都如潮水般地濺到國民黨裏來，變成國民黨裏最忠實的同志，至於張學良「同志」（不客氣的人叫做張學良「小子」，）那更不消說得，是當今第一等「黨國要人」，「五大巨頭」之一（也有人說六

大「巨頭」，「其實有兩位「巨頭」是「一家人」，「只可算作一位」，國府委員兼東三省（實在是「東四省」，因為還包含熱河省）「小霸王」，「名震中外，威武赫赫，誰都知道他是當今「黨國」底柱石，有功於「社稷」的人，因為有了他，國民黨才能「統一全國」，「國府」才能取得對外代表的資格（在這個意義上說，張學良「同志」真正是今日「國民革命」底最後完成者，其功勞之大，非任何人所能比擬。）第二，現在的國民黨，已經廢棄民主集權的原則，採取官僚主義的辦法，各級黨部底負責人，完全聽由「實力者」自由更換，不但姓名更換了許多次，就是名目也更換了許多次（清黨委員、改組委員、整理委員、指導委員等，）黨員對於黨務沒有一點發言權。只有機械地服從，盲目地做少數人底工具，因此黨部變成衙門，黨部職員變成黨官，黨員變成走卒（這是就客觀的情形來說的，決不是說每個黨員主觀上都願意做走卒。）第三，現在的國民黨，不但是有所謂左右派，（這還是就好的方面來說的，）而且還有無數槍桿子的派別和私人的地方的派別，每一個有力的軍閥都有自己的派，每一個有力的官僚也有自己的派，許多小軍閥小官僚也各有自己的一系一派名為一個「國民黨」，「實在是無數「國民黨」，」各自有某記某記的字樣。第四，現

在的國民黨，其綱領其政策其行動，都已經和以前大不相同，而且根本兩樣。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宣言、政綱、決議案，中央與各省聯席會議所通過的政綱，決議案，及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案，都已經被少數官僚軍閥底行動根本推翻，而且從四次中央全體會議發表宣言以來，已經正式地形成他們些反動綱領和反動政策，其行動更不消說得。以上四點，是現今國民黨最顯著的事實，決沒有一絲一毫是我們所造的謠言，此外奇奇怪怪的事情，還不知道有多少，我們此刻沒有時間去細說它。總之，現在的國民黨，與兩年前的國民黨甚至於一年半前的國民黨，不但內容完全相反，就是面貌也已經大不相同。如果今年三月十五日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得成，那麼現在這個日趨腐化反動的國民黨，不但事實上支配了中國，而且獲得法律上的根據了（這是就國民黨內部而說的）。

（二）

很明白的事實擺在我們面前，現在的國民黨，不但不能完成中國革命，而且已經在阻礙壓迫中國革命了。這一個工具，現在對於中國革命不但無益而且有害了。

然則我們應當怎麼辦呢？

我們底答案是『根本改組。』

用什麼方法改組？革命的手段呢，還是合法的手段？我們底答案是應當採用革命的手段，而且也只能採用革命的手段。

也許有人主張採用合法的手段。所謂合法的手段，就是先改組中央黨部，再由中央黨部下命令改組；或者競爭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底代表選舉，由代表大會決定改組。其實這是一種妄想。如果現在還有人抱這種思想，簡直等於做夢。我們要根本明白：現在黨底基礎，既不在於民衆，也不在於黨員，完全在於槍桿子上。黨底意志，隨着『槍桿子』底意志為轉移。黨內一切問題底解決，都依照槍桿子底勢力關係來決定。四次會議如此，五次會議如此，最近所謂編遣會議也是如此。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所謂政治分會存廢問題。五次會議決定政治分會限於去年年底廢止，終因為槍桿子底均勢關係，沒有方法廢止。現在所謂中央黨部，不過是少數軍閥官僚底御用工具，革命的分子不要說拿不到手，就是拿到手裏也沒有什麼用處，除非依舊做軍閥官僚底工具。他們所謂『主義』和『黨紀』，只有屬屬『小黨員』還有點用處。委派下級幹部也好，圈定下級幹部也好，甚至於選舉下級幹部也好，終逃不脫槍桿子所支配的範圍。在甲省要受甲省槍桿子底支配，在乙省要受

乙省槍桿子底支配，所謂二五等於一十，沒有多大的區別。現在的中央黨部既然是這樣一個東西，在這樣的中央黨部支配之下所產生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一定也是這樣一個東西，絕對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只有更壞更反動。固然，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得成開不成，還是一個問題；但是我們可以斷言的，如果開得成的話，一定是集反動之大成，會把一切稍具革命性的分子排除得乾乾淨淨，變成『純純粹粹』的反動的國民黨。所以希望用合法的手段來改組國民黨，完全等於做夢，大不了改來改去也不過如此。

所以真正革命的同志，現在再不可存一點苟安妥協投機取巧的妄想。過去對於『法統』的迷夢，應該根本覺醒過來。中國國民黨底法統，自從漢甯合作，特別委員會成立，早已蕩焉無存，毀滅無餘；自從四次會議發表『空前的』系統的反動宣言以來，更是把十三年改組以來一切光榮的革命綱領和革命鬥爭辱污不堪了。現在要談『法統』，實在是無『法』可談，無『統』可說。如果今日還要迷戀於所謂『法統』，要想在所謂『法統』之下討生活，即使主觀上十分革命，而客觀上只有做了反動派底工具，決不會有一點好的結果。我們大家試回想一下：四次會議以來許多人所追求的『整理黨務』的幻影，現在的結果怎樣？整理了一年，

現在還整理不出一個頭緒，有些地方連登記還沒有辦理完畢，這真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奇觀。爲什麼會有這種怪現象？因爲現在的基礎太壞，在這種基礎之上決不會整理出好東西來，而且整理好了也只能做反動派底工具。最近竟至於稍爲好點的指導委員都不能立足，清一色的反動傾向更加明顯（如撤換各地指導委員，昏庸老朽分子親自出馬等現象），黨之不能整理，已無待贅言。什麼特別登記，指派代表，固定委員，都不過是這種反動現象底表現。聽說有些地方，近來嚴令屬僚和部下入黨，預備逐鹿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黨底前途如何，雖三歲小孩子，都不難豫測。在這種情形之下，還要迷戀什麼『法統』，藉口所謂『整理』以圖生存，不是至愚極蠢的人，便是甘爲走卒的人。真正革命的同志？應當立即打破『法統』與『整理』的迷夢。

其次，我們現在還應當打破希望上層領袖的迷夢。過去有些革命的青年，今天希望這個領袖來領導他，明天希望那個領袖來領導他，而不肯自己腳踏實地的做一番切實的工夫，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我們要知道：過去的所謂『革命領袖』，多半已變成反革命的領袖。要他們領導反革命是很好的，要他們領導革命實在可笑。他們已經到

極品。財逢鉅萬，左有嬌妻，右有美妾，還要領導革命做什麼？我們希望這些先生來領導革命，倒不如爽爽快快地跟着他們去反革命。我們不要以為他們過去曾經參加過革命，便以為他們現在還是在革命。以後還可以革命。事實告訴我們，他們早已背叛革命，從事反革命了。我們如果還要繼續革命，不但要離開他們，而且要準備消滅他們。我們絕對不應該盲目地無條件地崇拜任何領袖。領袖一旦背叛了革命，背叛了民眾，便成了我們底敵人。我們過去因為盲目地迷信領袖，所以才有這樣悲慘的失敗。我們以後如果還要繼續革命，第一必須站穩自己底革命立場，打破盲目崇拜領袖的迷夢。現在真正革命的同志，必須自己先有真正的認識。

(三)

從上面所說的種種情形看來，我們已經很可以明白：現在的國民黨，決不是用合法的手段所能改組得好，也不是站在所謂『法統』的圈子裏所能『整理』得好，更不是依賴某某領袖或某某有力者所能『組織』得好，『指導』得好。一切真正革命的同志，如果要復興中國革命運動，如果要恢復革命的國民黨，現在只有一個方法——即堅決地站在革命的立場上，承繼總理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以革命的手段

從根本上改組國民黨。

一切革命的同志，我們現在都應當根本覺悟：我們是為革命才來組織黨，我們是為革命才來加入黨；黨決不是目的，黨僅僅是革命底工具。我們從客觀上研究的結果，知道中國革命需要一個革命的國民黨。總理所組織的國民黨是革命的黨，所以我們才加入國民黨，為革命而奮鬥。可是現在的國民黨，已變成一個不革命的黨了，各級黨部差不多都被少數反動分子所把持，革命的黨員要革命幾有無從革起之慨。現在的國民黨，已經根本變了性質，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底宣言及決議案，已被反動分子摧毀無餘，總理底革命歷史與革命精神；已被軍閥官僚污辱不堪，所以張學良『小子』底易幟通電就公開地說『國府諸公反共清黨，與此間宗旨相同。』要想拿這樣的工具來完成中國革命，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當然是南轅而北轍，相離恐怕不止十萬八千里。我們如果不忠總理底革命精神，不忠廣大的痛苦民眾，還要繼續革命，自然只有恢復革命的國民黨，復興中國革命運動。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採用革命的手段，準備黨底根本改組，而且這種改組必須根據新的精神，築在新的基礎上，以適應新的革命需要。

現在黨內許多革命的同志，都處於革命的立場與黨的

立場交戰的矛盾之中。現在的黨，不但不能保障我們底革命立場，而且還要壓迫我們底革命立場，不許我們保持革命的立場。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犧牲革命的立場，屈服於現在的黨的立場，跟着少數軍閥官僚去反革命；另一條是死死地保持革命的立場，在保持革命的立場中從新去求得黨的立場——即恢復革命的國民黨以切合革命的立場。在這中間，斷沒有徘徊的餘地。

中國革命鬥爭的戰略和戰術

馬 澐

一 戰略戰術是什麼

未討論革命鬥爭的戰略和戰術以前，不能不釋明戰術是什麼。當此豪紳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積極高壓，使政治日趨反動黑暗的今日，革命民衆，如何貫徹革命目的，以推進革命，決不能沒有科學的指導，這種科學的指導即是革命民衆的戰略和戰術。

一般被壓迫的民衆，現在最迫切的，無如政治的解放；否則一切的革命行動，和個人自由，完全剝喪；所以他們的目的，在消極上是在於推翻反動政權，在積極上自己獲得政權。然而這兩方面是有互相的關係；因為只在於推

親愛的革命同志們！現在客觀的環境，需要我們立即答復這個嚴重的問題：我們還是繼續革命呢，還是從此反革命？如果大家還要繼續革命，那就應該堅決地站在革命的方面來，一致地參加目前的改組運動，從最下層做起，以下層羣衆底力量，準備根本改組國民黨，造成真正革命的國民黨！

一九二九，一，十四。

翻反動政權，而不能自己去掌握政權，其結果政權必落於第三者之手，未必有利於革命民衆。但是這個鬥爭的勝利，當不得不解決若干根本問題，尤其當國民革命職線破碎的今日，民衆雖在普遍的死亡的掙扎，却少團結一致的力，量，甚至有許多在沉悶，徘徊的歧途中，徬徨無所措手足。所以現在最要務的任務，無如在如何使革命運動，重新再建起來？有普遍的民衆運動，才有統一集中革命勢力的可能；革命勢力統一集中，然後才能使革命鬥爭，擴大深入，以至入於正軌。在此即橫有第二個問題，即是如何能使民衆運動，得以普遍？這當然不是主觀的玄想，所能實現

，而是要客觀上合於大多數人要求的條件。不過大多數人絕不是單純一個階級；因為客觀上中國的社會層，並沒有形成一個偉大的中心階級力量；所以不能不顧及各階級革命民衆個別的要求，同時又顧及其相互的要求。然而在客觀上雖中國社會層沒有形成一個絕對強有力的中心階級，但在各階級革命民衆間，絕不是沒有比較強大的力量；並且在革命過程中，只有以某種階級爲主體爲領導，才能使其革命的意義，變成某種性質，否則漫無歸趨。所以必先檢察什麼是革命的主力軍？及怎樣處理同盟軍？同時，在自己的對方，所包含的反動勢力，亦不是單純一個階級，在革命過程中，隨時有較接近自己利害的份子（或羣衆），必先考慮如何使彼等中立化？或無力化？始能在帶有永久性的中國革命，不斷的推進，而期最後的勝利。此外不但計較主觀的力量，並且要認明客觀的統治勢力是代表什麼階級？以革命鬥爭的發展，是否有屬於革命民衆——尤其是革命主力以外的可能性？這種危險，是否可以阻止以至消滅？或者至少僅在於過渡的現象，必要如何的努力？對於現在統治階級，除自己主觀的革命勢力以外，可以形成其他反對勢力？而自己的主觀力量可以領導否？什麼是領導的主觀力量？等等問題，得到科學的解答，推進鬥爭的

方向，即是戰略，亦即是鬥爭的戰略。

但是規定戰略的根本方針，不得不發生如何以貫徹其目的的具體化的方法問題。種種形勢的鬥爭及其組織，以得到一般戰略的成功，在這種複雜的過程中，應鬥爭的進展和變化等主觀和客觀的狀態及性質，以最適切有效的方法，即是戰術！所以戰略是與革命的性質相聯的，戰術是與革命的戰略相聯的。詳言之，戰略由革命的性質所決定鬥爭的意義，使革命鬥爭得到最後的勝利，而戰術則在適應革命過程各階段及各種形勢，使個個鬥爭，得到個個的勝利。所以戰略是革命行動整個方案，而戰術是革命行動的一部份或一階段的方法。戰術可以隨時變換，戰略則須互比較長的歲月。因此戰略和決定革命的勢力，及其預備勢力相關係。它是一個革命階段，轉換到他一階段的原素，同時須適應其性質而與俱變，並且繼續該個階段的全時間的不變領綱——甚至維持與實現。所以關於革命的階段是什麼？自己立場與實力之如何？以及如何使這一階段，轉換到另一階段？等等這是不能不有的客觀的科學的分析！

二 過去革命戰略之錯誤和教訓

中國數十餘年來的革命，關於戰略，可分做四個階段

：自同盟會至辛亥革命爲第一個階段；自辛亥革命至十三年改組爲第二個階段；自十三年改組至國共分裂爲第三個階段；自國共分裂至現在爲第四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雖以三民主義爲標榜；但行動的中心，只在救義的排滿；而排滿的意義，又復十分含糊，在某種意義上，乃是以漢族的下級封建勢力爲中心。排除滿族，作閉末義士忠烈的繼承。又以右派的妥協，使北洋軍閥得勢；所以結果雖換了共和民主的招牌，實際上仍爲封建勢力專制。第二個階段以中山先生爲領導，極力掃除代表封建勢力的北洋軍閥，以建立真正的民主國，恢復舊約法。這可以說是充分代表新興市民的要求。然而一方面以帝國主義的壓迫，使代表新興工商業的市民階級不能成熟，以致什麼約法國會，都得不到強有力的擁護，至於權力化；一方面又以這個階級係以投機的軍事勢力爲主體，勝則不過造成新的軍閥，敗則更不能得到下級民衆的同情。第三個階段，以應革命潮流之發展；使革命集團——中國國民黨——得到進步，組織和主義政綱，都加以新的特質，所以有年來革命勢力的進展。然改組之始，即包有一個矛盾現象，即是黨中有黨（共產黨）；同時對於民衆工作，國民黨既無長久的訓練和準備，共產黨復從而極力壟斷操縱之，務使國民黨、優若

空中樓閣，毫無實際基礎，所有國民黨中較革命的同志，非爲共產黨所吸收，即設法揭制其活動。而所謂較革命的領袖，不是作共產黨的傀儡，即難於立足；然在所謂首領的下面，除共產黨所引導的民衆外，全看不到自己的基礎；所以使每個國民黨的同志，都覺自危，予反動派以可乘之機。

並且由北伐出師，由防預的戰爭，而變爲進攻的戰爭，軍事的進展，超過黨的實力，使脆弱的革命力量，漸漸不能圍拱革命的中心——國民黨——；於是軍事支配黨的現象，漸漸顯露，而共產黨復爭奪革命的領導權，更成了動搖國民黨的導火線。因爲那時已是軍事突進，黨權旁落的當中，復益之以共產黨的分裂，使黨的根本更加動搖，一切以個人權力爲中心的反動行爲無法抑制。一般昏庸老朽，和向不得志於國民黨左傾（即改組以後國共未分裂以前）時代的份子（如西山會議派）倡爲『黨軍可愛，革命黨可殺』的論調使軍事勢力，愈出於黨的領導範圍，一切黨內外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的份子，只知憑藉軍事力量，形成各個只有個人而無黨的集團，紛紛割據，各自殺戮革命份子，摧殘民衆，假借清共除共之名，排除異己；於是黨的壽命，實際上等於完結，自此以後，純粹變做個

人利用工具。

而共產黨在過去國民黨容共時代，已是在民衆運動中，開始了無計劃不統一的鬥爭，固然使豪紳資產階級、閥閥戰慄；同時以戰略戰術之不確定，與黨員行動的幼稚，且使小市民與鄉村自耕農。發生恐怖和動搖，這已是予國民革命戰線以必然破裂的朕兆。更以分共以後，共產黨的政策，趨於極端，竭力製造形式上以工人和貧農爲主體，而實際上以流氓無產者爲中心的暴動以後，且標榜人不多懂的名詞——蘇維埃——以致不但反動的豪紳資產階級，更加反動，即帶有革命性的民衆——尤其是城市或鄉村的資產階級，亦不能同情。所以自共產黨的暴動政策實行以後，政治局面，益加險惡。國民黨固以反動勢力之利用，離開民衆，共產黨亦以戰略之錯誤，反促成反動勢力之成功所以演出這第四個階段混亂的局面。

固然在原則上，一個革命黨人，不能反對暴動；而且在革命民衆的革命勢力達到高度，革命情緒和要求臻於相當的時期，一切表現反抗精神的暴動行爲，自然爆發；況根本的說來，如果相信革命政權，不是用改良或妥協與和平等方法。以暨軍事設備，可以獲得；那末，除了革命民衆的暴動，可別沒有第二個方法。但是暴動（指革命階級

治暴動）的先決條件，須要看民衆的自然要求；而黨的暴動，尤其要看是否有成功——退一步說，要看是否有貫徹戰略目的的可能性。（所以必須有計劃有組織，有一定標準。）因爲暴動不同兒戲，乃是一切參加暴動的人，同統治勢力，及其他一切社會的人人，最後的肉搏，如果不能得到勝利——即獲得政權，則彼等個體，即遭到更惡劣的命運（如犧牲性命及逃亡等）；固然使這一些份子，更固定在亡命的途中；可是一切革命民衆，却以不斷的暴動失敗教訓中，相顧不前。況共產黨的目的，既專在於製造暴動（不自然的暴動），而其暴動的口號，復在於非普遍民衆要求的工農蘇維埃，純粹違背中國革命現階段的特殊性（以後還要說明）；因此，在共產黨暴動政策的本身，日趨強制而日消失其作用；一般革命小資產階級，煩悶無所歸，農工更受反動的待遇，使反動勢力之抬頭，至於不可向還。所以我們可以說過去的革命戰略，幾乎全盤錯誤，這固然在客觀上以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的經濟進化，失掉經常的軌道；使複雜的社會層，分化不顯明，形成各階級間相生相剋的特性，不能使革命告一段落（無論是民主革命，或社會革命），而世界革命的潮流，復加外來的壓迫，刺激煩悶的民衆心理，（因革命不易成功），陷於趨避實

際的左傾（如共產黨）使革命勢力，不能集中而入正軌。同時在主觀上，以民衆物質生活的落後，反映文化的幼稚，自然對革命現階段的認識，沒有科學的分析和考慮的餘地。所以關於革命戰略問題，非直接受意於外人，即茫然無所知，這種現象，實足危害革命前途，殊值吾人特別的注意！

二 革命現階段的認識革命鬥爭的特質

革命鬥爭戰略和戰術的決定，自然首先要認識革命現階段的特質；然而這個革命現階段的認識，最要亦無如對統治勢力的分析。因為革命鬥爭的主要對象，即是統治階級；如果沒有分析統治勢力的內容及其現狀，一切鬥爭，（尤其是政治鬥爭）即無從開始。現在的統治勢力是什麼？在形式上雖應各地的實際情形以不同，而在本質上，却沒有那個不知道是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特殊大資產階級的三角聯盟。這種三角關係，是怎樣構成呢？當然是其彼此間目前有共同的利害；例如，中國社會固有的封建勢力，和由資本主義發達到最後階段的國際帝國主義，其本質是相矛盾的（所以維新運動和同盟會運動未發生以前的滿清政府，極力反抗列強；）然而中國封建勢力，看到革命勢力的起來，動搖其根本，便不能不在經濟上（如財政）和政治

上，藉得外援，以鞏固其本身利益。同時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達到資本集中，以獨占代替競爭的時代；漸臻爲國家資本主義，由幾個大資本的組合，壟斷生產及政權，儼若王朝時代的帝王；其性質無異於封建專制之復活；並且以維持其本身資本過剩和消極再生產的利益，不得不在消極上壓迫殖民地資本主義（即新興工商業）的發展；和在積極上拉攏殖民地的統治階級，以得到一切政治上和經濟上（投資）的優越，自然中國的封建勢力，是她們最好的帮手。

至若中國的特殊大資產階級，在原則上，自和封建勢力相衝突；因爲封建勢力的基礎，是建築在舊有封建的地主農業經濟的廢墟，而大資產階級工商業的發達；必先剷除及破壞其經濟的根本和制度的束縛，轉換到新的民主主義的政治。且以受帝國主義侵略壓迫之故，不得不與先進資本主義國爭國內的市場；所以巨們和帝國主義亦是相衝突的。可是以中國特質大資產階級，客觀上受帝國主義壓迫，不易發展之故，本身力量，非常薄弱；加以下級民衆革命運動的恐怖，更不得不倚靠其他統治勢力的反動政權，以相壓迫。況特殊大資產階級的本身，如政商資本，原是封建勢力的化身，買辦階級，更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其

他一切大的工商業者，其原料機械既多輸自列強，商品亦多仰給於外國，所有銀行家，一方面須受外國大資本的轉制，一方面專供買賣外債的媒介；而大部份的證券，復多在於外人之手；所以他們實際上不過從外國資本榨取中國人的血汗過程中分得一部份，以為生存唯一條件而已！自然他們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沒有反抗的意識和決心。

在客觀上統治勢力的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中國特殊的大資產階級，其互相間未嘗沒有若干的衝突，但對革命勢力，可以利害一致；尤其是自革命失敗以後，經過了鬥爭的複雜化的過程，和主觀的戰略和戰術的錯誤，使一切反動勢力，優於共同利害之前，益加接近；而政治日加反動。不過反動政權的社會基礎，雖代表了鄉村地主階級，及城市特殊大資產階級，與夫帝國主義勢力的化合物；然而其維持政權的工具，仍係借重於封建的軍事勢力；所以一般軍事領袖，成了反動政治的中心。這自然是脆弱的資產階級，不能單獨攫取政權，鞏固政權，造成民主政治，而帝國主義亦以中國為半殖民地國家，沒有容得整個支配權；因此事實上只有封建社會遺留的特權階級——封建的軍事勢力——繼續着代替執行反動的使命。他們雖

然要避就特殊大資產階級的需要，表示若干的讓步；可是以其本身利害關係所決定，不得不極力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造成極反動的局面；結果，普遍民衆——尤其是工農對於他們的敵視和反抗，日晉高度。所以在此無黨，無法律，無輿論，無自由等極端個人專制黑暗腐敗政治之下，必有一個更深入更擴大的革命新運動發生。

這個革命運動的性質是什麼？以主觀對象的決定，無疑的是民權鬥爭。因為反動政治勢力，雖包含有帝國主義勢力做後援，與夫特殊大資產階級的參與；但是中心力量，還是封建勢力；所以民權鬥爭，恰是相對待的東西。一般人最大的錯誤以為民權鬥爭，是屬於過去的，現在已轉入到社會革命的階段；又有以為民權鬥爭是資產階級的，名詞已經很厭棄。不知道革命鬥爭，純由客觀條件的決定，不是由主觀的幻想。中國資本主義不成熟，物質上決沒有馬上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可能。農工力量，雖佔革命勢力的主要部份；但社會革命的主力，是靠單純無產階級的工人，而不是帶有小資產階級特性的農民。自然如果無產階級力量偉大，未嘗不能引導貧苦農民向社會革命的道路；但是以集中於少數都市的一二百萬無產階級，在質量上，和數量上怎樣能夠在幾重勢力壓迫下的中國，形成一個

偉大革命勢力的中心。況且革命鬥爭的發生和進展，其先決條件，是獲得大多數民衆的參與和同情；若革命行動的性質，已超過一般民衆——甚至相反——的切近需要；那末，雖在主觀上如何的努力，亦是徒然。

固然我們所謂民權鬥爭，不是放棄了最大的敵人——帝國主義，亦不是夢想以資產階級爲中心，來建設什麼資本主義的國家。因爲殘餘的封建勢力，不倚賴帝國主義的力量，便根本無法維持統治（所以軍閥政府，最要緊的是要得到外國的承認；）同時中國資產階級亦沒有力量來領導中國革命；並且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崩潰的末日，中國亦根本不能單獨走上資本主義的路，所以無疑的中國民權鬥爭過程中，隨時不應——且事實不能忘了帝國主義；況以下級民衆——包工農及小市民與遊民無產者等——爲中心，及不能脫離反國際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戰線之故，必然走到非資本主義的階段。

然而我們明知道中國革命前途，是要歸結到非資本主義，爲什麼還要標榜——或者說爭持帶資本主義性的民權革命？這便益現革命階段主要的中心問題。事實上反動勢力的中心是與封建勢力，和無產階級不能脫上社會革命，已無疑義；我們贊成中國革命，是鬥爭的兩階級——無產階

級和資產階級——以俱倒？還是贊成革命鬥爭的延長？如果是贊成中國革命鬥爭的中斷；那末，中國的無產階級，只有坐待世界革命的成功，暫時讓一讓統治勢力的專橫；否則最要緊的責任，還是怎樣推進革命。若要推進革命，一切擴大革命戰線和集中革命勢力是必要的；那末，一切穩定後備軍，建立同盟軍，以及使較接近而又較相反的階級的中立化，是必要的，自然只有民權鬥爭，才有可能。這個民權鬥爭，切不要以爲是對普通資產階級的讓步，而是目前結合一般革命小市民與農民的必要戰略。因爲他們客觀上不但沒有社會革命的要求，且在無產階級力量還幼稚時代，但們社會革命的情緒，決沒有方法表現出來，老實說，只夠得上民權革命。等到民權鬥爭的戰線形成以後，表現革命勢力最偉大的，自然只有工農，而工農亦只有在民權鬥爭過程中，漸漸促進自己團結和鬥爭的力量，不期然而然，成了革命鬥爭的中心，以至於直接獲得政權，開始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的建設。所以民權鬥爭是現在革命的推進機，亦是社會革命的起點，其前途歸結到工農革命政權，並不是很奇怪，而是很必然的事。（未完）

世界革命的預測與中國革命的將來

黃惠平

國際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煽動了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大戰的結果，不論在戰勝國戰敗國方面，經濟秩序的破壞，幣制的紊亂，生產力的銳減，人民購買力的薄弱，幾為一般的現象；於是資本主義國家國內的階級鬥爭，日趨尖銳，勞動階級以罷工為武器，資本家以封鎖工廠為工具，相互鬥爭，各走極端。在戰敗國方面，更因為軍隊的解體，統治階級權威的失墜；武裝暴動的事實，時有所聞。至于國際間的關係，大規模的武力鬥爭，雖然因為大戰以後瘡痍未復人民厭倦戰爭，統治階級的政治家，不得不高唱和平而得以暫時告一結束；但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鬥爭，比較大戰以前，更為深刻，更加厲害，高度的保護關稅經濟的封鎖（Blockade）與當平（Dumping）的政策，就是國際資本主義在崩潰的過程中努力掙扎的武器，藉以恢復其平衡的狀態鎮壓世界革命運動的進行之手段。根據這個說明，我們可以知道這次的世界大戰，會給與資本主義在歷史罕有的打擊。在事實上大戰以後，歐西各國民衆運動的勃興與革命勢力的彌漫，全世界的現象，

都是各有其客觀的背景。而大戰停後十年的今日資本主義的暫時穩定，國際政治的普遍反動，世界革命勢力的銷沈，與殖民地獨立運動的失敗，亦必有其客觀的原因。我們為預測世界革命的前途與中國革命的將來，對於這些事實與其前因後果不可不求一個明確的認識，然後才可以根據這個認識判斷過去的現象，觀察世界革命的前途與中國革命之將來。

1. 世界革命的過去之追溯

「世界革命」應當作怎樣的解釋？這個問題就是在社會主義的營壘裏面亦有兩種不同的見解。一種見解以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考茨基為代表，把世界革命認為是社會主義的理想。同時普遍於無產階級的羣衆中間，以階級鬥爭的策略，使社會主義形成一種世界的力量，時常支配一切國家的生活。另一種見解以鮑爾塞維克為代表，把世界革命認為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在最近期內奪取政權的爭鬥，建設蘇維埃的政體，剝奪一切非共產黨黨員的份子的政權，煽動全世界各國的內亂，建設共產黨的獨裁。這兩種解釋

，在理論上究竟那一種解釋是比較合理些，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暫且不談。但在歷史的意義來說，以後一種解釋為出發點的世界革命，企圖，確然會給與全世界無產階級以許多新的希望與新的勇氣，做了許多影響大多數人類實際生活的猛烈鬥爭，對於殖民地的獨立運動確會給與許多新的刺激與精神上的鼓舞，即就對於中國革命的影響的來說，因為世界革命運動的中心蘇維埃俄羅斯國在地理上與中國比鄰的關係，與其第二國際——德國社會民主黨與英國工黨為其中堅——對於殖民地獨立運動口惠而實不至的態度，亦以後一種的世界革命企圖發生較大的影響，所以此處所指的世界革命的過去之追溯，當然是指各國的無產階級，在最近期內以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鬥爭。在帝國主義戰爭的末期，與大戰以後幾年當中世界革命運動的進展。在人類的歷史上雖不能謂為絕後，但可認為空前一九一七年的三月，俄國專制政府，土崩瓦解，都市勞動階級與農村農民到處騷動，一九一七年的五月，繼之以英國的大罷工，其來勢之兇猛有如狂風暴雨，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幾為之搖撼，資本階級皆為之戰慄。同年十月俄國鮑爾塞維克又推翻了克倫斯基政府，建設蘇維埃政權，與德國停戰媾和。協約國方面，驚皇失措，派兵鎮壓，勞師無

功。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北歐兩大帝國德意志與奧匈聯合國，相繼瓦解，政權落於社會民主黨之手，而罷工運動，在西歐各國則到處爆發，漫延甚廣。二九一九年三月匈牙利共產黨暴動成立，宣佈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貴族資本家悉被驅逐出境。在德國方面，一九一九的二月革命運動與三月鬥爭，一九二〇年三月的開布暴動，(Kapp Putsch)更使革命的空氣佈滿全歐，舉世為之震驚。意大利的勞動階級，則實行佔據工廠，沒收資本家的財產，四處罷工威嚇政府。一九二〇年的十二月，捷克的無產階級厲行武裝暴動。一九二一年的三月，英國礦工開始大規模的罷工運動。從上面所舉的這些事實看來，我們可以立即發現革命運動的發展，不論在戰勝國或戰敗國方面，都有同一的趨勢，就是許多中立國家也難免被其波及。再就各殖民地的獨立運動與半殖民地的革命的運動來看，東方民族的覺醒與民族自決的要求，已成為這時代的不可抵抗的潮流。土耳其以一個戰敗的國家崛起，安哥拉戰勝希臘，屹然獨立於西歐帝國主義包圍之中，同教民族因而奮起爭欲脫離帝國主義的羈絆。其他如埃及的獨立運動，印度的自治要求，敘利亞摩洛哥的反抗，中國國民運動的發展，皆足以促進國際資本主義的崩潰與世界革命的成功；但是

結果怎樣？這個強大的革命勢力不但沒有毀滅世界資本主義，而且無力擊破歐洲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支配勢力，對於殖民地的經濟剝削，不但沒有減弱，而且更加鞏固了，這究竟是什麼道理？據我看來，有下面幾個的重要原因：

(一)蘇俄向華沙攻勢的失敗 俄羅斯共產黨自奪取政權以後，即積極進行世界革命的企圖，一方面以巨金接濟西歐各國的共產黨與社會黨左翼，指使其作大規模的武裝暴動，推翻資本階級的政府，一方面以武力向波蘭首都華沙進攻，冀圖打通俄德聯絡的孔道，積極為德國的共產黨聲援。如果這個計劃得以成功，依當時的國際關係與德國情形來看，德國共產黨或有奪取政權的可能，奧匈諸國亦必因德國共產黨之勝利而被捲入漩渦。法國在大陸方面的霸權勢必為之墜落，這是可以斷言的。法國早已窺破這點，於是另一方面以軍械巨款接濟波蘭擊退俄國赤軍，一方面唆使羅馬尼亞波蘭捷克與波蘭訂結攻守同盟，此卽世之所語小協約防止俄國勢力的西進；於是俄國西進的計劃，遭受挫折；進攻華沙的企圖，功敗垂成。而西歐各國的革命勢力，以蘇俄華沙攻勢之失敗，亦不得不由攻勢轉為守勢；由高漲而衰退了。

(二)西歐各國的經濟復興 凡是留心過國際經濟的人，一定會知道西歐各國在戰後的頭兩年當中，經濟狀況非常進步。由前線上回來的兵士，不但沒有失業的恐慌，而且盡數容納到了工廠裏去。勞動階級的收入，雖然不能和物價的騰貴有同程度的增加，但是勞動階級的生活狀況，較之一般靠利息維持生活的中產階級因為紙幣價值跌落的關係日趨沒落的命運還要勝過一籌。我們知道大凡一個革命運動的發生，必有其客觀的經濟背景，必須大多數人在現存的社會制度之下根本沒有保障其經濟生活安全的希望，才達到成熟的境地。（這自然是指經濟革命不是指狹義的政治革命）西歐各國在戰後的經濟復興，自然是革命高潮退落的重要原因。但是怎樣會發生這種現象？這裏有兩個客觀的原因應當補行說明的：(一)因為國際匯率變動的關係，中立國與殖民地的購買力增大，國際市場因而擴展。(二)高度保護關稅的實施與當平 Dumping 政策的採用。

(三)社會黨的內鬨與勞動階級統一陣綫的分化 西歐的社會黨，猶其是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與英國的工黨有過長期的鬥爭經驗，擁有堅強的組織，可以說是全世界無產政黨的模範。他們有幾十萬或百多萬的正式黨員，他們

有密佈全國包括全國勞動階級十分之七八的人數的勞動組合做他們的後盾，不論我們在客觀上怎樣罵他們是馬克思主義的叛徒，背叛勞動階級的利益；在主觀上怎樣恨他們代表貴族工人階級，投降資本家階級，做反革命的勾當；但是我們可以武斷點說，西歐各國的革命，如果沒有他們積極的參加一致的合作絕無成功的希望。但是事實告訴我們怎樣呢？社會黨對共產黨的鬥爭，比較對資本階級的政黨還要加倍劇烈。共產黨對社會黨的攻擊，比較對付資本階級的政黨的攻勢在某種意義上或許更加兇猛。勞動階級的各個分子，因為各人所隸屬的黨派不同，互相仇視的程度，或許比較仇恨其他階級的心理猶其深刻。於是資本階級的政黨遂得操縱其間施用各個擊破的策略，鎮壓國內的革命運動。最顯明的例證就是德國一九一八年的革命與一九一九年的開布暴動。因為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的互鬥，遂使德國的革命運動一蹶而不可復振，資本階級的政黨於是得以從容集中其力量，左右德國的政治。世界革命的企圖，因此而受一極大的打擊。

2. 國際資本主義穩定局面下的反動政治

在一個中墜的革命運動之後，必有一度反動政治的出現，這個歷史的因果律，證之于已往的革命史，實與今日

中國革命的經驗真是絲毫不爽。這是不是像我們中國人所慣說的「天理循環，物極必反」？我以為目前國際政治的反動，乃是國際資本主義穩定與革命運動中墜的必然的結果。至於國際資本主義是否穩定？這個問題現在最流行的有兩種相反的觀察：一種以為國際資本主義暫時是穩定了的；一種認定國際資本主義正在崩潰。我是堅持前種見解的人，不過在這裏須說明的我並不是否認國際資本主義含有許多內在的矛盾與衝突，更不是說國際資本主義有長久穩定的可能。此地所謂暫時的時間性，不過說明一種目前的事實，國際資本主義已恢復了平衡的狀態與一般的領勢而已。為什麼我們說國際資本主義是穩定了？現在不必拿統計上的數目字來作證明，祇要舉出幾個主要的象徵作為證據。(一)道威斯(Dawson)計劃實現之後，德國幣制的穩定英國金本位制的恢復，法國佛郎匯價的變動極小。(二)造船事業的復興，(三)煤鐵產額的增加，肯定這些事實之後，我們現在進一步來觀察伴國際資本主義穩定的國際政治局面怎樣？就德國來說，右黨的政治基礎日漸鞏固，一九二四年的選舉，右黨聯合大獲勝利，與登堡當選為德國大總統，內閣雖然經過幾度的改組，中央黨的馬克斯與國民黨的司特曼(Strohm)總是穩穩當當的坐在總長的交椅

上面，資本家階級的殖民地恢復運動，更有如火如荼之勢。其次就英法兩國來說，社會黨內閣赫里歐的毋台，右黨領袖普實恩得金融資本家之援助，重行出現于法國的政治舞台，於是法國政治的右傾，已成爲確切不移的事實。至于英國保守黨鮑爾特溫內閣的成立，自由黨路易喬治派與愛士麥斯派的分裂，自由黨勢力的瓦解，不單是英國資本主義穩定的要求，也是大托萊斯與嘉特爾的要求。現在我們再談到意大利罷。意大利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前後三四年間社會黨遙超雲湧，資本階級爲之岌岌不可終日。一九二二年八月法西斯領袖墨索利尼暗中得全國實業家的資助與退任軍官的擁護，大舉向羅馬進攻，(March nach Rom)推翻蒂羅特內閣，自爲狄克推多。其他如日本財閥內閣之成立，蘇俄幹部政策之右傾，西班牙之專制統治，匈牙利王室之復辟，在在都表現國際資本主義穩定局面之下國際政治局面的普遍反動。這裏要說明的是什麼？就是要說明世界革命運動在這個國際資本主義穩定當中的政治局面之下不得不消沈下去的事。但是問題的焦點不在乎國際資本主義是否暫時穩定，問題的中心是要討論國際資本主義是否有永久穩定的可能，世界革命是否遲早有實現的一天。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站在肯定的方面

；因爲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與經濟組織，因其內在的矛盾束縛人類生產力的發展，已被歷史的進化律判決了死刑，遲早地必有崩潰的一天。否則，全人類的文明，祇有趨于毀滅之一途。理論如此，事實怎樣。

3.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醞釀與世界革命的趨勢

在大戰以後，國際資本主義雖然因爲上面所說的幾種客觀原因暫時可以穩定，但是各國資本主義一步一步的發達，必然地會引起國際間的競爭，爭奪投資的地帶消納其過剩的資本，乃是毫無疑義的。誠然不錯！工業資本時代的帝國主義，比較商業資本主義時代的帝國主義論其侵略的性質要和平得多。財政資本主義時代的帝國主義，更要和平一些。但在事實上恰得其反，因爲在商業資本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的時代，全世界殖民地的分割，尙沒有完結，後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還可以設法分管一壘，不妨礙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既得權利。彼此之間，在一定的程度之內，可以相安一時。到了現在財政資本主義的時期，殖民地的分割，已經告了終結；而且財政資本反面的排他性，獨佔性；正面的侵略性，進攻性，格外強烈。倘若列強各國仍照舊日扶植勢力于國外的政策，也許即將在十年之

內引起第二次的世界大戰。我們不是預言家，當然不能斷定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定會在什麼時候發生。但就國際資本主義內部的衝突與目前表現于國際關係的事實判斷起來，我們可以說這個推測是大致不差的。然而目前表現于國際關係的事實是什麼？（一）英美海上霸權之競爭，暗中競造戰艦擴充軍備，英法海軍協定之訂結，即英國聯法制美的企圖，故美國極力反對倡導非戰條約以為抵制。（二）日美太平洋霸權之競爭，雙方均厲兵秣馬，躍躍欲試，不過因為準備不充沒有一方敢于首先發難罷了。（三）意地地中海霸權之爭奪，實以南斯拉夫與意大利的爭鬥為其關鍵，慕沙里尼答公開的宣言：「危險時期」當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五年之間。但是此兩國的衝突，必將影響及于全歐或全世界，是決不能以當地為限的。根據上面這些說明，我們可以肯定點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醞釀發動的時期，也許在十年以內。那末，世界革命的趨勢怎樣？關於這個問題，有一些人相信國際資本主義的崩潰與世界革命之實現，有如黃河之堤潰。全世界的勞動階級會相約在某一瞬間共同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的政府，建設範圍包括全世界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邦，這真是可怕的烏托邦的幻想。我以為世界革命的實現，必須經過一個很長期的社會進化歷

程，因為全世界各個民族，各有其特殊的歷史環境，資本主義發達的階段，各有先後的的不同。無產階級的組織能力與政治意識，必有許多程度上的差別，而資本家的抵抗力，亦必有強弱的區分；因此各國革命運動的發生，必然地會表現各種不同的形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必然地會有戰敗國與戰勝國兩方面，而急劇的革命運動，又必然地會在具備下面兩個條件的戰敗國家湧現出來。（一）資本主義抵抗力薄弱的國家（二）統治階級組織脆弱的國家。人類已往的歷史，可以給吾人以充分的證明。例如民主的政治形態，在英法兩國已有兩百年來的歷史；而資本主義發展最早的英國與大戰前為資本主義國家典型的日本，還是保留君主政體的政治形態。從大體上說來，自從法國大革命以後，民主的政治形態，已成為全世界各國政治組織的主要形態；君主政治形態的意義，已退居于不重要之地位罷了。所以我相信將來革命的趨勢，社會主義的建設，亦將循此歷史的規律而進行，決不是像一班抱着機械的見解的人所夢想的那樣地單純那樣地直挺。

4. 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句口號幾年以來我們到處可以聽到。但是這句口號內含的意義與其性質，

除了極少數革命同志曾經加以考慮之外，我恐怕大多數同志是沒有加以思索的。我以為「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這句口號的意義，並非以第三國際世界革命的企圖為其出發點，而僅是說明中國革命的特殊性質與其世界的意義因為中國是國際資本主義生命之賴所依賴的市場及寶庫，在一方面國際資本主義為了他自身的發展與膨脹，不得不對於封建的中國實行他們所謂「文化的注射」，強迫輸入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於是引起了全中國民衆的覺醒，誘起了中國的革命運動向國際資本主義進攻，促進國際資本主義的崩潰，要求民族的獨立。在另一方面，中國革命，並非單純的帶有民族革命之性質；因為中國的內部，更含着新興工商資本家及勞動者，農民對封建勢力的反抗，顯然含有社會革命的性質，促進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實現。在這兩點上，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當然毫無問題。現在我們要討論的第一就是要問中國革命是否必須在整個的國際資本的崩潰以後才有成功的可能，第二就是要問中國革命的成功是否可以促進世界革命運動的發展。關於第一個問題，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以為中國革命的成功，不必一定在整個的國際資本主義崩潰以後才能實現。俄國革命的成功與其現在政治經濟的穩定就可證明這個

答案的正確。關於第二個問題，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以為中國問題是支配世界運命的問題，大概只有到中國四億的民衆與全世界的被壓迫的民族都同時奮起斬斷亂國主義的鐵鏈的時候，世界革命才可以實現，全人類才可以攜手前進共唱自由快樂之歌。

5. 中國革命的將來

中國革命過去的失敗，基于兩種客觀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國際資本主義的穩定，一方面由于封建勢力的復興與新興資產階級的反動。這兩種因素，表現于政治上，則為政治的腐蝕，官僚政治的復活；表現于黨務上，則為壓抑黨內民主運動，以黨部為少數人操縱政權的工具。這些事實已經先後經許多革命同志的指明，犯不着重複的再說一遍。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就是中國革命的將來。我們以為中國革命的將來，在主觀上有兩條路可走，在客觀上祇有一條路可通。那兩條路可走：一條路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建設，把歐美百年來的一切喜劇悲劇重新在中國演過一回。一條路就是民生主義的社會建設，像總理孫先生所說的迎頭趕上前去，樹立起一個衣食住行人均等滿足的新社會來。但在客觀上怎樣？我們認為祇有一條路可通，這就是民生主義的路。為什麼？這裏又有兩個客觀的原因（一）資本

主義的建設必須有一個堅強的資產階級有一定的政治要求與政治態度能夠領導中國的民衆運動，打倒外來的資本主義，剷除封建的社會基礎。但是事實告訴我們：中國的資產階級，不但沒有參加反帝國主義的勇氣，而且因為懼怕革命運動的深入，反而倒在封建階級的懷裏與封建階級結成鞏固的反革命同盟了。(一)農工小市民的解放運動，必然的要促成代表其利益的革命黨取得政權。我們知道資本

黨治與專制

到現在我們還不得不討論什麼是黨治，這是多麼奇怪而不幸的事啊！「革命成功」了。「全國統一」了。「訓政開始」了。「黨治」自然不成問題了。你看，經過一而再，再而三的謔價後，張學良也已經把五色旗收起在箱子裏，搖身一變，在關外山寨上威風抖抖的扯起一面青白旗來。四川的大小將軍互相火併到蓬蓬烈烈的時候，各自向南京請命下令討伐對方的人，表示各各爲了黨國才「忍無可忍」的意思。民衆相信三民主義，舉行反日游行，黨國要人却怕帝國主義見怪，以致外交不好辦，所以對民衆加以「訓練」，使他們恍然大悟，「悔過」而散。於是開會議恭讀總

主義的經濟組織是與農工小市民的經濟利益處在相反的地位，天下決沒有一個階級會運用自己的政權建設一個與本身利益相反的經濟制度。根據上面這兩種理由，我們可以斷定中國革命的將來。從消極方面說，必然的會走非資本主義的路；從積極方面說，必然的會走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的路。否則，祇有亡國滅種之一途。古代文明國家巴比崙的命運即是我們的命運。

程希孟

理遺囑時唸到「喚起民衆……廢除不平等條約……」豈不更覺得心領神會有一唱三嘆之妙！說到黨的方面，只要聽聽戴季陶先生痛哭流涕的訓話就知道一切了。登記又登記，弄到今日還是我攻你，你罵他，糾紛不清。派出去的黨務指導委員，爭的爭個不休，趕的趕跑了，拘捕的拘捕，甚至弄得堂堂黨部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政治哩，據南京整飭官方令，是「政以賄成，……人心遠怨……」比民間「軍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諺語，說得還更懇切些。最近正當總司令總指揮們濟濟一堂，會議編遣的時候，居然在首都之下，城門之外，車站之上，讓攜帶槍炮的匪類，有計畫有

步驟地從從容容劫去了整軍的財物和公款。你若說不是黨治吧，明明白白大家是開口黨，閉口黨。在那裏致詞訓，打電報。你若說是黨治吧，明明白白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以至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規劃的黨治裏面，又確實沒有那般「治」法。可憐的民衆，別的也沒有什麼，只覺得這里共黨猖獗，那兒土匪橫行，言論自由沒有還不去說，公債和稅賦的負擔，却一天天壓到頭下來，所以今日來談黨治，確實使人覺得有點奇怪和不幸。

什麼是黨治？照本黨的主張，依革命進展的階段，分以黨救國以黨建國以黨治國三個步驟或方面，其實在各個步驟中都包含有一個共同的中心原則，這個中心原則即是黨權高於一切——黨治。在黨治下，不獨軍事和政治完全受黨權的支配，而且一切革命的建設都以黨為最高領導機關。這時，反動勢力固須根本掃除，反對黨固然不許其存在，即不革命的黨或人也不能讓他們積極參預政治，所以黨治在政制上就是一黨專政。不過黨治的用意並不在一黨專制。至少革命的黨治應該是黨政而不是黨制。普通所謂黨制是指無條件無限制的專政，黨治却不是這樣。第一，黨治是黨義的治，不單是黨人的治，一個黨行使政權時，自然不能不假手於黨員，而且，為貫徹主義計，應該以用

黨員為原則。不過一切黨員及領袖都受所共信的主義和公決的政綱之支配。違反這個原則，那便不算黨治，其次，革命的黨治定必以民衆為基礎，因為革命的本身必須以民衆為基礎。離開了民衆的黨治當然免不了成為少數人的專制，至於個人獨裁。人總具了人類的弱點。政權是世上最毒不過的東西，主政的人在事實上既然往往是少數，如果沒有民衆做監督，不怕你黨義——主張——多麼好，領袖如何信誓旦旦，不知不覺會由腐化而至於專制。

黨治既然是如此危險的政制，我們何以定要主張採用黨治呢！這完全為領導革命，完成革命計，以中國情形看，在客觀上，黨治確是革命過程中所不可不取的政治方式。總理那樣主張民權的革命先導所昭示我們必經的道路之一也，即是黨治。不用說，革命有破壞和建設兩方面。破壞方面是打倒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下的一切反動份子，要掃除反動勢力，抵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牠勾結軍閥的陰謀非制止反對黨活動並將政權集中於革命的黨治下不成的。再從積極方面講，民衆在解放之初，既無組織能力若又乏政治訓練，必不能即刻負建設的重任。所以本黨定訓政時為施行憲政之準備，在訓政期中，革命的黨治可以領導民衆養成自治習慣確定經濟政治上革命的建設。所以黨治最適應

革命的需要，施行黨治唯一的大理由即是革命。離開革命，用不着什麼黨治也不會形成黨治，只會流於專制，因此我們不要受歐美資本制度下虛偽民主政治的欺騙而反對黨治，也不要受唯心論者的影響，爲黨治而主張黨治。腐化份子常常會利用黨治來破壞革命；反動勢力尤其會盜竊黨治來斷送革命，我們只有從革命的進展上來判斷黨治是否實現。

革命的黨治在中國革命過程中還有一種特別的意義和效用，值得我們注意的。中國幾千年來都在封建式政治中循環，表面上有一治一亂之分別有賢主暴君的不同，實際上平民永久是被壓迫着。這種封建式政治的特質即是以剝削經濟爲背景，強權爲基礎以壓迫爲政策的人的政治。沒有「政」也沒有「法」，只有統治階級的威權——專制。所謂禮教，都不過直接間接養成，維持，助長政治壓迫的工具。因爲土域的遼闊，生產的落後，經濟的單位長期的以家庭或宗族爲基礎，家族的地位便成了人人行動思想的定限，而超越社會對個人關係之上。人民既無擴充組織的訓練，少數強者富者因而利用壓迫。同時家長爲主的制度反映到政治上成爲君主或英雄的專制，多半時候成形成制據的封建專制，一般士大夫階級在經濟居於剝削民衆的地位，自

然附和壓迫者的專制。即使有少數反對專制的知識份子，因爲自身不是生產勞動者受不着真壓迫，便流於無政府式的一派，藉以鳴高，更加減少民衆要求政權實行革命的機會。等到生產物品實在不夠供給的時候，饑荒和暴政迫着民衆逃荒或成土匪。土匪中出來一些英雄好漢互相火併，等打跑富朝的一天子，吞併別的土匪頭子，人口死亡過多，生產物品因天時地方的關係恢復原狀，足以供給大家需要時，民衆又悄悄回到田間，做順民，於是這一朝天子又成了統治者，各種剝削份子投機的士大夫又來歌功頌德在歷史上造出無限的謠言來欺騙人民。其實一個又一個的循環下去政治永遠成爲強權的私人政治——封建政治。中國現代的軍閥，及一切士勞士大夫通通是數千年來一脈相承正統相傳的產物。一直等海禁開後，資本制度勢力侵入，農村經濟破產，民衆反抗壓迫的運動才取了革命的方式。中國國民黨依着 總理的領導而起來負擔這個革命使命，對外是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是要剷除封建勢力和附屬於他的各種反動壓迫份子，掃除他們專制的政治，割據的政治，以強權做基礎的私人政治，自然做這種封建式政治的根據之經濟背景，已經由動搖而崩潰了。老式農村經濟，爲得資本式工業的發展，交通的改良，生產方式和須要的變

更，已經不得不崩潰，封建政治所恃為割據專制的根基，早已不能挽回了。他們還要作日暮途窮的最後掙扎，至多也不過成一個回光返照而已。

所以我們趕快實行民生主義。即是替封建勢力送葬，但我現在是討論政治方面，黨治如何是打倒封建式人治政治之工具，只好專講這一點。人治的對稱是法治——憲政，黨治是革命過程中引中國政治入憲政軌道的唯一可靠方法。固然在歐美各國所謂民主政治，所謂法治，因為資本主義的猖獗，無形中包庇資產階級的專政，所以總理便指出牠的虛偽。但畢竟歐洲各國農村經濟破壞較早，封建勢力推翻較早，從中產階級勝利中一般人民所得消極的保障，如身體的安全和言論的自由，比中國總要好一些。中國在數千年來人的專制下，連身體的自由法律上也沒有保障。並且法制腐敗，殘酷無比。平心而論，我國民衆還和中古時代歐洲人民一樣，根本就沒有「法」治。所有的壓迫，正是混治，虐治，暴治，蠻治下的壓迫。去年美國資本勢力枉殺了沙可，溫色第兩人的前後，差不多世界各國民衆都對美國表示抗議，美國人中比較明白的進步份子也會大大反對過。再看中國，殺人如麻，誰也不怪；並且種種非刑殘殺不僅共產和土匪施用，在割據局面下，據報紙所

載，也是司空見慣。歐美法治固然虛偽，但究竟還有一點制度的形式，和一些基本的觀念。中國呢，差不多一點法的觀念也沒有！

上節所述好像專指司法而言，其實司法不過法治中之一端。壓迫民衆數千年的封建政治現在還借着各種反動勢力大有死灰復燃之勢。這種政治即是強權的人的政治；一切政治的施行骨子裏都以當權的和人的利害，恩怨和愛憎為轉移，民衆沒有實力，無從過問，只好忍受壓迫。這種專制——割據的專制最好也不過形成英雄主義或賢人主義的政治，可以敷衍民衆一下，欺騙民衆幾天，但結果總跳不出那個惡劣的循環。所以本黨黨治的功用，即在領導民衆，貫徹革命，除了在經濟上根本謀平等以外，還要以為黨（組織）的意志代替私人意志，以黨的政治代替人的政治，以為黨的革命力量訓練民衆使用民權漸漸引上法治之路。這的確是打破軍閥或政制的唯一可靠方法。

自然，這樣一種以民衆為基礎而領導革命的黨治，在努力求經濟平等政治平等和民族平等的時候，自身必定要很健全。換言之，這個實行黨治的黨非自身健全不可。確實的黨治的施行先要從黨內部治起，如果黨自己還治不好，便要以黨治完成革命，那不獨是滑稽而且是夢想。

要黨的健全，第一要在黨內以黨治代替人治。這就是說，黨義高於一切，黨權過於全黨，黨員與領袖在主義和政綱下彼此都是平等而互助的同志。一切黨務的進行應該以黨義為最高原則，一切黨政的決定應該以全體黨員意志為標準。領袖只是代表。代表不得利用地位以黨為私人的工具；黨員尤其應該認定主義，監督領袖，不可移擁護黨義的精力來盡忠於私人。誰都知道，本黨過去許多不幸的事，大半起於少數領袖利用地位及黨員的弱點，而不少的黨員又混領袖的主義與領袖的個人為一談，於是打倒這個，擁護那個，弄來弄去，多半在人的問題上起糾紛。今後我們應該以革命為立場，黨義為標準，然所擁護或反對的不是領袖而是主義。這樣才是使黨脫離封建勢力而到黨治的出路。

當然，要達到這個目的，須賴黨的紀律，黨紀的嚴正和公平都要平時在組織和訓練中實現。一個革命黨健全與否固然不全靠組織和訓練，但這兩件事影響黨的健全非常大。我們討論到黨治時，有一點須特別注意的，即民主集權制的運用。一個革命黨最怕腐化，又最怕不強固。要防止腐化或反動，集中革命的力量，保證革命的成功，唯有採用民主集權制，使統一之中有民主的精神，穩定之中有

不斷的前進。

但是黨治的實現，甚至於革命的成功，最後還靠黨的成份上的革命力量，前途已經表明過，只有革命才有採用黨治制的理由，才有施行黨治的需要和可能。所以革命力量愈充足，黨治愈容易。但怎樣充實革命的力量呢？簡單說，革命的黨如果要充實革命勢力，實行黨治，要不斷的吸收革命份子到黨裏來，同時不斷的排棄不革命假革命的分於黨外。自然這種吸收和排棄決不能以私人感情或利害做標準，應該以革命的前途和黨的主義來決定。尤其在現在的中國，革命成了風行的口號，在名義上誰都要爭說是革命分子，實際上投機的一切封建餘孽，既容易混進黨來，政權的滋味又使假革命的政客和多數不直接從事生產的人原形畢露，作威作福，自私自利斷送了黨治。我們眼看見黨的中墮，愈佩服總理不斷的改組他自己手造的革命黨，那一種偉大而堅決的革命精神。他那樣百折不撓的前進，一路的吸收革命分子集中革命力量實在是本黨所以得到今日的一個大原因。雖然容共政策在本黨死後，釀成絕大的危險，但我相信他如果不死，一定會努力領導民衆——被壓迫的民衆來擁護本黨，一切跨黨分子都無從施展其破壞技倆，那有共產黨搗亂的機會？勞苦民衆本來是最

須要革命最擁護革命的人。現在爲「防止共產黨」對於被壓迫民衆沒有一點積極的領導方針，革命力量何從吸收到黨裏來？據南京市黨部和浙江省黨部登記的結果做例，本黨的黨員中農工成分不到百分之二三。別處登記的趨勢也只見民衆的成分逐漸減少。「反共」和「清黨」，難道是要趕農工分子於徘徊歧路上去麼？在另一方面，反動和投機分子先做了官再加入黨來！這樣吸收不革命的力量排棄革命力量，和十三年來改組的原則整個相反，長此下去，真不知把這個黨領導到那裏去！忠於革命，擁護黨義的同志不要讓這個重要事實被許多表面上的問題掩過去啊！

上述只是從理論上將黨治的性質和條件略略加以討論。現在我們應該從實際上將黨治分析一下，因爲黨治最容易被誤認爲專制，也最容易被盜用而流於專制，所以不妨將黨治和專制各方面比較來看，便知道如何才能算黨治。

(一)在目的上黨治與專制比較。黨治，革命的黨治，是爲黨的主義和政綱而治，不是爲黨的統治地位而治，更不是爲領袖私人的權位而治。在革命成功時候政權即須奉還人民，在革命過程中，革命民衆在黨義的範圍內，也可以行使「革命民權」專制就大不同了。無論他是階級的，主權的，貴族的，軍閥的，財閥的，或個人獨裁的，專制

之主要目的總不外乎要維持增高主政者的統治地位，延長壓迫，以達所謂「萬世之業」的夢。

(二)在政權運用的方式上，黨治與專制的比較。在實行黨治時，政權執行的人，受全體黨員所共信的主義，及全體或大多數黨員所決定的政綱之限制。政府的組織，施政的方式，也都要依照黨所規定的法。並且領袖受黨員之委托，執行黨政，又須受黨員的監察，向全體負責任。尤其在本黨，一切黨內職務之分担，是以選舉爲原則；下級黨部對上級黨部，又有依法抗議之權。這樣一種黨治，如果實行起來，隱然有法治之用意，與單純的人治完全不同。況且以民衆爲基礎，不致成爲專制。講到專制顯然不同了。在專制下，政權的運用，完全以握權者的私人利害，恩怨，愛憎爲轉移。無所謂限制，無所謂負責。不管是暴君或是賢主，是英雄或是民賊，專制的時候他總是超法律的。甚至有主張君主神權說的，以爲君主本人必定是神聖的，代天而治。中國所謂「天子聖明」西方所謂「君王不會做錯事」均是這種表示。所以在黨治的標榜下，黨國要人如果濫法用權未嘗不是變相的專制。

(三)在對付政敵上黨治與專制的比較。根本上黨治下的政敵只是主義上的敵，黨的政敵，專制下誰都可以做敵

人，因為專制的政體是利害懸絕上私人的敵。況且革命的黨一定是代表民衆的，黨的敵即是民衆的敵，專制只有把民衆當敵人而加以壓迫。黨治固然要制止或撲滅反動，但制止的情形也應與專制有分別。專制的制止既是私人的報復暴政，所以常常極其殘酷。凡以民衆為敵的政府，一定對民衆用恐怖手段。但是一個革命的成功只能建立在民衆的希望上，決不能建立在民衆的恐懼上。如果冒黨治的名，以袁世凱對付國民黨同志的政策對付民衆，肆行殺戮，政治的命運是不會長的。

(四)在內容上黨治與專制的比較 黨治中，雖然免不了破壞和制止反動；但主要的事務還在建設。專制可以只在管在壓迫上做功夫，黨治却要建設新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為民衆謀利益。並且在黨治下，訓政期中，自治的進行，民主的訓練，都要逐步實行。革命的民衆，在各級政府中，應該有參與的權。若是單純以制止政敵為滿足，同時又只顧長久把持私人政權，必定投降反動勢力，形成專制局面。

(五)在效果上黨治與專制比較 專制必然造成少數統治者特殊階級，即間接製造一個民衆的革命。黨治的效果可以領導民衆入於民治，完成建設，貫徹革命。

在黨治變成專制的過程中，也有許多客觀的表現，可以略為舉例如下。(1)腐化及反動勢力混入黨內，根本消滅黨治精神和效用；(2)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的資本結合起來，奪取政黨的機關和權力；(3)黨政上都無積極革命工作，反畏懼民衆，加以壓迫；(4)誤認政敵的沒落，即是政治的勝利，而流於採用恐怖手段；(5)黨內專制趨勢逐漸增加，甚至黨紀蕩然，而忠於黨義，勇於革命的同志反被仇視或誣害；(6)變相的「朕即國家」思想之發生：握政權的忘記了黨權高於一切並非暫時握權的人本身高於一切。他們在無形中露出一種思想，以為領袖「不會做錯事」的，是比帝王還要神聖的。其實，在黨治下，民衆反對黨的主張容可以說是反動，若是民衆希望革命非常急切，因為主政的人言行不符而發表正當的呼聲時，對革命是有利益的，也要壓抑，將黨和民衆打成兩段，恐怕連意大利的黨王莫梭里尼還不十分肯做哩！

總之，我們對於黨治的擁護要擁護黨的治，不要擁護制黨的專制。離開了革命，違反了黨紀，拋棄了民衆，沒有黨治的餘地。我們要在革命的立場上，中興本黨，實現黨治。愛護本黨的革命同志，起來！努力！

南京市黨部圈選結果給予我們的認識

蕭淑宇

南京市黨部的選舉和圈定手續已經完畢了，選舉圈定的結果，已載京滬各報，無煩錄載之必要；而且這般地結果，早在吾人意料之中，毫不足為稀奇。好在天下事利弊常非兩全，以南京黨部所頒布的圈定選舉而論，一方面固大有妨害於黨和革命前途，但同時因為經過了此種事實的證明，使革命同志能堅定他們的觀察和信仰，而從前對於南京黨部尚存希望之念，居於徘徊之地位的同志們，得以增加一層認識。

對於南京黨部圈定選舉的決議，早經吾人和黨內多數同志的反對，反對的理由原因：（一）因為圈定選舉違犯了本黨總章；有背本黨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將使個人却持黨權，擅改黨章之事實，成為例文。（二）現在中央本非健全，因而多數中央執行委員由於無權過問，至於不加過問，以為消極的抵制，期促當權者之反省；多數黨員權更因黨旁落的原故，對中央不生信仰，成功着黨員與黨不關係成之現勢；因為黨內部動搖和不健全，遂至失去民衆的同情，陷革命於中斷的危途中。在此種情況之下，為圖挽救黨

和革命前途的危機，應先謀鞏固黨的基礎，恢復黨的威信，萬不能再有此種名為圈選，實際委派的敷衍行為，更失黨員的信仰，所以為圖鞏固黨的組織，挽回黨的信用起見，非加反對不可。（三）我們早經看出了權勢派與創此種所謂圈選制，別有用心，明白一點的說，就是現在的少數當權者企圖長久把持黨權以遂其藉黨營私之願。現在的當權者本不能得多數黨員和民衆的信仰，他們的行動尤其不能代表本黨的精神，所以為防野心家永久篡奪黨權起見，更非反對不可。在這幾種條件之下，各地同志已層起反對，結果雖不能使此項決議即歸取消，但已得黨內多數同志之同情。

當權者每籍慎重人選，防止共黨為口實，以自辯護，其實均不得成為理由，因為經過了此次登記以後，共產黨人已無法取得本黨黨籍，即或偶然混入幾個，亦斷不致被選為省市執監委員，因為所得為多數同志選擇者，其平日之言行當較表著，斷無顯著活躍之共黨，而不為同志所發覺，反為同志所共信之理。若說在加倍選舉的數量中，可

以慎重選擇忠實而有才力之負責人員，本有相當理由，然而當權者的用心實不出此，我們記得圈定選舉的辦法，於民國十六年在江西和廣東都採用過，當時因共產黨勢甚猖獗，某中委一面指揮組織小團體，暗中與之競爭，同時經過圈定手續，以判定最後勝利，結果兩地均操勝算；今日此種制度之復生，蓋當權者猶師昔年之故智。殊不知，彼一時，此一時，昔日因國制共，故本黨同志均甚樂從，現在經過了多次的清黨，多次的登記，共產份子既去，更何有防制，顯明一點的說，欲藉以排除一切異己，以造成一個清一色的系統罷了！

南京市黨部選舉和圈定的結果，已經証實了我們的見地和野心家的企圖。我們看當權者在選舉未開始以前已以各種利便，幫助其小團體的活動，同時更慮小團體力量之不足操縱一切，更由組織部預先計劃着所謂『寄名單選』的選舉法，隨於選舉之前，方始宣佈，以防止其他派系組織之活動，選舉結果權勢派本已得着了相當的勝利，圈定的結果，幾乎得到了一個『清一色』。從此次圈定的結果當中我連帶生出了以下的幾種感覺：

(一) 權勢派手段的陰險狠毒 我們知道，從南京市黨部指委會人員雖然多列於權勢派的小組織當中，然而因為

信用喪失，在學界間生不出力量，如果依照普通的選舉法施行選舉，結果定歸失敗，所以由組織部定出來所謂寄名單選法，以為補救辦法。此種選舉法之不合理由，人盡知之，蓋不但違反了本黨選舉通則，本黨從未採用過此項選舉制度；在單選結果之後，更加一次任意的圈定，直可以說是剝奪了大多數黨員的選舉和被選權、事實告訴我們，南京黨部無時不在履行他們原定的第二次清黨計劃，南京市黨部圈選的結果，是一個事實的證明；因為他們以圈為名，用着高壓的力量，無理由的將一般思想激進的革命同志排除淨盡。比如此次谷正綱當選的票數，幾乎超出於一般人之上，然而他却連一個候補的資格都得不到，劉紀文當選票數不過七十餘張，少於谷三倍，他却無條件的『中圈』了；假定不有如此兩重的限制，我們可以斷定，劉紀文等一般『唯官主義』者一定不能當選，而谷正綱等却當選着了，權勢派手腕的陰險狠毒，於此可見矣！

(二) 從此顯見黨基的動搖和黨權的旁落 在前面我已經說過『為圖挽救黨和革命前途的危機，應先謀鞏固黨的基礎，恢復黨的威信』，而權勢派却顧不到黨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而必一意孤行，極盡其把持，操縱，排斥之能事；殊不知權勢派所把持者不過的軀殼，黨的空招牌！

然而束縛不了黨員的思想和意志，我們知道黨的黨基乃是建立在多數的革命同志和廣大的革命民衆身上，黨基的動搖或鞏固，要看多數的黨員和民衆心理的向遠，像此次南京黨部用盡了各種的心計和手腕，奪取到的不過是南京市黨部的空招牌，違反了的却是多數革命同志的心理，權衡輕重、無論爲黨的前途或權勢派本身的利益計，均可謂不得其所，我敢斷言。南京市多數同志將來對於此次圈選結果的黨部，不但不能加以擁護和信仰，而且必然會生出相反的方向，推而言之，不但對於南京市黨部如此，對於整個南京黨部亦屬如此，不但南京方面的同志如此；全國各地的革命將無不如此，所以從南京市黨部的圈選當中，更顯見黨基的動搖和黨權的旁落了！

(三)革命同志應有的覺悟 一年以前我們已看出了南京黨部之無希望，所以提出了再度改組本黨的口號，然而有許多革命尚未消失的同志，一方面贊成我們的主張，一方面却對於南京黨部還抱着一種最後的希望，正如陳公博同志所說，「對於十七年整個局面的觀察，大概分作兩種

人，一種想失望而還帶有希望的，一種是失望而至於絕望的，我的客觀是屬於後一種，而主觀呢是屬於前一種，我并不是個人內在性的矛盾，實在是時時刻刻正把黨的立場切合革命的立場」。事實如何呢？正又合着陳公博同志所謂，「而現在呢，絕望的更加絕望，而希望的也斷然入了絕望」自然「人之愛黨，誰不如我」，有一分希望，總應存一點希望，然而到了絕望的時候，還強存希望，那正和以前研究系的希望北京政府一樣！同志們，革命的同志們，在這個重重危機之下，我們從此，不但不應對於權勢派稍存希望，而且不應抱着寄生於某種小組織以苟存的心理，因爲現在黨內依附於權勢派的一切小組織，不論他什麼「CC」也好，「SS」也好，屬於西山派也好，屬於某系也好，都含有反革命的投機性，絕對談不上所謂黨和革命；所以爲我們黨的前途計，爲中國革命前途計，只有認清目前的環境和將來的趨向，與一切爲三民主義奮鬥的革命同志，神聖的團結起來，担負起來未來新任務！

一九二九，一，一五。

中國革命必須怎樣才可能

張崧年

中國現代的革命與所謂社會革命有怎樣的關係，是中國革命的一個必須先決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經過我幾年的思索，幾年的經歷，並為使得中國革命可以進行的經濟一點，我想提出這樣的一個主題 (Theme) 就是：「中國革命第一步就是社會革命」。這個主題是我觀察中國革命的結果，也就是我對於中國革命前程的豫言。最要緊的是：我這個主題並不是講的中國革命的目的，乃是講的中國革命必須怎麼樣子作，乃是講的實際上的可能：必須怎麼樣子作中國革命實際上才可能。我現在打算就根據着中國國民黨的革命主義，試作一篇簡單的證明，以證明這個主題的意思的當然與必然；至於驗證，當然一部分還要待之于將來的事實。但在證明之前，我應先把這個主題中的兩個名詞界說清楚，免得發生可以不必發生的誤會，兩個名詞就是「社會革命」與所謂「中國革命第一步」。

我所謂「社會革命」乃是英語 Social Revolution 的譯語。我乃照本來的用法用以泛指一切社會的根本變革。凡是社會經濟基礎的改動，我以為都可叫作社會革命。所以，我所謂社會革命是很廣泛的，並非專指社會主義革命而言。英語中 Social Revolution 一語應譯為社會主義革命，而不應含混地譯為社會革命，以免混殺。普通本把革命

分為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兩種。政治革命建設新政權，社會革命改變社會結構。但其實，則沒有政治革命不兼是社會革命，也沒有社會革命不同時并行政治革命。中國今日的國民革命便是兼有這兩方面的。所以普通把國民革命與社會革命對立，實在是一種錯誤，國民革命只可與無產階級革命相對立，而不能與社會革命相對立。社會革命並不是無產階級的事業，社會革命可以是社會主義的，也可以不是社會主義的；社會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且非一體，與無產階級革命自更不相等。中國國民革命本應是既要建設新政權又要改變社會結構的，我現在所要證明的就是在革命開始的第一步即非着手改變社會結構不可。于此我應當解說所謂第一步的意思。

要詳細明白什麼是現代中國革命的第一步，本應先曉得現代中國是怎樣情形。現代中國是現代世界的一部分，時時在在都受着世界環境的制約。所以欲曉得現代中國的情形，又應先明了現代世界的狀況。這些我姑假定讀者都是知道的，我當直求所謂革命第一步的意思。普通對於革命，本可有兩種看法。一種是純客觀的看法，只看整個社會客觀的變化，一點不參加革命者主觀的人的成分。在這種看法之下，是只有社會革命的，所謂政治革命，不過其

中某一段落的附屬的表徵。照這種看法中國革命本久在進行之中，且仍在進行之中，前年下半年以來的反動情形，只能說是又受了一次頓挫，而無所謂失敗，將來只有再振興，而無所謂再開始。所以照這種看法，某年某年的革命的說法，是不能用的。又在這種看法下，既只有社會革命，社會不革命當然算不得革命。照這樣說法，說中國革命第一步就是社會革命，直成了一個甲是甲之類的抱香蓮輯 (tautology) 無時不真，簡直用不着證明。

不過，平常對於革命，却還有一種看法。這第二種看法是比較主觀的，是從革命黨的見地來看的。照這第二種看法，必待革命黨握得了政權，開始行施其革命方案，乃算是革命上了成功之路。我所謂革命第一步，也是指的這種意思。所以，所謂中國革命的第一步，說明白了，就是真正執行中國國民革命的中國國民黨握得了政權，開始實行其主義的時候。我的主題就是說，就從那個時候起，即非着手進行中國社會的根本改組不可，更明白說，即是非開始從事替中國社會奠定一個新經濟基礎不可。否則，政權必然握不穩，主義必然不得實行，民衆必依然受不到利益，雖說成功，必是假的。

在去證明這個主題之前，我當再把我對於中國革命的

認識加以申說。我這些認識也可說就是我那個主題含蘊的意思。第一，我確認，中國今日只有一個革命。這意思等于說，適合于現代世界中的現代中國情況的革命，是只有一個的。這個唯一的革命叫作國民革命可以，叫作社會革命也可以，因其兼具雙方的性質。第二，我不相信中國革命是兩截的，先成功了一個國民革命，然後再來一個什麼革命，然後才能漸漸達到現代人所能想得到的最高理想；我認爲用不着如此地周折，且其實也不可能。我以爲今日我們建設革命理論，最要防備這個已經試驗失敗的兩截說，切不可有形無形地又落了它的窠臼，致勞他人再來革我們的命。第三，我確認中國社會不革命，隨便什麼別的革命都不可能。但令人肯向革命實際上的可能上着想，必可見到非先從事把中國社會根本改造，非掉換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別的簡直可以無從談起。我相信，真正相信唯物史觀的革命者，必然是可以相信這個的。這最是我那個主題的主要含義，我現在就從這個證明起。

中國革命信奉的是三民主義。當然，中國革命第一步所要實行的也是三民主義，不能着手實行三民主義，中國革命絕不能算是已上了成功之路。三民主義有三方面。這就是大家已經爛熟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

。民族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國際方面。民權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政治方面。民生主義是三民主義的經濟方面。凡是今日日圖藉的要建設新國家改變整個社會的革命主義，不能不兼有這三方面，自是顯然的。至于這三方面爲什麼有聯帶關係，即是爲什麼三民主義是整個的；要行其一必須參行其它，當然不難證明。但這我且莫說。我現在只在分着說明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方面怎樣才能真正地實施。

第一說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簡明的意思就是打倒帝國主義，使中國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打倒帝國主義本有二義，一爲打倒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打倒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政治上的勢力；一爲從根本上打倒帝國主義那種制度。顯然，第一步大概應先作到第一個意義。不過，打倒帝國主義的兩個意義，其實也是相聯的。如果真能打倒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雖非就是打倒了帝國主義的制度，但確已從根本上給了它一個大打擊。要曉得這是什麼緣故，不可不先看帝國主義的意思；從帝國主義的思想上，也才可以曉得要打倒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力量，而使中國成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即是實現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如何才可以作得到。

照人人所能稱道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一個階段；世界沒了資本主義也就無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發長到帝國主義，也就到了死期了。這是不錯的。凡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工業發達到了某種程度，必然地要向外擴張，否則必致不能生存。這種資本主義的向外擴張便是現代帝國主義的源起。受其擴張的，必是工業沒有發達經濟落後的國度，受了擴張以後，便構成了所謂殖民地，經濟受了翦估，政治也失了獨立。這種擴張，在表面上是侵略壓迫與迷惑；在內容裏，實在消納貨品，攫取賤價原料賤價勞力，與夫繁殖資本；強迫着農業國度在其制裁下而工業化，以吸收其血汗。今日的帝國主義便是這個意思。這種帝國主義的辦法，對於資本主義雖是必要的，非此不足以延長其生命，然一方也就是資本主義自掘其墳墓，自促其滅亡。因爲，不但等到帝國主義發達到極點，全世界都工業化了，資本主義再無擴張的餘地，即是再無消納貨品，繁殖資本，攫取賤價原料賤價勞力之餘地，資本主義借其擴張出來的帝國主義，必然要歸于消滅。而且不必到那個時候，就是在帝國主義擴張的過程中，必然要引起被侵略的民族的反抗，這也就足以促令帝國主義與待之而生的資本主義死亡了。所以照這樣子，各個殖民地的民族獨立運

助，如能打倒帝國主義在各該地的勢力，均能使帝國主義受到根本的打擊。

那麼，帝國主義既然是如此的，怎樣才能打倒它在中國的勢力，也就不難見了。帝國主義是經濟的，顯然，要抵抗之，方法不能不在經濟上想，現在帝國主義既在強迫着中國工業化而彼從中吸取其利益，中國如不甘受帝國主義的強迫，如不甘聽帝國主義者來坐收其利，那便中國只有自行工業化一途可出。如祇以殘餘封建制度下的破碎經濟，來作反動的抵抗，顯然是必無效果可收的。你必自有貨品，然後可以抵制帝國主義的貨品來銷納。你必自有資本自然後可以抵制帝國主義的資本來繁殖。你必自能利用你自家的賤價原料賤價勞力，然後可以禁制帝國主義來擷取。所以中國的工業化實在是要打倒帝國主義不得不走的第一步驟。

不過，現在要把中國工業化，又有兩個方法。一是資本主義的方法，一是超過資本主義的方法。在這兩個方法之中，我們當然是採取第二個方法的。資本主義的方法，不用說其不可能，就令其可能，如前所說，運命也必不會久，那又何取。而況且又不應該。所以，但令我們眼光看得遠一點，願應現代世界的趨勢，採用超資本主義的方法

以使中國工業化，實在是當然的。既然如此，中國為打倒帝國主義，一方既須工業化，一方又要採取超資本主義的方法，這還不是把中國社會根本改組，重新換個經濟基礎，是什麼？所以，即以民族主義而言，如要其實現，中國已非社會革命不可。

更從政治方面來說：帝國主義之得在中國橫行，在經濟上固緣中國經濟落後，在政治上亦緣中國的殘餘封建階級與新興的資產階級，甘于為虎作倀引狼為友。所以，在政治上講打倒帝國主義，便不可不使中國民衆起來，而把殘餘的封建階級掃除，而把新興的資產階級推翻。如何使中國民衆起來？如何把殘餘的封建階級掃除？如何把新興的資產階級推翻？這要講到民權主義上去。

中國國民黨的民權主義乃是要推翻殘餘的封建階級，與新興的資產階級而把政權交在農工與小資產階級的手裏。但是這又如何可能呢？當然這不能不建設一種專治的民主政治。但是這種政治又如何才能站得住？一，先從正面來說：今日的革命黨必謀握得政權，這與革命必須有黨，黨中必須有領袖，可說差不多都已成了今日革命理論上的天經地義。可是一個革命黨并不是握得政權，就算了事；建設了政權，尤須維護那種政權，尤須鞏固那種政權。我

們如果真相信唯物史觀是一個可以暫用的假說 *Provisional hypothesis* 的話，我們便不能不相信，經濟更重於政治，我們便不能不相信，經濟比較政治更根本；政治不過上層構造，經濟乃是下層基礎。所以要鞏固一種政治，不可不先堅定其下層的經濟基礎。我們如要建設我們的革命政權，當然也要建設在一個新的經濟基礎上。要鞏固之，自也必須先鞏固這個經濟基礎。而且要維護一種革命政權，必不能不有賴於廣大的民衆。廣大的民衆如何肯維護那種政權？必緣認識了那種政權乃是他們自己的，必緣從那種政權上他們可以得到他們以前得不到的利益，解除他們以前不能解除的痛苦，必緣從下層起，鄉村政權城市政權都已操在他們手裏。試問中國的社會如非已根本地改組，如何能夠作到這些？

二、更從負面言之：今日中國的政權，顯然完全猶在殘餘的封建階級與新興的資產階級的掌握。這兩個本不相容的階級所以能掌中國政權，固然是外受帝國主義者卵翼，然也必是各自有其相當的經濟基礎。假使你一旦假借革命的力量，在政治上，把這兩個殘餘的新興的階級都打倒了，而你却不即刻掃蕩了它們的經濟基礎，那它們是不是很有死灰復燃的可能？固然，今日的殘餘封建階級經濟基

礎，已在崩壞，而新興的資產階級經濟基礎猶未長成。但這在革命階級正好及早趁勢廓清之，而絕不能作為不必在意的理由。本來，要打倒反革命階級，掃除其所依附的經濟基礎，最是切要的辦法。舊經濟基礎破壞了，新經濟基礎奠定了，反革命者自然無復施展之餘地。前邊曾說實際上政治革命，沒有不兼是社會革命的，也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照這樣子，不拘從正面看，從負面說，要實現民權主義，要建設一種專治的民主政治，要鞏固農工小資產階級聯合的革命政權，都非開始即把中國社會根本改組，一天一夜就可以完成。我自不說，一個社會的根本改組，不可不踏上正當的道路，則我認爲是必要而應該的。在今日中國封建勢力猶熾的現狀之下，鼓吹民主政治，自也非無必要。如果只是鼓吹，自也別無可說。但如不止鼓吹，而且計劃到實行，那就不可不想到如何才能上去。照上所證，我是認爲中國社會如不革命，就令拿到政權也是換湯不換藥，必無可以實施真正的民主政治的道理。

民權主義如此了，復次當說民生主義。民生主義本は今通譯爲社會主義的 *Socialism* 的譯語。真正實行民生主義，必是一種社會革命，是可以不特言說的。民生主義

的兩個成分，一為土地問題，一為資本問題。解決土地問題，乃為免除土地上的剝削；當然的出路自在廢除土地私有權，收歸公共所有，而耕作者享用之。解決資本問題，乃為防制資本上的剝削，這在中國第一步的辦法當然是在建設國家資本，同時獎勵私人小投資而國家監督之。如此以使中國工業敏捷振興。這雙方如能作得到，中國社會當然要大改其觀。這個作不到，中國的人禍天災必不會有可以以時。這雙方問題的解決，自也要同時進行，是聯帶的，因為解決土地問題，即須資本，而建設國家資本振興工業，又須增加土地生產力，增長鄉村購買力。解決土地問題，建設國家資本，現在中國真正的革命者，大概已沒有一個不承認為當務之急的。那麼，對於中國革命的第一步就是社會革命這個將來的事實，自也可以無疑。

近年中國的革命，可說已經失敗了兩次。第一次是所謂辛亥革命，第二次就是前年的革命，失敗的最為慘痛。兩次失敗的原因，固然都有種種，但最根本最重要的，不能不說是由於舊日經濟基礎沒有掃蕩，社會沒有根本上的改動。這種歷史的教訓，我們革命者一定不能不承受。假使現在準備將來再度的革命，而仍不注意到開始就要是社

會革命的必要：難道我們還是願意再見一度的失敗？固然，以前兩次舊的經濟基礎不能掃蕩，社會根本不能改動，也許有其不能掃蕩不能改動者在。我們見到這層，我們期望革命之速上正軌，我們的準備便不可以不周，便不可以不早。

我自非不承認，中國革命真上成功之路，恐怕還是很久遠的事。那麼，我為什麼現在就提出第一步就是社會革命的話來說？這乃因我相信：革命者必不可不認識事實，尤不可不認識事實的出路，前程的可能，以便早日有個豫備，免得臨時無所措手足。革命是一件大事，尤其必須豫先有個大的豫備。『備豫不虞，古之善教』。我們固然相信社會的變遷是必然的，有些必然的規律可循。然而不幸，今日的人智猶然還是幼稚膚淺的很，事變之來，常常不免出人意料之外。所以一個真正的革命黨，必然時時都在枕戈待旦之中。所以不能不慮及久遠，看準方向，一部分也就是為的這個意思。同時，一個革命黨不可一日無行動，第一步的社會革命既然還是久遠的事，那麼目前我們應當作什麼呢？必須作些什麼才可以達到那個第一步呢？這是我要作的另一篇文字。

從國際形勢說明中國革命

許德珩

乙如何不能穩定資本主義（續）

(A) 生產問題

伐爾加 Varea 在他那本穩定後之資本主義傾倒時期的經濟現勢 *L'économie de la période du Capitalisme après la Stabilisation* 一書裏，把國際的經濟現象研究了；他的結論是這樣說的：「資本主義是沒有穩定的可能的，並且在一箇社會裏面，生產的器具與生產者是分開了，人類在社會上的關係，已經成了一箇貨物與貨物的關係；人類的生命，是由盲目無組織的定律以處理。而自己不能處理，一大部份的人是被少數人剝奪的時候，資本主義是

不會穩定的。……」歐戰以後，資本帝國主義者之所孜孜不息以進行的三種工作如上面所講的防俄，鎮壓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對付國內勞動運動等等，都是為得要求穩定的資本主義。然而從各國生產的情形看起來，工業出品雖然是一天天的增加，而原料的生產却不是同樣的增加而且還減少。美國是現在號稱為生產最合理化的國家，然而他的原料生產，却遠不及他的工業生產增加之速，其情形表列於次。

美國出產數目統計表

（見前舉伐爾加著穩定後之資本主義傾倒時期的經濟現勢）。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〇	一九二四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煤(單位百萬噸).....	四八七	五六九	四八四	五二〇	五七八	五二〇
無煙煤(百萬噸).....	九一	九〇	八八	六二	八五	八一
焦煤(百萬噸).....	四六	五一	四四	五一	五六	五〇
鐵(百萬噸).....	三一	三七	三一	三七	三九	三六
銅(千噸).....	八七	七六三	一、一三〇	一、一〇二	一、一七三	

鋼(千噸).....	三一	四二	三八	四五	四四	四三
棉花(千包).....	五、七八六	六、七六二	五二二	六、四三三	六、六八七	七、四〇六
煤油(百萬桶).....	二四八	四四二	七二四	七六四	七六七	八九〇
汽車(千乘).....	四六二	一、八八三	三、二四三	三、八三九	三、九三七	三、九三九
工業出品(億元).....	九〇七	二四〇七	二六〇八			
新建設(兆元).....	八五八	二、五三三	三、八八〇	五、〇四三	五、三九一	
大商業(等於一〇〇).....	一〇〇				一五一	一四七

據右表看起來，煤的產額在一九一三年是四八七，而在一九二七年只增加到五二〇，無烟煤的出產，在一九一三年的總額是九一，而在一九二七年，則減少到了八一；鐵的出產在一九一三年的總額是三一，而在一九二七年，也只增加到三六〇，棉花的出產，在一九一三年的總額是五、七八六，而在一九二七年的總額只增加到七、四〇六。反之如工業出品在戰前是九、七，而在一九二六年已經達到了二六、八，差不多增加到了三倍。煤油的出產在戰前的總額是二四八，而在一九二七年已經到了八九〇，差不多增加到了三倍半；汽車的數目，在戰前是四六三，而

在一九二七年，他的總數目已經達到了三、二四三，差不多增加到了八倍。大商業在一九二七年，也已經比戰前增加到了百分之四十五，像這樣原料出產的減少，或者是相對的減少，工商業出品之突變的增加，是目前資本主義國家裏一箇共同的矛盾現象，美國如此，英德法及其他各國亦更加如此，現在且再就英國出產數目的概略，表列於次。

英國出產數目統計表
 (見倫敦一九二八年二月出版的商業經濟史 The Economist Commercial History of 1927)

煤(單位百萬噸).....	一九一三	一九二〇	一九二四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鐵(百萬噸).....	二八七	一三三三	二七〇	二四七	一三一	二五九
	一〇、三	八、二	七、三	六、二	二、四	七、三

鋼(百萬噸).....	七、七	九、二	八、二	三、六
棉(千包).....	三、八二五	二、七二八	三、二三五	三、〇二二
汽車(千箇).....	二二	一三二	一七六	一九五
工業生產(於一九〇〇年等)	一〇〇	七六	八七	一一四

英國也同美國一樣。是原料出產的減少，而工業出產的增加。要解決這值衝突的現象，惟一的出路，當然只有爭奪市場，與獨佔世界上原料的出產地，這樣一來，資本主義者的國家彼此的衝突也就是愈甚了。怎樣還能夠穩定資本主義呢？這是第一。

(B) 勞働問題
因為商品的增加，貨物的停滯，勞働者失業的人數，也就是一天天的增加。現在我們且來看一看歐戰以後各國勞働者失業的狀況。

各國失業人數的統計表(以一千人為單位)

一九二〇	一九二一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	一九二四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後三箇月	一九二一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	一九二四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英.....	五二六	一、八〇四	一、四五八	一、三二五	一、一三五	一、三二七
德.....	三六八	三一四	四三	一三九	五二六	一九七
義.....	一〇四	五四二	三七二	一八三	一一八	一八八
波蘭.....		六五	八七	六五	一五二	一七五
比.....	四九	一四七	三六	一四	二二	三一

這還是算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止，各國失業的人數是一個猛烈的增加；一九二六年以後，各國經濟的狀況趨於穩定，而失業的人數，更還是一個突進的增加。法國素來是號稱失業的工人很少的地方，而到了一九二六年秋間以

及一九二七年的春天，失業的人數忽然增加到了兩百多萬。凡是在工廠裏面的外國工人，到此時竟無理由的被廠主悉數辭脫。在美國，失業的人數雖一時無正確的記載可放，然而據一九二八年三月九日的 *Annalist* 報記載，從一

九一九到一九二六年。在農業，工業，礦業，鐵路交通運

一九一九年

輸等等的工人中，其逐漸減少的數目如次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農業(單位千人)..... 一一、三〇〇

一〇、五〇〇 一〇、三五〇

大工業..... 一〇、六九八

九、七七二 九、八五〇

鑛工..... 一、〇六五

一、〇六五 八六〇

運輸..... 一、九一五

一、七四四 一、七八二

僅據這四種工人計算。由一九一九到一九二六年，所減少的工人總額，是兩百一十六萬六千人，其他各種工業的工人，尙還未算在計算之中。減少的工人是否箇箇都成了失業者，這當然是箇問題；不過其大多數的人都成了失業者，則可以斷定。失業的人數增加，又不是不是穩定資本主義的一箇矛盾現象？這是第二。

(一)英國

資本流通統計(單位——百萬金鎊)

總數.....	一九二〇、九	一九二一、七	一九二二、九	一九二三、三	一九二四、一	一九二五、一	一九二六、一	一九二七、一
(甲)英殖民地								
政府.....	一四、七	二六、三	五〇、一	三〇、七	三一、九	五五、七		
私人.....	五八	四九、九	二二、二	三〇、二	二二、三	四四、一		
(乙)外國								

(C)資本問題

除了失業的工人增加以外，還有一箇最重大的問題，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發生出一箇過剩的資本問題，這箇問題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國家前途之一大危機。我們現在只把英美兩國近年來所流通的經濟概要，表列於次，當然可以明白過剩的資本一年年增加的情況了。

政府.....	九、六	二六、二	四〇、六	二三、八	一一、八
私人.....	八、三三	五八、三	一一、八	一六、三	二四、六
				二四、六	三六、六

(二)美國

對外資本流通統計表(單位——百萬金元)

歐洲.....	一九一三年底	一九二三年底	一九二四年底	一九二五年底	一九二七年六月底
拉丁美洲.....	三五〇	一、三〇〇	一、九〇〇	二、五〇〇	一二、五五
坎拿大新芬倫.....	一、三三〇	三、七六〇	四、〇四〇	四、二一〇	四、八〇〇
亞洲與奧洲.....	七五〇	二、四五〇	二、六〇〇	二、八二五	三、二〇〇
	一七五	五九四	六九〇	八七〇	九五〇
總計.....	二、六〇五	八、一〇五	九、二三〇	一〇、四〇五	一二、三〇〇

英國在戰前如一九一三年，資本流動額是一十九億六千七百萬金鎊，在一九二四年是二十億九千三百萬金鎊，到了一九二七年，已經是三十五億五千一百萬金鎊；增加差不多到了百分之二十五。美國對外投資的總額，在一九一三年是二十六億·五百萬金元，到了一九二三年，已經是八十一億·五百萬金元；直至一九二七年底，竟增加到了一百二十三億金元，比戰前增加到了五倍。過剩的資本這樣突飛的增加，投資地的獲得，當然又是一箇爭執的問題了。

這樣看起來，資本主義者用盡了許許多多的方法來穩

定資本主義，而其結果實不能穩定資本主義。這於上面所舉的過剩的資本。過剩的貨物，過剩的勞力中已見其端倪。要解決這三箇問題，資本主義的國家。於政治上，經濟上。彼此的衝突就是愈多了。我們現在且把這些衝突，簡略的來說一箇大概。

(一)德法的衝突 德法的衝突，無論他是在歷史上，在地理上，在經濟上，都是一箇不能避免的事實。從歷史上說起來，亞爾薩斯 *Alsace* 羅連 *Lorraine* 在拿破崙時代被法國奪了來，在普法戰爭時代被普魯士人奪了去，上次大戰以後，又被法國人奪了回來，這種歷史上的讎仇，可

以說是深印在人民心理之中，不會忘記的。從地理上講起來，德法比鄰，他們都是歐洲大陸上一箇強國，都想來做歐洲大陸大王，所以上次大戰，原因雖多，而歐洲大陸上之兩雄不並立也是原因之一。然而其最重要的，還是經濟問題。德法衝突之最大的一箇原因，就是在亞爾薩斯與羅連的問題。但是爲什麼他們兩國都不惜犧牲一切，苦苦的去爭這兩箇地方呢？因爲這兩個地方是歐洲產煤產鐵最豐富的地方。我們知道近代資本主義的國家，他們所持以生存的，就是煤鐵問題，誰得了這箇地方，誰就備具了資本主義的條件，誰就能夠稱雄於歐陸。所以亞爾薩斯羅連的問題，是歐洲最重要，最難解決的一箇問題，也就是德法衝突的一箇焦點。法國既把這箇地方搶回了，懼怕德國復仇，所以於和議開始時就有一箇駭人聽聞的一三六億金馬克的賠款，限制軍隊不許過十萬的條文；不足，於和平會議時，要求英美法三國聯盟，担保德國若有反攻的情事，英美起來助法，事爲美國反對而沒有成功，他不得不變動方略，聯合捷克斯拉夫，幼哥斯拉夫，羅馬尼亞，成爲小協約國，再與波蘭提攜以防德，這是大家所早知道的一些事實。就是這次英法海軍協定，其內容雖然包括了許多對俄對美的問題，然而英國承認法國在萊茵河岸之處理權，

與湯吉爾「Tangier」的勢力範圍，法國承認英國在印度埃及之主權，以及太平洋的特權，雖然是英法間有不可掩飾的衝突而協定的，然而英國承認法國在萊茵河岸之處理權，就是英國承認法國可以繼續的制服德國，怕德國起來復仇的勾當。

(二)英法的衝突。戰後的英法。也和戰後的英美一樣，他們的利益總是處處衝突的。英國歷來就是歐洲的海上王，他總不願意在大陸上有一箇國家起來做大陸大王與他抗衡的。從歷史上講起來，滑鐵樓 Waterloo 一戰，把一箇蓋世英雄的拿破崙一世，從歐陸大王的交椅上，拖了下來，永因於荒涼孤島，這是當時的英國人所最快意的一件事。普法戰爭以後。以俾士馬克的豐功偉績，早已置普魯士的國家於歐陸主人的地位；繼之以維廉二世的野心，德國的地位，實已爲歐陸盟主，這是英國人所最不願意的。所以上次大戰，起而共同制德，這也是一箇原因。但是德國打倒了，繼之而起的，可以說就是法國了。其實，戰後的法國，他立在歐洲大陸，隱隱然是居於一箇最優勝的地位。地中海的南岸東岸，大半都已經是他殖民地或者是他的勢力範圍。這是不用說的了。他一方面唆使捷克斯拉夫，幼哥斯拉夫，羅馬尼亞三國，在他的指揮之下。成爲小

協約國，與波蘭聯合，是已經置巴爾幹半島於他的勢力範圍以內；而在他一方面，又與比利時聯合，共同的駐重兵於萊茵河岸，以制服德國，這種不可一世的大陸政策，其氣概不是歐洲大王是什麼？這箇歐陸大王之再起，用汽船在兩點鐘以內可以直達英島，飛機在一點鐘以內可以由巴黎直抵倫敦，遠距離炮可以由法國海岸打到英國，情形如此，孰是叫英國害怕；所以在德國打敗以後，英國對大陸的政治，雖然不能不敷衍法國，而其實還是想與德國提攜；如羅加洛會議，道斯計畫，把德國拖至國際聯盟裏面去，一方面固然是爲着防俄，同時爲着活動歐洲的經濟，而其實還是想把德國扶助起來，以制服飛揚跋扈的大陸大王——法國。更加以援助波羅的海的海岸四國，可以說是針對着小協約國而成的，名是爲着防俄，而其實還是爲着制服法國。至於煤的問題，鐵的問題，戰後的法國，已經由亞爾薩斯，羅連之兩富區而駕乎英國以上，備具了資本帝國主義者的資格，這又是爲英國所不甘心而妬嫉莫過的。

這右英國在新加坡築港的計畫，也是一箇最使法國不

安的地方；英國在新加坡的築港，不惟對法國在遠東的利益，是一箇威脅，就是已經拿在手裏的印度支那，也將受其威脅，要生動搖的。

(二)法義的衝突。義大利自黑衣大王執政以來，也是一箇想雄飛於世界，問鼎於歐陸的。然而想問鼎於歐陸，就不得不從地中海起。但是地中海的霸權，早已爲法國所有，東岸的突尼斯 Tunis，亞爾石里 Algiers，南岸的摩洛哥 Maroc，都一箇的爲法國的殖民地；更加以小協約國之成，處處使志欲雄飛的莫索尼里，不得不面面碰壁而確伏，這是使義大利所最不甘心而欲悻然思動的，又加以亞得利亞海峽有南斯拉夫把持，雖欲駐爲已有，而亦不可得；南斯拉夫其所以能夠把持，敢於敵對義大利也是得有法國爲之後援的原故。所以從去年夏秋以來，義大利與南斯拉夫的衝突，一天天的激啓，一天天的厲害，其實，所謂南斯拉夫與義大利的衝突，其內幕不過只是法義的衝突而已。

(未完)

專 載

中國國民革命的前路(二續)

陳公博

(三) 國民黨的破碎

國際形勢之複雜和困難既如彼，國內形勢之複雜和困難又如彼，縱使國民黨的組織極其健全，也會受絕大的影響，畏怯，退卻，何況國民黨的成分自歷史上已含多面的矛盾性，那有不跟着環境分裂和破碎？

同時我們更要明白，三民主義是整個的，不是分立的，也不是連環的，中國非反帝國主義必不能生存，所以有民族主義；但光是民族獨立，非廓清封建勢力，必不能建設近代式的國家，所以有民權主義。封建勢力的打破，資本主義跟着便會產生，非根本預防資本主義的發展，結果大多數人依然受着壓迫，民族民權，徒成空論，所以有民生主義。然而這個整個的革命三民主義，依時代的遞變，黨員認識都有不同。辛亥時候，黨員所認識的有一個滿洲，民國十三年黨員所認識的只有帝國主義。在辛亥時候國民黨只管高談三民主義，可是他們心目中只求滿洲政府推

倒，對帝國主義是可以讓步的，對不平等條約是可以尊重的，所以無論那一省獨立，對外第一件事便是正式承認滿洲已締結的條約。在今日的黨員只管高談三民主義，可是他們心目中只求帝國主義能夠排拒，封建勢力是可以聽其復起的，新興資本主義是可以讓其發展的。今日雖然有許多批評南京政府的主義是投降帝國主義，牠的外交是亡國外交，但平情而論，這種讓步都非牠的本心，不過在黨的破碎和外方的橫壓時候，個人要保持政權的絕續，投降適成爲必然的結果，這是我所不願意冤枉南京政府，也不故意迴護南京政府，可是民權和民生他們沒有清楚認識，這是事實。

要而言之，辛亥當時的人們只認識半個民族主義，到了今日的人們又只認識一個民族主義，於是整個的三民主義便跟着人們的認識不同而異其解釋，黨也跟着人們的認識不同而露其破碎。而且集中於半民族和一民族的模糊意

議底下，封建勢力和新興資本主義也是同一迫切要求，因為封建勢力到了沒落的時代，也想政權有一度轉變，維持其本身的存在，而新興資本主義呢，為着個人商業和工業的發展，對於民族獨立的革命，當然有相對的熱情。可是民權主義并非封建階級所歡迎，民生主義更非新興資產階級要實現，所以無論到那一個時候革命算已成功（例如軍事或政治的勉強統一）黨便在那一個時候破碎，革命便在那一個時候失敗。

本來一個革命黨的破裂，無論在那一頁的革命史上都不是一件很希奇的事，國民黨自入辛亥以後，有宋教仁等接受憲政黨的綱領，洪憲以後有陳炯明接受軍閥的綱領，改組以後有西山會議派接受新興資產階級的綱領，前年更因漢甯的分裂，共產黨的叛變，於是黨員的革命心理破碎了，民衆的革命心理疲倦了，這麼一來，黨員固不互信，也不信黨，並且也不信革命，各人皆謀自己的出路，至形成今日破碎之局。目前我們分析現在個人的出路，大概有以下的各派：

一 軍人派 這派人的思想，以為革命是要武力的，維持黨的存在也要靠武力的，現在革命沒有出路，惟有以個人的武力保持革命的形式，這種勉強保持的時期，自己也

不敢相信能延長若干時間，但能敷衍掉，有一日便算一日。可是這種思想在主觀缺乏了反省，在客觀缺乏了觀察，什麼是主觀缺乏了反省？因為一個武力的存在，必要條件一個是民衆的擁護，一個是政治的立場，現在無論那一個武力都是口裏革命而俱怕民衆，高談主義而絕無主張，如果這樣能夠維持下去，那麼袁世凱和段祺瑞早已成功，何必今日再待我們的革命。什麼是客觀缺乏了觀察，因為幾個絕端矛盾的武力，決然不會相安，各人都要保持革命的形式，根本各人還要保持而且擴大個人的實力，分配得當，依然互防，分配不當，立刻衝突，現在什麼縮軍會議，總道會議，都是這種思想的表現，然而我敢斷言這完全是一種幻想。

二 政客派 這派人的思想，以為中國連年的混戰，坐在軍閥之分據不能相容，所以要使中國相安，最好使全國有力量的軍人都集在中央，易槍桿的鬥爭為紳士的辨論。如果這一層能夠實現，在國家方面可以減少混戰的機會，在個人方面可以操縱政權於幾個武力均勢的上層，所以目前政治的黑幕什麼聯甲制乙，聯丙制丁，都是這種思想的表現。可是這種思想主觀是空虛，客觀是幻滅。什麼緣故？因為一國的政治，除了主義不說，必須有牠的堅確立場

所謂立場，就是有一貫的主張和有確定的步驟，必得這種主張形成了力量，然後才有策略之可言，如果自己沒有立場，單靠一種空虛的希望，決然沒有成功的道理。其次，各個軍人的基礎不完全是個人的本質，而是整個的封建集團，無論個人如何集中在中央，他們背後都有很鞏固的地盤作後盾，他們並不是到了中央便犧牲了地盤，反而到了中央對於地盤再加上一重保障。而且政權建築於幾個武力平衡上面，最易動搖，無論某一個武力露了裂痕，整個政局便立刻崩潰。

三官僚派 這派人的思想，以為天下之亂，坐於政慾過奢，欲求革命成而不敗，最好使天下皆歸靜而不動，說到主義，依然高呼三民，說到主張，則絕不為天下先，無為而無所不為，無可而無所不可。對於實力是『依違』，對於政治是『緘默』這種思想的主觀是動搖，客觀是糊塗，在革命高潮當中，固會藉士大夫的資格，以清高號召一時，但在革命低降當中，也首先以官僚的地位，率領羣盲泥首降服。至於今日官僚取之在政治早失其優勢，而其作用僅作為裝飾政府之具，有時則利用以彌縫一時政爭。所以官僚派之在今日，下焉者僅能作事務的一員，上焉者亦祇能作政治衝突的緩衝具，然照中國最近歷史的混沌，這一

派作用雖小，勢力雖微，而不加軍人政客起降之突兀，這可以預測的。

四資產派 這一派的思想，以為中國之敵，在於產業不能發達，但求工商業可以發展，中國即資本主義之路亦所不惜。這一派的勢力在政治上雖未形成，然而對於南京政府確有不少的支配力，不過在這個政治矛盾的裏面，牠的勢力不能擴張，但我深信這一派的力量終必在政治上別樹一獨立的壁壘。然而這一派的思想，在主觀則缺乏實在性，在客觀則富有游離性，因為這一派只有趨向資本主義的傾向，還沒有建設資本主義的大企圖，目前只能影響政治而不能操縱政治，只能謀個人的利益，還談不到對於國家提出具體主張。其次則傾其力量，只能結納某種勢力以求生存，仍不能兀然獨立，保持其政治生命，語其結果，到了某種武力分裂時候，必游離而至於崩潰，退卻妥洽，或亂傾。

以上的分析還是抽象的而不是具體的，然而大概執政的人們已包括在這四派之中，除了軍人一派能獨立形成一個封建集團，資產派正在裂做獨立勢力，所謂元老，西山會議派，無政府主義者，非皖化而為政客，則已搖變而為官僚，簡單一句話，封建勢力仍附屬於軍人，而以官僚為

設佈置，新興資本主義雖以資產派為代表，而政客又多半孕育於資本主義的思潮，不過在多面的政治矛盾性當中，各派各有其向心力和離心力，而一派之中又有其結合性和排斥性罷了。

我對於各派的批評，完全站在「好」一方面去推想，設身處地在他們本身的觀點而且向着好人政府主義方向走，來推論他們必然的結果。若果更詳細而具體分析，還有流氓派，買辦派，耶教派，桂派，奉派，親日派，親英派；以及種種派，不過這是主觀的分析，非客觀論者所應有的，而且往往被人誤解為毆罵和攻擊，所以不再論列了。可是這四派雖然各有各的矛盾，而其總共同點則有三，一是懷疑革命本體，二是離開黨的立場，三是各謀自己出路，總括一句話即是只知有人不知有黨，并且只知有自己的個人不知有人們的他人，前月有一個朋友從南京來，他很滑稽的對我說：『我們早不見了黨的存在，只見到黨的名詞，其實我連『黨』的字也見不到，只見到『尙黑』我聽了這朋友說的話，不禁悚然，原來他把黨字分開了兩截，拆開變為『尙黑』兩個字。可是這也是一件事實，目前謹復注意到黨，大家惟有尙黑！』

目前無論執政的文的文的武的都要做一個中國的莫索林尼

，夢想意大利法西斯帶的個人專政，行動上文字上不惜明白表現這種模仿精神。可是平情觀察，不管莫索林尼反動不反動，所以成為莫索林尼也有他成立的必要條件。我們要知道黨的專政和個人專政不同，黨的專政靠綱領，個人專政靠勢力，莫索林尼能夠造成狄克推多，自然要靠個人的勢力，他造成勢力的方法，第一步以武力奪取政權，第二步以武力向外發展，個人勢力能夠維持若干較長的期間，不在武力的向內，而靠武力的向外。意大利在戰後在歐洲至少有幾個中歐小國受其宰割，在殖民地至少有一個摩洛哥做武力宣洩的尾閥，所以全國人民視聽，不管反動與不反動，都移其目標外向，使佛西斯帶維持較長的生命。若中國第一開步走便碰到日本佔領濟南問題，不獨沒有意大利可宰割的中歐小國，反而本身要做日本殖民的摩洛哥。武力不能外向，當然內衝，而且因中國的摩洛哥與別國接壤的關係不同，又發生有親日親英的區別。親日的要做莫索林尼，親英的要做法索林尼，甚至政客也要做法索林尼，莫索林尼太多，政固不專，亂從此起。如果中國武力能夠外向，我相信今日的莫索林尼在歐洲怕不早已大呼『我們要學中國的袁世凱』，又何至於等到今日我們才拼命模仿莫索林尼呢！所以今日中國國民黨，黨面淪亡，人亦

潰散，莫索林尼今日已知個人的力量不足，在去年漸定意大利憲法要全黨伸入政府行政立法司法各機關，而我們則一方面要學莫索林尼，一方面看不見莫索林尼的新方法，只是抄襲莫索林尼丟在字籠的舊藍本，真是可嘆。

黨的破碎，在上述四派之外，很顯明的表露就是小組問題。我們不管牠是CC，或是AB，甚至如最近上海新成立的SS，以及其他一切的一切，平心而論，任往日容共時候，整個國民黨既沒有堅強組織，這種小組組織在客觀上必然發生。如果說小組組織都是反革命的，那是共產黨厭惡國民黨的宣傳，如果說小組組織都是革命的，只有對於事實是盲目的才這樣說。小組組織的作用是容共時代的一時要求，過了這個時間性，今日名成了黨內個人利害的結合。小組組織至今日不獨不能解散而且有發榮滋長之勢，最大原因就在本黨的中央不能健全，本黨的主義不能實現，本黨的政策不能確定，上層的黨員因為沒有出路，以他的地位和勢力可以找個人的出路，下層的黨員也因黨沒有希望，但是因為沒有地位和勢力只好成為散團的小組織。我從前曾指出目前小組組織的兩個毛病，一個是利益結合多於主義結合，一個是上衝行動多於下衝行動。其實照我最近的觀察，小組組織的毛病還不止此。今日散團的組織，第一

弊病無論那個組織都沒有綱領，縱使有綱領也不能普遍化羣衆化。第二他們依然找不出革命的出路，完全捨不得離開現存勢力，沒有從實幹起的決心。第三革命利益和小組織利益相同時候，自然向革命路走，假使革命利益和小組織利益不同時候。那就游移搖動、寢或向革命的反方向盲行。所以我今後判斷一切的小組織，除了單為個人工具不足論列以外，假若不把這幾種弊病掃除，不論革命的成功和失敗，都足隨時破散，隨時粘粘，結果終不會學從前的研究系政學系，也一定變了日本的政客，今日加黨，明日脫黨，對於革命的道路愈離愈遠，這可斷言的。現在有許多人的幻想，以為黨的破碎已無法收拾，把一切希望都付託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我對於這一類的希望。比如夢尤為浮泛，這個理由，我在結論再批評罷。

『以上所述是各國對於中國革命的個別態度，自綜合方面說，無論英美日和第三國際，對於中國國民革命的障礙，沒有絲毫不同，自分析一面說，英美則採軟化策略，日本和第三國際則採進攻策略。英美的企圖只要中國革命軟化，只要中國猶在牠們支配的範圍，餘外的可以作有條件的讓步。日本則不管中國革命不革命，有進攻機會還要進攻，第三國際更不管中國所需要是什麼，其目的以共產

黨取得政權為止。所以英美態度雖不滿於日本的單獨侵略，然而對於濟南事件，始終未着一詞，其目的借日本的進攻，予中國革命以一大打擊，好藉此容易行其軟化政策，第三國際對於濟案，一面對世界宣傳要扶助中國人民（但不是國民黨），然一方面依舊對日妥洽，犧牲高麗的獨立和中國的革命，最近且對日締結密約，保證日本在南滿的利益，交換自己在外蒙的活動權。中國處在這個軟化和進攻兩種勢力當中，革命勢力遂闕然中斷；於是黨便跟着這兩種勢力破碎，人也跟着這兩種勢力離散了。」

29	27	25	25	23	23	23	21	14	12	12	11	6	5	封	頁	本 期 勘 誤 表	
上	下	上	上	上	下	上	下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面	欄		
1	6	8	2	5	11	10	6	14	3	20	3	2	5	7	4		行
1-5	11	23-31	14	19	24-5	12	17	16	2	20-21	20	10	10-11	20	2		字
英帝國主義者	竭	狡	虛	能	拋	滾	很	的	爲	擲	算	死	單	終	山	誤	
接英帝國主義者	枯	矯	備	應	不	活	雖	地	如	哪	定	取	單	路	三	正	

目前黨的改組問題

許德珩

目前黨的改組，似乎是已經成了社會上一箇客觀的要求，而並不是一兩箇人主觀的感觸；似乎是社會上大多數民衆，基於革命的要求，爲中國窮苦的革命出路打算，而並不是少數人，基於什麼黨的主觀的立場，僅僅感於黨的滅亡，而謀重興「整頓」黨的一個感觸；我們並且狠相信，這箇重大的改組問題，他也絕對不會因爲一兩箇人主觀的感觸，或者基於少數人黨的主觀的立場，感於黨的滅亡而謀重新「整頓」之一些很簡單的要求，所能夠呼喊得起來，號召得起來的！

因爲過去的中國革命，已經是由一場混鬥，把整箇的革命力量，鬥得箇散亡精盡，四壁蕭然！只落得一部份的人在那些無目的暴動，而另一部份的人却是盡量的在那裏繼續的反動！中國革命，却在這箇暴動與反動之間而消沉沒落！帝國主義者，軍閥，貪官污吏，都在這箇革命的力量消沉沒落的當兒，再加緊一步的剝削搶掠，民衆却在這箇家破外寇之加緊一步的剝削搶掠當中，更加添一層痛苦，更深入一重牢獄，更多套上一重枷鎖！

我們既從中國客觀的環境來觀察，認定目前這箇反動，混鬥，剝奪，搶掠的一些事實，只是在那裏醞釀一箇新的局面，醞釀一箇新的革命力量，中國革命絕不會因此絕滅的；又從這箇最複雜的中國社會來分析，認定在這箇複雜社會裏的革命，是三民主義的革命；孫先生所昭示於我們的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這三箇原則，是針對着我們現社會的要求，是革命的，他的精神也是革命的。

不幸，他的黨到現在，却被人腐化盡了，強奸盡了！我們現在自然用不着把那些盡人皆知的什麼新軍閥舊軍閥，賣國賊，貪污土劣，研究系，政學系，國家主義派雜色人等都做了南京的忠實同志，或者還做了黨的領袖等等的話再來重複逼誦一次；當然也用不着把那些有耳皆聞，有目共見的圈點，指派，活活的把一箇革命的黨，硬弄成功幾箇私人御用的黨的事蹟，再來彷彿的申說一次，我們現在只要把南京的黨究竟是箇什麼黨，他能不能夠代表大多數民衆的利益？又能不能夠算是箇革命的黨？這我們只

要依據表冊，依據表冊中黨員的成分，他自己就會回答我們的。

據南京特別市黨部指導委員會組織部，依去年十月以前一二兩次總登記合格的黨員數目，成分，製成各種表冊，其中的職業表冊情形如左：——

(甲)登記合格黨員總計結果(十七年十月十三日上海

中央日報)

六·職業

職業	職業		總數	百分比
	男	女		
黨務	四九〇	六	五五六	一五·一
司法	五〇	五	五五	一·五
行政	五〇八	二六	五三四	一四·五
教育	一九一	二二	二一三	五·八
學生	六一四	三六	六五〇	一七·六
警務	八四	無	八四	二·三
政訓	三四五	一四	三五九	九·七
軍官	六七六	五	六八一	一八·五
士兵	九四	無	九四	二·五
農民	一二	無	一二	〇·三
工人	三三	無	三三	〇·九

商人	一八	無	一八	〇·五
醫界	八	三	一一	〇·三
報界	四〇	無	四〇	一·一
自由職業	二二	一	二三	〇·六
無職業	二九九	二七	三二六	八·八
總數	三四八四	二〇五	三六八九	一〇〇

依上面的表冊看起來，黨員總數三千六百八十九，工人農合攏起來，只有四十五人，佔全數百分之一零二，合兵士學生，商人，自由職業者，無業者不過居全數百分之三十，再合教員，報界，黨務，也不過只居全數百分之四十七；這樣一箇黨，我們很客觀的認識他是一箇官僚，軍閥，財閥，士大夫，豪紳，地主，買辦的總匯。是一些剝奪階級的集團，不是箇革命的黨，不能夠代表民衆的利益；雖然其中有很少數的青年工農，然而他們都是立於被支配者的地位；指派、圈定、威嚇、利誘，共產黨，華共產黨等等的方來，他們是毫無辦法的；既是如此，我們現在究竟應當怎麼樣呢？

我的回答是：要中國革命有出路，目前是要進一步的要求重新改組這箇腐化了的，墮落的國民黨！也更是不顧忌一切，用革命的方法來改組這箇已經腐化了的，墮

棄了的國民黨！但是在現在的時期來談改組，我們就有必須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這次的改組，雖然重要之點，是在要恢復十三年改組的精神，然而我們却要進一步的去認識，認識十三年改組的精神在那裏？直接應該繼承的地方在那裏？要進一步再去認識的地方在那裏？因為我們到現在，不僅僅是要能夠繼承既往，却要在能夠認識既往，判別既往。我們以為十三年改組的精神，是在他能夠團結當時國內一切革命的力量，排除反革命的勢力，一致向當時反動的勢力進攻，這是第一，第二是在他能夠把建築在羣衆之上，尤其是建築工農羣衆之上，如當時在各種民衆團體之外，還有種種的工會，農會的組織，農工政策的制定，直接爲工農謀利益，並且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說的：「……國民黨於此，一方面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當以全力助其發展，補助其經濟組織使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以期增加國民革命運動之實力，一方面對於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相與爲不斷之努力，以促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蓋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等等，足以見得當時對於工農羣衆是如何的援助呵！第三，是

在他能夠認識中國革命之世界性，從國際上去認識中國的地位，更從國際上去認識那些人是我們的同情者，那些人是我們的反對者，從這箇地方，打聽了當時快要抬頭的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狡猾的國家主義誤謬思想，糾正了大部份人的錯誤。第四，是孫先生那種百折不撓的精神，和他那種不妥協的精神，我們現在也只有引他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一段演說來看看，看他的精神是怎麼樣？他說：

「現在本黨召集此次代表大會，發表此次宣言，就是表示以後革命，與從前不同。前幾次革命，均因半路上與軍閥官僚相妥協，相調和，以致革命成功之後，仍不免於失敗。當袁世凱做皇帝的時候，本黨的同志，在山東，在廣東，在福建，在長江一帶的，紛紛起事，用種種力量來抵抗袁氏的帝制。那時候並不用鮮明的旗幟。以後，袁世凱自斃，總算我們反對袁世凱的成功；但是按之革命的真精神，仍是失敗。後來護法之役，也沒把革命的旗幟豎起，做了五六年的護法工夫，最後曹錕吳佩孚也贊成護法，弄得護法問題，又歸調和妥協。大抵我們革命，在起初的時候，奮鬥均極猛烈，到後結果，無一次不是妥協。即舉排葡，倒袁，護法三役而言，我們做革命，都是有頭無尾

，都是有始無終。所以終歸失敗。此次通過宣言，就是重新担負革命的責任，就是計畫澈底的革命，總要把軍閥來推倒，把受壓迫的人民完全解放，這是關於對內的責任。至於對外的責任，必要反抗帝國主義，將全世界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人，牽聯絡一致，共同工作，互相扶助，將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來解放。我們有此宣言，決不能又蹈從前的覆轍，做到中間，又來妥協。以後應該把妥協調和的手段一概取消。並且要知道妥協是我們做澈底革命的大錯。所以今天通過宣言之後，必須大家努力前進，有始有終，來做澈底成功的革命。……」

這是在當時改組的所備具的幾種革命的精神！無論是什麼黨，我是要備具了這些精神，纔能夠算得一箇革命的黨。現在南京的黨，因為彭明較著的自己壓迫民衆，屠殺工農；公開的自己來投降妥協，明目張胆的自己反動起來；並且胡漢民最近在南京所謂建設委員就職的訓詞當中，（見一月廿二日上海各報）還公開的罵十三年的改組；說：在十三年未改組以前，黨員價值向上，改組了以後，黨員價值自私自利。南京的老同志們，自私自利的官能，恐怕要特別豐富！不過他們做的是改組以後的黨官！不惟共同的行動是在那裏背叛總理，背叛總理改組的精神！就是

自稱為改組以後之黨的領袖，他箇人的言論，也都是那樣背叛總理；背叛總理的改組精神！是因為如此，才有再來改組的要求！那嗎，我們的改組是不是要堅決的自誓，確實能不能夠繼承總理十三年改組的這些革命精神呢？

不過於這些要繼承的以外，於當時的改組，我們還得要進一步的認識的地方，因為在當時有幾個先決的問題如理論問題，組織問題等等，沒有根本的解決，所以弄到終局，曾經團結的力量，都是要破裂下來，分解下來；我們現在的時候不是十三年！由十三年以來中間所經過的歷程，使我們對於十三年的改組，除了認為是應當接受的以外，還有使我們應當注意，應當進一步的認識的地方。

我所認為應當進一步的去認識的最緊要的就是理論問題。自然，我們的黨的根本理論，就是三民主義，不是其他的主義，不過因為當時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沒有堅決的確定，在當時工農羣衆雖然認為是本黨的羣衆，但是於黨的階級基礎，却始終沒有堅決的確定，也更沒有確定本黨所代表的究竟是什麼？因為如此，所以有些人竟主張全民革命，進一步的更來替封建軍閥說話，主張要把國民黨交給武裝同志！更進一步的有些人妙想天開，替士大夫說話，主張士大夫階級的革命，把箇黨索與長衫化了拉

們，什麼「連環」「道統」，弄得一塌糊塗，這是一方面。而還有其他的一方面，是在那裏主張無產階級的革命！一箇黨裏面的主張是如此！所以這些人混鬥起來，許許多多的革命青年，就在這箇枉死城中肉搏，而真正的三民主義，就隨着這些肉搏的青年，湮沒下去！同時也就是因為中國革命的性質沒有確定。有些人以為中國革命只是國民革命；國民革命的對象，內是封建軍閥，外是帝國主義者。要求反帝，反軍閥的工作，他們以為各階級都是參預的；爲得真要被壞這箇各階級的聯合戰線，取巧一點的呢，說是真要提高民生的要求——經濟的要求；（其實離開了經濟的要求，我們就不要革命，或者可以說是不着革命）直率一點的呢，或者竟是說不要民生主義！這樣一來，是把箇國民革命斷送到法蘭西革命的資本主義的舊路上去了！（其實，現在的中國，能不能夠走這條路，這條路是否走得通，還是一箇重大的問題。）還有一種人，以為中國的革命，只是社會革命，只是由無產階級直接領導的社會革命，不是什麼其他的革命。這兩種主張，都是當時改組了的國民黨中之兩種重要的主張，他們所講的，都是一民主義，而不是三民主義！在一箇黨中，這兩個問題沒有解決，所以一方面主張社會革命的人，天天在那裏預備，預

備去革那些主張國民革命的人的命！而那些主張國民革命的人，也是天天在那裏預備，預備怕那些主張社會革命的人去革他們的命，這樣一來，雖然革命的力量曾經一度的團結，而其結果還不免於分裂，這些問題我相信是目前改組的前車之鑒？而這箇理論的問題，我相信是我們一箇緊要的先決問題！我更相信只有能夠去脫感情，利害和私見，站在一箇共同的革命立場上面，共同的革命理論上面，無論是哪一黨，那一派，只要重新認識中國革命的人，在革命的三民主義之下，忘記過去的歷史和感情而團結起來；只有這樣的團結，才是可靠，才是有力！若是丟脫了共同的理論，來談團結，那只有促進革命的破裂，增加革命的糾紛，於這箇「三摘已稀，豈堪四摘」的中國革命，是只有壞處，而無益處的。

（二）是要實現黨的民主化的原則。現在一些領袖先生們，恐怕是把「黨的獨裁」講錯了！把黨的獨裁，講作首領的獨裁，或者講作是一兩箇人的獨裁了！因爲現在無論是大事也好，小事也好，只看見有指派，圈定，而沒看見有選舉！只看見有首領，沒看見有羣衆，這是黨的腐化一箇根本原因，因爲有了指派圈定，自然能夠與選的，都是些附帶逐臭的東西，稍有革命性的人，多半不能與選，一箇

黨裏的革命份子少了，附帶送吳的份子多了，當然下段就只會搖旗納喊，上段就是要借黨營私，這樣一來，當然會弄得黨是箇箇人的工具，離脫了黨的意義和革命的意義了。我們現在改組，是要根本反對這箇指派和圈定的亡黨策略，我們要絕對的相信，民眾是革命的，首領是有時革命，有時不革命的；我們是要徹底的主張黨的民主化，我們認為只有黨的民主化，才可以消滅一切植黨營私的積弊，才可以斷絕首領的專橫操縱。才可以減少軍閥政閥分贓割據之一些行爲。

(三)是要集中革命的份子，注意於大多數民眾的要求，成一箇嶄新的，革命的黨，而不要僅僅的只遷就於少數有歷史有地位的人的意見，成功一箇改良式的東西。我們在上面曾經講過。這次的改組，是基於社會上大多數民眾的要求，爲中國整箇的革命求一條出路，而並不是基於少數人甚麼黨的場，僅僅的感於黨的滅亡，而謀重具「整頓」的一箇感覺。既是於此，所以我們的精神，就是要在乎結

團結革命的新份子，注意於民眾的總要求，而不是遷就於少數有地位，有歷史的人的意見。自然我們進行爲步驟，雖然不能不顧忌於現在，而我們的打算，却不能不注意到將來；中國革命是長久的，不是一時可以成功；改組也就是要在這箇長久的革命途徑中，謀一箇永久的打算，開一條永久的道路，計劃一箇永久的將來！他自然不是遷就於少數人的意見，也不是繼承某部份的系統，某部份的法統——自然是繼承孫先生十三年改組到十六年的革命系統——所能夠成功的。因爲革命不是一兩箇人所能夠包辦的東西，也不是一兩箇人的專利品，你不能夠革命，自然有其他人來革命，你的總領，組織，革命的精神，不能夠滿足革命民眾的要求，革命民眾也就可以自己起來革命的！實在說起來，改組就是革命，也就是爲中國這箇長久革命的途徑上開出一新的道路出來的革命！離脫了革命的精神，也就無所謂改組。全國革命的青年，起來，奔起這箇革命！

一九二九，一，二十二。

印刷所重要啓事

民衆先鋒第一期陳公博先生所著中國國民革命前路一文被手民遺漏，如下的一段：

「以上所述是各國對於中國革命的個別態度，自綜合方面說，無論英美日和第三國際，對於中國國民革命的障礙，沒有絲毫不同，自分析一面說，英美則採軟化策略，日本和第三國際則採進攻策略。英美的企圖只要中國革命軟化，只要中國還在牠們支配的範圍，餘外的可以作有條件的讓步。日本則不管中國革命不革命，有進攻機會還要進攻，第三國際更不管中國需要是什麼，其目的以共產黨取得政權爲止。所以英美態度雖不滿於日本的單獨侵略，然而對於濟南事件，始終未着一詞，其目的借日本的進攻，予中國革命以一大打擊，好藉此容易行其軟化政策，第三國際對於濟案，一面對世界宣傳要扶助中國人民（但不是國民黨），然一方面依舊對日妥洽，犧牲高麗的獨立和中國的革命，最近且對日締結密約，保證日本在南滿的利益，交換自己在外蒙的活動權。中國處在這個軟化和進攻兩種勢力當中，革命勢力遂闕然中斷；於是黨便跟着這兩種勢力破碎，人也跟着這兩種勢力離散了。」

敵所本應在第三期登一啓事不料又被手民將啓事遺失，反將所遺漏之一段誤排入與本刊第三期陳先生所著中國國民革命的前路續文相混合以致牛頭不對馬嘴。敵所既負有印刷全責而又如是貽笑大方實對作者陳公博先生及讀者諸君抱莫大之歉意特向陳先生當面抱歉外謹此聲明。

檢閱第十期目錄

短評

李石曾與銀行

「張作霖遺志」的中國統一

張學良請停止黨員工作

滑稽的條約與外交

相安局勢的裏面

中國的革命與日本的明治維新

通信一則

民衆之聲

轉載一則

編輯餘談二則

萍

黎

唐卓

長年

時復

革命評論全集

陳公博

先生

精裝

一元陸角

主編

平裝

一元貳角

新書出版

三版 中國國民黨時代的是什麼

再版 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

再版 目前中國革命問題

再版 中國國民黨組織及訓練

三版 吳稚暉陳公博辯論集

中國革命與三民主義

陳公博最近論文集

著者 陳公博

著者 陳公博

著者 施樂

著者 王樂

編者 孟存

著者 施存

編者 孟存

五角

三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革命」與「改組」

馬 澔

中國國民黨自被軍事勢力，及藉其為奧援的腐化份子，政客，官僚，買辦等等，操縱離斷以後，完全變做他們御用的留聲機，軍閥時代的舊國會，省議會，縣議會，實在已經決定了。所有黨外的派別，無不窺伺環攻；黨內的小組織，小派別如西山會議派，國家主義者，研究系等，都在寄生利用。而介乎黨內與黨外的無政府黨，更大肆猖狂，硬說三民主義的目的，即在實現無政府主義。一般黨國名流，如連環先生，道統先生，便盡精忠，以至賄選議員王季文又名王乃昌者，都變做了總理的顏面，曾參，閔子暹，孟子，等而下之韓黨。他們已經把黨一清再清，連革命氣也嗅不出一點；現在硬要指派和圈定親信代表（天津市指委，因有些「不願從己解散了」），來開什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便造成清一色的工具——黨。有許多人說：「國民黨已由在民衆裏，變做在衙門裏」，我覺得衙門的範圍還太大，不如說在某某或某某幾個人手裏。因此，可以說，中國國民黨已被他們「送終」；所有他們預備的「迎

欄大道」，正好公開的為中國國民黨「出殯」。

無疑的黨是被他們斷送完了；然而豈止於此！革命不是完全失敗了嗎？現已反動政治的抬頭——從鄉村的土豪劣紳，到城市的豪紳資產階級——，恐怕比以前還要利害，帝國主義的反攻，尤有甚焉；一般革命民衆，不是斷肢折骨，便是流離轉徙，有的呻吟牢獄，有的淒涼白骨。所以在民衆間無非瀰漫着，悲哀，沉痛，困苦的空氣；黃土壇上，斷頭台前，都是印着革命。戰士的血痕；而一切政治，社會，經濟，文化，都中了陰毒和慘淡的毒。

自然我們為革命才信仰主義入黨，黨不過革命的工具；只有在革命鬥爭的需要上，才會湧現革命黨；只有革命黨的主義政綱完全實現，革命黨本身才能盡其使命，黨員才能卸其責任。然而事實上中國國民黨具有數十年光榮革命的歷史，和合於革命民衆需要的主義和政綱（不是國共分家以後），以及「總理不妥協的革命精神，都不能令我們忘情於這個黨。況中國國民黨的腐化，亦僅是少數上層份子，而不是多數下級黨員，尤不是需要中國國民黨主義

綱政實現的民衆。並且現在的狀況，不但是中國國民黨的破碎，沒落而是整個的中國革命，完全流產，失敗；所以我們對於中國國民黨破碎沒落的責任尙小，而對於中國革命流產失敗的責任，尤其重大。

但是爲黨爲革命，不能不自咎於心；然而却不能不考察客觀的事實。歷史先生告訴我們，社會現象，決不是偶然的；就革命說，過去失敗，全因客觀條件，還欠成熟；就黨說，組織上，理論上，策略上，因脫不掉環境的支配，自然許多地方尙是幼稚。可是經過這次失敗的經驗，和反動勢力抬頭的結果，益逼迫製造革命，向新的路上發展。因爲社會的進化，是被支配在矛盾的辯證的法則；一個矛盾現象的發生，本是社會進化的最初一步；而在這個矛盾現象中，使舊勢力得到重新的「相安」，和加倍的反動，正是助長新的更大的矛盾的必然條件——亦即助長進化到一個新的階段的必然條件。由事實上說，辛亥革命的原由，是在推動社會的進步；而結果僅產生了十餘年的北洋軍閥混戰與割據，其黑暗可謂比之滿清政府，有過之無不及。十三年改組中國國民黨，重新確定綱領，嚴密組織，其實質與精神，較之辛亥革命，當然進步得多，却又產生了目前這個積端反動的局面。然而我們試放開眼光來看，滿

清時代的腐敗，正是產生辛亥革命的原因，而十餘年北洋軍閥的宰制，又是十三年改組湧起革命高潮的原因，自然目前的反動，又在阻礙新的革命。所以中國革命每一次失敗，都是推動又一革命；同時又一革命比前次革命，必定更加深入和偉大。

若從中國國民黨的歷史看，由與中會同盟會到辛亥革命，以右派黃興宋教仁等等反動，與袁世凱妥協，改組爲國民黨，經營豬仔生涯（美其名競爭國會，鞏固內閣制），總理乃去另組中華革命黨，與右派分裂，繼續進行革命。十三年春更改組而爲中國國民黨。在形式上自與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以至於中國國民黨，都是以三民主義爲號召，而其內容，政綱，戰略，及黨的組織，隨中國革命潮流的湧進，都充實了新的特質。簡言之，卽三民主義的意義，愈鬥爭愈顯明，本黨的政綱，戰略，組織，亦愈鬥爭愈演進。十三年改組到現在，又逢着一個失敗的時期，黨的形和質，幾乎全被反動勢力腐蝕。然而革命的需要，却更普遍深入，「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三民主義社會之實現，成了民衆更迫切的要求；因此我們爲革命，爲中國國民黨，爲革命的三民主義，都有一個新的努力的必要！

我們怎樣努力？自然首先要確定自己的立場；因為沒有立場，便沒有奮鬥的勇氣。但確定立場絕不是主觀的，須先有客觀的認識，和認識客觀的力量（理論），才能指示行動（圖等）的方法和方向。在容共期間，一般比較革命的中國國民黨同志，固多不願隨和右派去無意識的消極反共，却自己積極的革命立場，還是欠缺。普通心理大都以為中國國民黨係領導國民革命，而中國共產黨係領導社會革命；等到共產黨認定中國革命已到社會革命，自己應擱取領導權時，自己才覺得慌了手脚。實際的他們並不認識中國國民革命的意義，對外是由民族革命到社會革命，或對內由民權革命到社會革命，乃係整個階段，必然歸結；如以為國民革命後，又有社會革命，那就等於把國民革命，看做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或民族革命一樣；無怪吳稚暉聽了陳獨秀中國國民革命和共產黨革命多少年成功的話，嚇得自己連命也不革了。其次又有一般認為共產黨係代表工農，中國國民黨係代表普通民衆的；不錯，共產黨應該代表工農，難道中國國民黨就不應該代表工農嗎？中國革命民衆，除工農外，還有比較更偉大的勢力嗎？又無怪目前反動勢力，以為要殺盡共產黨，只有殺盡工農！

此外還有一種意見，以為共產黨去代表工人，中國國民黨自己代表農民，平分中國的革命勢力，共同合作，儼如工人和農民聯合革命同盟一樣，自然永不會分裂。其實革命的成功，是要統一革命勢力，和集中革命勢力；所以統一領導權是先決條件。如果中國革命的基本勢力——工農，有兩個黨去領導；結果，政出多門，工農無衝突，也要生出衝突來。由此看來，過去中國國民黨同志，雖在天天叫革命，實在心中藏有說不出的矛盾觀念，並不知道自己革命的目的為什麼。所以不得不徘徊於右派和共產黨鬥爭當中，覺得徬徨無所適從。

至若理論，更很不統一；無論認識和主張，都不能一貫。所以在此革命破碎混亂的當中，不但整個革命戰線，沒有中心的革命理論，做指導的最高原則，即黨內所表現的，亦幾如光怪陸離，不能把同志們的意識集中起來。本來理論的重要，在革命過程中，非常偉大，可以謂『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所以『總理語知難行易』，這就是要鼓勵同志們求知的意思！雖然在名義上，中國國民黨的理論，有『總理手創的三民主義，及全部遺教，和第一次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決議等，可以遵照實行；然而三民主義的最高目的『國際平等』，『政治平等』

，「經濟平等」，樹立了遠大前途；可是三民主義內容，却以經過中國數十年革命，是包含了許多適合時代要求的固定性，和順應革命潮流的流動性；最顯明的是中國革命已經了幾個階段，而三民主義的內容，亦不得不分成幾個段落。例如同盟會時代的民族主義，實用在於排滿，十三年改組，却實用在反國際帝國主義，何嘗有天壤之別。這是因為同盟會時代的客觀環境與十三年改組時代的客觀環境不同，所以革命的對象，革命的性質，以至革命的戰略，都為之轉換，豈有革命的主義，反礙為化石之理？因此，我們信仰主義，實行主義，絕不是「抱殘守缺」，「斷章取義」，「鑿守膠柱之見」，而是要根據客觀事實，隨時發光揚大；這就是 總理所說「是事實產生理論，不是理論產生事實」的意思。

三

現在一般與反動勢力不相容的中國國民黨同志，自己漸漸知道只有求理論的出路，才能求個人或革命的出路。然而到現在，他們的理論立足點在那裏？說中國革命，是整個民族的；所以不但民族主義，是代表民族利益，即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亦是代表民族利益；如此，可以說他已不知不覺做了道道地地的國家主義。又有說中國封建制

度，早已消滅，資本主義還沒產生，中國是職業社會，不是階級社會，自然掉取和被掉取的關係，完全沒有，根本上用不着革命。否則，藉便要革帝國主義的命，也是全國人民的事；這至多只可做「全民革命」的信徒。再有以為中國國民黨應該代表壓迫民衆，不應該代表階級；如果被壓迫民衆，與被壓迫階級，沒有分別，則不應故意抽出科學的革命性；如果被壓迫民衆，與被壓迫階級有分別，我不知道被壓迫民衆是指那些人？如果帝國主義看做壓迫者，中國看做整個被壓迫者；那末，國家主義也可以說得通，如果把軍閥看做壓迫者，全國人民國看做被壓迫者，全民革命，亦未嘗不妥。更有承認有階級，而且革命應有階級做基礎，但否認階級鬭爭的，我不知道他的革命論從那裏發生？可見此種似是而非的理論，並未在所謂中國國民黨革命同志間絕緣，其危險性之大，實不在什麼國家主義，全民革命理論之下。他們最好的批評，可以引在精衛先生所說「……不然，我們自己心中，先藏着了國家主義派，如何還能反對國家主義派，我們自己心中先藏着西山會議派，如何還能反動西山會議派，一旦眼中看見的國家主義派，和西山會議派，與心中藏的國家主義和西山會議派邂逅着了，便融合起來了，那時候，軟化了……」

組織本是担任革命使命的集團最要注意的問題；否則沒有嚴密組織，等於一般散沙的遊擊隊，決不能成功。然而中國國民黨在改組之初，雖在白紙上規定了組織形式，可是實質上全未履行；尤其包括許多複雜份子：右有西山會議派，左有共產黨，各有理論，各有行動，各有組織，使黨成四分五裂的現象。在此時，站在革命和黨的立場，以與反革命的右派鬥爭，本不乏人；然以陷自己於夾擊之中，終始不能形成一個獨立組織，建立繼承黨的革命歷史的中心；所以要反右派，便不能不依借共產黨，要反共產黨便不能不歸附右派。

固然黨內有派，甚至有小組織，是黨的不幸；可是此不幸事件，既已發生，我們僅在口頭吶喊，反對不贊成；然而實際上各人幹各人的，有什麼效果。因此，共產黨一經失敗，右派便立時成功；至於我們自己，仍是沒有團結，不能互信，更不能共信，民衆一個也找不出；上焉者暫時避開，次焉者暫時消沉，下焉者乾脆投降混飯吃，難道這就算革命嗎？

最後談到民衆，自然是黨的基礎；但是大家心裏，總在迷信軍事投機。至多一部份的中國國民黨同志，看出這種危險，想接近些民衆；可是以自己沒有立場，沒有理論，

沒有組織，却使自己沒有方法去與民衆接近。說起民衆來，幾乎四億人民，無一不可邏輯到自己的黨；可是有組織的，不是共產黨的，便是右派的；實際以自已主觀意識透到客觀民衆，使其心悅誠服，信仰指導的，能有幾個。我們要知道，黨的力量，是建於民衆的身上，而革命的意識和毅力，只有在羣衆運動中，才能確定，才能堅定。尤其是所謂領袖，只有在民衆運動中，才能鍛鍊出來；亦只有頃刻不離的在民衆行動中，表現了比任何人更勇敢，更剛折更能爲大多數人利益奮鬥，才能產生出來。

四

現在革命和黨都失敗了，滅亡了；形式上有許多人要黨，叫革命，可是黨和革命的命運，却斷送在他們手裏，在他們所製造反動局面下，一方面在想建設封建資本主義，彷彿什麼明治維新，造成第二個遠東大帝國主義；一方面在加緊暴動政策，實現第二個蘇俄；在此極端矛盾之下，我們不願投降反動勢力，又不願加入共產黨，不是無路可走嗎？然而實際中國革命，並不如是簡單，中國受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其必然崩潰的命運，中國不能發達資本主義，固做不到他們羨慕的大帝國。同時又以中國客觀上沒有發達資本主義，和主觀上僅有少數無產階級，亦不

能馬上實現蘇俄革命；所以在這兩個極端的中間，便反映出了中國革命，以及我們應走的康衢大道。我們由認識這個中國革命的特性，由民族革命，或民權革命到民生革命（即社會革命），既不是兩個階段，亦不是一氣呵成；那末，只有重新確定革命的三民主義的信仰，是沒有錯誤。並且負擔這個革命使命的是中國大多數的工農及小市民的羣衆；那末，只有站在這個階級的立場，無懷疑無妥協的奮鬥。一方面我們知道中國革命，以被支配在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故，應求與國際一切革命勢力合作。這固然是我對中國革命應盡的責任，亦是對黨，對 總理革命精神，應盡的責任。

不過客觀的革命需要，雖可確定三民主義及中國國民黨的自信。可是主觀的「中國國民黨」，却是已齟齬在反革命與不革命的手中，少不得等到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一開，這個招牌，就大大的改換了老板，（現在已經轉了老板），等於「物在人亡」，我們到那裏去找這個「中國國民黨」死去靈魂呢？然而黨是為革命的，只有革命才有資格有黨，我們應該本過去一切痛苦失敗的經驗，堅決自己的信仰，繼承 總理革命精神，不妥協的把我們一切革命勢力，一切同志，都集中起來，等到我們革命勢力，戰勝反動勢力時

，不怕黨不是我們的。又以我們的黨，是被反動勢力所篡佔利用，不是黨的本身消滅革命性；所以黨是我們的，不是反動勢力的，同時以我們的黨，被反動勢力所篡佔利用；所以我們對黨應該負起挽救的責任——一切信仰三民主義的，亦有這個責任——方能補贖我們過去放棄了任責的過失。

並且 總理會以「革命的再來過」的精神，去改組為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我們難道就不可拿這種精神，來改組這個反動勢力所篡佔利用的黨，而成為革命的黨嗎？所以現在是革命的，應該認識革命的要求，和自己的責任，不要在腦筋裏迷信法統；因為革命黨法統的價值，只有由革命來決定，其本身價值，絕不能超過革命的價值以上。更不要想用妥協方法，改良手腕，去和反動勢力，講價錢以圖和平的接近政權；因為和反動勢力絕無妥協改良的餘地，否則對黨對革命都是不忠實；並且以我們妥協改良的方法而失敗，那時民衆就不會再來原諒了！

現在事實擺在面前，只有「改組」中國國民黨，才能使革命有出路，黨有生機；況「改組」的意義，是適應革命的需要，實行革命的三民主義，繼續 總理革命精神，補贖我們過去錯誤的過失，以圖再集中革命勢力，切實完成！

至少推遲中國革命；所以我們的「改組」，是相當於由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以至「中國國民黨」，或由俄國的「社會民主黨」改組為「佈爾什維克黨」，絕不是由「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民二)。並且以「改組」的使命，在於「革命」，自然「改組」的意義，是以「革命」的意義來決定。因

黨員的成分問題

資產階級的政黨，長於政治的陰謀；中間階級的政黨，長于輿論上的宣傳；無產階級的政黨，長於鬥爭的組織，這是我個人幾年來觀察的結果，而且認為是基于一客觀的必然，並非由于主觀的偶然。我們可以拿歐美各國既成政黨的事實來做證明，也可以拿中國政黨的現象來做比較；並注重說明這種現象發生的客觀原因。

(一)資產階級的政黨，總是代表少數人的政黨，在政治上，以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必須具備幾個客觀的條件；(二)智力的優越，(三)輔助工具的完備，(四)社會生產工具的掌握，(五)下層民衆的駕馭。在歷史上，資產階級因為掌握了全社會的生產工具，就變成了政治上的統治階級；於是國家的行政機關，悉為資產階級出身的份子所獨佔

此，我們可以總括起來說：

我們要「革命」只有「改組」；

「改組」即是為「革命」；

只有「革命」才配「改組」！

一九二九，一，二〇。

黃惠平

，就是現在號稱民主的國家，資產階級在國家的行政機關上，仍然佔有絕對的優勢。根據這個歷史的遺傳，資產階級的政黨，富于政治的經驗，長于政治的陰謀，乃是歷史的必然，並非我個人的杜撰。拿具體的事實來說：一九二四年英國保守黨借徐諾維夫書札事件為口實，推倒工黨內閣；一九二六年法國右黨撲薩開雷以銀行家為後盾，使佛郎跌價，弄得左派內閣對於財政根本沒有辦法，藉此推倒赫里歐內閣；都是資產階級政黨的政治陰謀的成功。至於我國過去的安福系，交通系與代表資產階級的袁世凱，長於政治的陰謀，慣施縱橫捭闔的手段攫取政權，乃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是無待詳加說明了。

(2)中間階級在一個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以內，其數

不量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性質究有變更，而經濟利害的共同更趨一致。近代民主政治勃興以後，代表中間階級利益的政黨，在西歐各國強而有力，即基於這種客觀的原因。例如德國的中央黨，幾有左右全德政治的力量，中央黨左傾，則左派得勢，中央右傾，則右黨掌權，但就中間階級的社會生存條件與其經濟背景而言：「鋼的組織」「鐵的紀律」，既非這個階級的能力所能勝任；在歷史上，中間階級參加政治的年代乃民主政治勝利以後的事實，所以政治的經驗，又不及資產階級的政黨。於是中間階級的政黨，就不得不以輿論為其奪取政權，保障其階級利益的惟一武器。所以中間階級的政黨，長於輿論上的宣傳，乃其適應生存的必然結果，如德國人民黨(Deutsche Volkspartei)的機關報 *Vomische Zeitung* 中央黨(Zentrum)與巴伐利亞人民黨(Bayerische Volkspartei)的日報(Berliner *Janitor*)我國研究系主辦的北京晨報，……乃中德兩國的最好的輿論機關，便足以充分證明前面假定的正確了。

(c)「無產階級爭奪政權的工具，除了組織外，沒有別的利器。」這是列寧對於共產黨所下的定義。這裏有幾個客觀的原因，促成無產階級的政黨長於鬥爭的組織：

(一)無產階級的政黨，是現社會中既成政黨中革命的政黨

，他們要想奪取政權，不得不需要爭鬥的革命組織。(二)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內，在量的方面，雖然佔全國人口中之多數；但在質的方面，較之資產階級，與中間階級，以社會地位與教育機會的關係，非常落後。無論如何，必須有這階級先驅份子的堅強組織，才能實現自己的政策，(三)因為近代產業的集中，無產階級的社會生存條件，及生活形態，沒有自由主義的傾向；容易形成鋼的紀律，服從鐵的紀律。現在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其組織之嚴密，紀律之整肅，這是人人知道的事實，但在這裏須順便說明的：就是「組織」是保障一個革命黨成功最重要的要素；卻不是惟一的要素，黨的主義與黨的政綱，是否適於此時此地客觀的需要，也是一個革命黨成功的必須條件呵！

說到這裏，我們便要回溯到中國國民黨的本身問題了。中國國民黨，是一個革命的政黨，是一個代表大多數被壓迫民衆的利益而奮鬥的革命黨，她必須獲得大多數被壓迫民衆的擁護與參加，才能完成其歷史的任務，但是民衆的大部分，是農工階級，所以我們的黨，應當特別注重農工的利益，同時因為中國是一個產業落後半殖民地的國家，都市中的小市民，亦為被壓迫民衆的一部分，其需要解

放的迫切，並不亞於農工階級；所以我們的黨，亦不應漠視其小市民的實際利益，與其革命的要求。依本黨的主義政綱與其過去的歷史來說：中國國民黨絕不是一個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也不是一個代表中間階級的政黨；（至於可能不能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請參看陳公博先生所著的「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我們可以肯切地說：中國國民黨是一個堅決地代表下層階級——農工與小市民——的利益而奮鬥的革命黨。所以我說：「無產階級爭奪政權的工具，除了組織外，沒有別的利器。」這個黨的定義，可以同樣地適用於革命的國民黨。但是黨的組織嚴密與否，不全在成文章程之殘缺與完備，紀律之鬆懈和緊張；而另一方面須看構成黨的成分之單純與複雜。幾年以來，我時常聽到許多同志談到黨的組織問題，不是批評本黨組織大鬆懈無力，便大罵本黨組織大腐化。但是很有人考慮到黨的組織，為什麼會鬆懈無力，本黨的紀律為什麼會疏散不振，自從陳公博同志提出黨員的成分問題以後，才算發見了本黨組織鬆懈撤結之所在。公博同志的意見：以爲本黨黨員的成分，應當保持如左的比例，才能鞏固黨的民衆基礎，保障本黨的革命性不至消失。

黨員百分率

農民

百分之五十

工人

百分之三十

小資產階級

百分之二十

公博同志的意見：更以爲我們能夠保持這個百分率那麼國民的組織和訓練，可以不成問題；如果我們不能保持這個百分率，任何嚴的紀律，都無法可以行使。並舉辛亥革命的事實爲例，認定黨員與民衆的要求不一致之時，除了黨的崩潰之外，絕無其他可走之路。要求全黨同志對於這個問題，加以深刻的考察。我以爲這個問題，是黨的改組運動中一個極重要問題，並承認公博同志的意見是極正確的意見。但是怎樣纔能保持這個百分率？具體的辦法怎樣？古語有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要拿人家的好處，補自己的短處，不可因爲反對共產黨錯誤的主張與策略，就不肯認識人家組織的優點。我現在把俄國共產黨限制黨員入黨的辦法抄錄下來，供全黨同志的參考，然後再討論我們自己的辦法。

黨的分子和入黨的條件，對於黨的性質如何？有莫大的關係；因此黨員之意義與其作用，在黨的建設問題，往往佔極重要的位置。因此俄國共產黨在章程上關於入黨的規定是這樣：工人六個月，農民與手工業者一年，其餘的

人二年，畢業於政治學校之學生由候補黨員轉為正式黨員時，分三條辦法：（一）工人和農民或工人出身的紅軍軍人；（二）不剝削別人生產力的和耕種力的的農業和手工業者；（三）其他第（一）（二）類必須有入黨三年的三個正式黨員介紹，第三條必須有入黨五年的五個正式黨員介紹。由此看來，對於工人入黨的條件，為最輕了。所以如此者，主要的是因為布爾塞維克黨，原是純無產階級政黨的；所以必須使工廠的工人多多加入。第十四次全蘇聯共產黨大會決定，又把工人入黨的候補條件更減輕了，凡是在工業中直接參加生產的工人入黨只要入黨一年的二個黨員介紹就夠了。（見加卡，諾維亦著「俄國共產黨之建設」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印行）

由此看來，俄國共產黨能夠推翻專制沙皇與資本主義，全賴其有嚴格的紀律，與具體的辦法，但是我們怎樣？根據我俄黨章的規定：黨員入黨時，應須有本黨黨員二人以上之介紹；填寫入黨志願書，經向所請求之區分部黨員大會之通過，區黨部執行委員會之認可，即為本黨黨員；

怎樣造成健全的黨

既沒有候補期限的規定又沒有農工小市民與其他階級出身的份子的區別。這次南京中央頒布的特種登記條例，更是大開其門，讓那些自私自利的野心家，混進黨來。所以實現黨的改組，是恢復本黨革命性的惟一出路，要使黨的改組，不流於空虛，我以為對於黨員的成分問題，在原則上，最低限度應有兩種嚴密的規定：（一）黨員入黨須有候補期限的規定，我個人主張農工小市民入黨的候補期限三個月，知識分子入黨的候補的候補期限半年，如知識份子入黨的候補期限亦規定為三個月，就應當加以別種的限制。（二）農工小市民入黨的程序，應與其他階級出身的份子入黨的程序有嚴格的區分，否則，不是流於空虛，便是流於幻想。黨員的成分問題，終究是一個紙上談兵不着實際的問題，黨的改組，便也無從實現，祇有讓那些自由主義的機會主義者來腐蝕本黨；總理四十年來艱難困苦締造的國民黨，便從此完了。我希望全黨的革命同志，對於這個黨員的成分問題，加以深刻的注意。

（完）

施存統

(一)

我們曾經幾次說過，要復興中國革命運動，必須實行黨底再組織，根本改組國民黨，恢復革命的國民黨（也可以說重建新的革命的國民黨。）我上次並且說過，我們要改組國民黨必須採用革命的手段，而且也只能採用革命的手段。現在事實很明顯地擺在我們底面前，改組國民黨的運動，決不是一個改良的運動（也不應當是一個改良的運動），已成爲一個革命的運動了。我們承認，這個改組國民黨的運動，是目前客觀的需要，是復興中國革命運動的第一步。在這一個認識上，我們毫無躊躇地積極地參加這個運動，我們並且希望一切革命的同志也與我們一樣地積極地參加這個運動。我們敢負責任地對一切革命的同志宣言：我們從事這個運動，爲的是中國革命與中國民族，決不是爲我們個人，更不是爲什麼『權力者』。我們痛心於革命勢力底分裂，我們希望一切革命勢力重復在新的形式之下團結起來。我們積極參加改組運動，完全爲的這種意義。

然則我們所要改組成成功的國民黨，是怎樣的國民黨？換句話說，我們心目中的國民黨，我們所要造成的國民黨，是怎樣的國民黨？簡單地說，我們所要造成的國民黨，

第一必須以工農小市民（即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爲黨底階級基礎，能夠充分代表工農小市民底利益而奮鬥；第二必須完成整個三民主義的革命，目前繼續進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與反封建勢力的民權革命，建立真正革命的民主政權，一直達到反資本主義的民生革命，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第三必須統一工農小市民底一切革命勢力，鞏固工農小市民底革命戰線。這就是我們所要造成的健全的統一的革命的國民黨。我們相信，只有造成這樣健全的黨，纔能領導中國革命，完成中國革命。

(二)

那麼怎樣纔能造成健全的黨？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我在『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及訓練』（中山大學訓育叢書之一，上海各書店有翻印版）一本小冊子中，曾經舉出六個條件，我覺得大體都沒有錯，現在摘要轉抄於下：

『第一，要使每個黨員都能服從黨的紀律，能爲黨的主張而奮鬥，並能組織民衆，領導民衆。在消極方面，能夠打破封建的，地方的，宗法的思想與觀念；剷除虛榮心，自大性，與自私自利的念頭；消滅個人的浪漫行動與私人的感情結合。』

【第二，要使區分部成爲黨員生活與活動的中心；區分部能夠實際訓練黨員，指揮黨員，並能深入羣衆當中；黨員相互間，有深刻的批評與嚴厲的監督，並能使黨員樂於接受批評與處分，以改正自己的錯誤，區分部能分配每個黨員以適當的工作並能提高他的工作能力；一切個人的經驗都成爲集團的經驗，使每個黨員都能利用集團的經驗。

【第三，黨的各級機關應該有非常密切的聯絡，黨應該成爲整個的有機的組織。中央黨部與省黨部，省黨部與縣黨部，縣黨部與區黨部，區黨部與區分部，都應該像一部機器一樣，活潑敏捷地轉動，中央下一個命令，整個黨便會有系統地活動起來，由一個中心機關將所有的力量分佈出去，深入於一般羣衆中。要有這樣的作用，必須全黨一致地遵守紀律。

【第四，要選舉黨內最有經驗（革命的經驗，不是反革命的經驗），最有能力（革命的能力，不是反革命的能力），最忠實（忠實於革命與民衆，不是忠實於反革命與個人），最勇敢（勇敢於革命，不是勇敢於反革命），最孚衆望（即最得革命羣衆底信任，不是最得反革命羣衆底信任）的人，做黨的最高領袖，組織强有力的中央機關，蓄積黨的

一切革命經驗，利用黨的一切革命經驗，來指導黨的活動。省黨部，縣黨部，區黨部，區分部等，亦要有最好的領袖來指揮各該黨部的活動。這些領袖，都要從實際的革命運動中產生。好的領袖便是革命經驗最豐富，指導能力最偉大，對於革命最忠實，最勇敢，深得羣衆信仰的人。領袖的得人與否，對於黨的發展，關係很大；沒有好的領袖決不能有健全的黨。我們的黨，若有許多好的領袖，集合他們的革命經驗（我們黨的各級黨部，一律採用委員制而不採用個人獨裁制，就是要集合許多人的革命經驗成爲一個集體的經驗，可以減少許多的錯誤）來指導黨的活動，引導黨的順利發展，黨是一定會健全的。好領袖是黨的重要的工具，黨是一定需要他的。

【第五，要吸收一切革命的分到我們黨裏來，集中國民革命的力量。……我們的黨，爲集中革命勢力，造成健全的黨，必須吸收一切革命分子到黨裏來；任何革命的分到，只要他肯加入，願意遵守本黨的紀律，我們的黨當然歡迎他進來。……

【第六，要真正代表大多數被壓迫民衆的利益而奮鬥，獲得大多數被壓迫民衆的擁護。我們的黨是一切被壓迫民衆的黨，我們應該認識他們的要求，喚起他們的覺悟，

爲他們的利益來奮鬥；這樣，才能得到他們的擁護。民衆的大部份是農工階級，最痛苦最能革命的亦是農工階級，所以我們的黨應當特別注重農工階級的利益（根據總理的農工政策），要得到農工階級的擁護。我們要造成健全的黨，必須要得到大多數被壓迫民衆尤其是農工階級的擁護。

「如果我們能夠很圓滿地做到上面六個條件，則我們的黨必能造成一個極健全的黨，我們的革命必能急速成功。」

這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我在廣州中山大學所說的話。我相信，我這些說話，現在還一樣地可以適用；但是現在的國民黨，却絕對不適用這些話了。現在的國民黨，不但不上面所說的六個條件，而且它所表現的事實，恰恰與上面所說的相反。國民黨因爲不能做到上面所說的六個條件，所以「現在」變成了一個背叛主義背叛民衆背叛黨綱背叛黨章的黨，自然這是由於少數官僚軍閥昏庸老朽分子底篡奪。

(三)

現在我們且根據上面所說的六個條件，與目前國民黨底實際情形對照一下。

第一，我們所能看見的是，黨底紀律毀壞無餘，黨員底成份根本一變。現在南京的所謂中央黨部，早已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決定的黨綱黨章，全部毀棄，自從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以來，已經逐漸地造成他們自己的「另外一套」，不待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底召集，也可以說已經達到完成之域了。至於黨員底成份，早已充滿着官僚軍閥豪紳地主買辦洋奴以及其他一切腐化反動的分子，自從「特別登記」的辦法施行以來，更是湧進了一大批昏庸老朽的反革命的「元老」（他們是「元老」，因爲過去掛過幾天革命的招牌，但是行動早已是反革命了，所以稱爲「反革命的元老」），真可謂無所不包無所不收了。這第一種事實，剛剛與上面所說的第一個條件正相反對。

第二，我們所能看見的是區分部有的是「空空如也」；一無所有；有的變成俱樂部，大家玩耍玩耍；有的變成談話會，彼此清談清談；有的專門捧場，有的專門反動；更有些是整理了一年，到現在還無處可找。關於此中情形，恕我不能詳細描寫；不過我敢於武斷一句，與上面所說的第二個條件一定相反（也許有些例外）。

第三，我們所看見的，更是可笑得厲害。姑不要說各個軍閥都有自己所支配的「特別黨部」（例如兩湖有兩湖的

『特別黨部』，兩廣有兩廣的『特別黨部』，最近張學良也要在東三省組織東三省的『特別黨部』，形成『某記某記』的國民黨；就是在『同一字號』之內，小夥計們也各有各底恃殊打算，等於同床異夢。一個中央黨部，完全隨着軍事勢力而轉變，自己一點也作不得主，何功命令下級黨部。一切的一切，最後的決定，總在於幾個有軍事實力的人，政客官僚所能玩弄的把戲，也只能在這個範圍以內。名義上說什麼『黨權高於一切』，實際上所表現的完完全全是『黨權低於一切』。整個的黨，不但完全變了質，而且也完全變了相，四分五裂得不成樣子，與上面所說的第三個條件根本相反了。

第四，現在的黨，最高領袖頗不算少，最近連張學良『同志』（可惜張作霖死了）也加入最高領袖之中，真可謂『空前絕後』，盛極一時，比民國元年強得多了（因為那時袁世凱親段祺瑞等『最高領袖』都還沒有加入國民黨）。這些最高領袖，有幾個反革命的經驗非常豐富，能力也很偉大，對於反革命的忠實與勇敢，那更不必說起，至少也可與袁世凱段祺瑞相比。他們現在深得封建資產階級（他們底民衆）底信任（信任他們有反革命的經驗與能力，比袁世凱段祺瑞好得多），並且深得帝國主義者底信任。他們

現在在反革命方面，的確是『最有經驗，最有能力，最忠實，最勇敢，最孚衆望的人』；但是在革命方面，恰恰相反。

第五，我們現在所看見的，與上面所說的第五個條件，也完全相反。現在不但不吸收革命的分分子，而且繼續不斷地排出革命的分分子，勢非排出一切革命分分子於國民黨門外不可。共產黨員是不必說了（好像上帝註定共產黨員是『該殺的』，殺完了共產黨，三民主義便算實現了），就是稍具革命性的分子，也一律被加上『紅帽子』（名目多得很多，如什麼『準共產黨』，『國民黨的共產主義者』，『共產黨的朋友』，『搗亂分子』等等，不計其數），站不住腳，甚至於連帶地被屠殺了。他們底勇於反革命工作，慘殺革命分分子，爲歷史上任何國家所沒有看見過，其能『流芳百世』已毫無可疑。聽說湖北某某軍閥對衆宣言，『官可誤殺三千，不可漏網一個』，其抱負氣魄之大，實足令人驚歎。難怪湖北有幾縣清鄉，不管青紅皂白，只要有國民黨徽章的，看見便殺（這是湖北一個朋友告訴我的事實，幾個人不能相信其野蠻殘酷一至於此），橫豎中國有四萬萬人，殺了幾千幾萬，算不了什麼一回事。革命失敗，反動必然到來，這原不足奇怪；不過頂着『革命』的招牌去殘殺革命的分

同志，未免太傷心了。

第六，說什麼『要真正代表大多數被壓迫農民的利益而奮鬥』，那更不用提起，提起了只有氣死了人。實在呢，對於大多數被壓迫民眾，只要少剝削一點，少壓迫一點，少殘殺幾個，就算是『大慈大悲』，『仁愛』無比了。本來國民黨應當以農工羣衆為基礎，特別維護農工利益（就是講『全民』利益吧，『農工』利益也是占最大的部份），但是現在的事實，一提到農工，好像就是共產黨，至少也有『共產黨的嫌疑』，國民黨不但不要農工，好像專與農工作對，尤以兩湖兩廣為最甚。國民黨放棄了農工政策，也就拋棄了農工羣衆，現在的國民黨，對於農民，不但不幫助他們去解決土地問題，不實行最低的『二五減租』而且加重他們底負擔，禁止他們底團結，甚至於殘殺他們（雖然是軍閥利用國民黨底名義，然而國民黨為什麼讓軍閥利用）？對於工人，不但不幫助他們提高地位和改良生活，不促進他們底團結與教育，而且解散工人底團體，禁止工人底罷工，壓迫工人底行動。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決定的關於農工的政綱及決議案，中央及各省區聯席會議所決定的關於農工的政綱，不但一條沒有實行，而且根本違反了。去年南京黨部（所謂中央黨部）所發佈的什麼告工人書（在

郵務工人罷工時所發佈的），暴露得最清楚。所以現在農工羣衆不但肯擁護國民黨，而且一聽到國民黨三個字便頭痛了。這是與我上面所說的第六個條件完全相反的情形。

所以總括起來說，現在的國民黨，為什麼會糟到這步田地，就是因為沒有做到上面所說的六個必要條件。我們如果要造成健全的黨（自然是革命的黨），絕對地必須做到上面所說的六個條件。但是現在要造成健全的黨，絕對不是在南京的所謂中央黨部支配之下所能做到的，必須跳出南京的連環圈子，才有希望。現在還要在南京的連環圈子裏面討生活的人，實際上只有幫助反革命，儘管王觀上是很革命的。因此，一切真正革命的同志，應當根本地對於南京黨部底支配斷了希望，重新認明中國革命底出路，站穩革命的立場，下一個決心，重新建立一個革命的國民黨，努力造成一個健全的統一的革命的國民黨。

(四)

然而現在要造成一個健全的革命的黨，僅僅做到前面所說的六個條件是不夠的，至少還要加上後面所說的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要有新的革命綱領適應新的革命需要。我們承認：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決定的綱領是

對的，中央及各省區聯席會議所補充的綱領，大體上也是對的，這些我們都要奮鬥，求其實現。但是時代是前進了（表面上是退後了），所以南京黨部拼命地開着倒車），新的革命需要已經非舊的革命綱領所能滿足了。歷史已經提起了許多新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土地問題，逼得我們不能不給與它以一種正確的解答。中國革命前途，也已經很明白地顯示給我們看：要走非資本主義的民生社會。在這種客觀的情勢之下，僅僅保持舊有的綱領，顯然是不夠的；必須有進一步的新的綱領（自然是革命綱領），才能滿足新時代底新需要。我們此時必須規定一種新的革命綱領，能夠充分代表工農小市民底實際利益，並能領導他們走上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的道路。我們現在如果要造成一個健全的革命的黨，絕對地要有新的革命綱領適應新的革命需要。（詳細討論這個問題，當另俟專稿。）

* 第二個條件就是要不斷地吸收新的革命分子並使他有機會發揮其能力。一個黨自然不能沒有歷史，對於歷史自然不能不有相當的尊重，然而尊重歷史必須有一定的限度，且須有一定的條件。一個在黨內歷史很久的人，也許能力很小，不大革命；一個歷史很淺的人，也許能力很大，十分革命。在這種時候，當取後者，不取前者。一個革命

的黨，分配工作的標準最重要的有兩個：一個是對於革命忠實及努力的程度，另一個是工作能力底大小。革命不是背歷史，更不是背革命的歷史。革命黨裏沒有所謂「元老」，能力最大工作最努力對於革命最忠實的人就是「元老」。像現在有些昏庸老朽分子，行動早已是反革命，還自命為「革命元老」，「老同盟會」，甚至於以曾經跟隨總理若干年而自鳴得意，真所謂「老而不死」，「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真正的革命黨，不論是誰，即使歷史再久些；資格再老些，只要一旦反革命了，便馬上以敵人相待，毫無客氣可言，在革命黨裏專門背歷史謗資格的人，可以說是最無恥的人。自然，一個革命黨，對於黨內歷史最久資格最老有能力而忠實的同志，應當表示較大的倚重，但要出於自然，不能故意地抬高。尤其在現在這個革命勢力一度分裂重新團結的時候，對於任何革命的同志，不問其過去的歷史如何，只要目前主張相同，一塊行動；都不應當有所歧視。至於現在開始準備的時候，更當聯合主張相同的有能力的革命同志，從事一致的奮鬥。沒有能力的人，在革命黨裏霸占着重要的地位，以妨礙有能力者底工作，對於革命是一種罪惡。我們現在如果要造成一個健全的革命黨，無疑地應當盡量吸收新的有能力的革命分子，並應使他們有

機會發揮他們底能力，貢獻到黨裏來，充實黨底革命生命。目前黨底組織，絕對地要與這種實際的需要相適應。不然；健全的黨，永不能造成。

第三個條件就是要靠下層革命羣衆底推動。我細細觀察現在的所謂革命領袖，多半情性甚重，不推不動。現在還不是領袖領導羣衆的時代，還只是羣衆推動領袖的時代。自然，我們希望有好的領袖來領導我們，可是現在還沒有我們理想中的領袖。在這個時候，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廣大的下層革命羣衆。我們希望下層革命同志及下層革命羣衆，自己從新做一番澈底的認識，然後站穩自己底革命立場，把真正羣衆底要求提出來，推動上層領袖前進一步。我相信羣衆底力量，我尤其相信革命羣衆底力量。此時要想造成健全的黨，我相信下層革命羣衆底力量是最大的動力，而且是根本的動力。不認識這一點，無異不認識

中國革命現階段中黨的歷史任務

朱 璜

革命。一切革命的同志，眼睛要多向下面看，少向上面看。我們大家都要明白：現在要造成健全的黨，下層革命羣衆努力與推動是最重要的的一個條件。

如果我們目前能夠具備或確立這三個條件，一步一步地鬥爭下去，再做到上面所說的六個條件，我相信我們必能於短期間內，造成一個健全的革命黨——代表工農小市民的統一的革命的國民黨。如果不能做到這一些條件，或者做得不充分，那麼我們底運動必歸於失敗。

新的革命時代，快要到來。我們要努力準備新時代底到來。這當中底根本問題，就是黨的組織問題。組織是理論與行動底媒介物。理論透過組織，才能變為行動。離了組織，理論便成空談。所以我們要注重組織問題，我們要努力造成健全的黨，以準備新時代底到來。

一九二九，一，十五。

雖然全國都掛起了青天白日的旗子，雖然國民政府將要得各國——尤其是歐美列強的承認，雖然連僻在邊隅的新疆和甯夏等處也懸掛着總理的遺像和遺囑，而中國革命

之正遭到厄運，反革命勢力之飛揚跋扈，那是一個不容我們否認的事實。

我們知道中國革命的目的，是在於求得國際的政治的

經濟的平等，這就是說：中國革命必須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建設一個非資本主義之自由平等的國家。

可是我們來分析現狀就可以知道不但這一個任務沒有達到，而且帝國主義封建勢力這一切的反動勢力正在更進一步的向革命勢力進攻。

因為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之政治的經濟的侵略，使中國手工業農業經濟開始破產，陷社會於不安的騷動的狀態中而誘發了近代的革命運動。中國革命開始就是羣衆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無論是太平運動，平英團運動，義和團運動，都是帶有很充分的反帝國主義的意義。我們可以說，中國革命的第一個對象是反對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痛苦的原泉，是一切反動勢力的總腦，是被壓迫人民的公敵。無疑的如果我們拋棄了反帝國主義的立場，不但失去了革命的意義，而且在客觀上，我們已經投降帝國主義，做革命的敵人了！帝國主義的勢力存在一天，即是中國人民的痛苦一天不得解除；革命勢力與帝國主義是勢不兩立，絕對沒有妥協的餘地。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擴大，就是中國革命的開展；同樣，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消沉，就是革命高潮的低落。

五卅運動以後，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高潮由大都市擴大到窮鄉僻野，使中國革命呈空前的發展：上海和香港的罷工，各地的反英運動，不但使大英帝國遠東殖民根據地的香港衰落，不但使日本和英國都受嚴重的打擊，而且，這一個一九二六年的中國革命高潮，給了世界一個鉅大的影響。保加利亞和爪哇的暴動，摩洛哥里夫民族的英勇的戰爭，埃及，印度朝鮮和菲列濱等處獨立運動的擴大，都是間接直接受了中國革命之相當的影響。在倫敦，在巴黎，在華盛頓，在東京，尤其是在日內瓦的一批帝國主義所蒙養的政治家，他們都是愁眉不展的焦慮着中國問題，因為中國革命的發展，有促成世界革命，根本葬送帝國主義的危險。

在那時候，國民黨的統治勢力雖僅侷於廣東一隅，而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是非常之光榮的，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及其工具的驚惶失措，英帝國主義的機關報——泰晤士日報甚至大聲疾呼的要國民注意這『將醒的睡獅』，因為這『將醒的睡獅』會擾亂世界的浩安。另一方面，全世界的革命民衆——西方的被壓迫階級和東方的被壓迫民族的奴隸們都在歡呼着中國革命成功萬歲的口號。

可是帝國主義的力量究竟還是不容我們忽視的，這一個中國革命的高潮，終於被帝國主義的反攻所鎮壓下去。

現在是一個完全矛盾的現象，黨的統治勢力已經擴大到統一全國，而革命運動反而消沉下去，帝國主義的侵略更進了一步。

這些都是不容我們否認的事實：第一，是英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顯然更擴大了。最劇烈的南方的反英運動，完全被英帝國主義用間接的甚至直接的力量鎮壓下去；領導反英運動的各工會各團體被封了，領袖被殺死了，不但從前完全被抵制的英國貨仍舊可以暢銷無阻，而且在政治上在經濟上，英帝國主義握着無上的威權，勝過於從前東交民巷的太上政府。在長江一帶甚至北方，英帝國主義依然保持着優越的地位，而且更增高了。第二，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硬政策」顯然是勝利了！山東的佔領，滿洲的獨霸，漢口各處的屠殺，這些超平等條約的舉行，無條件的使懦弱的中國屈服了！第三，美帝國主義的「軟化政策」，顯然也已經有了相當的結果，金融的操縱，經濟侵略的猛進，這一些無形的進攻比日帝國主義的強硬政策和英帝國主義的砲艦政策更利害十倍！第四，顯著的外交上的失敗，更是我們都可以看見的，各國雷案的解決，在國民政府的

外交史上永遠留着一個不能洗刷的污點；濟南慘案當然更不用說了。

封建勢力是帝國主義在中國最好的工具，單是蔣民國以來，從袁世凱一直到現在，封建勢力不知為帝國主義建了多少功勳。我們要反對帝國主義，我們要求得被壓迫人民的解放，無疑的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封建勢力！封建勢力不但是民主政治的敵人，而是民族的敵人因為他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中國革命如果離開反對封建勢力的標準，那末中國革命根本失去了民族主義民權主義的意義，自然更談不上民生主義了。

五四運動，反對封建勢力的新文化運動發展得非常迅速，一九二四年黨的改組，更是充分的表現排除封建勢力的精神。馮自由鄧家彥等的叛背，西山會議派的肅清，這些都是表現革命的進展，封建勢力的衰落。尤其是北伐軍出發以後，民衆運動的發展，使封建勢力受這個嚴重的打擊。但是因為帝國主義反攻的勝利，革命勢力的低落，使封建勢力也更猖獗起來。

在目前幾乎到處都在高唱着軍閥已經打倒了的勝利之歌，可是事實告訴我們：失敗了的是代表封建勢力之上升

建築的吳佩孚和孫傳芳張宗昌，而整個的封建勢力——封建軍閥之社會基礎一點也沒有動搖，而且可以說更盛大了。吳佩孚張宗昌孫傳芳失敗的意義，不過和袁世凱曹錕段祺瑞失敗一樣的意義。事實所昭示我們的，吳佩孚張宗昌孫傳芳固然是失敗了，而軍事上的割據形勢依然如故，封建軍閥的下層建築的土豪劣紳比曹錕袁世凱時代更猖獗了！尤其是兩湖兩廣，土豪劣紳都是地方上的土皇帝，如是自己不滿意的人民都可以格殺不論，至於對人民加重的榨取，自然更不用說了。

跟着封建勢力之飛揚跋扈而來的，是意識的復古運動。舊禮教舊道德一切舊倫理觀念的復興，甚至於恢復到「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現象；至於男女授受不親，更已為社會所公認。讀經，作八股文，廢止白話文，禁止男女同校，甚至禁止女子剪髮，禁止自由結婚，提倡尊孔尊關，甚至祇要是古人都在可尊之列。這一個封建思想的復古運動的流毒，在政治上，形成了比秦始皇更反動的封建的獨裁，——凡帶有新文化運動的傾向的人，都在格殺勿論之列。在意識上，使革命思想更沉下去，使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更得永遠鞏固他的統治，使袁世凱的精神永遠不死！

由於帝國主義的勝利，封建勢力的猖獗，民族主義是屈服，是投降，民權主義是獨裁，是屠殺，而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民生主義，自然也變成資本主義了。

一種尊敬資本主義的意識的流傳，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在國民政府在廣州的時代，資本家而買辦的領袖的陳廉伯陳恭受要被通緝而逃到香港，甚至逃到新加坡，在北伐軍克復武漢以後，武漢的資本家和買辦要逃到上海甚至逃到大連，而現在，不但陳廉伯陳恭受已經回到了廣州做「要人的上司」，而且連上海幾位洋行買辦，銀行經理也都做了舉是輕重的國府要人了！

我們應該忠實的承認，中國革命是暫時失敗了！我們更應該忠實的承認，一直到現在，還是反革命的力量勝過革命的力量，這是一個事實。但是我們更應該明瞭，中國革命是暫時的失敗，不是永久的沒落。這一個失敗是革命過程中必不可免的現象，雖然我們不否認這個失敗的原因包含有許多我們主觀上的錯誤，而我們一點也不必灰心，我們正可以在失敗中找出寶貴的教訓。

雖然現在有一部份人正在慶祝革命成功而高談建設，可是無疑的中國革命正遭到厄運，挽救這個厄運還須待我們更大的努力。

中國革命已經開展了一個新階段了，在這新階段中，黨的歷史任務依然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勢力，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圖建設非資本主義的前途。

我們應該繼續十三年改組後反帝國主義的精神，我們更應該不忘記總理的遺言：「北伐之目的，不僅在顛覆曹吳，尤在曹吳顛覆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換言之，北伐之目的，不僅在顛覆曹吳，尤才顛覆曹吳類以生存之帝國主義。」我們應該堅決的認定：反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的唯一目標，是黨的歷史任務的一件。黨的革命精神必須與反帝國主義並存；——這就是說離開了反帝國主義運動就失去了黨的革命精神。最低的要求，我們必須達到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目的。

我們知道反帝國主義的勝利，是黨的勝利，但是反帝國主義勝利，必須依靠廣大羣衆的努力——革命之外交政策的勝利，是廣大羣衆努力的結果。

對於封建勢力的肅清，自然也是同樣的重要。但要完成這個任務，同樣的必須依靠羣衆的力量。

從國際政治說明中國革命(二續)

我們反對封建勢力不但一句抽象的口號，我們要反對軍事上封建割據的形勢，我們要反對政治上一切封建的獨裁；我們要反對農村中城市中土豪劣紳的橫行——不但是反對，我們要用黨的民衆的力量來裁制這些反動份子的猖獗。我們要反對舊道德舊禮教一切舊倫理觀念，我們要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實現政治平等的民權主義！

最後，我始終不要忘記我們歷史任務是要走上非資本主義的路，在目前，我們否認民生主義已被曲解為資本主義了，政治的設施也有許多傾向資本主義的色彩，我們要努力肅清一切對民生主義的曲解理論，我們要堅決的肯定我們的要走向非資本主義！這是非常重要的！民生主義不能實現，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不能解決被壓迫人民最主要的問題，什麼都成了空洞了。我們要實行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來達到非資本主義的道路。

歷史是前進的，歷史已經昭示我們：最後的勝利必然是我們的，我們不必灰心，不必消極，以我們的努力來獲得最後的勝利，來完成歷史的任務！

許德珩

(四)英義的衝突。從表面上看起來，英義的衝突，好像是比较很少。又因法國之大陸政策，把巴爾幹半島，早已劃入於他的勢力範圍；英國如此，他在近東之必須拉出一箇義大利來抗法，也猶之義大利要得到地中海的霸權，必須聯絡英國以抗法一樣；所英義交情之說，曾經一度盛傳於歐洲之輿論界。然而據事實上講起來：英國之於義大利，他們最近的衝突，也是一天天的逼近。第一如尼羅河問題。尼羅河畔全部的勢力，早已為英帝國主義者所佔去，這是莫索尼里所最不甘心的。因為黑衣大王他要想他的雄飛於世界的政策獲售，對於隔海相望之非洲的利益，當然也是一步不能放鬆，然而非洲的門戶如尼羅河一岸的地方，已非義大利的勢力所能插入；所以從去夏以來，當埃及反英運動高潮之中，如在開羅 Cairo，在亞力山大里 Alexandria 一帶反英的運動之中，常常發見有法西斯蒂黨人從中鼓動的事實。這可以說是莫索尼里在尼羅河畔開始向英國示威。事雖未成，而徵象已見，國際的情勢若果沒有更改，這種衝突，恐怕只有一天天厲害，而不能夠和緩的，第二，如在亞拉伯，在波斯，英國與義大利市場之爭，也就是很激烈。有此種種，英國之與義大利，也就是不能和洽無間的。

(五)英日的衝突。英國與日本，本來在過去是箇攻守同盟的國家，然而戰後因為利害的關係，他們放棄了盟約，反成了一箇極相衝突的國家，其原因大概是在下面：

(a) 東方問題。這裏與其說是東方的問題，無甯說是我們貴國的問題。在歐戰以前，日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勢力，只及於東北，而英帝國主義者的勢力則在西南及揚子江，這樣很可保持均權，無大衝突的。自歐戰暴發，日帝國主義者乘列強不暇東顧，起而奪取德國所據之山東，並進一步的要求繼承德國在東方的利益，破了均勢的局面，並且不啻對英國在遠東的勢力，予以威脅，這是使英國最恐慌而最不願意的。

(b) 海軍問題。海軍的競爭，一方面固然是英美與日美的衝突問題，而同時也就是英日衝突的問題。華府會議之所謂五五三的比例，就是這箇衝突的表現。

(c) 市場問題。然而根本還是一箇爭奪市場為問題。日本是箇後起的資本帝國主義者；在他這箇後起的帝國主義形成以後，世界的市場，已經分割殆盡，他要維持他的資本主義，自然不能不從搶奪市場下手。他除了在中國獲得了一箇廣大的市場以外，其他的地方，可以說是不能許他插足的。歐戰暴發，他趁着這箇時期，不惟取得了英國在

中國的市場(至以後的情形，又是一箇問題。)並且取得了英國在南洋羣島一帶的市場。又在歐戰以後，如俄國之革命土耳其之革命，埃及之獨立，坎拿大，又為美國遇剩的資本所侵入等等，英國的國際市場，已經一箇箇的斷裂衰落，無以自存。他此時總以為可以供他的剝削的，只有一箇肥沃的印度；然而近年以來，日本在印度的貿易，也是一天天的發達，並且還有與英國競爭的趨勢；這樣的冤家偏信遇着對頭，是使英帝國主義者所最感痛苦，極為不安的；因此，英國在新加坡築港的問題，其原因雖多，但是對於日本，也不能不算是一箇威脅。所以近時報載日英聯盟復活問題，言之確鑿，人幾信以為真；然而根據我在上面所述的幾箇要點看起來，戰後的英日，他們衝突的程度，已經到了如此，還有復活聯盟之可能嗎？

(六)日美的衝突。近年來日本與美國的衝突，已經表現得如箭在弓弦，一觸即發的樣子。今總其衝突之處，大概可有四端。略舉如左：

- (a) 海軍問題。
- (b) 移民問題。
- (c) 菲律賓問題。
- (d) 太平洋問題。

其中所謂太平洋問題，就是對付我們中國的問題。本來日本之與美國，雖然同為帝國主義的國家，然而因為他們的資本主義的性質之不同，又兼他們在地理上情形有不同，國勢有不同，所以他們侵掠中國的目的雖然一樣，而手段却有不同，就每每能使一般人以為只有美國是真能幫助中國者，其實何嘗如此！往者不必論，我們只就最近最顯著的如中美條約看起來，就是可以知道的。最近的中美條約，不是一般人所認為是極平等互惠的嗎？然而其中如「最惠國待遇」之條文，是已經把從前條約上所有的特權專利，一一的錠釘住脚，加以承認。並且還有如「本國所享受之待遇，不得次於任何他國所享受之待遇，」之條文，是已經又把從前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等等吃人的口吻，一一的又鐵板住脚，加以承認！美國所需要的，就是要獲得我們的市場，好暢銷他們的物貨，流通他們的資本；日本則不然；他除了要暢銷貨物，流通資本以外，還進一步要求土地之獲得；因此，日本對付我們總是一個武力的，威脅的；美國之對付我們，總是一個妥協的，和平的；日本因為要進一步的要求土地之獲得，所以他的希望是惟恐我們不亂；美國是希望即於投資，消貨，獲得經濟權，所以他所希望於我們的，就是惟恐慌我們亂。又美國是

太平洋岸最強的國家、他不願意在太平洋岸再有一箇強國與他抗衡的，所以與我們這位東鄰的小醜，是極不相容。至於移民問題，海軍競爭問題，菲律賓問題，發生衝突的地方極多，這我們等待他時專論太平洋問題，再來詳述，此處可以不必細說了。

(七) 英美的衝突。

(a) 歐戰以前，世界的經濟大權，本來是操在英國的手裏，英國、他是世界各國的債務者，這是英國人所常常舉以自豪的一點。歐戰以後，這位世界債權者的國家，一變而為局部的債務者，世界的經濟大權，輕輕的由倫敦一移，移至紐約；從道斯計畫實行以後，金元大王的勢力，已經支配了全歐洲，這是英國人所最不好過的；又況且這次的非戰公約，明明是經濟力量支配歐洲得勝之餘之一種典禮，英國其何能忍受；所以於非戰公約以後，接着英法就有一箇海軍協定，這可以說是英國向美國示威，打聲美國勢力支配歐洲而設的。

(b) 坎拿大問題。坎拿大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的寶藏，一箇是印度，一箇就是坎拿大。在歐戰以前，坎拿大的經濟勢力，完全操在英帝國主義者的手裏；不惟在歐戰以前，就是緊接着歐戰以後也是一樣。在一九一八年，坎

拿大的外國資本，共有二十四億金元，其中英國的資本佔了十四億餘，美國的資本，只佔四億餘。到了一九二三年，坎拿大的外國資本，有四十八億金元，其中英國的資本不到二十億，美國的資本，增加到了二十四億之多；在此數年之間，坎拿大所增加之資本，可以說都是美國的。美國的資本之在坎拿大，現在還是一天天的繼續增加，幾乎有壓倒英國之勢，這是使英國最恐懼，最不安的；也就是英國與美國衝突的第二箇要點。

(c) 煤油問題。煤油問題，也是近來英美的一箇最大的競爭。英國公司如 Royal Dutch，美國的公司如 Standard Oil Company，他們之在印度，在埃及，在哥倫比亞 Columbia，在亞洲各國，彼此因爭奪市場而起的衝突，也就是最厲害的。

(d) 橡皮問題。橡皮問題，也是英美衝突中的一箇最重大的問題。總而言之，自歐洲大戰以後，美國的經濟力量之勃興，真是不可遏抑；他在北美幾乎已經統治了坎拿大，驅逐了英國的勢力；在南美已經統一了拉丁美洲各國；因道斯計劃的實現，又奪到了英國所視為重要市場的德國，並且幫助了德國的復興，從而要求放棄德國的賠款，恢復殖民地的獨立，以恐嚇英國；在地中海方面，又從

經濟上援助了義大利，助長義大利之帝國主義的野心，企圖鼓起地中海之風雲，打毀英法在地中海的勢力。美國的資本勢力的膨漲，已感覺美洲一隅不足以消納，不惟要飛渡太平洋並有要飛渡大西洋而奪取歐洲的商業之勢，震撼了英國，使他覺得在澳洲，在印度，在波斯灣一帶舊有的地盤之危險；所以英美的衝突，到現在真是着着逼近；這種衝突，因歷次的軍備縮減會議之結果及此次非戰公約之餘波而更甚。更因非戰公約的所生的得結果，有下列的幾種事實：

(甲)英法海軍協定。因非戰公約，促成英國與法國暫時成立海軍協定，以謀對付美國飛渡歐洲的計畫。

(乙)非戰公約簽字後不過旬日，英政府立即以七千餘萬金鎊，將新加坡築港的工程，包與捷克公司。

(丙)美國聲稱，如英法海軍協約存在，美國將以造艦競爭為抵制，並已有五年內造成一萬噸以上之巡洋艦十五艘的計畫。

由上面所舉的這些事實看起來，國際政治已經是這樣一個極矛盾，極衝突的現象，帝國主義者他們彼此既又是這樣的針鋒相對，拔劍張弩的情況，其早晚必出於一打，這是可無疑義的；資本主義發展到了這樣一個衝突矛盾的

情形，他還有穩定的可能嗎？所以有人說二次世界大戰，即在目前，這是千真萬確的，然而千真萬確的事實，尤不止於上面所述種種，而還有其他的事實在。

我們現在且進一步的再來看一看，看最近這幾十年來，帝國主義者他們口口聲聲總是限制軍費，減少軍備，看他們究竟減少沒有？限制沒有？他們的軍費不惟沒有減少，而並且還是與日俱進的增加，這就更可以使我們知道是什麼？現在為明瞭起見，簡單的把近十年來各國軍費的情況，表列於下：

海陸軍軍費表

國名	年度	數目
英國	一九一三年	一,三二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英國	一九二三年	二,一四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法國	一九一三年	六九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法國	一九二三年	九二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日本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日本	一九二三年	七三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海軍軍費表		
國名	年度	數目
英國	一九一三年	四七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英國	一九二八年	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美國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八年二八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五四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日本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八年九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這是這十年來，各國的海陸軍軍費以及各國的海軍軍費之增加的情形如此。還有軍用飛機，他在這十幾年來之增加，可以說是叫人驚駭！在一九一三年，世界各國的軍用飛機總數，僅僅只有一百五十輛，而到了一九二六年，他的數目，竟達到了三千五百五十輛，而最近兩年所增加之數目，還沒有計算。軍用飛機這樣銳利的增加，不是在預備打仗是做什麼？

我們看見了上面的一些表冊，當然知道帝國主義他們口裏雖然是在那裏盡量的喊着限制軍備，而事實上却是在那裏擴張軍備；他們口頭上雖然是在那裏反對戰爭，而事實上却是在那裏預備戰爭。尤其可笑的。是在不久以前之所謂「非戰公約」。當美國提出「非戰公約」於世界的時候，正是他們的幾千大兵鎮壓尼加拉圭的時候；當英國接受這個非戰公約，什麼「和平」，「正義」喊得震天的時候，

正是他的兵艦，砲艦飛機艦，潛水艇，登薄的開往厄羅河一帶，向埃及的人民壓迫示威的時候；當日本接受非戰公約，向世界上宣言反對武力主義的時候，也正是他們兩萬多大兵，在我們的山東實行大屠殺，鎗彈炮火以後，繼之以剖心剖目之慘無人道之種種獸行的時候！這樣看起來，他們之所謂「非戰」，就是戰爭即在目前的警號；而所謂非戰的實意，只可以說是帝國主義者自己本身相約在某種條件之下不戰，並不是對於我們這些被壓迫民族，而有所顧忌，有所愛惜，不盛之以兵，不隨之以戰哪！這是要在我們被壓迫民族中之革命民衆，所共同的恍然大悟，振作精神來再三反省！在這箇萬難重圍中共同的打出一條血路來，再不要上任何帝國主義者的當，以爲「和平」，「正義」，「人道」，「公理」，「不戰」的等等名詞，可以見之於帝國主義者的字典當中，更可以憐憐的見之於帝國主義者待付我們弱小民族的行爲當中呵！然而我們中國民衆，他在這箇被壓迫的民族當中，所負的使命尤大，所感受的痛苦尤深，在這箇衝突矛盾之反動的世界政局裏面，他們的革命，究竟是應當怎麼樣呢？

(未完)

中國國民革命的前路（三續）

陳公博

（四）目前各黨的批判

中國革命的沒落和中國國民黨的破碎，既如上所述，那麼黨的改組已成了必然事實的要求，可是我們沒有討論之前，先批判目前的各黨。自北洋軍閥專橫北方以後，所有研究系，交通系，外交系，安福系，政學系，雖會炫耀一時，然而今日已成過去名詞，歷史陳跡，他們有些歸化國民黨，圖個人的生存，有些操縱金融商業，謀部分的活動，還有些逃亡租借地，依附帝國主義以求全，要而言之，目前已經破碎，不成爲黨，現在我要批判的，有以下的各組合。

（一）共產黨 共產黨自經迭次失敗以後，轉入於盲動時期，絕對談不到綱領。我們看看恩秋白所著『中國革命與共產黨』，內裏很有許多謬妄的行動，他指明：

『各處的農民運動，殺戮營紳之外，『必須』加以燒屋的工作，有些地方，如湖北漢川農民暴動的指導

者，要燒去整個兒的城市，湖北整個兒的村莊都燒盡；湖南某地指導者，生張燒光縣城，只取去暴動農軍所需要的東西（如油印機等），主張殺盡一切人，（除出跟着來革命的）

『江蘇省委的暴動須知也說：『必須挨家挨戶告以暴動口號，號召……起來參加，不來者以反革命紀律制裁——殺。』

『甚至廣東工人在省委會議時說：『爲什麼暴動失敗時，我們沒有決定將廣州燒燬他？』

『海豐限定陸豐每村必須殺若干人——是人就夠了，更不問反動與否。』見一五五至一五六頁）

這都是共產黨屠殺民衆自己的供詞，以這樣的黨而說革命，只是反革命。我們現在姑且撇開這種無理智的事實不談，且看他們幌子的理論罷。所謂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的決議案（見布爾札維克二卷二期），說大會完全同意於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第七第八第九次全體會議對於中國革命性質之估量，就是『如認中國革命目前階段爲已轉變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是錯誤的，同樣，認中國現時革命爲『無間斷革命』也是不對的』，他們認定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

好了，他們既決定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而他方面卻決定『必須用武裝暴動革命的方法，推翻了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地主軍閥及資產階級國民黨的政權，建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蘇維埃工農民權獨裁制。』性質和方法的矛盾離奇，至此可謂極理論之大觀。我們更看他們所謂中國革命之十大要求，一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二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三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四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五建立農工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等，七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耕地歸農民，八改善兵士生活，發給兵士土地和工作，如取消一切軍閥政府地方的捐稅，實行統一稅累進稅，十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這個十大要求，除了一兩條高調裝裝幌子以外，第三第六第八第九實絕對是改良主義，尤其是對於城市資產階級採取極端讓步，不着一詞，比之國民黨製

造國家資本論還差得很遠。以無理智的暴動，僅換取一個改良主義，於社會受無謂的犧牲，於革命無絲毫的利益，結果除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外，對於革命毫無無關，所以共產黨的將來，只有隨他們矛盾的理論和殘殺的暴行同其沒落，并且今日中國整個反動的造成，共產黨尤應絕對負其責任。

（二）第三黨 這幾個月來，第三黨的消息已由沉寂而成渙散，我往昔批評第三黨，牠的態度是閃縮，理論是貧弱，立場有搖動，我并且指出第三黨聯俄聯共暴動三大主張的錯誤，歸結說：

（一）第三黨實在沒有綱領 因爲聯俄是政治上的主張，不能作爲一黨的基本綱領。聯共更是國民黨試驗已敗的政策。若更採取於根基未固的第三黨，只有同化於共產黨，斷難使黨生存。若暴動則更爲共產黨今日的唯一手段，第三黨還跟着這個主張，不啻是共產黨的末技，只是共產黨搖旗吶喊的工具。

（二）第三黨實在沒有基礎 我看突擊一至三期，總沒有很明顯的主張，除了攻擊國民黨以外，大半文字都是求共產黨諒解的文字。凡自號一個黨，沒有一點主張和基礎，光是求人諒解，這還算什麼黨？而且我從頭至尾分析第

三黨的文章，實看不出第三黨和共產黨的不同在什麼地方，他們沒有標示和共產黨的不同在什麼地方，所以我以為他們標出一個中華革命黨的名稱，不如簡直說是CY還直捷痛快。

然而最近他們在渙散的當中，另草一個宣言想另定一個新的方向。（聽說這個宣言是譚平山起草，因為團體散，還沒有通過）。他們對內政策雖有三十六條，然而充滿了妥洽色彩，他們認定土地革命的中心問題，更有小自耕農之土地不沒收，和現役軍人的土地不沒收之規定。照這個宣言的內容，較之『突擊』和『革命行動』所發表的顯然有往後退的妥洽表示，而且他們自命代表勞動平民，其涵義很是模糊費解。他們經過了共產黨的攻擊，知道聯共近於幻想，所以說：『對於代表下層民衆的各黨派，皆願與之合作，故對於中國共產黨，亦採同樣的態度，惟必須攻擊其希冀消滅無產階級運動以外的一切左傾的民族革命運動的錯誤，及虛無主義的傾向。』他們經過了第三國際的冷淡，知道聯俄也難實行，所以說：『在被壓迫階級與被壓迫民族構成反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聯合戰綫之下，願與第三國際發生同情之關係，但亦祇限於同情者。』但其中還有值得我們注意的，他們所得土地的材料，剛剛和

共產不同，他們說：『中國大多數土地，集中於少數地主之手，而無土地之農民：遍於全國。』而共產黨第六次大會關於土地決議案則說：『地主階級之中小地主比較大地主更占優勢——土地集中於地主個人的很少，然而土地集中於地主階級的過程非常急劇。』這種不同的材料誰是對呢？等他們自己回答罷。要之第三黨的沒落，自在意中，我的批評，第三黨必將分化於國民黨和共產黨兩者，並且對於革命毫無影響，這是觀察過去一年的事實可以證明的。

(三)混合的反動黨 這一個黨是以國家主義的綱領為中心，而以失意的軍閥官僚政客，新交通系；安福系，及一部的研究系和政學系為骨幹。這個黨最近曾開會於大連；名稱還沒有確定，所以我只好喚牠為混合的反動黨。他們主要的政綱是：一恢復民主憲政，反對一黨專政，二實行勞資合作，反對階級戰爭，三實行國民教育，反對黨化教育，四反對訓政，五組織討赤軍（指蔣馮），六各事國民大會解決，七佔領一縣即實行民治，軍人不得干政。可是滿我們觀察，這種混合的反動黨在事實上必然產生，但在事實上也必然的失敗，何以故？因為這班反動份子，窮無所歸，收拾殘餘，以圖反抗，這是必然的事實，而且在中國有了租借地和租界一天，這種黨系也會不斷的滋長。我為

什麼批判他們失敗呢？第一個簡單理由是：如果他們會成功，過去早不會失敗，第二個簡單理由是：代表反動勢力已有國民黨內的反動份子，更用不着他們代庖，何況舊的反動份子不如新的反動份子高明，其結果只是暫時結合，必然沒落。

除了上述三者以外，似乎還要說說的，是所謂無政府主義者，這派先生們一面是國民黨，一面也是無政府信徒，（黑色青年組合只是極少數人的結合，暫不論列）。說他們忠於國民黨嗎？他們卻別有所圖，說他們忠於無政府主義嗎？他們卻專植其親戚宗部。我們雖然知道他們充滿多面的矛盾性，然而卻沒有方法加以明顯的分折。實質地說，他們之談無政府主義，實如上海富豪之念佛，玩古董，裝清高罷了。惟其如此，所以無政府主義者可以奔走於軍閥之門，可以廁身於豪紳之列，假使真要實行無政府主義，首先反對的就是他們，恰如上海的富豪，佛是講的，經是念的，但要屏姬妾，絕酒肉，那麼只好不幹。今日中國式的無政府主義者，實是革命整個的致命傷，然而這種封建餘孽士大夫，處在今日小農作的國家，恐怕還有悠久的生命，非俟將來封建勢力崩潰，無法可以掃除，這是事實，而非某一個人倒了，便可算作消滅。

(五) 左派的過去與將來

要討論左派的將來，必須談談左派的過去，左派今日在黨和社會上雖佔很優的形勢，但在政治上已處了一個失敗地位無可諱言。過去左派的失敗，雖有種種的外因和內因，而歸結一句話，完全在於缺乏組織。因為沒有組織，所以沒有統一的理論，因為沒有組織，所以也沒有確定的方案。有許多人說，有了理論然後才有行動，過去的左派既然沒有統一的理論，怎樣能有嚴密的組織？這樣的話是不錯的，但是理論可以推進行動，而反一方面行動也可推進理論，過去左派之渙散很顯然的基於兩件事實。

第一是環境的困苦 現在說到革命的策源地，誰都說是出師北伐起點的廣東，但是我們知道廣東當日困苦的情形嗎？廣東在清末民初的收入大概每年——指所謂承平時候，可以到三千萬。在國民黨改組當時，東江給陳炯明佔領，南路給鄧本殷佔領，廣州給楊希閔劉震寰佔領，所以當時政府每月收入最多是八十萬，最少是二十萬。及至楊劉撲滅，全省統一，軍隊驟然增至六軍；另外還有黃浦學校，兵工廠，海軍局，航空局，表面軍費支出每月突至四百五十萬，另外國民政府的政費，省政府的政費，還不在內，以廣東一省而担负這種鉅額，所謂歛死不贖，奚啻殆

理論大家坐在桌子上會談，天天皺着眉完全爲着食飯問題，如果談到稍理想的理論，無論人家不目笑存之，自己也不好開口，這是當時在廣東左派握有政權的情況。到了北伐進展，佔領武漢，宜若可以整飭理論了，然而當日國民政府尚未穩定，漢甯早已分離，內部的動搖，下游的封鎖，整個局面沒有一日不在風雨飄搖之中。當時武漢每月收入不過三百餘萬，而軍費支出猶達到一千三百萬。中央銀行紙票完了，於是不能不拿石印的國庫券替代，金融已瀕絕境，於是祇實行那現金封存。這樣如果還談理論，正是劍戰集門，臬比擁座，這是當時在武漢左派握有政權的情況。及至所謂漢甯合作，特別委員會繼起，上至中央下至各地的左派一時散處各地，無法集合，不但理論談不到，連談話今後的出路也沒有集中的機會。力量一散，思想紛歧，大家都是圍着門玄想，理論那有統一的道理，這是過去左派因環境的困苦不能統一理論的緣故。

第二是認識的歧異。我常說右派的認識可以一致，左派的認識未免分歧，爲什麼呢？右派跟着社會背後，社會跑到那裏便是那裏，他們只有跟着社會右傾，用不着有特殊認識。至於左派是要站在社會前頭，因各人的觀察不同，對於革命的認識便有差別。我們暫且放下旁的問題不談

，單單對於共產黨的認識，至少有以下幾樣觀察，有些同志，以爲若要中國革命成功，國民黨必須和共產黨合作到底，這是一種。有些同志以爲和共產黨分裂是可以的，但和第三國際分裂是不可以的，這是一種。有些同志以爲國民黨要和共產黨及第三國際分裂都可以，但是國民黨要生存必得比共產黨還要左，這又是一種。因有這種種的認識，左派遂無組織之可能，我敢斷言，如果共產黨不在南昌鬧一次暴動，在廣州更鬧一次暴動，至到今日左派對於共產黨還沒有真確的認識。而且一個革命黨的成立與普通政黨不同，其唯一條件即在同一革命的認識，所以國民黨一日容共，左派斷難成功，非受共產黨煽惑而至動搖，即受共產黨壓迫而歸反動，這是客觀必然的事實，並不是主觀或然的推測。

過去的左派，有了前一個原因，缺乏了統一的理論，有了後一個原因，缺乏了嚴密的組織。武漢當日情共，完全爲着國民黨的生存，但同時因爲清共，左派也像整個的黨起了革命心理的破碎。至於今日，經過民國十七年一年鬥爭，破碎的革命心理已算復歸完整，左派的基礎至是始可以說有幾微建樹，所以今日軍閥政客之反攻，共產黨徒之叛變，對於左派「不徒無害，而又益之」。

我爲什麼說左派今日在黨和社會已佔很優的形勢呢？

我們估量自己的力量，須先觀察敵人的進攻，現在集中攻擊左派的有軍閥，政客，官僚，無政府主義者，新興資產階級，第三黨，共產黨，帝國主義者，最顯著的，在方面北平一個軍閥公開演說，「日前我們的敵人，不是帝國主義，不是共產黨，而是左派。」在另一方面，共產黨決定先向左派進攻；上海見得到的，什麼布爾扎維克，什麼紅旗，一齊向左派抨擊。其餘軍閥的附庸品，無政府主義的小政客，新興資產階級的應聲蟲，揚波煽風，污誣謾罵，但是在這個環攻當中，我們已經估量了自己很大力量，并在全般反動當中，我們已經感覺加重我們的責任和加緊我們的工作了。

不過我們日前要知道，破碎的革命心理經過一年來的爭鬥，可算復元，而疲倦的革命心理經了幾次的失敗，依然沒有恢復。在革命黨對於整個反動局面，雖然都已失望，而且絕望，而一般羣衆，經過重重壓迫破散之後，對於革命前路，尚在猶疑。「相安一時」的口號，我們決不能輕視爲腐化份子所主張，其實是在整個反動局面的必然反射。其意若曰：我們也知道軍閥們不能相安永遠，然而在破散之後只希望相安一時；吊是要上的，但是讓我們目前唱

嗚氣，等一息間再吊過罷。所以這種主張，我們認爲革命心理疲倦的主張，因而左派的鬥爭，也是長期的鬥爭，我敢斷言，一九二八年是革命沒落的一個舊階段，一九二九年是革命發展的一個新階段，然而在這五年以內，還是我們的準備工作，五年以後才是我們的邁進工作。

普通革命黨的毛病，一個是幼稚病，一個是機會心，我檢閱左派的過去，兩種毛病都不能免。有了幼稚病，往往驚視事實，好爲虛泛的左傾，雖天天批評右派的唯心主義，而自己依舊陷於主觀的革命。在失敗時候、躁動、散漫，在成功時候，蠻幹，騫高。有了機會心（這是指革命的投機，不是指個人的投機），常陷於不成熟之政權妄慾，和非條件的軍事勾結，他們忽略了基礎的構成，誤認以爲政權的佔領就是革命的保障。目前幼稚病雖已減削不少，但機會心依然沒有掃除。我見了許多各省來的同志，他們第一句問話就是，革命已沒出路，我們怎麼辦？他們所謂辦法，并不是指基礎之養成，而是指立刻的效果，我們要知道，沒有統一的理論，沒有確定的方案，沒有嚴密的組織，我們離開黨的實行改組遠遠，離開革命的成功遠遠，縱使因於軍事或政治之投機，一時成功，這不過是暫時而且偶然的事，終久必倒而且失敗至無法自存。革命豈是

暫時而偶然的事業嗎？深望左派的同志們決心掃除幼稚病和機會心，革命最終的勝利，只有屬於國民黨左派，我們

只有忍耐着。

(未完)

讀者論壇

讀「國民黨左派與中國革命前途」以後

歐陽謙

去年出版的革命評論，實足衝破了一般民衆的迷蒙，而在革命青年的精神生活上，陡起了絕大的變化。（我說精神生活，並不是暗射青年愛『唯心』，其實在忠實同志防共的密網之下，可憐青年，連打一個呵欠，便得留神人家說你搗亂，請教，除了僵起身子在被窩裏過活之外，還有什麼別的生活！不然者，老實說一句，青年不是好惹的，倘不是在特殊環境之下，早已接受革命評論的全部的『烟土披里純』(Inspiration)而『搗竿而起』了。精神生活云乎哉！然而不敢放肆者，蓋怕死也，怕死云者，不怕死於『革命』，而怕死於『非命』！哦，總理啊，你知道在今日防共政策之中，堆積了無數你的信徒的碧血和白骨嗎！不知道最好，免得您老人家痛心！）但同時，却引起國府裏一般忠實同志的駭怕和妬恨，於是老羞成怒，其處心積

慮於『革評』之打倒者，已匪伊朝夕。果然，事有必至，胡先生上台之時，便爲我們的讀物關門之日了。

自此之後，我們一方太息於誼之消亡，而杞憂於革命大業之不易完成。實際上由杞憂而隱憂，由失望而絕望，而孰知在這個絕望之中，革評的姊妹刊物『民衆先鋒』。乃如長庚太白，衝險而出！我們青年，至少是我個人，不知不覺地破淚爲笑。

最使我滿意，而使我對革命前途抱樂觀的，是這回的旗幟更鮮明了，言論更實在了，計劃更具體了。在創刊號中，每篇文章有每篇的好處，各人有各人的特識。在我們青年的客觀上，都覺得『民衆先鋒』的一字一句，都能打動我們的心坎，而滿足其『革命理論慾』，『雖則在現時剝削那間

，實際的革命行動爲不可能。

但是其中最引我注意的，就是蕭淑字同志的『國民黨左派與中國革命前途』一文裏面的『國民黨左派』赫赫五個大字，不由得由注意而沈思，更不由得由沈思而懷疑。懷疑的結果，便構成我寫這封信的原因。

我的懷疑，正如汪先生所說的一般：『何處有左派？癢癢以求之！』本來，也正如蕭淑字同志所說的一樣：『本來，在理論上，只有革命與不革命之分沒有左右之分。』

一個嚴守『辯證法』的論者，對於已往的歷史，和現存的社會的總觀察，只有兩個勢力：一個是保守的，一個是進步的。以哲學家術語詮釋之，前者爲『正』(Thesis)，後者爲『反』(Antithesis)，以革命者的口氣詮釋之。前者是革命的，後者是革命的。在今日的中國局面之下，只要我們沒有近視，我們很容易清清楚楚看出革命和反革命兩大勢力的楚河漢界。在反革命的勢力裏面；儘管五顏六色，有共產黨，(至少是『中國共產黨』)無政府黨，國家主義黨，西山會議黨，或胡漢民先生的胡黨，戴傳賢先生的賢黨，乃至其他一切一切的黨，其內包無論怎樣豐富，我們只能恭維牠爲『反革命黨。』反過來說，在革命的勢力當中，無論牠是黨紀先生也好，毛頭小子也好，一等大國民也好

。只要他們是革命的，理論上，或行動上，我們都通稱爲『革命黨。』我們決不那樣傻個，別的把他們分析出來說，這是革命黨裏的什麼什麼派，那是革命黨裏的什麼什麼系，這不是我們昧於『科學方法』不知分析，更不是我們偷懶或倦怠不去分析，實在是客觀的事實如此這樣地擺在我們面前，叫我們如何分析得來，所以國民黨裏面，只有革命的，和不革命，假革命或反革命之分，決沒有左右派或上下派之分，倘若是勉強分來，在『非革命』(包括不革命假革命和反革命)的立場上，正是『周王賜伯舅胙』，行見『下拜登受。』其所以爲人者，可謂客氣備至，而所以自爲者則何如？凡我革命同志，對於這點。盍留意焉。此其一。

以上略提我們國民黨革命同志，不應抬出左派招牌。以資號召，致使對方反革命分子，也居然竊『右派』之號以自誤，結果無形中延長其當絕而不絕的生命。這裏我要指出左派名詞之非必要。大概是新評論的章乃器先生吧，要是我沒有記錯，也說『革命的：本來就有左傾的；不左傾，便不得算爲革命。』因此，我們革命的同志，只要自問是不是真地革命？如果答案是『是』，那就夠了。委實用不着伸長頸子，大聲疾呼說『我們是左派！我們是左派！』不慚

多餘，而且討厭！忠實的同志們，努力的同志們，我們要認清，尤其在這種十二分緊急的關頭，我們所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的，只是一個根本觀念——『我們是革命的』我們決不應如餒餒然小丈夫一樣，自稱為什麼派。蕭同志說得狠對：『對於黨叛的不革命，反革命分子，我們應該不承認他們為國民黨同志！』反過來說，真正國民黨同志，便是我們！這不是我們吹牛，這是我們負責！此其二。

雖如此，可是在『實事上現在國民黨的黨權。從中央以至於地方，大部分被反革命的右派（？）分子掌握着，他們又有武力為壓制一切，黨的招牌既然頂着在他們頭上，而他們口中還天天談革命，談三民主義，所以為使民衆易於辨別而不至於混淆起見，只好尊稱之為右派。』從上面看，我們很深切了解蕭同志劃分左右派的苦心，為的是『使民衆易於辨別而不至於混淆起見。』蕭同志呵，以你對民衆的忠實程度說來，你決不至於『輕』視民衆，然而至少你也誤『視了民衆了！客觀的事實，赤裸裸地擺在民衆之前，聽候民衆最合理的裁判，那些人是革命的，那些人是反革命的，蕭同志，你能說他們——民衆——不認識嗎？不，只有比我們更清楚些。

或者說，現在的反革命派，牠『頂着黨的招牌，實際

上握着黨權，而且口中還天天談革命，談三民主義』所以和沒有招牌，沒其黨權，口中不談革命不談三民主義的反革命派，大有不同，所以不可逕稱之為反革命派，而應稱牠為右（？）派，以示優異。那末，民國自建國以來，到於今十有八年之久，那一個軍閥，那一個官僚，總括一句，那一個封建勢力者，不是開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閉口『救國救民，不敢後人，』最近『先大元帥佳電息爭，』又復『對三民主義，可以服從，而五色旗則未便改掛，』現在總算勉強易轍了（當然仁者之言，其舜國之忠，愛國之忱，直要出霄漢而貫日月，然而我們為『使人易於辨別而不至於混淆起見，』統統大書特書曰『反革命！』國民黨同志的意見如此，民衆的意見還是如此；國民黨同志沒有說過他們是『右派，』民衆也沒有說過他們是『右派。』

一個革命的集團，其言論，其行動，必建築於『民衆的利益』之上，方不失其為革命。否則，具體的說來，像現存南京假革命的政府，其施政設教，不是離棄了民衆的利益，便是超越了民衆的利益，關於前，例子太多，舉不勝舉；關於後，譬如『講求衛生』一個例吧。曠觀國中，不知有多少民衆沒有飯吃，衣穿，和屋住，即使有，也不夠

德、不夠暖。不夠避風雨，而我當局，偌大發慈悲，叫我們去『衛生』。嗚呼『生』之不得『衛』什麼來！這不超越民衆利益的證明嗎。這樣的集團，當然是反革命，那裏說得上什麼右派。胡漢民先生，是右派的領袖嗎？不，反革命的頭目而已；戴季陶先生，是右派的柱石嗎？不；反革命的大班而已；甚至某軍事領袖，也是右派的鑲客嗎？不，反革命的土酋而已。此其三。

更有一層。我們革命同志，於國民黨黨員之外，更立一個左派名目，從好的一方講，固然給青年民衆在革命的歧途中，指出一條康莊，而得所遵循。但在壞的一方講，不獨破壞了『黨內無派』的原則，資人以口實；而且名目繁多，於民衆將益增其迷惑和依違，而莫知所從。同時，我們自居於左派，敵人則竊改良派（即右派）之美名，以欺蒙擅煽教育不充分的民衆，結果祇有使革命前途蒙其影響，竊爲革命同志不取。古人說得好『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吾人於名字之端，不可不三致意焉。其事雖微。所關匪細！心所謂危，不敢不言。並以『極青年』的態度，求諸同志及讀者的指教。

歐陽謙一九二九，一，十七於東吳。

記者先生大鑒

今送上拙作一篇，閱後請您給我一個理

論上的指正。至於在貴刊的珍貴的篇幅，通訊或讀者論壇或其他地占一席之地，固所願也，非所敢望也。

我第一次聽見左派的呼聲，是在汪先生在西門演說的前年。『革命者向左邊來，不革命者向右邊去！』我爲了這個，幾乎在江西被疑爲西披，準共產黨，而死於非命，但我却愛說這兩句話。同時，武漢的同志，更大擂大鼓地左派化了，使我更覺興奮。不幸，寧漢合作，黨猶同器，左派的旗幟，漫漫地收摺起來。當時我竟辨不出誰是革命來？同時，吳『老同志』節節進逼，不由得汪先生不說：『何處有左派？寤寐以求之。』難道汪先生犧牲了左派的主張嗎？我想決不！理由是：

1. 在左右兩派對峙的時代，汪先生覺得大家都是老朋友，在黨裏都是有悠久的歷史的，尤其是胡戴諸先生。汪先生不願爲己甚，操之過激，故姑分爲左右派，以示寬容，原冀對方覺悟，放下屠刀，走到一條路上來。
2. 不幸，反革命的右派，恠惡不悛，不僅倒行逆施，而且變本加厲。從前年潛黨運動起一直到現在，完完全全地和革命爲敵。於是汪先生忍無可忍，毅然決然以反革命派視之，故曰『何處有左派？』推其竟，更何處有右派？實事上，既革命與反革命派而已！

現在黨同志又做無謂的左派復活運動，我覺得不僅有點不必，而且有點不對；我作文的動機，便在乎此。敬

答歐陽謙先生

蕭淑宇

歐陽謙先生：

尊稿和大札俱拜讀過了，你所提出疑問和指示各節多屬正大而有理，在相當的接受以爲討論資料外，并深欽佩你的勇氣和卓見，向你表示感謝和敬意；惟關於採用『左派』名詞，我尙有如下的意見，以補足我前文的不足。

在我沒有補充意見以前，應該指你一個錯會，你誤認吳稚暉致汪先生書所云，『何處有左派，掃蕩以求之』的兩句話，爲汪先生所說，因此認爲汪先生已經放棄了『左派』的名詞，這個誤會很大；汪先生不但沒說過這句話，而且最近不但還承用這個名詞，并會加以解釋，你如不信，可找前年六月間的中央半月刊和去年九月間巴黎通訊兩種刊物證一下。

對於以左右派形容革命派與反革命派的疑問和意見，不只你一個人有，就是我以前也有和你一般的意見。我當民國十四年冬從上海到廣州，在國民政府見汪先生時，曾

祝 撰安

歐陽謙行革命禮一月十七燈下

經親自以這種意見和汪先生談過，當時汪先生回答我說，『黨的有派，爲歷史上所向有，像現在上海的一班人指西山會議派，』嚴格的說來，要算是反革命，稱他們是右派，已是客氣得多了』有人或者要說汪先生自相矛盾，因爲他一方面高叫着『革命的向左來』同時又尊稱已經論爲反革命的人爲右派其實我們要曉得汪先生的苦心，汪先生一方面要領導着現實的一切革命同志朝前奮鬥，一面還要指導那班有革命要求，而認識不清的同志們，一條光明的道路；所以不能不以『向左來』的口號，以相號召。同時因爲他度量非常寬大，情感非常濃厚，對於已經走近反革命道路的人，還希望他們於重新覺悟起來之後，還有參加革命的機會，所以不惜以右派的尊號稱之。我們現在所以仍以左派的名詞相標榜，用意猶屬如此。

你說，『胡漢民先生是右派的領袖嗎？不，反革命的頭目而已；戴季陶先生是右派的柱石嗎？不，反革命的大

班而已；甚至某軍事領袖也是右派的僑客麼？不，反革命的士會而已。」事實容或如此，然而在這個稱他們革命同志，不能；稱他們為反革命，又不忍，的困難情況之下，只好統之為右派！比如，有人問你，胡漢民是否國民黨員？你必不遲疑地答覆，是；再問！胡漢民是否一個革命的領袖？你必定要說，不是。以胡漢民先生的地位，既不配稱為我們的革命領袖，又不能否認其非國民黨，究竟我們用什麼名詞來形容他呢？請你想想。

這有要請你注意的，就是你說，「蕭同志又做起無謂的左派復活運動」你要知道，左右派的分野是事實？然而左右派的名詞，是外來的，而不是主稱的。留心國民黨事的人都知，國民黨左右派的分稱，始自十三年夏間，馮自由，謝持，張繼等提出彈核共產黨案以後；因為當時一部分人反共，總理及多數同志不贊成此種舉動，自後香港報

通 訊

德珩先生：

民衆先鋒雜誌革命評論而出版。買兩期來，一氣看完，

紙便時常造出國民黨左右派分裂的危詞以為搖惑矇矓之計，而全國各紙均相援助，久而久之，遂深印於人們的腦海中，而成爲國有名詞矣。假使你你和你們東吳的外國教員談話，他們要是知道你是國民黨員，一定要問你是左派還是右派？你那時怎樣回答呢？你難道能夠否認有左右派之分麼！但是縱或你同他們爭論，他們還是不肯相信。假使你又和一個普通民衆去談時事，他一定問你，「蔣介石是左派還是右派，到底左派好呢？」還是右派好？」因此我們知道，左右的名詞已經深入民衆腦海，而至於牢不可破，何待人們再來作什麼左派運動？

當我作這那篇稿子的時候，我已料到有人要和我來討論這個問題，此次我本想多有點發揮，但以印刷所催稿甚忙，只得從簡，你如果關於這個問題，還有其他的指教，下次再當置答。

蕭漱字廿三日

真是令人五體投地。我確信諸同志們，是真正中國革命的指導者；我就貢獻一點意見，不曉得是對不對，請求指正

。民衆先鋒裏有沒有空閒的職位，肯把我這封信發表出來，給大家注意呢？此誌

撰安

一般革命的青年們，在北洋軍閥鐵蹄之下，拼着頭腦，鮮血，爲着國民革命作殊死戰。一般士劣們，爲着自己眼前的利益，幫着北軍閥，對於革命的青年，積極作壓迫，殘殺的勾當。并且這樁事實，赫然爲社會上所共見共聞的。

迫到革命是成功了，（在別的方面并不是如此看法）北洋軍閥是打倒了，一般革命青年所以拼命奮鬥的目的，算是達到最後的勝利了。照理說來：這一般革命的青年，雖然不必要即時掌握黨政大權揚眉吐氣。但至少亦當對於言論行動方面，較得一點自由的權利。

但是事實上却是與這種理論成反對：一般從前幫着北軍追殺革命青年的，在這一剎那間，用勾結舊軍閥的方法，來勾結新軍閥。不上一個月，這一般士劣們，搖身一變而爲忠實同志，黨國鉅子。忽而省委員，忽而省主席，忽而指導員，忽而某廳長。依舊這一般青年革命的，受他們的壓迫，受他們的殘殺。而且理由更爲充足，舉動更爲光明正大；激烈一點，說是惡化，幼稚，穩健一點，說是腐

化，落後。迫這一般青年的革命黨，走頭無路；打得這一般青年的革命黨，落花流水。他們現在革命算是大成功了，華屋綺羅，子孫吃着不盡。他們還要替爪牙們做了小成功、嫖賭揮霍，一生吃着不盡。這是何等不平的事體呀！

『一國的希望就在兒童，一國的命運在青年。』我國現在紊亂的結果，其種因是在十年廿年以前的。我國將來的結果，是在這時候種出因來。我在家鄉的時候，時常全幾位中等學校的國文教員；談起教育的情形。據一般的觀察：現在青年學生的思想，的確是不錯；他們要教授吳稚暉的文章，常常是學生們反對的了不得。可見一般學生們，對於理論方面，確能分別到極微了。青年學生，具有如此正確的思想，不能不說是我國將來的大希望啦。但不知在這當兒，一般士劣軍閥們大刀闊斧之下；能保留一點讀書種子，做後來的苗兒呢？但不知在這當兒，一般士劣軍閥們正在與高彩極做賣國的勾當；能夠留一點國脈，給救國的青年們來的及呢？

黃天任上 一月十四日

編輯先生：

今天我看見我的朋友拿了一本「民衆先鋒」。牠的封面和革命評論差不多。裏面作文的人。也大多是從前革命評論中的先生們。我過去是最狂熱最愛讀革命評論的。並且

十分同情于革命評論的主張的。因此我看見革命評論第二
——民衆先鋒出版。不禁使我狂跳起來。在這整個反動局
面底下。一切的革命刊物都被封禁的時候，有一個這樣的
代表革命勢力的言論刊物；使我們這班「青年小子」何等的
高興啊！于是我馬上拿了幾隻角子。坐電車到四馬路去，
想買幾本來看看。並且還要送送我的朋友。可是我到了四
馬路，使我萬分的失望！所有的書店都沒有民衆先鋒。我
問那書店夥計。為什麼民衆先鋒沒有。賣他說：「南京政
府有命令，不許賣這種刊物」我聽到這句話，使我更痛恨
更仇視南京這般傢伙。恨不得立即把這般人來殺死，最後
我跑到一個賣小報的所在。才滿足我的慾望很痛快購買了
幾本。買回來一氣的連讀了二期。(第一第二)牠的內容。
一字一句却使我十分滿意。我除滿意之外又還有什麼話可
說呢？但是我總覺美中不足。貴刊的態度雖然十分的坦白
和強硬。可是還有許多問題却没有談及。貴刊已然沒有
談及。我今天要問的是關於第三次代表大會的事。大家都
知道南京政府已與北京政府一樣了。離開了革
命離開了民衆的政府了。(因牠離開了民衆和革命所以革
命叫牠南京政府不配叫國民政府)民衆和革命所以被剝
削了。一個革命的國民黨也被他們強盜去了。現在整個
軍閥的槍桿子變動。軍閥無不專橫之下。一切都談不
下來。

從新。現在我們復得建國革命。只有把這般封禁軍閥。有好結果。
是革命的。在南京！我們非常明白。所謂幾個軍閥。有那些
無非是第二次中央委員有許多黨的。所以上次全。大會。
因爲第二次中央委員有許多黨的。所以上次全。大會。
革命的事。所以中央委員有許多黨的。所以上次全。大會。
之。在絕。對。的。我們強。色。去。離。開。的。完。全。專。見。
離。下。絕。對。的。我們強。色。去。離。開。的。完。全。專。見。
大。會。的。結。束。給。他。們。提。起。強。好。過。對。于。這。點。主。張。對。三。次。代。
次。代。表。會。的。結。束。給。他。們。提。起。強。好。過。對。于。這。點。主。張。對。三。次。代。
非常懷疑。會中生活。在民衆先鋒很公道。對三。次。代。
敬祝。
瑞浦
一月廿二日

會。對。於。我。們。沒有。談。到。南京。我們。所。要。開。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無。所。不。備。等。於。一。般。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還。不。止。一。等。於。一。般。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道。不。止。一。等。於。一。般。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刊。不。止。一。等。於。一。般。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有。的。事。當。然。是。不。必。大。感。憤。了。我。們。的。刊。物。的。發。表。主。張。的。意。見。沒
道。不。止。一。等。於。一。般。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刊。不。止。一。等。於。一。般。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有。的。事。當。然。是。不。必。大。感。憤。了。我。們。的。刊。物。的。發。表。主。張。的。意。見。沒

我們對於所謂第三次代表大會應有的認識

許德珩

現在南京的編遣會議已經開完了；所要發行的公債已經分配好了；暫時的軍事妥協已經妥協定了，民衆團體老早就摧殘盡了。貪官污吏都是各得其所，爲所欲爲了；指派，圍點，威逼，利誘，拉攏，勾結等等的手續，都已經一步步的完成，得以安心無事了；他們進一步的工作，就是要來開這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現在開這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期，已經又是走着逼近；運動的，指派的，雖然都是「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然而究竟什麼是一箇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他的真實的意義是什麼？恐怕我們還不得不有一箇明確的認識。

我們知道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也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樣，根本就是因爲有了民國十三年改組的國民黨改組；他一切的精神，行動，都是附隸在十三年改組了的國民黨之上，脫離了十三年改組，當然無所謂第一二次代表大會，自然更談不到第三次代表大會，這是一箇很淺近的事實。我們又知道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所以能夠算得是一箇革命的大會，是因爲當時產生這個大會

的黨是一箇革命的黨，是一箇能夠代表革命民衆的黨；現在南京所急於要召集的第三次代表大會，究竟是不是能夠合於這個條件呢？

要解答這個問題，當然是要根據於當時的黨和南京現在的黨以爲定，也就是要根據於當時改組後黨的精神和現在南京的黨的精神以爲定；是要根據於這些事實，以作比較，我們才能夠有一箇明白的認識。

第一我們所知道的，就是改組以後的黨，他是不断的吸收革命的新份子，除去不革命，反革命的腐舊份子，表示他一箇革命的，前進的精神；如在當時他對於所謂黨員如馮自由，馬素等人之開除黨籍，以後對於西山份子之開除黨籍；青年學生，工人，農民，婦女等等革命的份子之源源不絕的入黨；這樣一些新陳代謝，勇往前進的事實，就是在當時黨的一箇前進的，革命的好例！然而現在怎麼樣呢？事實告訴我們，不惟這兩年來經過他們「亡黨的清黨」和他們的「登記」等類的手續，把黨裏所有的革命份子都加上一箇「牽共產黨」，「不離字的共產黨」，「共產黨

嫌疑」等類的名詞，一箇箇的都清查出去，或者竟是屠殺消滅下去，把一大堆腐的，爛的，老的，臭的以及曾經開除了，反動有據的都投進來。作了黨的柱石！國的棟樑！並且這一次爲他們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預備，還要進一步的規定一箇「特種登記法」，要把十三年改組名是未登記而其實是在那裏腐化反動的份子，先去了黨員資格的份子，都適用這箇「特種登記法」，一一的搬進黨來，根本推翻十三年改組的系統，消滅十三年改組的精神，這是與十三年改組時候的黨根本不同的第一點。

本黨十三年改組的第二箇精神，就是他的民主集權制，就是他要把箇黨的基礎建築在一般革命民衆之上，成爲革命黨員共同奮鬥的革命集團，而不是一兩箇人荷包裏的私黨。關於此點，且看總理在第一次全國大會的一段演說：

「……有人以此次由總理制改爲委員制，覺得不大妥當，但須知彼一時，此一時，當前回大家灰心的時候，我沒有法子，只得一人起來担負革命的責任，現在有很多有思想的青年出來了，人民的程度也增高起來了，沒有人覺得中國的革命應該在二十年以後了。我們從事革命的事業，國民祇以爲太慢，不以爲太快了，故此改組，即把本

黨團結起來，使力量加大，使革命容易成功，以迎合全國國民的心理。」又說：

「……本黨此次改組，就是本總理想把這人負擔的革命重大責任分之衆人，希望大家奮鬥起來，使本黨不要因爲本總理箇人而有所與廢。……」

當時的情形是如此，總理之要把一箇黨成爲大多數人共同担負革命責任的黨其情形是如此；更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紀律問題決議案中，是這樣決定的：

「……大會以爲國民黨之組織原則，當爲民主集權制度，每一黨員，既有應享之權利，亦有當盡之義務，參與黨內一切問題之決議；及黨外政策之確定，選舉各級執行黨務之機關，此其權利也。此等全體黨員，參與共同討論決議及選舉之制度，即所以保證民主主義之實行也。」

然而現在呢？這種精神本來早已經就喪失無餘了。更由什麼「中央」一七九次的決議，決定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由「中央」指定半數，未正式成立之各地黨部代表，亦由「中央」指定。而這次南京市黨部的選舉，索與正式廢除了黨的選舉制，實行用圈定的方法；由這箇指派與圈定，宣告了黨的壽終正寢！這是與十三年改組以後的黨根本不同的第二點。

十三年改組，認定工農為本黨的革命主力軍，認定軍閥，帝國主義為本黨的革命對象；更認定只有不妥協的精神，才可以對付軍閥，才可以對付帝國主義者，完成革命。所以在當時才有種種工會農會的組織，農工政策之制定，實行援助罷工如當時的「省港罷工」，以求得大多數勞苦民衆的解放；實行與帝國主義者，軍閥肉搏，如當時之沙基慘案，商團事件以及十五年的北伐，表現他一箇不妥協的精神！但是現在怎麼樣呢？對付帝國主義者是怎麼樣呢？對付軍閥是怎麼樣呢？這不待我們再來重重覆覆的申述一次勾結妥協，民衆是早已知道工會農會是整箇的消滅盡了，我在上次曾經講過，南京去年總登記的結果，黨員三千六百多人，工農只有四十多人佔全數百分之一零五，以

民生主義的民主政治

(一)
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下的革命同志所信仰的三民主義，本來不用說，是整個的。不幸有了所謂「連環」說，硬把牠割成了三段，好像是三個東西串在一起似的，子是不革命和革命的分野子要講究得極，妥協得極，以掩飾革命的時

居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農，而在黨的成分裏面，竟佔了百分之一零五，這箇黨還成箇什麼黨？這又是與十三年改組時候的黨根本不同的第三點！

基於上述的三點看來，現在南京的黨，他已經是推翻了十三年改組的系統與精神，他已經是放棄了十三年改組時候所認定的革命對象，他已經是停頓了十三年改組時候所認定的黨的基礎，他是一箇封建的集團，軍閥官僚的淵藪，不是一箇革命黨人的集團，所以這次南京所要召集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是等於「善後會議」，「分贓會議」，「豬仔會議」一樣，是一箇欺騙民衆的東西，這是我們所應當根本認識的。並且應該起來，一致反對的！

一九二九，一，廿八日

程希孟

置而包庇反動的進攻。其實像這種反動勢力高張下，革命民衆只看見「黨」被腐化分子所竊盜，只覺得「國」被封建集團所割據，黑暗和壓迫自是必然的結果，革命當然談不到了。這種事實無論敢說不敢說，大家在客觀上，看得清清楚楚，用不着我勸來多說。對於在這箇情形下，許多革命

的同志因爲反動的勢力來得太兇，民衆的壓迫受得太苦，簡直使革命的進展一步也走不動，所以對症發藥，第一步要求打破反動的壓迫，主張先用全力來完成民權革命。這個意思是非常正大勇敢，在策略上講，也有相當的理由，並且未嘗不是根據革命的立場而出發的。不過，在充滿了矛盾和虛偽的中國局面下爲革命的根本前途計，我對於這種側重民權革命的態度，不能不有一點批評。不，與其說是批評，不如說是補充。因爲我不是反對民主革命——情仰三民主義的人誰都擁護民主革命——我只怕側重民主革命的宣傳，足以無意中助長那種割裂三民主義的威風，予假革命的人以藉口；更怕渴望民生主義實現的勞苦民衆，由誤會而失望，損失革命的力氣；尤其怕有少數「革命領袖」當真將民主革命做最初一件工作和最後一件工作，豈不又要無形中引革命於歧路而終於促成其流產？所以我認爲有從根本上說明我們所要求的民主政治的必要。

在敘這個說明之先，我們須澈底的明瞭革命本身是什麼東西；民權革命及民權（民主）政治怎樣可以達到。

革命是適應社會上客觀的需要，這是不消說的。革命的發動沒有不從被壓迫民衆要求改善經濟政治地位而來。革命的成敗必定要在社會結構上打倒一切壓迫勢力和制度

，建設平等自由，解放民衆的制度。換言之，革命的內容不是領導革命者之握得政權，而在政權到了革命勢力手中時，一切壓迫的制度，尤其是經濟的制度之推翻及民衆所需要的根本制度之建設。這一個過程即是革命。

我是反對無政府主義的，但是正當中國無政府主義者變相的猖獗於青天白日旗下的今日，不妨引一段克魯泡特金對於革命所下的定義，讓他們清夜捫心去想想看，到底現在這般反動的回攻，配不配冒充革命的招牌：

「一個革命是無限地多過於一套連續的城市及鄉間的武力反抗。牠不止是一個單純的政黨間鬥爭，無論鬥爭流了多少血；不止是單純的巷戰；千百倍不止是一種政府的變更，例如一八三〇年及一八四八年法國所經過的政府更換。一個革命是將經過幾百年才根深蒂固的制度，將似乎極堅固，極穩定，連最熱烈的改革家都不敢用文字來攻擊制度在幾年之內，迅速地打倒……」（見克魯泡特金《大革命史第一章》）

我們都知道克魯泡特金這段話是要說明革命不是偶然的表面上的變更；革命是根本而迅速的變更，或者有人以爲這個定義太「兇」了麼？那麼，我來退一步說，一個革命最少是要將那個革命所認定了要革去的對象根本地迅速地打倒讓

我再補一句——並且根本的迅速的建設一種那個革命所認定要建設的新社會秩序。留心，革命的同志！革命不是政府的變更。革命是制度及思想的根本的改革。但是一切政治制度是以社會經濟制度，結構為主要根基，所以沒有那一個單純的政治突變是革命。人類歷史上有無數的政變，並且爲了這政變，不知流了多少血，有罪的或無罪的。無論政變的方式如何透澈，政變的現象如何嚴重，假使不伴若經濟制度或結構上的改革，簡直不成爲革命。其實，真贖懂了歷史的人，也不會在經濟革命運動以外去找社會或政治革命。我們即拿歐洲所謂「宗教革命」——姑且認爲是革命——做例，這總算是屬於人們精神生活上的改變吧。試問宗教改革是不是骨子裏爲得經濟問題才鬧成一個廣大的社會運動？一般民衆，是不是苦於舊教寺院的橫征暴斂，請求無厭才起來打倒舊教，附和路德的肅清教會貪污的運動？德國一大部份民衆尤其是農民是不是因爲擴大要求經濟地位的改革而暴動而卒被路德反噬并助着當時一切反動壓迫階級來殺戮革命的農民？當時德國大部份農民是不是因爲這個由宗教引起的革命流產而受地主更大的壓迫，以致比當時歐洲任何國家中農民的地位還要壞？更進一步，「三十年戰爭」發生的第一個最大原因是不是因爲日耳曼的

新舊教徒爭寺院財產所有權，而結果引動了國內外的封建軍閥接一連二的混戰？（可憐，當時一般老百姓人民真有相信地位的王侯是爲得「衛教」才動干戈的，所以犧牲了生命，不知原本是爭財的火併。當時「衛教」同如今「革命」是一般神聖的口號！）當時一些君主，貴族及其他壓迫者是不是因爲垂涎舊教寺院所侵掠的大宗財產而許允并助長新教徒，趁火打劫，沒收或佔領舊教土地及寺宇？如果不爲得骨子裏的爭財，及苛捐，恐怕馬丁路德連宗教改革的面具也沒有機會帶上呢！革命是何等須要澈底的經濟改革爲骨幹的事，難道當真只要南京代替了「北京」就成了革命？最少，在三民主義的革命立場上講，中國的革命是一個整個的革命；在方面上，雖可以說民生，民族，民權；在體質上還只是一個革命。牠的最大目的在求經濟平等，政治平等及民族平等。

(二)

具體來說，民權政治必須以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爲實質。政治的革命必須以經濟的改革爲基礎。這個理由很簡單。社會的經濟結構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最重要的使命即在用社會集合的力量來主持改進并保障人民生計上根本制度，所以政治革命必定要將社會經濟的改造，用政治方

式表現且完成起來。爲什麼說多革命運動的基礎，都是取爭權政權，改革政治的方式？根本上，因爲民衆生計問題，在生產方法變更過程中，受了少數人們的逐漸加重剝削，而形成經濟上無政府狀態的壓迫；而同時政治勢力與制度都必然隨着經濟勢力落在少數壓迫者手中，現存的政治，在制度上和行政權使用上，必然爲壓迫的工具。不發生革命則已，一發生革命那革命的爆發也必然先以政治爲目標，其實呢，社會上經濟的壓迫和不平等，使多數的人「民不聊生」，已經製造根本上革命原因。多數的受壓迫的民衆，第一呼聲固然常是要求民主政治，打倒專制。但是，這時候革命運動如果推翻了專制，並且在政治上採取了民主的形式，而不在根本上滿足經濟上革命的要求，這個民主政治，一定失敗，一定虛偽，一定不能完成革命。不獨革命不能完成，並且政治雖然改換一個形式，反動勢力和壓迫階級，仍然可以變相來利用，操縱政權。固然，單純的政治改變，實質上就不是革命；而且政治革命必定影響經濟制度。不過，如果我們承認革命的標準是多數人（民衆）的解放，我們即知道，政治的解放必定要建設在經濟解放上；民權革命必定要建立在民生革命上。

壓迫的最後威權是經濟上的不平等；而革命的唯一最

後威權是經濟的平等。我們固然不應該說民主政治是民權政治，終究算革命。我們也不可以民主主義附屬於民權主義即算革命。外國的革命例子，如英國的「光榮革命」，法國的大革命，美國的獨立運動，暫且不去提。我們只要將中華民國歷史追溯一下。五色旗幟下，有國會，有選舉，有憲法，並有自治的發端，那時候民衆享受了民權沒有？再進一步看，現在總算中國在青白旗下（訓政只建國大綱，五院設立應在憲政開始時期，現在的五院究竟對不對，姑不去討論）期中，連黨的民主制都被「指派」和「圈定」摧殘無餘，民衆運動無形中已經壓制，說起來還是爲國爲民爲黨呀；我們索性將這種局面推展來看，即使自治進行了，憲政開始了，四權使用了，黨的本身上革命的軌道，如果民生主義中土地和資本兩大問題不解決，民衆的經濟地位只是換湯不換藥，誰能相信那時的民主政治不重演民元以來窮局？

確確實實，中國民衆除了須要民族解放外所最須求的不是單純的民權政治，而是以民生爲起點爲基礎的民主政治。平常人說到中國政治不入軌道，總怪民衆不肯與開國政治。但爲什麼民衆不與開國政治呢？在民元以前，可以說在別的原因外，因爲專制君主的壓迫促成的現象。民元以來

實在是在每一次政變只有變本加厲的剝削民衆，以致他們不信政治的改動與他們有切實的利益。在革命的退落潮流中，民衆除了受壓迫以外，實在是失望了；所謂革命在他們眼中，只是換了一個國旗！他們目前最切要的是生計的解放，經濟的平等，而革命要人拿什麼五院，電報，法令，委員等等來應付他們，（貧民壓迫且不去說）他們嘴裏不說，心裏明明白白知道你們的「革命」把戲了！不錯，這年頭，我們應該先向民衆說：「壓迫你們的是封建勢力，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結合的政局，所以要打破這個壓迫，先要實現民主革命！」我知道，民衆一定回答你說：「先生我不管什麼『民主』『君主』，我要飯吃，我要衣裳，我要地，至少收我幾個租錢，我要工廠多給一點工資！」近來社會上只要有一點騷動，即聽見說「共產黨圖謀暴動」。到底大家尤其是要人，這般「相憐以伯有」能夠證明共產黨有多大的勢力呢？事實告訴我們，這都不過「民不聊生」而革命又未滿足民衆生計上的要求之表示而已？也許有人不怪反動的高壓而怪民衆不與聞政治，所以革命沒有出路；而不知革命的根本出路即在民生上。

尤其在革命中盟的今日，革命「支票」已經有一次不兌現，再要推動革命民衆時，民衆會特別慎重，先考查發支

票的銀行是不是靠得住，支票的內容能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革命受一度的挫折，民衆的要求必然進一步而漸具體化，積極化。滿清時代，可以用民族自主喚起民衆；民二以後非以打倒軍閥，及帝國主義不爲功。時至今日，更不用空空洞洞劃除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建設民主政治等口號，能夠適應民衆的期望。發「革命支票」的銀行——黨——一定要有信用，支票的內容——政綱——更要澈底。這不是爲革命的策略計，是爲革命的本身計。如果在黨的信用和政綱上不能充分滿足民衆的要求，儘管用最好的感略，民衆是不肯輕動再蹈覆轍。革命經過一度打擊，民衆苦痛更甚，失望雖然加深，同時要求也更熱烈而具體。經過了多少的失敗，俄國民衆的革命運動才逼上了列寧的路。十三年改組後的本黨，在總理領導下，已經一步一步切合民衆的革命需要。目前的反動並沒有損害三民主義革命的本質，只証明了三民主義要澈底實行才能完成革命的使命。因此，我不贊成側重民主政治的宣傳，我主張更應該在這時候，使革命民衆了解中國革命雖然要求民主政治，可是這個民主政治即是民衆所期望的以民生主義爲基礎的民主，是與民族，民生同時並進的民主。

(三)

什麼是益得性的「革命支票」？怎樣才使民權主義以民生為基礎而與民族主義同時並進呢？解答了這些問題，便知道什麼是我們在革命的立場上所要求的民主政治。

可以發現的革命支票是革命民衆自己發行的支票。發支票的銀行要民衆自己也加入做股東。換言之，革命的國民主黨不但要代表民衆——農工小市民——並且要吸收民衆。這樣，黨才是民衆化的黨，黨才是民衆的自治，黨的要求才能代表民衆的要求。現在的國民黨太缺乏了革命民衆，太充滿了腐化反動份子，革命的同志誰都從事實上看得出，不必我在消極方面去揭發。我們如今要恢復黨的革命信用，中興黨的革命力量，最要緊的事是將黨公開於農工小市民使了解三民，要求革命的民衆都來同心合力，完成革命，但是民衆不會為空洞的民主政治而參加革命，他們却會為民生主義的政治而參加革命。話又說回去了。

理想的民主政治現在地球上還找不出，而歐美式的民主政治只是一個形式，一個空幻，一個包庇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這不是偶然的事。最大原因即在經濟不平等。這種民主政治改是以多數制 (Majority Rule) 為原則，以代議制為主要的表現。可是因為代議制在資本主義經濟不平等下，不確不是以多數治少數，簡直是以少數治多數。普

選制的實行在歐美本來近二十年才實行的，現在選舉上財產的限制雖然不載在法律上，但貧富懸絕的社會中，却實現於事實上。英國自誇為民主的先進，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聰明的英國資產階級決不懷衰世凱曹錕那樣硬幹硬買。他們並用法律規定每個候選員選舉費用不得過一定限度。但在事實上，運動選舉時，一舉一動都要花錢。印一本宣傳小冊，貼一張選舉傳單，舉行一個演說旅行，召集一個公開大會，其他請客，疏通，勾結，收買不用說，那一件不是資產階級政黨佔絕大的便宜，無形中超出勞工階級百倍，法律怎樣去限制呢？工黨開一個會，衣衫襤褸的工人要從荷包裏掏幾個銅子做捐款，集起來三五十人不到兩三鎊。保守黨或自由黨要開會，款子自然不成問題，只須一個當舖或銀行家答一張支票立刻幾十鎊。這還不去說。大凡競等選舉，不是臨時抱佛脚能發生効力，一切宣傳都在平常新聞及雜誌中進行。全英國言論機關，差不多被資產階級壟斷了。資本世界所奉為泰斗的大報，如太陽士報，每日郵報，電訊報，孟切司脫導報等等，新聞多麼豐富，篇幅多麼大！他們要傳布謠言，製造民意何等容易。再看工黨所辦唯一流行全英的日報 (Daily Herald) 每天出十面小而簡的新聞，還朝不保夕，一直賠錢。現在工黨

政策本是灰色的，所以才容納的報紙隨順當當的出下去。至於其他稍為激進的報紙，不知道一月要打多少官司，罰多少款。（平心而論，比我們中國還高明高倍，不至於動不動藉口毀謗要人的名義，用軍法殺害新聞家。）不止宣傳上，資產階級可以用民主之名操縱政治，即是實際政治上，又何嘗不露骨的資產專政。我們都知道，工黨於一九二四年內閣倒台的導火綫是所謂「紅信案」(Red Letters)。這即是一件對俄的外交公文，沒有得麥克唐諾知道，被英外交部屬員一向是保守黨的勢力範圍)故意洩漏，讓每日郵報連夜披露，并說工黨勾結蘇俄。要赤化英國。於是工黨內閣突然下台。據羅素先生對我談的，這類事是資產階級的宿謀，可以證明工黨要利用資產階級總免不了要上當。這種以民主之名專政之實的政治，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度裏如美法德等，通是一樣，不過有大同小異而已。歐美式民主政治所以虛偽，總理會經指出過，即因為沒有經濟平等——民生主義；中國既要革命，自然非民生與民權同時並進不可。不是這樣做，帝國主義更無法打倒。

國民黨在革命過程中須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當然不在乎取民主政治的形式，蹈歐美的覆轍，但民權的精神則必須在黨治中充分實現。表面上，這似乎成了一個矛盾，其

實不一定是矛盾。民主不能不以多數制為政治原則，而政治又必須以經濟背景為基礎，所以只要能代表多數的利益——經濟平等，黨治即可以說是代表多數的民主政治。中國多數人民是誰？當然無疑的是農，工，和小市民了。現在情形不允許理想民主政治，唯有一方面讓革命的農，工，小市民參加國民黨，一方面即用黨治為民衆謀利益，尤其是經濟的平等發展。果能如此，即無民主之名，已有民主之實，比歐美的虛偽民主要實在得多。

或者有人以為農工加入黨後，知識分子恐怕失去了領導的力量，政治上難免引起大困難。就中國革命的歷史看，過去黨的大缺點，正在民衆加入的太少。知識分子在領導革命時是決不可少的，不過時時刻刻要有民衆的推動與監督，否則知識分子與封建勢力所壟斷的黨，一登政治舞台。極容易成為「官黨」，革命也白革了，還有什麼民權政治？要國民黨能夠代表民衆利益，根本上不是「黨治」問題，也不是民治問題而是民生主義是否在政治上表現出來這一個總問題。

從此，我們更相信民主政治必定須建立在民生主義上，才有意義，民衆的知道程度過低，結果在政治上，只有少數的利用，不能行使民權。要補救這種流弊「調政」還

不是根本的辦法。根本辦法要實行民生主義，整個地改革社會經濟組織，和生產方法，使從事生產的農工小市民，做不剝削資本的奴隸，工作之外，得時間和機會求知識。若不從經濟平等着手，即使國家或地方從事教育普及運動，經濟壓迫下的青年依然不能和富貴人家的子弟，享同等政權，這是中外古今事實的表現。不獨如此，因為經濟的壓迫，社會上才發現許多悲慘現象：死亡率的增高，人民身體康健的低落，失業的恐慌，盜匪的增多，娼妓的蔓延，民族精神的萎靡等等趨勢，在這般水深火熱中，掙扎的民衆，那有機會去開問政治？可是，因為遭經濟壓迫的是大多數民衆，這些社會病狀多由他們生活上發生起來，于是少數壓迫人們更振振有詞，說民衆不配干與政治。本來已經陷入於社會病狀，做了犧牲的人們，知識能力既未啓迪發展，當然不知道運用政權。（但這種責任應該由社會組織去負）。結果，除了用革命方式來打倒壓迫勢力外，民主政治，自不是立刻可以完全實現的。

在另一方面，因為大多數人——民衆——長久在經濟壓迫下生存，政治訓練，根本上不會得過，即使政治上發生一個革命式的變化，民衆還是莫明其妙，不會用領袖，反被領袖所用。等到民衆覺悟領導者不可靠時，政權早已

落到少數人手中。這少數人自然畏懼民衆，爲穩壓民衆的革命計，即刻與社會上經濟上甚至於外國的反動勢力相妥協，大家聯合起來壓迫民衆。這時如果還有一些忠於革命的分，仍然站在民衆一邊，來大聲疾呼，重鑿革命的旗鼓，反動勢力一定愈畏懼民衆而加以壓迫，愈急切的將舊經濟政治勢力團結，結果也自己日趨於末路。民衆雖暫時失望，他們如果再起來時，的確不是從前召號革命的政口號所能滿足。他們所切盼最甚的更加是經濟的解放，政治的問題還是其次。所以這時候，革命領導者，若用民權主義來宣傳，遠不如用民生主義的方案來宣傳。

況且再鑿革命的旗鼓時，除非將民權建設在民生上，舊社會經濟一定又不能改革，新社會經濟一定又不會建設，革命仍然要隨着反動的反攻而中墮。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非下決心建立革命基礎不可。得着一天的政權，即要實行建設一步新經濟制度，否則民主政治必無實現的餘地。自然，要完成全革命，無論在政治上或在經濟上，帝國主義非打倒不可。民衆現在所受的壓迫，尤其是經濟的，處處都和帝國主義相關相成，但現代帝國主義的核心即是資本主義，所以中國的革命進展中，處處要實行民族主義，（民族平等），即處處要實行民生主義，使資本制度無立足

之地，然後我們所得的民主政治才是真實的。（關於資本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衝突及民生主義的革命對資本的政策，當另為文討論之。）

如何統一革命理論

施存統

（一）
「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這句話在革命的同輩間，現在已經是普遍化了。革命理論對於革命的重要，差不多一切革命的同輩都認識了。無疑地，我們要革命成功，必須有正確的革命理論來指導我們底革命行動；不然，我們底革命，一定要歸於失敗。

為什麼革命理論有這樣的重要性？這是因為革命是一種社會底根本變革，社會變革有一定的法則可尋，革命理論就是指導社會變革的科學。歷史上所經過的革命現象（自然僅指人類社會而說，）都具備兩個條件：第一個是新的社會制度起來代替舊的社會制度，第二個是新的支配階級（原來的被支配階級）起來代替舊的支配階級。具備了這兩個條件，才能叫做「革命」。這種革命底目的，在於促進社會底進化。這種革命底發生，由於社會進化底結果。革

歸結起來，只有一句似普通而極重要的話：我們所要求的民主政治是與民族主義並行，而以民生主義為基礎的民主政治。這就是民生主義的民主政治。

命是社會進化到一定的階段必然要爆發的現象——自然主動者是人類自己。革命所顯示給我們的最重大的社會現象（根本的社會現象，）就是從根本上變革了社會制度和階級關係（支配關係。）這種社會制度和階級關係底變革，為着促進社會底進化，同時也是社會進化底必然結果。革命理論就是指導這種社會變革的科學。

我們知道，社會現象也與自然現象一樣，有一定的因果關係可尋，不過它有它自己一種的因果關係罷了。社會現象，為「社會的因果律」所支配。社會科學底根本任務，就是要究明社會的因果律。革命理論，自然屬於社會科學的範疇，構成社會科學底一部份，不過它是研究社會變革過程中的因果關係罷了。但是我們要真正懂得革命理論，必須對於整個社會底構造與變革有正確的認識——必須以這種正確的認識為基礎，才能獲得正確的革命理論。所以

廣義地說起來，革命理論可以包括整個社會觀（全部社會科學），甚至於包括整個宇宙觀（哲學）。革命者要建立堅固的信仰，不能沒有自己底社會觀與宇宙觀，與反革派對抗。革命者有了正確的社會觀與宇宙觀，才能堅定自己底信仰，不致因一時挫折而悲觀，而動搖。所以我們研究革命理論，不僅要研究關於一定部份的社會變革的理論，並且要研究一切革命的社會科學以至於革命的哲學。

然而我們最重要的任務，還是在於研究關於特定社會變革的理論。我們現在生活着的世界是資本主義的世界，我們便應當研究關於資本主義世界變革的理論。我們現在生活着的國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制的中國，我們便應當研究關於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制的中國社會變革的理論。我們現在是在中國革命，可是中國是世界底一部份，中國革命又是世界革命底一部份，我們一方面固然要研究中國情形及中國革命情形，同時也不能不研究世界情形及世界革命情形。我們底革命理論——中國革命底理論，只看在這兩重情形底研究之下才能建立起來。我們一方面要明白「中國」，同時必須明白「世界」。『現代的中國和現代的世界都處於一個革命的時代——即社會將要根本變革的時代。我們必須明白這二重變革底因果關係，才能建立我們底革

命理論。我們有了正確的革命理論，才能引導現在的革命階級去打倒現在的支配階級，推翻舊的社會制度，建設新的社會制度。如果沒有正確的革命理論，儘管有很大的羣衆暴動，毫無目的地亂鬧一陣，也不成其為革命。革命必須有一定的目的——建設新社會制度，促進社會底進化。被壓迫羣衆底暴動，只有在向着這樣的目的進行時，才能成為革命，變成革命的行動；不然，僅僅是暴動或反抗，決不是革命。所以古代的奴隸反叛，中世紀的農民暴動，近世初期工人反抗機器的行動，以及義和團運動紅槍會運動等，嚴格地說都不是革命，因為他們都沒有一定的適應社會進化的目的（這是因為沒有這種客觀條件）。所謂『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就是這樣的意思。因此，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正確的革命理論來指導我們底行動，使我們底行動合於革命底目的。我們在中國革命，必須建立一個真正能夠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使我們底一切行動變成革命的行動。

革命理論底重要，便是這樣。

(二)

然則現在有沒有真正能夠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呢？說沒有固然是不可以，說有也似乎太早。現在關於中國革命

的理論，雖然比較過去已經算有了相當的進步，一般革命同志對於革命理論的認識比以前的確增高了不少，但是關於中國革命的幾個根本問題，仍舊還得不到適當的解決，尤其沒有一致的解決。中國革命底性質，中國革命底階級問題，中國革命底組織問題（黨的問題），中國革命底策略問題，中國革命中的土地問題與資本問題，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底關係等重大問題，直到現在，還是異說紛陳，莫衷一是。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適當的解決，中國革命底正確的理论便很難建立起來，更不會統一起來。我們知道，要統一革命勢力，必須先統一革命理論，必須由一個正確的革命理論把一切革命勢力統一起來。可是現在的革命理論，雖統一的時期還很遠很遠。其餘的問題我此刻且不去說它，單拿中國革命底性質一個問題來說吧。（關於這個問題請參看拙作『中國革命與三民主義』及『中國革命底理論問題』等小冊子）

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的爭論，除了狗屁不通的『全民革命說』以外，主要的有兩種意見，我們應該先提出來說一說：一種是說中國革命僅僅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另一種是說中國革命現在應當轉變到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而且已經轉變到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了。例如彭學沛先生，就

是採取前一種意見的人，『戰線』底迪可先生（因為我與迪可先生討論過這個問題，故舉他做一個例子，）就是採取後一種意見的人。大概『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多採取前一種意見；『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多採取後一種意見（自然都是指那些與革命有多少關係的智識分子而說。）這兩種意見，雖然始終不曾看見有人做系統的不斷的宣傳，然而在許多革命同志底意識中，却時時發生作用，右傾的多採取前一種意見，左傾的多採取後一種意見。這種情形，在前年國共兩黨分裂以後，表現得格外明顯。其實從中國社會實際情形觀察起來，這兩種意見都是錯誤的，都沒有事實的根據。

我們底意見不是這樣。我們根據中國客觀的事實來觀察，知道中國不能有『純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也不能有『純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中國革命底性質，決不這麼簡單；它是更複雜的現象。中國社會，從內部關係來說，還充滿着封建遺制與封建勢力，封建階級（官僚軍閥豪紳地主等）還處於統治的地位，顯然需要推翻封建階級的民權革命；就對外關係來說，乃是帝國主義支配下的殖民地，全國人民都做了帝國主義底奴隸，顯然需要打倒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然而這種反封建階級的民權革命與反帝國主義

義的民族革命，適處於世界革命（以打倒帝國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爲共同目標）的時代，且以工農階級爲主體，不是以資產階級爲主體，）所以這種革命（民族民主革命）底徹底勝利，必然要走上社會革命（民生革命）的道路，向着非資本主義的民生社會前進。所以整個革命底性質，就是三民主義的革命，既不是『純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也不是『純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自然，從歷史的觀點看來，我們也可以承認而且必須承認：這個三民主義的革命，依其主要任務底不同，可以分爲兩個階段，即民權革命的階段與社會革命（民生革命）的階段，而現在這是民權革命的階段。再則我們還可以承認：現階段的民權革命是帶有資產階級性的革命（依其『歷史的任務』來說，）但不是『純資產階級的』革命。次階段的社會革命是帶有無產階級的革命（也依其『歷史的任務』來說，）但不是『純無產階級的』革命。我們所謂中國革命底兩個階段，並不是說中國革命要分兩次來做（像俄國底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乃是指整個中國革命過程——三民主義的革命過程，依其『歷史的任務』底不同，在實際上在戰略上都應有這樣的規定。這兩個階段乃是整個中國革命中兩個互相銜接的不可分的環節。連結這兩個階段的『樞紐』，乃是一個以工農爲基礎的革

命的民主政權。有了這樣的民主政權，民權革命必然會發展到社會革命。其次，在這從民權革命到社會革命的過程中，始終須堅持着反帝國主義的精神，與世界一切反帝國主義的勢力相聯絡，結成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綫，以促成世界革命底成功。所以中國革命，就內部關係說，是從民權革命到社會革命；就外部關係說，是從民族革命到世界革命（嚴格地說，中國革命就是世界革命底一部份。）整個中國革命底性質，就是三民主義的革命。這個三民主義的革命，其根本的關健在於民權革命。因爲民權革命是一個方法，（自然還有它歷史的意義，）有了方法才能達到目的，換句話說，民權革命勝利了，三民主義的革命才有成功的可能，對外才能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才能開始社會主義的建設。所以我們認定目前的中心關爭是民權主義的鬥爭，一切革命的勢力都應當集中於這個中心的鬥爭。這是我們對於中國革命性質的正當認識。我們自信，我們這種認識是正確的；然而有許多革命的同志，他們底認識，至今還不能與我們一致。

這還是單就革命性質來說的，意見之不統一已甚明顯。講到階級問題，黨的問題，策略問題等，意見之紛歧，當更厲害。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現在的革命理論，實在

很不統一，不但各黨各派之間不能一致，就是一黨一派以內也還不能一致。革命勢力至今不能統一，這是一個很大的原因，而且是一個根本的原因。

(三)

我們相信，要使中國革命成功，必須統一一切革命的勢力。要統一革命勢力，必須統一革命理論。

然則如何可以統一革命理論？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最近有許多革命青年，都爲這個問題煩悶。我曾經遇到好些青年問我：「現在革命理論這樣紛歧龐雜，叫我們到底從哪一種好？」我底答復只有一個：「要你們自己去認識判斷，不過要站在革命的立場，採用科學的方法。不要盲目地崇拜偶像，也不要盲目地接受不負責任的煽動！」我這種答復，自然不能滿足許多革命青年底希望，然而我只能有這樣的答復，我以爲只有這樣的答復才是正當的答復。一切革命的青年，對於這個問題，必須用自己底力量去認識去判斷，別人是不能代爲解決的。

我們要知道：目前革命理論底紛歧，一方面是革命失敗後必然發生的現象，同時也是一種很好的現象。這次革命底失敗，從一方面看來，固然比辛亥革命慘痛得多，但

從另一方面看來，這次革命所遺給革命同志的教訓，也比辛亥革命豐富得多，別的姑且不說，單就一般革命同志對於革命的認識來說，實在比以前進步得多了。現在革命理論底紛歧，固然一方面是因爲大家對於革命失敗的觀察不一致（這當中還夾雜着許多個人的偏見和黨派的偏見，）同時也因爲大家對於革命的認識程度提高了。如果大家對於革命的認識和以前一樣，恐怕決不會有這些不同的革命理論提出，即使有人提出了也不會引起人們底注意。所以目前革命理論底紛歧，倒是一個進步的現象。但是要使革命成功，決不能讓革命理論長此紛歧下去。革命理論，必須從紛歧到統一，革命才有辦法。

但是革命理論，如何才能從紛歧到統一呢？由南京黨部下命令來統一嗎？這是笑話，也是夢話（居然有人在「青天白日之下」做這樣的夢話呢。）不要說現在的南京黨部和南京底權力者，不能用命令來統一革命理論；就是比現在南京黨部和南京底權力者再高明些的黨部和權力者，也不能用命令來統一革命理論。革命理論，不但不是用命令可以統一，而且也不是以多數底通過（少數是更不必說）可以強迫統一的。真正要統一革命理論，只有兩個方法可以採用：一個是實行公開的理論鬭爭，另一個是從事共同

的革命行動。現在稍爲解說幾句。

先說第一個方法——即實行公開的理論鬥爭。我以爲真正要統一革命理論，不但與黨派之間要實行公開的理論鬥爭，就是同黨派之內也要實行公開的理論鬥爭。因爲革命理論是要指導革命行動的，革命行動不是一二人或少數人秘密的事，而是多數革命羣衆共同的公開的事，所以革命理論如果有了紛歧，只有向着羣衆實行公開的理論鬥爭，以多數羣衆底力量（贊成或反對某一種理論，都由羣衆自己去判斷）來統一革命理論。我相信，我們主張或提倡一種革命理論，爲的是革命與民衆，決不是爲個人。我們之所以堅持某種革命理論，是因為我們相信只有某種革命理論可以指導革命行動。如果實行公開的理論鬥爭的結果，我們所主張的理論歸於失敗，那麼我們爲了革命的利益，自然應當在「真理」底面前投降，決不應當頑固到底，仍以錯誤的意見去害人。真實的革命者，只認識公共的真理，決不顧惜個人的面子。只隨得顧惜個人的面子而不認識真理的人，一定是虛偽的革命者——革命的騙子。實行公開的理論鬥爭，不但可以統一革命理論，而且還可以暴露「假革命者」底「真面目」。革命的羣衆，在公開的理論鬥爭之下，一定會有正確的認識和正當的判斷；而且亦只有在

這種公開的理論鬥爭之下，才能訓練羣衆，才能提高羣衆底理論認識。經過了公開的理論鬥爭，多數羣衆擁護某一種革命理論，那種理論便成了統一的理論（自然是相對的），取得指導的地位。我們如果信自己底理論是正確的，應當大胆地主張並且實行公開的理論鬥爭。

次說第二個方法——即從事共同的革命行動。固然，從一方面說是「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但從另一方面說，沒有革命的行動也不會有革命的理論——而且理論本身也可以說就行動底一部份。革命理論與革命行動，並不是兩個對立的東西，乃是一個東西底兩面看法。真正的革命理論，不但要從社會經濟狀況及階級關係中產生，並且要從革命階級底經驗與革命者底行動中產生。站在革命外面的人，離開革命行動的人，決不能建立革命的理論，甚至於不能了解革命的理論（頂多只能了解一部分）。只有親自投身革命運動中的人，只有實際從事革命行動的人，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論，以至於建立革命的理論。正確的革命理論（尤其關於戰略戰術的部份），必須集合種種革命行動所得的經驗與教訓而成。每一次革命行動（無論成功或失敗），都有幫助於革命理論底建設。從行動中產生理論，用理論指導行動，再以行動改正理論。理論底

正確與否，必須靠行動來證明。正確的革命理論，能夠正確地分析環境，指出行動底主要任務及其應當具備的一切條件，並能預測各種可以發生的情形，指示行動底正確路向。不然，就是錯誤的理論。所謂統一革命理論，只有正確的理論代替錯誤的理論，決不是使正確的理論與錯誤的理論相調和相混合（如果是這樣，錯誤一定更厲害。）正確與錯誤，只有行動是最好的證明。在實際的行動中，錯誤的理論，必然會暴露出它底原形，證明自己底無力無用以至於失敗。正確的革命理論，在實際行動中一定逐漸會被人認識，最終必能取得指導的地位。許多理論不同的人，在一個共同的革命行動之後，一定會比較以前一致，至少羣衆一定如此。我們現要統一革命理論，必須發起廣大的羣衆運動——一切革命者都可以參加的羣衆運動，使大家從事共同的革命行動，從共同的革命行動中去求得比較一致的認識，由此漸漸統一革命理論。經驗告訴我們，有

到民權主義之路

我們平常一談到「民權」問題，便要聯想到「黨權」「軍權」與「官權」依照國民黨的革命三大程序——即軍政訓

許多革命同志，彼此沒有從事共同的革命行動以前，意見是很不一致的，但是一從事了共同的行動，意見就漸漸趨一致了。尤其對於智識分子，只有共同的革命行動，才能統一他們底意見。共同的革命行動，是統一革命理論的最好方法。我們真正要統一革命理論，必須從事共同的革命行動，決不能專靠口頭或文字的爭論。

以上就是統一革命理論的兩個方法。我相信，只有公開的理論鬭爭與共同的革命行動，才能真正統一革命理論。現在理論底不統一，是種種矛盾事實底反映。要解決矛盾，只有鬥爭和行動，調和與冥想是絕對無能的。這不是二人或少數人所能解決的，必須靠多數人底努力，羣衆底努力。一切革命的同志，我們要大家一致地努力；我們爲統一革命勢力而統一革命理論，我們以公開的理論鬭爭與共同的革命行動去統一革命理論！

一九二九，一，廿六。

黃惠平

政憲政——在軍政訓政兩個時期以內，提高「黨權」是「民權主義」有利的惟一保障，抑制「官權」是摧毀封建勢力的

必要手段：一則因爲「黨權」必須透過「民權」方能提高，「民權」亦須透過「黨權」才可實現；一則因爲「官權」是封建勢力的結晶，「軍權」是新舊軍閥的政治基礎，「官權」降落，便是使封建勢力失其政治上的保障，「軍權」的瓦解，便是軍閥沒落的末運，所以我說，提高「黨權」是實現「民權」的重要前提，抑制「官權」是摧毀封建勢力的必要手段。但是目前的「黨權」怎樣？「官權」怎樣？我們所看到的：祇是「軍權」的擴大，「官權」的伸張。所謂「黨權」，簡直變成了反動派壓抑革命言論排除黨內民主分子的工具，所謂「民權」更是一張不兌現的支票；連革命民衆最低限度的自由，——即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也被剝奪得乾乾淨淨了！至于「軍權」的擴大，乃是有耳共聞有目共見的事實，中央執行委員會雖然沒有議決「把黨交給武裝同志」，但是領袖武裝同志，也就毫不客氣把「黨放進自己的荷包裏去了」。至于「官權」的伸張，我們祇要看看北平政治分會制止各級黨部干政，（見一月廿八號申報專電）便曉得北方的政客官僚，早已把黨部看作眼中之釘，嫉「黨權」如仇了。他們所謂禁止侵犯人民在法律上之自由，祇是禁止侵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剝削革命民衆的自由罷了。奉方代表竟道魯先生談話：主張一切下級黨部停止活動，以防俄方

宣傳赤化，（見一月廿八號）真是妙人妙語，不愧爲國民黨的忠實黨員（？）難怪南京方面也有人主張民衆運動，祇許有組織的組織，不準有立體的形式，以免爲共黨所利用。吾知危豐先生有知，亦必大喊一聲「吾道不孤矣」。總而言之無論從任何方面來看，我們不得不說這次革命的結果，比辛亥革命還不如。辛亥革命以後，大家還曉得什麼「主權在民」，頒佈「臨時約法」；不管她是真的假的，政府方面總須表示表示「尊重民意」。現在呢？少數軍閥官僚，挾着「軍權」威迫「黨權」，提倡「官權」抑壓「民權」。聰明狡猾一點的軍閥官僚更藉着提高「黨權」（？）的招牌，擴大「軍權」，消滅異己，提高「官權」，維持封建的遺制。因此「軍權」與「官權」是兩個狼狽爲奸的反動政權，「黨權」與「民權」是一對相依爲命的革命姊妹。我們要想實現革命的民權，必須摧毀整個反動的政權，——即「軍權」與「官權」的混合體——保障民權革命的勝利，必須提高「黨權」。但是「黨權」怎樣纔可以提高？反動的政權如何才可以摧毀？這是橫在「到民權主義之路」中間的兩個重大問題。我們希望本黨的革命同志，對於這個問題，有個確實明確的認識，指導民衆匯爲英勇的廣汎的民主鬥爭，不可一誤再誤重蹈辛亥革命覆轍。我個人的意見，以爲

(1) 必須實現黨的改組，使革命的國民黨。〔黨〕是革命鬥爭的工具。健全的黨，是保障革命勝利促進民權運動的惟一條件。無論民衆對於民權主義的要求如何迫切，參加民權主義的鬥爭，怎樣勇敢，假使沒有一個堅強的革命黨之領導，鮮明而統一的理論，指示其鬥爭的途徑；結果便要發生兩種現象，使近代的「民權」政治便無從實現。一種現象就是中國式的秘密結社，一種現象就是俄國式的虛無主義。前一種鬥爭的方式，祇有無結果的民衆暴動。後一種鬥爭的方式，祇有製造恐怖的个人暗殺。所以中國舊式的秘密結社與俄國式的虛無主義，都不能促進民權的發展，完成歷史的任務。但是我們所要求的是革命的民主政治之實現，我們所需要的是革命的民權主義之發展，所以我們需要一個革命的國民黨，領導革命民衆的民主鬥爭，走上民權主義之路。不然，在革命空氣稍爲緩弛之後，一定就要回頭跑，重新恢復反動的局面。但是中國國民黨的現狀怎樣？她是否能在現狀之下，實行民權革命，完成民權革命。我們可以毫不猶豫的答覆：現在的黨，已經整個地爲反動份子所把持，她不但不能實行民權革命，反而被反動份子劫持操縱，變爲壓抑民權革命的工具了。所以我們認定實現黨的改組，恢復黨的革命性，是完成民權

革命實現民權主義的先決條件。我們尤其希望一切革命的三民主義者，現在應集中其力量，促成黨的改組，準備擴大民權主義的鬥爭。

(2) 恢復民衆運動，力爭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完全自由權。代表整個反動勢力的統治階級，有兩種最可靠的工具，有兩個最可怕的勢力。我們要想完成民權革命，實現革命的民主政治，必須發展統治階級最可怕的勢力，毀滅統治階級最可靠的工具。然而什麼是統治階級最可靠的兩種工具？我以為一種就是遠反民衆利益接受反動統治階級指揮的軍隊，一種就是剝削民衆的官僚制度。什麼是統治階級最可怕的兩個勢力？一種是民衆思想上的覺醒，一種是民衆組織力量的勃興。所以統治階級維持政權的手段？無間古今中外，都是千篇一律。以壓抑民衆的運動，解散民衆的組織，限制民衆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權爲手段。軍國主義與官僚制度，便是統治階級壓制民衆的兩副工具。站在我們這方面來說：一就是被壓迫的民衆這方面——軍國主義與官僚制度是我們最可怕的枷鎖，民衆思想上的覺醒，民衆組織力量的勃興，才是我們完成民權革命實現民權主義最可靠的武器。更具體點說：我們目前民權主義的鬥爭，積極方面，應當力爭民衆運動的恢復與集會結

此言論出版的目的；消極方面，應當猛烈地攻擊封建軍閥主義與官僚制度，毀滅統治階級的武器，復與民權主義的鬥爭。(3)厲行以黨訓政，大小官吏悉由黨員代表大會推舉倍數候補名額，由合法的民衆團體職業團體選舉。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的失敗，使全世界的社會革命家認爲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這個階段。本黨總理孫先生根據中國革命的經驗，洞察中國的革命需要，亦規定革命的程序爲軍政訓政憲政三大時期，期于循序漸進，以完成革命之工作。「蓋不經軍政時期則反革命之勢力無由掃蕩，而革命之主義亦無由宣傳於羣衆，以得其同性與信仰。不經訓政時期，則大數之人民，久經縛束，雖驟被解放，初不瞭解其活動之方式；非墨守其放棄責任之故習，卽爲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見建國大綱)所以「以黨訓政」——卽是「以黨專政」，名異而實同，我之用「以黨訓政」這個名詞，完全爲的便當的關係。——實爲由軍政時期過渡到憲政時期的必經階段。我在前面已經說過，「黨權」必須透過「民權」方能提高，「民權」必須透過「黨權」才可實現，所以我主張在「以黨訓政」的時期內，一切大小官吏，悉由黨員代表大會推舉倍數之候補名額，由合法的民衆團體職業團體決定當選之人。一方可以

導誘革命的民衆運用政權，一方可以打破民衆墨守其放棄責任之故習，與爲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的危險。這樣一來，真正的民權革命，才可以實現。至于僞託「以黨訓政」之名，行其個人專制之實者，皆爲總理的叛徒，革命的對象，我們必須不避一切的犧牲，與其作猛烈的鬥爭。(4)反對國家主義派的「第四共和」一個月以前，有一個新從日本回來的同志對我說：國家主義派近來在日本東三省大肆活動。他們新近的口號：是「反對一黨專政」——擁護「第四共和」。我現在不必拿國家主義派在政治上的醜史，說明其反革命的罪惡。我們現在姑且心平氣和批評其主張的荒謬。國家主義派素以全民政治(?)相標榜，所以「反對一黨專政」。他們根本的錯誤：就是不知革命的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適合於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蓋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于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于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無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而國家主義派所標榜的全民政治，這是以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古董學說，爲其反

動理論的基礎。大張其「天賦人權」之說，合貪官污吏新舊軍閥為一體而治之，於是乎「全民政治」與「全民革命」，竟先後映于中國。「懲歎盛哉」，「中國前途庶有豸乎！」（仿「醒獅」語氣）至于他們所謂「擁護第四共和」，大約是指繼承辛亥革命後的第二共和，袁世凱復辟以後的第二共和，宣統復辟以後的第三共和而言。而辛亥革命的結果，所獲得者，僅中華民國之名，而無共和之實。本黨總理孫先生痛心這次的失敗，於是才有改組中國革命黨之舉，復興中國革命運動之謀。而袁世凱復辟失敗以後的第二共和，與宣統復辟以後的第三共和（？）更祇有軍閥的弄權政治的腐敗，外交的失敗，國際地位的低落，根本看不見民國的影子。國家主義派乃自承為北洋軍閥的繼承人，主張「創造第四共和」，「擁護第四共和」，難怪北洋軍閥的領袖靳雲鵬也全情國家主義，張宗昌孫傳芳之徒更是國家主義派的忠實信徒了。

(5) 反對共產黨的一階級獨裁。「建設蘇維埃」「擁護蘇維埃」，是中國共產黨目前喊得最響亮的兩個口號。他們想利用中國流氓無產階級的原始鬥爭方式，作為社會革命的動力，主張在生產力極端落后與無產階級尚未成熟的中國，宣佈都市工人與農村貧農的政權，剝奪一切不贊成共

產黨的人底生存權利。他們忘記了無產階級底較高的道德觀念，與發達的國民教育，乃為實行社會主義的兩個重要前提。但是中國今日的無產階級，是否具備了這兩個重要條件，一眼就可看到，似乎不必多費筆墨加以反證。所以中國共產黨要想跳過民權革命這一個階段，直接進于社會主義，建立工農兵蘇維埃的政權，不是陷于主觀的危險，便是流于可笑的幼稚。說到這裏，一定會有人說這個理論是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的理論，罵我是資產階級的宣傳家。我們現在不必斤斤作名詞上的爭執。全世界共產黨的鼻祖列寧大約總不是資產階級的宣傳家了罷？我們且看他怎樣解說「蘇維埃」的意義：他以為「蘇維埃」這個標語。不許輕易使用；只有勞農階級有了獨裁的確信時，才能提出蘇維埃來做標語。」（見當代第二期二一四頁）中國共產黨，現在提出「建設蘇維埃」這個口號，是不是證明了中國的無產階級——依嚴格解釋——已經有了獨裁與專政的確信呢？我始終以為中國的社會，是一個半封建的社會。無產階級的成熟，還有待于民權鬥爭的勝利，與真正民主共和國的實現。目前中國革命的性質，還是民權革命，而這種掃除封建制度的革命，乃是由民權革命過渡到民生主義之社會建設所必經的階段。中國共產黨忽視中國社會的特殊

性質，主張在中國立即施行無產階級的獨裁，不論在主義上怎樣革命，但在客觀上，究竟背叛了革命！

中國的革命是一個長期的革命過程，至于怎樣可以引民權主義之路，我在前面說過了一個大概。我希望不會被人誤會，以為主張民權革命，就是贊成歐美資本主義的虛偽民主政治；或者以為民權革命的勝利，就是整個中國革命的 success。關於第一點：我們以為中國的民權革命，必須伴着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反資本主義的民生革命而進

中國革命鬥爭的戰略和戰術（一續）

馬 溶

行。民權革命的勝利，必然地是農工小市民的勝利，決不是資產階級的勝利。關於第二點，我們以為民權革命的勝利，沒有民生革命與之相輔而行，所謂民權主義，決非真正民主政治。所以整個中國革命的成功，必須有待于民生主義的實現。民權革命的勝利，不過是保障整個中國革命的頭個步驟，她是實現民生主義的手段，不是人類政治理想的終極目的呵！

（完）

一月二十九日

（四）革命主力的檢討

所謂革命的主力軍和非主力軍，不是完全就數量來決定，而是就其各個所佔立的經濟及政治的地位，與夫其生產關係，所發生的革命意識和要求，以及是否合於革命最終目的之中心條件來決定的。革命主力軍，是因革命趨勢而自然表現出來；而代表此革命精神的階級，自然形成當階級的主要力量。例如法國大革命，自然是全市民做中心，俄國大革命，自然是工農為領導，這都是順應客觀條件的發現。同時革命的性質——至少革命黨的性質，是以其

主力軍的誰屬而定的。並且革命的結果，亦是以主力軍的要求和力量為之左右的。革命主力，對於革命民衆，是等於軍隊的先鋒，又等於中堅，對於革命黨，是等於建築的基礎，又等於樑柱。

在中國革命民衆中，誰是主力？大概都知道是工人和農民；因為在事實上中國過去三四年來，革命運動的中心，大都是工人做先驅，最後復普遍到農村的農民。最近雖以反動勢力之高壓，而工農——尤其是農民的政治暴動，時有所聞；這固然出於共產黨之煽動，但是工農非受壓迫

而世於不得已，實不出此。理論上，中國革命，是由民權——或民族革命，到社會革命——或建設；所以歸結目的，在達到非資本主義的社會——即社會主義的社會，自然只有要求改選現有私有制度的工人，及不反對此要求的農民做主體。況工人和農民，佔全國人口的最大多數，同為被壓迫者，自然是中國主要力量。

不過，工和農，是以職業來區別，不是以階級來區別；反之，同為一工，或同為一農，即有許多生產關係及地位之不同，其要求亦異；這還不是科學的觀察。在中國這個社會，許多還停滯在原始農業以至氏族制度，而一部份却保留了中世紀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的現象，另一方面又在通都大邑發現了近代帝國主義的資本和商品。此種複雜的生產關係，自然劃分不出嚴格的階級；然而所謂主力軍，若不在階級的觀點上去區分，結果，仍不出主觀的唯心見解。階級是完全就生產關係之被剝削和剝削來看的；而被剝削階級，能夠起來，推倒剝削階級，以至消滅階級，即在於有大規模的共同生產下的生產者；換一句話說，即是建設非資本主義的社會，只有產業下的工人。所以我們知道中國革命主力，第一個便是這一部份。不過他們的實力如何？據最近日本東亞同文館出版之支那年鑑——

一九二七年——，約如下表，
現代工業制下之勞動者概數

種別

人數

工場勞動者

六四九,〇〇〇

特別工場勞動者

1. 電氣勞動
2. 鍊製金屬勞動

三,〇〇〇
四,〇〇〇

3. 政府直轄工場勞動

二八,〇〇〇

鑛山勞動者

五三一,〇〇〇

國有鐵路勞動者

一〇七,〇〇〇

數量上固然遠不及歐美各國，然以他們所處地位，較之任何先進國皆相差遠甚；因中國工人之僱主，無論是帝國主義的資本家，或中國資本家，以至中國政府，對於工人，無非是高度的榨取和壓迫。工作時間，平均為十二小時以上，工廠待遇，至為惡劣，工資低廉，為人間所罕見。現更以各公開之工會，大半為半官的組織，其作用不在為工人謀利益，而在以勞資合作名義，達到使資方進一步的榨取。工人自身組織，既經破壞，工人偶有改良待遇要求，即指為受共產黨之利用，拘禁，屠殺，視為故常，此種情形，幾如普遍一致。所以中國產業工人的現在環境，應同於歐洲法西斯之各國；尤以中國為半殖民地故，國

際地位低下，其所受痛苦，更有甚焉。

次爲苦力，大半以體力勞動爲生活，而無一定僱主，如碼頭工人；洋車夫等；雖不是嚴格的無產階級，自其受搾取和壓迫的程度，較之產業工人，有過之無不及；所以是決定的革命成份。再爲手工業工人，以中國最近工業之不進步，以使中世紀的家庭小手工業，工場手工業，尙佔主要成份；所以手工業工人的數目，甚爲衆多。以普通性質，他們同帶有小資產者的個性；但以中國資本主義發達，舊日經濟漸漸破產之故，小手工業者，日有破產的危險；因此店東場主，對於小手工業工人之剝削，日加殘酷，所以他們亦是革命要求最熱烈的份子。

至若農民（除收地租之地主），有人口三億三千六百萬，約占全國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以上；而有土地之農民，只占全農民數百分之四五；可見中國農民數目之多，與經濟地位之劣，其要求革命，乃是自然而必然的，且我們知道，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故有的農業及小手工業經濟，既受帝國主義優越的勢力而加緊破壞，新興工業，又固帝國主義的優越勢力之束縛，不能發展；結果，農村及城鎮破產之人口，只只有逃避於農村（土匪，流氓之多，亦是以此），發現農村人口過剩（都市失業，即是都市人口過剩

），替補不足的现象。耕地不足則地價高昂（故中國現在地價，超過世界各國），農民不身增加土地之所有。況以中國工業不發展之故，一般剝得地皮之官僚，及營業不能發達之工商業者，多投資於農村，收買土地；於是地價益高，而農村以農民經濟力之缺乏，資本涸竭，高利貸資本，大肆猖獗。所有流通資本，信用資本，商業資本，更全握在地主階級之手中，層層剝削。農產物之出口，亦多爲帝國主義及其買辦階級和與其有間接關係的商人所壟斷，國家及地方的苛稅雜捐，皆大部份爲農民所負擔，農村政治勢力，更完全爲土豪劣紳所占有。尤其在釐極反民衆的高壓時代（如兩湖兩廣），農民遭屠殺與逃亡的痛苦，及土劣政治勢力之抬頭，恰成正相反的比例。並且在連年軍閥戰爭之後，農民剝削之增加，和耕作之荒疎，使農民破產，更爲加速，致演成今年各處空前未有的饑饉。以數目計，現在災區如綏遠（約二百萬），察哈爾（約百萬），豫東（約七百萬），豫北（約二百萬），豫南（有南陽，信陽，光，潢，固，息各縣），豫西（數目無統計）。晉東（三十五縣，人民共二百七十萬，災民佔十分之三），晉北（約十萬），晉南（四十餘縣，十室九空），陝北晉西（人口八十八萬災民占五十九萬），陝西（俄死者約二十萬），山東（無統計），甘

肅(無統計)湖南(吳清爲民國以來所未有)，北平(吳民十萬)等。其餘無可考察，以及受間接損失者，更不知有若干萬。因此，迫於眼前的事實，決不能爲任何歌功頌德之虛詞所掩蔽，而農民自衛組織之增加，與暴動之不已，皆可表現其只有出於革命之一途。

不過農民尤其是自耕農，就嚴格意義上說，皆深具私有觀念，且係支配在生產散漫和固定的環境，和沒有較高文化之薰陶，與夫富有保守的編習(自耕農更當利害)，故雖有切迫的革命要求，而不易發生有組織與計劃的偉大革命力量；尤其是非資本主義的民生主義社會，基礎不在於農村；所以農民只有與工人同盟，才能發生革命效用；並且只有以工人當主要成份，才能使農民必然的不得不走向民生主義社會。這樣說，並不是以爲農民在中國革命，就失掉了重要性；而是以農民的重要，在彼而不在此。很明白的，中國很少數的工人，決不能一手包辦中國革命，而最有力的帮手，只有農民；並且中國在民權鬥爭中，以要求解決土地問題，及全般的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等，不得不參加反帝國主義、軍閥，及特殊大資產階級運動。尤其是在鄉村壓迫彼等的土豪劣紳，更是他們革命的唯一障礙物。在他們革命鬥爭開始以後，其意義和結果的偉大，自

然超過法國大革命時的農民運動幾倍。不過只以他們的生產過程，不能做民生主義社會的主要動力，只有依賴於產業下生產者的工人(依賴資產階級如法國大革命，則會走資本主義的路)，而又以他們走向非資本主義社會，不與工人利害相衝突，可以在兩者間結合爲鞏固的同盟。因此農民——(尤其是佃農，僱農)，亦是中國革命主力之一部份。

此外爲不屬於工或農之遊民，他們是經濟上的落伍者，生活沒有保障，生命的危險，比工農還要厲害，其反對現社會的意識，還要堅強。他們多數流爲盜匪或乞丐流氓。他們在現代政治下，不能滿足生活慾望，無論如何是決定的反抗者；所以他們每每做革命的勇敢先鋒。不過以他們不規則的生活行爲，養成浪漫習慣；且脫離了生產關係(直接上)，消滅了階級意識；結果，雖然不反對非資本主義社會之實現，可是沒有真正強有力的產業工人的領導，至多只能窮人造反，不能建設新社會的秩序。

以上所列革命之主力，大概在生产關係上是被榨取者(除遊民有些例外)而政治上是被壓迫者；並且只有對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大資產階級作戰，才能解放；尤其是不是積極要求社會主義社會實現者，即是消極不反對此者求

者。他們數量佔中國人口之百分之八十以上，可謂真正中國的「勞苦民衆」，與一切反對勢力絕緣；所以都是在革命隊伍中，雖有力量大小和效用深淺之不同，同不失爲最革命的成員。

(五) 主要同盟軍

同盟軍亦是決定的革命勢力——至少在當前民權革命階級中，是決定的革命勢力；不過他們或以本身的生產關係，不是直接被剝削的地位，而輕視了革衆對象；或以政治地位，有若何勝優於下層階級，而以目前現狀爲可苦；或以其根本要求，限於自身的現有生產關係和政治地位，而無再進的希望，僅不過目前的利益，與革命相關聯而已。在事實上最顯明的是他們非革命沒有出路；可是對於社會主義社會，根本沒有什麼希求；換一句話說，即是革命需要，而社會革命却不需要；就科學的術語，就是小資產階級。他們的革命熱情，有時過於革命主力；然而他們革命意識和革命力量，始終以其經濟基礎不確定而動搖；所以他們只能算做革命的同盟軍。

這種勢力指那些人？一是工商業小手工業者，小商販，小場主，店員等，其地位雖非剝削者，亦非被剝削者（直接的），全以勞動——或半勞動爲生活，對於生產關係，

與其謂帶榨取性，勿甯謂帶分業性；因爲他們的經濟基礎，根本爲中世紀的遺留，未進到資本主義社會。不過以他們大體說，是處在外受帝國主義及其買辦階級，與夫內受封建勢力和大資產階級的壓迫，暨間接的壟斷榨取，使自身利益，不徒無發展之望，且日在崩潰之故，所以非要求革命不可。又以其限於自身利益，只在要求更進一步達到私有資本之發展，所以僅能做革命的同盟軍。二是農業的自耕農和半自耕農，他們在政治上及經濟上，都是受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帝國主義，及工商資產階級的剝削壓迫，所以民族民權意識，相當明瞭；但是以其私有了若干土地資本，而不是直接被榨取階級，且非支配於共同的生產關係之下；所以爲其自身解放，未嘗不需要打倒封建勢力以至帝國主義；但以其充滿小有產者的私有觀念，和中世紀保守的特性，至多只能從事民權革命，而不能自動要求社會革命；因此，他們亦只算做中國革命的同盟軍。

三爲智識青年，自由職業者如小學教員，新聞記者，藝術家，乃至律師，醫生等；他們在原則上無所謂階級意識，因生產上並無特殊關係，只不過因消費上的利害關係，大概受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支配，政治上的利害關係，又受統治者——主要爲封建勢力的壓迫，而在資本主義

不發達的中國，職業之動搖和恐慌，生活覺感不安；尤其是青年學生，大半非出身於中小農業家庭，即為工商業者之子弟。其經濟背景，自然逃不出小資產階級的範疇，同時即逃不出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壓迫的命運，越其目前消費者的利害，和將來職業的要求都令他們對惡劣政治，擺脫不了鬥爭的責任。且他們感染舊勢力的習慣既淺，領袖新思想之刺或較易；而本其青年活潑好奇的特性，必然的易於參加革命。況野蠻的舊憲法制度，在在錮蔽青年的個性，和束縛青年的行動，這末嘗不是使青年感受切身痛苦（如婚姻制度，家庭制度），不能不反抗的重大原因。並且青年學生，有新的智識份子，亦為各階級的優秀子弟，其本身既有各階級的客觀條件作背景，而又賦有革命性；加以自清共以後，許多革命青年，非加赤化頭銜，即冠以華共的帽子，殺戮，逃亡，監禁，以至流離失所者，不知若干。所以他們雖不能形成一個社會階級，成為主要革命力量；而其種種特殊關係，往往構成各革命階級的連鎖，而在民權運動階段中，佔重要地位。

中國革命的同盟軍，亦即民權革命的主要參加者，就是上述的份子。就階級意義說，他們可謂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層，然而以各種生產關係之不同，決不能嚴密作成一個

階級。他們一半在都市一半在農村，而以中國經濟的沒落，漸瀕於半無產者，或無產者化。況且在生產上他們雖無對立的關係，而在政治上及消費上，却有對立關係，和共同的利害，所以絕不能與封建勢力，及大資產階級，以至帝國主義等勢力混為一談；且是極相反的，只有打倒封建勢力，帝國主義，以至大資產階級才有出路。他們都是從事於勞動或半勞動（精神或體力）以得食，亦絕不能謂為搾取或壓迫階級。他們是介於資產階級——或封建地主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可以叫做中間階級；但以他們是在帝國主義及資產階級封建勢力的種種搾取壓迫中所遺留下的落伍者故亦叫做過渡階級。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他們未嘗不可依靠大資產階級，走上民主自由的時代；可是以中國資本主義不能發達，大資產階級投降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之故，他們就不得不自己上民權鬥爭的舞台。

（六）中立派的穩定化與後備軍化

中國革命的中立派，不是目前沒有革命的要求，而是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各有相當利害，故不能表現決絕的態度。所以他們每為中國下層革命勢力所威脅，而投降反革命；然又以反革命如封建勢力及帝國主義的壓迫，在某種時期，又不能不反抗。固然在社會階級對立關係當中，

他們以勢力微小，不能作有力的中心；可是在目前民權鬥爭他們並未放棄這個要求的時期，在職階和職銜上，絕不應迫其入於反革命的隊伍當中，增加自己敵人的力量。

代表這種勢力的，首要是國內新興的土著工商業，及一部份在海外的華僑。無疑的他們在不平等條約沒有取消，關稅不能自主，封建的統治勢力，及自國不能富強以前，他們自身利益，絕不能發展。自然他們目的在發達自國的資本主義，才能振興工商業；然而在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勢力統治的時代，這都是夢話。他們的立場，並不同於買辦階級和大銀行家，及轉運外貨的大商人；乃是因為他們自己是要發達自己資本，不得不統一市場；而買辦階級等乃是專企圖寄生帝國主義資本生產過程之部份，便為滿足；於是彼等只有希望帝國主義資本，在中國能夠多多發展。至若華僑，上焉者等工商業，與下焉者的華工，彼此的利害雖不一致；然而在中國國家不振與以前（即資本主義不發達以前），他們在海外所受的法律待遇，經濟條件，均不平等，尤其是他們出國的動機，並不是須有如先進資本主義國殖民政策先驅的使命，自然沒有國家權力做後盾，乃是以本國經濟破壞，為生活所逼迫的逃亡；所以

對於祖國發達實業，整理政治，抬高國際地位，都是切要

的企圖。

不過他們和下級革命民衆——尤其工人的革命要求相衝突；因為他們目的，僅在於民權政治，而下級革命民衆——尤其工人的目的，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即二民主義）；所以他們對於下級革命民衆運動的起來，非常害怕。他們覺得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都不成問題；但是實行社會革命，走非資本主義，即是掘自己的墳墓；因此在某種形勢，寧願暫時投在統治的勢力懷裏，藉作鎮壓下級革命民衆運動的護身符。不過我們知道，他們亦是民權勢力之一部份，在目前民權鬥爭階級中，絕不應排斥或忽視他們的要求，以致逼上反革命。況且即使革命主力的革命政權成立，開始建始非資本主義國家的初期，在事實上絕不能根本消滅他們私有資本之利用；所以我們為完成民權鬥爭和擴大民權鬥爭，在原則上使統治勢力孤立（儘可能的），同時增加自己聲援；那末，對於現在的中間勢力，應隨時注意使其穩定化，且進一步的革命後備軍化。

（未完）

中國國民革命的前路(四續)

陳公博

(六)目前幾個實際問題

(A)武力問題

現在在革命期中；第一要成問題的，便是革命的武力。我們平日的理想，都想一切武力變成黨的武力，黨的武力變成民衆的武力，惟是目前這個理想真成了理想，不但變了理想而且成了空想了。

在過去幾年期間，人們以爲要武力要變成黨的武力，先要軍隊受政治訓練，所以在民國十四年中央下了軍隊應受政治訓練的決議案，國民政府成立當時首在軍事委員會設立政治訓練部，但其結果怎樣呢？政治自政治，軍隊自軍隊，至於今日連這種空虛的政治部也根本不要。我批評這種失敗，并非軍官的障礙，簡直是士兵根本成了問題。我們沒有批評這個問題以前，先要討論革命的民衆。無論那一種的革命，如果要他成功，最要條件就是要得民衆的擁護，否則革命根本不會告成。然而民衆爲什麼要擁

護革命？他們決不是擁護革命的空虛名詞，必得這種革命和他們有密切關係和他們有實際利益。過去我們最大錯誤，就是沒有給民衆以切實的指導，所以他們只有革命的傾向，沒有懂得本身的真正要求。譬如工人的要求是增加工資和減少時間，這是不錯的，可是他們的利益和整個革命利益的關係怎樣，他們便不懂。譬如農民的要求是給與耕地和減少田租，這也是不錯的，可是他們的利益和整個革命利益的關係怎樣，他們也不懂。這樣單調的要求，不但不能增加革命的力量，結果還要使革命破碎。然而這種單調要求，并不是農工本身的錯誤，實在還是答在本黨領導不能正確。過去本黨許多人，以爲民衆運動是革命的策略而不是革命的目的，單以單調的要求引起民衆的熱情，不是以整個革命利益的要求來培植民衆的理智。在軍事時期是要民衆起來破壞敵人的行動，在統一時候反恐懼民衆起來，破壞施政的方針，今日爲什麼取消民衆運動，爲什

麼停止民衆運動，都基於過去認識錯誤。

民衆不懂得真正要求，是革命中最危險不過的事，因爲有了民衆要求，然後才有革命，如果民衆不懂得真正要求，所謂革命還是主觀的革命，玄想的革命。同樣，士兵就是民衆，尤其是站在革命火綫的民衆，如果士兵們不知道民衆的真正要求，也就是不懂本身的真正要求，這是何等危險的事。

在中國要求革命最迫切的當然是農工和小市民，然而今日大部分的士兵並不是來自農工和小市民的隊伍，而是來自無業游民的隊伍，他們最切要而關心的是月餉，而他們的理想就是升官，除了這這個問題以外，本身在革命中的要求怎辦？留衆的要求又怎樣，他們很少理解。我記得在武漢討論土地問題時候，有一個同志極力主張說：土地問題應立即解決。因爲士兵是要求土地的。我說：土地問題之應解決有兩個重大理由，第一要根本掃除封建勢力非解決不可，第二要增加農村的生產經濟也非解決不可。但說到士兵要求土地，這太是玄談，因爲大部分的士兵來自鄉村的無業游民，他們在當兵之時，已決心拋棄農村而夢想都市的優美生活，他們的需要并非土地而是他們幻想的需求。我說這種話，并非過於苛刻，因爲我負責軍隊的政治

責任較常人爲多，我到軍隊裏去訓練士兵，每問他們爲什麼當兵？他們回答是：要革命。我問：爲什麼要革命？他們答：爲相信三民主義。我問：除了革命以外，你本身到底要求什麼？他們便不能回答。這樣很明顯的他們還不懂本身的真正革命要求，不懂革命要求而參加革命，這是空虛的革命。我們要知道，主義是抽象的要求，要求是實際的主義，不懂本身的真正要求而說是已經懂主義，這是一種渺茫的幻想。我常聽見許多担負軍事的同志說：士兵都是好的，只有軍官不好。他們的意見以爲士兵是無所謂的，軍官軍令，士兵便跟着革命，軍官反動，士兵便跟着反動。但我想他們這種說話，適足表示士兵沒有革命根基，如果士兵真正懂得，革命要求，少數的軍官怎能抵抗廣大的士兵羣衆？假使士兵沒有革命的認識，任何革命的軍官，到了某種時期，沒有不反動的。

今後我們若要武力變爲黨的武力，一條路是改造舊的武力，一條路是建設新的武力。頭一個方法，我們應該深入士兵羣衆，除了宣傳三民主義以外，必須一指明民衆的真正要求，二指明他們自己的真正要求，在革命期中他們要的是什麼，在革命完成以後他們的要求又是什麼，必須宣傳的主義和他們的要求有了密切關聯，然後革命才有

希望。第二個方法，以後新的武力，士兵的出處，必須是農工小市民的隊伍，而不是無業游民的隊伍，必須他們因着要求才當兵，不是當了兵才追求他們的幻想，否則革命依舊空虛，主義徒成高論。不過我們還須切記的，革命決

讀者 論壇

未來的革命中我們青年當怎樣

王余澄

不是勾結一兩個非黨武力能成，并且也不是單做成一批軍官能成，如果勾結一兩個武力，遲早黨必被這個武力所消滅，如果單做成一批軍官，結果必使黨治於軍，要武力成爲黨的武力，最要條件還是注意士兵的訓育。（未完）

張崧年先生說：「……一國的希望在於兒童，一國的命運在青年。」（見民衆先鋒第二期所望於今日的青年一文）我們也不自餒的承認：「中國的命運即在於青年的我們！」如果我們青年們好好的努力幹去，中國的命運定有好的可能；否則，中國只有混亂，紛亂……下去，終於必至滅亡的。我們青年對於國家的關係的重要和貢獻的偉大，由已往的歷史上可以完全證明。如意大利的亡國重建，是不是靠了純正的熱血的……青年們的力量？明例很多，不勝枚舉。在西洋是這樣，在中國我們青年對於文化運動之努力，愛國運動之熱烈，都是已明明的擺在我們面前而決不是可沒滅的，誰能否認呢？至於青年對於中國革命上

的努力與犧牲，尤其是偉大與明顯。青年們的血花灑滿了革命的道路，青年們的頭顱砌成了革命成功的基礎。青年們的血浪沖退了反革命的惡潮；而新反革命勢力的建築亦在於青年們的血肉上，他們富貴名顯的立尼石的砌成，還是有賴於青年們的可貴而可憐的頭顱！

民四的五四運動，表現出了青年們精神的偉大；辛亥革命的垂成，是青年們大犧牲的表徵；這第二次革命的由廣東出發，直到革命勢力佈展於長江流域，是問這種革命勢力的澎漲，是不是有賴於青年的努力與鼓勵？是呀，也是賴於革命領袖的努力，民衆的援助……，但是青年們的力量豈可忽視？這次革命的一點歷史上的成功，是不是有

類於青年們的大犧牲？而革命失敗後新與反革命勢力的當，貴，名，顯……的立尼石，是不是在青年們的——革命的青年們的血肉上？！如果你不是一個瞎子，這些明顯，瀾烈的事實你一定會看的清清楚楚。除非是一個沒有腦子的人，不然一定可以想到青年們的力量是多麼偉大！而青年們的犧牲又是多麼可敬！

青年們對於國家的尤其是對於革命的重要，既然這樣的大，那麼我們青年們——我敬愛的青年們哪！我們現在當怎樣呢？

這第二次的中國革命的失敗，早已照然在人耳，目，是不容否認和飾掩的。民衆的苦痛，我們父，母，兄，弟，姊，妹們的苦痛，只有日日在那裏加深！帝國主義對我們壓迫，侵害……的程度，也只有天天在那裏增高！試看看現在各省的災民，我們的親愛的，困餓將斃的同胞是有多麼苦？試想一想他們苦痛的情形，又是多麼令人可悲憫！日帝國主義淫威下的魯省膠東的景况，更是多麼慘苦！至於別的什麼土匪的橫行，軍隊的掠奪與侵害，苛捐暴稅的榨取……更不用說了！如果我們還有耳，目，我們當不至於聽不見，看不見；如果我們還有人心哪，我們也當想一想我們的確應當怎樣！

就是退一萬步說吧，民衆的苦痛我們不管，父，母，兄，弟，姊，妹們的慘情我們不顧但是請看一看我們本身怎樣？是不是在危險，急迫的環境中，過着苟且的生活？有沒有人生的意義？儘管有些青年們在過着美滿的生活——自以為美滿的——，享受着物質上的快樂，但是精神上的快樂有麼？就是捨去精神而只談物質，真的物質上的快樂有麼？即有，是否能保持長久？任你有幾多的財產，在中國這樣的環境之下，隨時都有失破的可能，靠得住麼？儘管有許多青年們在受着高等教育（？），但是出路在那裏？就是不談將來的出路，目下的有形，無形，精神上與肉體上的苦痛，束縛，壓迫……，是否還能忍受？至於其他大多數的青年們，不但沒有過富足生活，受高等教育的可能，連生活的維持力還怕沒有，所感受的苦痛，壓迫……更不用說了！

總之，現在我們青年們所感受到的，除了苦痛就是悲哀，此外還有什麼？如果我們這樣的死沈沈的下去，那沒有別的話說。否則，我們當奮力起來，求我們的出路！

我們為解除民衆的苦痛起見，為解除自身的苦痛起見，我們當奮力起來求出路；我們為實現真正的人生意義，為盡我們人生的責任起見，我們也不能不奮起來尋求我們

的出路。我們的出路是什麼？狼明顯的已擺在我們面前的，就是只有革命是我們的出路一條！

青年們哪！我們當奮力負起我們的使命，慎重而勇敢，堅決為熱烈的努力跑上這革命的途途！

中國革命的大失敗已有兩次了，辛亥革命是第一次，最近過去的是第二次我們將來的革命就要開始了。第一二次的革命已成了歷史上的陳蹟，我們把他放在一旁，現在來說一說在未來的革命中，我們青年的確是是應當怎樣。

為使眉目清晰起見，所以把未來的革命分作三個時期：第一，革命醞釀時期；第二，革命爭鬥時期；第三，革命完成時期。在這三個時期中，我們青年當各怎樣，現在以個人之所認為重要較切的，略略加以分述，希望各位同志大人的加以修正和批評。

第一，革命醞釀時期

這是革命的初期，在這裏我們當決定一切，在這時期中如果我們對於革命有了充分的準備，那麼我們才有革命爭鬥的可能。否則，是不成的。所以我們當：

一，確定我們的革命出路——

我們既是已竟知道，無論如何，我們是非革命不可的。但是革命是有出路的，並不是隨便一來，更不當馬虎從

事。所以確定革命的出路，是我們革命的一個先決問題。

我們由研究和觀察的結果，知道在我們這項次民地半封建制的中國社會，只有三民主義的革命是我們革命唯一的出路；別的一切的什麼主義的革命，什麼形式的革命，皆不是中國革命的出路，所以都走不通。

中國客觀的環境和主觀的要求，決定了中國必須應走的革命途途；就是中國非建設一個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非或超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國家不成；也就是中國革命的出路只有出於民主主義的社會革命之一途。（這裏所說的社會革命是 *Social Revolution* 而不是指社會主義革命 *Socialist Revolution* 而言。這個名詞的解釋及這件事體的分析，在民衆先鋒第三期張慈年先生的中國革命必須怎樣才可能一文裏可以完全看清楚，所以在此不用另多贅述。）也就是只有立足於唯物史觀上的三民主義革命，是我們中國革命唯一的出路。

對此我們青年不要遊疑，不要徘徊，不要踟躕更不要徬徨，我們當狠堅決的，極誠懇的認定這種革命，是我們唯一的革命出路；我們把革命的出路確定了之後，才有談到其他的必要與可能。才有行動的可能與必要。

二，團結於一黨的領導之下——

革命不是一兩個人所能幹的事體，也不是一些散漫而無組織的人們所能負責的事業，而乃是一種集團的行動；所以革命者們必須團結起來。團結革命勢力的工具只有黨，只有在黨的團結之中，領導之下，革命的勢力，方有堅實而擴展的可能。同時在黨的團結之中，各個革命者能彼此的互相改正其錯誤。互相訓練其技能，共同作革命進行的工作。而我們缺乏革命經驗的青年們，更不能一時離開了黨。

所以我們青年們既是第一步確定了革命的出路，第二步就是必須團結於適應於這條革命出路的黨的領導之下。我們知道只有以唯物史觀作基礎的三民主義革命，是中國革命唯一的出路。那麼能領導這種革命，適應這條革命出路的，也只有革命同盟左派國民黨，也就是只有接受總理全部遺教而適合中國客觀的革命環境，主觀的革命要求的真正的國民黨。（關於左派國民黨的解釋與分析，在民衆先鋒第一期蕭淑宇先生的國民黨左派與中國革命前途一文裏（亦可）已載的非常清楚了，所以在此亦不再述。）

我們青年們——革命的青年們，只有團結於此黨的領導之下，訓練之下，那麼我們所確定了的革命出路才有走通的可能。

三，免去個人一切不純正的思想與習氣——
許許多多的青年們，腦子裏總是忘不掉升官，發財，揚名，顯聲……；所以來參加革命，亦是帶了這些思想而來；思想既然若是之卑污，行動那能好了？那麼好的結果之獲得，更是不用期望了。所以我們青年們必須把這樣一類的一切思想來免去。

個人崇拜，亦青年們思想上的一個大錯誤，同時牠亦表現出了青年們個人主義的色彩，而英雄觀念之產生，亦即根源於此。我們知道，革命只有團結的黨的行動，而絕不能帶有個人主義的色彩。我們當站在革命的立場，只知道我們所認定的革命的主義與我們在其領導之下的黨，而不知有個人。如果黨的領導者，革命的先知先覺者，革命的中堅份子及一切的同志，他們能以黨的生命為生命，以黨的行動為行動，按照着我們所認定的革命出路走去，領導着我們，訓練着我們作革命的工作，那麼我們對他們只有敬從與愛護。否則，無論他們的名望如何高，能力如何大，一離開了革命的道路，或跑向了反革命的路上去了，我們當絕不容氣，絕不顧忌的，以敵對的態度相對待。這絕不是爲了我們個人本身而當如此，這完全是爲了我們革命主義的實現，黨的生命的安全，革命進行道路的平坦，

與盡我們歷史使命的負擔。至於封建式的英雄觀念，我們更當完全的除免。

一切不純正的習氣，如浪漫，怠惰，任性，吃酒，打牌……；我們青年差不多是牠部分的具有者。我們站在個人的立場上來說，這些不良的習氣能妨害自己事業的進行，學識的求取，及身體的發育健康的保持，並傷害精神之煥發，使思想下落人格降低。站在革命的立場上來說，這些惡習氣能喪失革命者的勇氣，破壞革命黨的紀律，減低革命的勢力……。所以我們青年如果想作一個有作為，有學識，身體健康精神壯旺而人格高上的個人，是非把這一切惡習氣去掉不可。至於想作一個革命者，想負起解放民衆苦痛，完成人生聽責的使命更是非決把這一切的惡習氣免除不可。否則，什麼我們也不必想，更不必談了。

四、實地到民衆中去——

革命沒有民衆便失掉了意義，便不成其爲革命，革命與民衆的相關是最爲密切的，所以革命者永不能離去了民衆。在以前的幾次革命的失敗，雖然有許多其他不同的原因，但是缺少民衆亦未始不是失敗的主因之一。當時的許多革命者，只口口聲聲說是爲民衆而革命，擁護民衆的利益……；但是實地深入民衆的條件，都不履行不到，如何能穩

得民衆的信仰與愛護？又如何得知民衆之情況與其要求？更如何能感受到民衆切身的痛苦？

所以我們革命的青年們，在確定了革命的出路，團結於黨的領導下以後，尤其重要的就是實地到民衆中去。在黨的領導之下，指揮之下，我們當親身跑向民衆中間去，喚醒他們，組織他們，使他們成爲這第三次革命中的主力軍，以備隨時與反革命勢力的小鬥爭，及將來的大戰鬥。並把親眼觀察所得，調查所獲的一切民衆狀況，報告給黨，以作馳行動的指南及決定進行方略的參考。

我們（是）不是去獲得民衆，乃是去叫民衆獲得我們。我們當使我們的黨成爲民衆的黨，民衆成爲黨的民衆；也就是使民衆黨化，使黨民衆化。切不可再像以前那樣的只在上層的智識界內瞎談，而不切實的跑進民衆的中間！

第二、革命爭鬥時期

革命的勢力愈擴展，反革命的勢力愈緊張，同時對於革命勢力的進攻與迫害愈嚴厲。也就是革命的醞釀時期愈成熟，而革命爭鬥的大爆發時期愈接近。在前個時期是革命的前期，即革命的預備期，在這個時期是革命的中期，即革命的大爆發時期，大爭鬥時期，乃有革命生死的關頭，所以我們更當加倍的努力與謹慎！

一，嚴守黨的紀律——

紀律是黨的維繫，是黨權維持的工具，嚴格的說，是黨的生命；黨沒有了紀律便不能存在，便失却了生命。在以前革命的失敗，革命者對於紀律的忽視，亦是原因之一。所以我們青年們對於黨的紀律當嚴嚴的遵守，尤其是在革命的爭鬥期。

二，絕對聽從黨的指揮與命令——

黨是革命的重心，是革命集團的主腦。牠能指揮革命的行動，牠能決定革命進行計劃，牠能定出革命爭鬥的方式及策略。所以革命者對於牠的指揮與命令，當絕對的聽從。否則，革命的爭鬥力絕不會統一，革命爭鬥的行動也決不能一致，那是再危險沒有的。

所以我們革命的青年們當絕對聽黨的指揮與命令，自革命的醞釀時期直到革命的完成時期，沒有一刻能違反了黨的指揮與命令，在革命爭鬥期尤當注意。我們青年是革命的前鋒，黨指揮我們向那衝，我們當毫不遲疑衝將上去；黨命令我們安靜的鎮持着，我們當毫不疑惑的靜靜的保持下去。總之，我們攻，守，動，靜全當聽從黨的指揮與命令，絕對不能有絲毫的個人色彩參與其間。

三，與民衆結成一片——

我們是革命的先鋒隊，民衆是革命爭鬥的主力軍，我們當在民衆的督監與援助之下，黨的指揮與命令之下，猛力去與反革命的惡勢力作殊死戰！

以前的革命爭鬥是用拿錢傭來的兵士作主力軍，而民衆的勢力則成了附屬，封建軍閥之形成，也未始不是根源於此。所以我們（黨）當以民衆爲爭鬥主力軍，以黨爲行軍的總司令，我們爲革命的先鋒，彼此互相關係，互相援助，互相監督，既可以鞏固與加增革命的戰鬥力，又可以防止封建軍閥，個人專制的產生。

與民衆結成一片，乃是中國第三次革命中我們青年們的一個主要任務，敬願我革命的青年們注意及之，並要切實作到！

四，爲革命犧牲一切——

我們既已確定了革命的出路，團結於黨的指導之下了，大革命的爭鬥暴發了，是否我們還有顧及一切的可能？是否還有戀念（的）別的一切的必要？否！否！我們當爲革命而犧牲一切。

尤其是在革命的爭鬥期中我們當以黨的生命爲生命，以革命的爭鬥爲職責；以整個的肉體，全副的精神，許給革命。爲愛護黨的生命，實現革命的勝利，我們當犧牲一

切。什麼金錢的高能，家庭的樂趣，愛人的依戀，朋友的懸念，一切一切，我們都當不顧了！我們爲了解除民衆的痛苦，爲了實現人生的真意義，爲了自由，平等的尋求與奪取，自己的只有一個的生命都要犧牲了，還顧得什麼其餘的一切？！

好了，如果我們有了這樣的精神與決心，並能實行下去，那麼我們才不枉是生在二十世紀的新青年。我們才對得起我們的國家，父，母，兄，弟，姊，妹，師，友和在困苦中的民衆。革命二字在我們才有了意義。

第三，革命完成時期

我們經過了長久的革命醞，與危險，壯烈的革命爭鬥，而達到了革命的完成。在前兩個時期我們的意志要十分堅決，在後一個時期我們的意志更要不能稍有所變化，而同時我們革命人格的保持，尤當多加以注意。否則，我們前兩個時期的努力，便完全失掉了意義，革命便永沒有成功的可能。所以在這一個時期我們當：

一，不發生一切苟賤的思想與行爲——

在以往每次革命稍有了成功的時候，許多革命者都以爲自己的功高了，勞重了，當大升其官，大發其財了，把民衆的要求忘掉了，把自己革命的初志拋却了，於是爭

權奪利的怪現象，乃充滿了所謂革命者的中間。革命者變而成爲反革命者；爲民衆利益而奮鬥者於是一變而爲剝削民衆之管血而努力者。革命的完成，乃一變而成了革命的完滅。這是我們由以往的革命史上常見到的事實，是多麼可惡而又令人傷心的事實！

所以我們爲貫徹我們這革命主義起見，爲保持我們的革命初志起見，爲盡我們的人生職責起見，我們決不當發生這苟賤的行爲；並且這類的思想亦不當便拋存在我們的腦間。同時革命人格的保持，亦是不可忽略的。唯有在共安樂的時候，才能見出人格之純正與否；也唯有在革命完成的時候，才能看出革命者之純正與否。我們當十二分的注意和謹慎，萬不可在此時而墮落！

二，努力於科學的研求——

我們深信科學萬能，自近世科學倡明與發達之後，人類的文化進步了許多，人類的幸福亦加增了不少，所以科學成了文化的中心，人類的宗教。

我們本來希望努力於科學的研究與追求，想在人類文化上貢獻一點材料。但可恨處在這樣的中國環境中，苟且生活的維持還怕不能，那有研求學識的力量？這是我們所最痛心的。所以不能不捨去一切而來革命，造成一個能供

我努力學問研究的環境。

所以於革命完成之後，我們青年當奮起我求學的初志，對於科學努力的加以深刻的研究與追求，以備將我們破碎的中國，建設成一個光明的科學化的中華；而同時亦能對於世界文化的進展少加上一一些推動的力量。人生才真正

通 訊

編輯先生：

「勞動大學」四個字，在一個人一看見或者一想起，總會把「無政府主義」和牠連續起來。就是如先生這樣明察，也不能逃出這個聯想。因此，在民衆先鋒第一期內，蕭淑字先生的「國民黨左派與中國革命前途」一文中，對於無政府主義現在所採取政策的分析，最後說：「最近他們的活動甚力，除在教育界佔有勢力以實行每年花費公款五十餘萬元之勞動大學爲其造就人才的大本營……」我們看了以後，我們實在氣忿難平，我們在校內受無政府主義派的壓迫，在社會上又受一般人士的誤會指謫，我們所受的冤抑，將無從昭雪，用特不揣冒昧，將勞動大學的內容略爲

有了意義：

是的青年當作的很多很多，我個人也不能全部拿來寫出，但是如果我們中國的青年們能注意到以上所說的，而又能切實的作得到，青年的本身，中國的運命，也定都有可能的。希望全國的青年！努力起來幹去！

先生及社會人士鑒之：

勞動大學的組織，是無政府主義派想對學生界植種的一種手段，所以在前年（民國十六年）秋，上課不久，無政府主義派便開始活動，牆壁上瀆寫着無政府主義的標語，無政府主義派的刊物如革命週報，民鋒，民鐘等，公開發售，或贈送；同學中無政府主義同志，宣傳引誘一般意志薄弱的青年加入，雖然當時受其誘惑而加入的實在不少，可是一班意志堅定的不但不爲所惑，而且暗中反抗，因此無政府主義派爲殲除異己，想造成清一色的勞動大學計，於是於十六年冬清黨的舉動，是在夜深舉行，他們的搜查，並不是全體搜查，而是對平日反對無政府主義最厲害的

來搜查，搜查的結果，毫無證據，像煞有介事的開除了思想比較進步的同學八人，并且押解司令部，而其中數人，經各方的審查，認為無罪，就釋放了，學校同時佈告恢復學籍，這種舉動，你說滑稽不滑稽？

無政府派自舉行這一次清黨後，反抗他們的繼起，再接再厲，無政府派也知無可奈何，漸漸讓步，因反抗的結果，而罷斷全校組織的教職員學生工人聯合組成的「同學會」解散了，無政府派的訓育課主任李某去職了，教職員中色彩明顯的都自去，無政府派自受此次打擊後，一蹶而不復振。

然而他們的野心還未死，他們於是變了方針，他們知道反對他們的都是大學部的同學，他們以為在大學部裏是不能活動的，於是他們目光轉到中學來。因為中學生年輕志薄，比較易於誘惑。自去年（十七年）後，中學部分立，從前無政府派的頭號走狗李某，因為過去有功，遂榮膺中學部主事之職，他這一次更努力，把中學各班的課程，都加入一項科目叫「國民訓練」并且親身訓練。時時在授課時極力捧揚無政府主義，而對於國民黨的左派，咬牙切齒地罵為共產黨，而一班中學生無知，只有聽其狂吠而已。但是他的野心還未足，他不但主張中學與大學部分立，而且

想獨據一方，盡量宣傳無政府主義，又因為大學部各同學，時時批評他，他不能無所顧忌，因此，他意想把中學搬到吳淞去，實行公開訓練，現在吳淞中學部新校舍已建築竣工，下學期遷往，從此李主事可以更加效力，更加得意洋洋了，可憐一般無知的天真爛漫的中學生，將為無政府主義而犧牲了。現在我們要聲明的勞動大學裏，雖然有少許無政府主義派，但他們因為有錢，終日過其浪漫的生活，然而最可注意的就是中學部遷往吳淞後的狀況。

最後我們要說一聲，就是勞動大學是為養成一班能夠領導農工，解放農工，為農工利害而奮鬥而犧牲的人才，我們承認勞動大學的設立是必要的，我們要把勞動大學從無政府派的束縛下解放出來，造成一個能夠真正解放農工，真正為農工利益而奮鬥為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的「勞動大學」！

烈濤寄于勞大一九二九，一，二四；

烈濤先生：

你這封長信寫得是十分的誠實，一讀而知是一箇很誠摯熱烈的革命青年，我們現在尊命把你這封信發表了。蕭同志的幾句話，完全是想把「無政府黨」人近來把持教育，欺騙青年之種種反革命的事實寫出來，所以提到了勞動大

學。他是想對於辦學的人之卑劣的手段加以槍譏，並非是對於求學的人有所非難，你不要誤會好了！並且我們這堅決的相信，青年們總是想革命的，要向上的。不過我們所願慮的，也就正是如先生所說的：「可憐一般無知的天真爛漫的中學生，被無政府主義而犧牲了。」若果真是被無政府主義而犧牲了呢，殆還可以說有巴魯寧，蒲魯東在，西天爺爺面前替他們伸冤，只可憐是被「吳」政府主義，「李」政府主義，「易」政府主義而犧牲了呵！你看，那裏有好稱為無政府主義的學校中，把思想進步的同學包圍搜查，披查不已，還要把這些思想進步的同學，親身歷解司令部裏去的道理！這箇要以司令部做護符，要逮捕思想進步的「中國無政府黨」，青年學生被他們犧牲了，你說究竟要向何處伸冤！究竟可惜不可惜呵！！

你最後的抱負，真是使革命的同志們抱十二萬分的希望與同情！你說：「你們要把勞働大學從「無政府派」的束縛下解放出來，造成一箇真正的解放農工，真正為農工利益而奮鬥，為三民主義而奮鬥的「勞働大學」，這樣，真不愧為革命的青年，望繼續，努力！又我們這箇刊物，是革命青年們共同發表言論的刊物，你們有什麼意見，儘可以多多的來討論。

編輯先生：

革命評論的「不附理由」停刊後，青年們感到異常的沉悶，整個的反動勢力的壓迫，革命勢力的分裂，使全國的民衆陷於絕望的地步。鄉村，尤其是封建勢力支配着的鄉村，農民的痛苦更是不堪言狀！就如我們太倉縣而論，苛捐雜稅的各式各樣的名目竟有十幾種之多，封建地主便居於統治階級的地位。長此以往，中國革命的勢力亦許要完全消滅呢！

這次民衆先鋒的出世，代替了革命民衆的喉舌，對反動的統治階級予以正義的攻討，對革命的痛苦民衆予以切實的指引，每一句話都好像是我們痛苦民衆自家所說的一般，這一點，實在值得我們敬慕的！

在這反動勢力準備着對革命的民衆進攻的現在，我們將怎樣開始我們的工作呢？改組，這個口號已經提了許久了，然而改組的方案呢，到現在我們都不知道。我們民衆們實在等得不耐煩了，我們實在再耐不住反動派的摧殘了！

編輯先生：在這兒我想提出幾個問題來請先生切實地指教我。

記者十二月二十七日

1. 我們到底怎樣改組國民黨？以革命的手腕還是以合法的手腕？

2. 何時才能實現黨的改組？我們實在等得不耐煩了。

3. 你們對於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態度如何？

4. 左派是否將來要與資產階級妥洽，抑係單獨地幹下去？有人說，左派恐有與資產階級妥洽的可能。確否？果爾，那我們真有點着急了。

以上幾點，望先生在民衆先鋒上簡要地答覆。敬請

撰安！並祝

努力！

陳國寶敬上一月十五日

國寶先生！

你的信收到得太晚了，我們到現在才能夠答覆你，抱歉得很！

(一)你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大概見之於本刊第三期和第四期，而尤其是在第四期，先生看後，當然就可以明白了。用合法的手段來改組，是等於吳稚暉所謂之「整理」，簡言之就是妥協，我們已有批評，此處可以不講。

(二)何時能實現黨的改組？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要看革命民衆的努力。中國革命不是短時間可以能成功的，還

是大家耐煩點等，努力點幹！充分點預備。

(三)對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意見，大概見之於上述一文中，若果稍微懂得革命的同志，我想不會對於這個(善後會議第二)還有什麼希望要去爭選吧！

(四)第四個問題，本來我們可以不予答覆，因為將來的事，將來有事實證明，也要到將來才有事實來證明！不過我們以為革命是大多數人的事，大家只要有勇氣來幹，是用不着着急的；誰妥協了資產階級，誰就離開了革命，這有什麼要着急的可言？若果要革命，先要把照妖鏡照照，等到照了以後再來革命，那嗎，恐怕永遠就不能革命，革命是唯實的，不是唯心的，先生以爲何如？

記者一月二十八日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女子，處於現在反動局面之下，本來沒有我們女子講話的餘地，所以我噤了口將近一年多，但是在現在封建勢力支配着黨，腐化勢力充實了政府的時候，我再也不能忍耐了。我雖然是一個女子，但是總覺得是一個人，不問局面如何反動，我總要開口了。

自從連環先生自海外歸來以後，中央差不多成了他囊中之物了。他老人家維恐不能包辦第三次。代表大會，所

以他拉攏西山會議派和無政府派開了一七九次的中央會議，議決了——延長登記，指派代表——兩個亡黨的議案。經各處黨部的反對起，「指派」改為「圈定」，不論他指派亦好，圈定亦好，我總覺得是違犯本黨組織原則的——民主集權制。現在我們本縣將開始選舉了，我們應該根本反對呢？或者是跟着他們去做連環先生的走狗呢？

蔣蓮貞一月二十三日

蓮貞先生：

先生既然覺得「指派」，「圈定」是違犯了本黨組織原則的民主集權制，又知道這次第三代全國代表大會是拉攏西山會議派和無政府派來包辦一切；那嗎，這個背叛了黨，背叛了民衆的會議，當然是應該起來反對的！

記者二十八日

編輯先生：

在上一個禮拜天，有個同學從上海放假回來，帶了一本新出版的民衆先鋒給我，我費了半夜的工夫一口氣讀完，真可以說是把我們青年所要講的話，都從心坎裏挖出來的講盡了！這是在叫我們何等愉快的事呀！真是在這半年來所沒有的愉快！但是我以後想買也買不到手，在報紙上我也找不出來，難道你們只出一期就完了嗎？爲什麼報上

又沒有廣告？爲什麼只看見「革命週報」「中央半月刊」的廣告，獨獨沒有看見貴刊的廣告？但是革命週報是無政府黨的刊物，無政府黨的刊物都可以大大的登廣告爲什麼貴個不能登廣告呢！

王宇仍寄自鎮江十二月二十三日

宇仍先生：

民衆先鋒在鎮江買不到，報上也看不見廣告，這並不算稀奇，也並不是我們的過錯，恐怕只可以說是中國現社會的過錯吧！你偏偏只能夠看見你所不願意看見的「革命週報」和「中央半月刊」的廣告，而不能夠看見你所要看見的民衆先鋒的廣告，這也不算稀奇，你曉得「革命週報」，「中央半月刊」後面的鎗桿子多厲害嘍！

記者一月二十八日

編輯先生！

我對於國民革命，本來是沒有好大的認識，不過在每次開會的時候，照例總要恭讀總理遺囑的。遺囑上明明是寫着廢除不平等條約及開國民會議的字樣，廢除不平等條約是打倒帝國主義的先聲，開國民會議是打倒軍閥的第一步。所以我曉得打倒帝國主義與打倒軍閥是中國國民革命的任務。但是現在事實上處處投降帝國主義，處處妥協軍

轉 載

天津特別市黨部通電

閱；「廢除不平等條約」改爲「修改不平等條約」，這不是投降了帝國主義麼？張學良明明是關外皇的軍閥，而現在他居然做了黨國要人國府委員了，這不是妥協軍閥麼？還有，黨權的墮落，政治的腐化，好像和未革命以前一樣，或至于還要甚些。這些已經證明革命失敗了，但是我相信帝國主義沒有打倒軍閥沒有剷除民衆痛苦沒有解除以前，革命是不會中止的，不過現在南京政府成了新軍閥士勞的大集團，南京黨部成了反革命者欺騙民衆的工具，在事實上已經不信任南京政府再有革命的可能了。然而在這黑暗局之下，我們革命的青年往那裏跑呢？進共產黨呢抑進第三黨呢？或者是留在南京的國民黨裏跟着腐化呢？請先生指引我一條光明之道吧！

金生于常州一月二十四日

金生先生：

你這封信我現在沒有很多的功夫，只好簡單的來答

覆。

我的答覆是：革命是要把社會上客觀的需要做前提，不必以個人主觀的感情作孤注。中國目前所需要的究竟是那種革命？先生既是痛心於目前政治的腐化，黨的墮落的一個革命青年，那嗎，所謂「留在南京跟着南京的國民黨腐化」的一箇問題，當然是憤激之辭，或者是不得已之辭，自然是用不着討論。第三黨的綱領我不知道，行動我沒有見過，不好答覆；中國革命目前是不是由無產階級單獨來領導的社會革命——經濟革命？若果先生也認爲是不可能，那嗎，以中國社會客觀的情形看起來，他所要求的是「一箇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之三民主義的革命，不是其他的革命，也是一箇必然的出路了；我們不必因爲南京的國民黨之腐化不革命，就整個的來懷疑到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黨，以至於徘徊四顧，莫知所從。先生以爲何如？

記者一月廿九日

天津特別市黨部

反胡迎汪之元旦通電

△區歐胡等罪狀

△提出六項要求

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各省市黨部鈞鑒，本黨自清共以後，中央迭陷於殘破不完，初毀於特別委員會，經革命同志，普遍運動，乃始召開中央執監第四次全體會議，同時非法特委員會之壽命，於焉告終，彼時本可推舉中央常委九人負責工作，而自詡為黨國元勳者，乃特先舉五人為常委之說，其四人留待海外同志之補充，但海外之同志有幾，及候補資格之誰屬，本無明文規定。迨五中全會之際，胡漢民，孫科，始自海外歸來，經五個常委之決議，遂補胡孫為常務委員，夫常務委員不經大會推選而私相授受，顯為總章所不容，若以胡孫為海外同志，即為當然委員，是等根據，尤為乖謬，此其違法事實，最為顯彰者也。距今二月之頃，鄭州市指委固會通電歡迎汪兆銘同志返國主持黨政，乃適觸中央之怒，而嚴電散解之，意又何居！汪獨非海外同志，獨非中央執委耶，何其以意高下，前後矛盾若是？最近 179, 186 兩次亡黨決議案，至誘起全國黨員之抗議，而不稍顧恤，尤為破壞民主集中之精神，

即五中全會決議案，如各地政治分會限十七年終一律取消，及十八年元旦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係何等重大，乃皆此二三非法之常務委員，輕輕推翻，飾詞委之於三全代會為之追認，違反黨章藐視紀律，莫為此甚；若常任此腐化勢力所轄籌之少數份子，把持中央，評外交則一味屈從，語內政則萬端廢弛，黨國危亡，可立而待矣！本會迫於愛國愛黨情緒，不忍不言，言而獲罪，聽之而言而與邦。則固所願也，今請以六事要求如下！

1. 否認非法常委及其 179, 186 兩次決議案
2. 反對以軍治黨
3. 一致拒絕現役軍人充黨務指委
4. 不承認現在不健全及違反之中央有召集三全代會之資格
5. 歡迎汪兆銘先生回國主持黨政解決一切糾紛恢復本黨十三年改組之精神
6. 敦請離職各中央執行委員速回中央主持黨政

天津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印

十八年一月一日

